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④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④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章开沅 编译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④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章开沅 刘家峰 黄怀玉 王薇佳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章开沅编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05. 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026-3

I. 美... II. 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045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四册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章开沅 编译

责任编辑 蒋德群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页 4

字 数 38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26-3/K·513

定 价 24.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昇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孟国祥 经盛鸿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 琳 吕 斌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郭整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 |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袁静文 | 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 |
| 刘玉飞 |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
| 奚欣华 | 安徽大学副教授 |
| 罗文文 |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 19 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 8 月 15 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 年 8 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 20 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 1116 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 年 5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满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其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

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

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拉贝日记》的发现并以多种文字出版,无疑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大进展,为这一历史事件又提供了一部翔实而系统的实录。但我们也应该注意,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以及该委员会成员的私人日记、信件、备忘录,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我在1988年6月初次利用耶鲁神学院特藏室(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Yale Divinity School)的档案,即已发现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1991年,我又在这个特藏室整整工作了八个月,主要是系统研究贝德士文献,并将其中较重要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及部分委员会成员的信函、日记,有选择地加以复印或做笔记。同时,也请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mory of Victim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同事吴章铨先生前来复印同样一套。1994年至1995年上半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利用上述文献撰写和编译了两本书——《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6月版)。由于这两本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利用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和作为该会成员的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文献,所以海内外许多新闻媒体特别关注并争相报道。我的金陵大学的两位前辈学长、台北金禾出版社负责人郭俊铎与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由于都曾受教于贝德士博士,所以对这批文献尤为重视。他们与我商定,将其中一部分影印出版,使全世界都能看见它们的本来面目。作为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便

2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是由玛莎·斯莱莉主编的《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Edit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 New Haven, 1997*),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刊》第9期名义出版问世。

耶鲁此书更为详尽地公布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分布情况。

表列如下:

姓 名	编 号	内 容
Bates, M. S. 贝德士	RG10: B1, F7—11 RG10: B4 RG10: B86, B87, B90 RG10: B102, F861—871 RG10: B103, F872—873 RG10: B126, F1 132, 1 137	给妻子和儿子的家信 与南京日本大使馆的来往信件,与金大创建者会以及田伯烈(Timperley H. J.)的通信 贝德士的有关文章,抗战期间有关南京的资料,有关中国政治与宗教局势的资料,传记资料,包括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作证词的副本
Fitch, G. 费吴生	RG11: B9, F202	信函
Forster, E. 福斯特	RG8: B263—265	信函,收集的文献和照片
McCallum, J. 麦卡伦	RG8: B119, B22x	“1937年冬至1938年日军在南京暴行述实”口述历史副本
Magee, J. 马吉	RG8: B263	福斯特文献所收信件,介绍他的影片
Mills, W. P. 米尔士	RG8: B141	给妻子的家信
Smythe, L. S. C. 史迈士	RG10: B102, F864—869 RG10: B4, F67 RG11: B225, F3 815	信函,《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

续表

姓 名	编 号	内 容
Vautrin, M. 华 群	RG8: B206 RG11: B134, F2 698—2 700 RG11: B145, F2 870—2 881	日记、信件、报告
Wilson, R. O. 威尔逊	RG11: B229, F3 874—3 876	信件, 报告
Bauer, G. 鲍 尔	RG11: B205, F3 489—3 493	与南京事件有关的记述(下同)
Buck, J. L. 卜 凯	RG11: B208, F3 537~3 542	
Caldwell, O. 卡德威尔	RG11: B209, F3 547	
Daniels, J. H. 谈和敦	RG11: B212, F3 603—3 606	
Garside, B. A. 贾义德	RG11: B10, F231—234 RG11: B136, F2 745	
Javis, A. M. 贾维丝	RG8: B103, RG11: B139, F2 783	
Kirk, F. 克尔克	RG11: B138, F2 761—2 763	
Riggs, Charles and Grace 林查理夫妇	RG11: B224, F3 787, 3 788	
Spicer, E. 斯派司	RG11: B142, F2 827~2 829	
Steward, Albert and Celia 史德蔚夫妇	RG20: B10, F220	

RG8: 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

RG10: 贝德士文献

RG11: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4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RG20: 史德蔚夫妇文献

此外,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档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Sterling Library)还保存着帕克斯顿文献(John Hall Parxton)。帕克斯顿是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南京副领事(1925—1929)、驻南京大使馆二秘(1937)和上海总领事馆派往南京官员(1938—1942)。

我已出版的两本书和耶鲁神学院新近出版的这本书,主要是利用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与刚刚出版的《拉贝日记》,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

以下,我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是它的真实性。

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早在当年就曾被发布和利用。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日军暴行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Tilman Durdin),他从1937年12月18日开始在该报发表连续报道,其中12月22日一篇题为《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 Missionaries Discribe Nanking Reign of Terror*)。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王世杰先后在1937年12月15日与1938年1月10日与2月14日的日记,都提到贝德士所陈述的日军烧、杀、淫、掳等滔天罪行。后经政府新闻媒体的传播,这一事件遂广为外界人士所知悉。当然,影响更大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相继出版的两本书。一是《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在伦敦与纽约出版的《战争意味什么? 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Modern Age Books Inc., London, New York, 1938);一是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辑并在上海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文献》(*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British Kelleg and Walsh Firm, Shanghai, 1939)。这两本书都收入了国际委员会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该会历次正式陈报的编号为444件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案例。现在,我们如果把已出版的这两本书和《拉贝日记》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国际委员会原始文献加以对照,便可发现它们的记述基本一致,而耶鲁馆藏更是目前保存得最好和最多的国际委员会

档案全宗。

第二是它的完整性。

从时间而言,田、徐两书和《拉贝日记》所收国际委员会文件只到1938年春季为止,而贝德士等文献所收该会档案则到1940年为止,比前者多两年有余。从文献种类而言,前者主要是由该会主席或秘书正式签发的公函及其附件;而耶鲁馆藏除该会正式公函外,还有各难民营向该会报告日军暴行的原件,这些原件正是该会据以向日本大使馆及军事当局及时通报的原始依据。此外,耶鲁馆藏还收有该会主要成员的日记和私人信件,更为坦率而详实地揭露日军各种罪行。如贝德士1938年1月10日辗转送出的秘密信件,同年4月2日马吉牧师为驳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致麦金牧师函,同年4月12日贝德士为说明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编写背景致友人书,以及同年11月29日贝德士就日军在南京地区造成战争损害有关统计数字致友人书,这些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贝德士除揭露日军大屠杀罪行外,还花费许多精力调查研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地区放肆扩展的毒品贸易,保存了许多系统而翔实的记述。此外,贝德士文献中保存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美其名曰“第四日支亲善馆”)海报,上面清清楚楚标明“支那美人”四个大字与该馆地址,并附有贝德士在报纸上发布的批判性说明,这也是有关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是它的客观性。

国际委员会许多成员虽然自称为“南京老市民”,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在1941年以前属于中立国人士。以贝德士为例,作为专注东方的历史学者,贝德士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都具有深挚的感情,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作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们一直呼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他们反对战争,却没有任何先验的成见,是亲眼看见的大量事实使他们作出公正的价值评判。1938年4月2日马吉给纽约J·C·麦金牧师的信中指出:“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确凿无疑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

6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私人之间这样真诚的表露,自然反映了记事的真实可靠。同时,他们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而且也如实地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错误政策。1938年11月29日,贝德士在去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叙述:“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其生活也是严峻的。他们连续数日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带有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他们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友人正受到谴责。因为害怕法西斯国家不高兴,(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博大胸怀,更增添了他们的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第四是它的严谨性。

贝德士是经过牛津、耶鲁等名校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而国际委员会大多数公文签发者——史迈士(Lewis. C. Smythe,国际委员会秘书),则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经他们整理并正式通报日方的日军暴行案例报告,都经过多次核实,并有可靠的知情者作证(凡能公开身份者均署姓名,但大多证人则略去姓名以保障其人身安全)。1938年3月—6月,在贝德士的协助下,史迈士主持编写《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1938年3月》一书(*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这是关于南京地区战争损失状况最早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份调查报告。他们“找到一位富有经验的农业经济专业人员,充当训练调查员和指导制表工作的总管”。还有以前曾为金陵大学卜凯教授大型调查报告——《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制图的人员亦来协助此项工作。由于国际委员会信誉良好,前来应征充当调查员者非常踊跃。除对调查员给以必要方法训练外,还向他们作细致的解释,他们的任务只限于调查事实,不同于家庭救济调查,更不能有意夸大损失。调查对于田野工作程序、资料时间、统计程序、重量单位、面积和币制都有明确的规定,体现了较好的科学规范和

严谨作风,不同于某些浮泛的估量或夹杂情绪性的抨击。正如贝德士为这份报告写的序言所曾指出的:“国际委员会注意到,中国人已经发表的有关南京地区人民损害的报道,对日本人往往有排外的夸大的谴责;而那些由日本人发表的报道,则把焚烧与抢劫说成是中国人干的,是他们自己大发慈悲加以阻止。”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公布此项调查结果,完全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首先乃是与本地和其他地区救济工作相关连的信息,其次则是牵涉或将要牵涉任何国家公民的战争损害”。报告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就是“客观准确”,而其目的无非是让外在世界了解南京地区的事实真相,并为后世留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实录。对于这样严肃的文献材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以高度重视。

但是毋庸讳言,国际委员会档案所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也存在着若干局限性。

一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当时是战争环境,加以日军横行霸道,限制极严,国际委员会对日军暴行的直接了解很难超越安全区以外。1938年3月—6月,他们虽然组织人力对南京地区(包括城乡及邻近县)进行覆盖面较大的战争损失调查,然而已是时过境迁,人口变动太大,受害家庭或全家死难,或逃避外地,而留居本地的幸存者也难免心存顾虑,不敢畅所欲言。在这样异常的情况下,自然很难获致完整准确的统计数字。

也正是考虑到在战争环境进行社会调查的各种困难,史迈士等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在市内每50个居住房屋中调查1个家庭,在农村则是每3个乡村中调查1个乡村,每10个返回农村的家庭中调查1个家庭。这样的调查结果,其意义主要在于说明造成损害的原因(即由于日军暴行所造成),而很难根据这一结果统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确切总数。

二是语言隔阂问题。

贝德士、史迈士等国际委员会成员尽管在中国多年,而且粗通中国语言文字,但他们经常接触的乃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对一般老百姓(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南京方言并非通晓。他们对于日军暴行的记录仍然习惯于用英文,而受害者姓名与肇事地点的拼音便很难回译为确切的中文原称。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必须与其他相关中文资

料相互校核。

虽然存在着这些局限性,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中国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与日寇蹂躏下的南京人民患难与共,不仅竭尽一切努力救援无依无靠的二十多万难民,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者良知与专业训练,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滔天罪行日复一日地如实记录并作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为后世留下相当大数量的宝贵资料。这批资料不仅在东京、南京两次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成为我们现今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

1998年春,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任天石教授与历史系茅家琦教授,鉴于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前身之一,南大本部校园就是原金大校园,而1937年冬奉命留守的金大教职员为救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京难民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敦促我为该社编译一本更为完整并更具权威性的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英文原始文献。作为原金大学生与现今南大校友,我觉得义不容辞。便于同年5月,偕内人黄怀玉女士再次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范围,并复印了一千多页相关档案文献。经与该馆特藏室负责人玛莎·斯茉莉女士协商,决定以她主编的《目睹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1937—1938》为底本,进一步扩充编译。由于多年相知已深,斯茉莉女士不仅同意我翻译此书,而且还充分授权让我根据编译扩充需要利用该馆珍藏的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文献。对于这样慷慨的帮助,我们深受感动并在此谨致谢意。

回国以后,我们夫妇与两位年轻的同事刘家峰先生、王薇佳小姐通力合作,经过近八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将这本新的译作定稿付印。与1995年出版的两本拙著相比,此书取材从“贝德士文献”,扩大到“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编号为RG8)、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编号为RG11)和“史德蔚文献”(Albert and Celia Steward Papers,编号为RG20)。与斯茉莉女士主编的原著相比则有几点变化:1. 原书选录文献数量较少,编译本则尽量作必要的扩充,使读者更为完整地了解日

军南京暴行的全貌。2. 原书正文系按时间顺序,将暴行目击者的日记、书信等分别加以摘录排列;编译本改以人头为序,借以保持各人日记、书信的完整性,使读者了解各个文献的原貌。3. 原书未选史德蔚文献,编译本则给以增补,因史德蔚虽然是在大屠杀以后回到金大,但所见所闻日军暴行甚多,他的当年记载亦可作为重要佐证。此外,书中辑录的有些文献早先的中文翻译每多歧义,我们则一律据原文重新翻译,并尽量作必要的校订与注释,以增强译文的准确程度。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限制与工作中难免的粗疏,误谬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正,帮助我们加以改进。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参照《拉贝日记》中译本,以及国内出版的各类有价值的中文资料结集,这使我们获益匪浅,特别是在人名、地名方面减少若干查寻之苦,在此一并深表感谢。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玛莎·斯茉莉和她的同事琼多年来一直关心并协助我们的工作,鲁斯基金会与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对我们两度耶鲁之行分别给以资助,雅礼协会贾南溪博士(Dr. Nancy Chapman)诸友人为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作了周到的安排,这些深情厚谊都使我们不胜感激。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原金陵大学的两位老学长郭俊铎先生和吴天威教授,如果没有他们的热情与诚挚鼓励,我是很难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坚持10年而不懈怠的。

本书原名《天理难容: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9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南京地区学者汇编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本书经修订收入其中为第四册。此次修订除对原有译文进行了重新校对外,对部分内容作了删减,增录了史迈士的《致贝克函》、宋煦伯的《给上海普莱士博士的信》、田伯烈编著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节录)等材料,特此说明。

章开沅

2005年5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贝德士	1
1. 南京一瞥(1937年12月15日)	1
2. 致日本使馆函(1937年12月16日—27日)	3
3. 金陵大学难民登记的情况备忘录(1937年12月26日)	11
4. 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	16
5. 致美国使馆阿利森函(1938年1月14日—6月16日)	20
6. 致妻子函(1938年2月1日、13日)	28
7. 田伯烈致贝德士函(1938年2月17日)	30
8. 致田伯烈函(1938年3月3日)	31
9. 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4月12日)	34
10. 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	36
11. 关于南京经济的一些事实及纪录(1938年5月1日)	37
12. 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函(1938年5月11日)	40
13. 关于毒品问题的公开信(1938年11月22日)	41
14. 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11月29日)	46
15. 贝德士夫妇致国外朋友函(1939年11月28日)	52
16. 在纽约的演讲记录(1941年6月25日)	57
二、费吴生	64
1. 日记(1937年12月10日—1938年1月下旬)	64

2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2. 致朋友函(1938年1月6日) 85
3. 致施彼得函(1938年2月14日) 87

三、福斯特 90

1. 致妻子函(1937年11月23日—1938年2月13日) 90
2. 致家人函(1937年12月7日) 130
3. 致朋友函(1938年1月14日) 133
4. 致家人函(1938年1月21日) 135
5. 致家人函(1938年2月10日) 136
6. 致主教函(1938年2月10日) 139
7. 致美国大使馆函(1938年3月10日) 141

四、马吉 144

1. 致妻子函(1937年12月12日—1938年2月5日) 144
2. 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年2月16日—17日) 172
3. 致麦金函(1938年4月2日) 175
4. 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 178

五、麦卡伦 203

1. 致家人函(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 203

六、米尔士 218

1. 致日本大使馆函(1937年12月22日) 218
2. 致妻子函(1938年1月24日) 219
3. 致美国大使馆函(1938年1月15日) 223

七、史迈士 225

1. 致家人函(1937年12月20日—1938年1月9日) 225
2. 致朋友函(1938年3月8日) 274
3. 现状记述(南京1938年3月21日) 286
4. 致贝克函 288

八、史德蔚 297

1. 日记选译(1938年12月10日—1940年3月23日) 297

九、华 群	308
1. 第一个月的评述(1937 年 12 月 13 日—1938 年 1 月 13 日).....	308
2. 作为难民营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8 年 1 月 14 日—3 月 31 日)	323
十、威尔逊	334
1. 书信(日记)选译(1937 年 12 月 15 日—1938 年 1 月 9 日)	334
十一、宋煦伯	353
1. 给上海普莱士博士的信	353
附 录	357
1. 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节录)	357
2. 外文资料中常见外国人士姓名对照表	390

一、贝德士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年5月28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父亲是一位牧师,曾任哈莱姆学院院长。1916年贝德士获得哈莱姆学院学士学位,并得到罗兹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深造。随着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前往美索不达米亚服役直至战争结束。他回到牛津完成学士学位并于1920年毕业。同年夏天被基督会(the 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任命为传教士,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23年与莉丽娅·罗宾斯(Lilliath Robbins)结婚,后者是加拿大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4—1935年,贝德士作为洛克菲勒基金学者在哈佛大学进修日语与俄语,1935年在耶鲁大学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贝德士独自在城内,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正滞留日本。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屠杀和强奸暴行下保护中国平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为加强他对付日本人的力量,金陵大学董事会在1938年1月13日任命他为副校长。南京沦陷不过两天,他就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对日军暴行的第一次抗议,接着是他那著名的1938年1月10日的抗议信,其复印件被送到国统区。

贝德士是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纽约,1938年6月)一书的主要筹划者。除了七次短期出访日本和一次出访印度参加会议以外,贝德士从1937年到1941年一直留在南京,向日本当局的暴行,特别是毒品贸易挑战。他代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南京地区粮食调查》,另一本是《南京人口》,两者都有助于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战后他奉召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和随后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1. 南京一瞥(1937年12月15日)

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声誉异常败坏,失去赢得中国居民和外国舆论尊敬的重要时机。这一地区中国政府的可耻溃败与中国军队的瓦解,使为数众多的人们期待着日本吹嘘的秩序与组织。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的紧张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至少是可以免于对溃散士兵的畏惧。他们确实是未对城市绝

2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大部分造成严重破坏就跑掉了。

但整整两天的频繁屠杀、大量反复不断地抢劫与对私人住宅的肆无忌惮的干扰并对妇女安全的危害,改变了整个城市面貌。曾在南京旅行过的外国人报告,许多市民的尸体躺在街道上。昨天在城市中心,他们估计尸体布满整整一个地区。死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13日下午和晚上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的,这一天正是日军进城的日子。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大街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绝大多数暴行都异常残酷。暴行在安全区一如其他地方,许多案件为外国人和有身份的中国人亲眼目睹。若干刺刀伤害残酷绝伦。

成群男子被日军当作以前的中国士兵抓走,捆绑起来并枪杀。这些士兵早已抛弃他们的武器,有些还丢掉军装。我们迄今尚未发现这些群体以外的被日军抓住的其他人确实或显然送去处决的迹象,日军保留一些男人,带到其他地方去充当抢劫物品与装备的临时搬运工。日军迫使当地警察,从安全区一所建筑物内挑选400个男人,捆绑成50人一组,在步兵和机枪手的行列间行进。他们的命运留给目击者的解释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士兵在主要街道上曾有小的抢劫,大多是食品店和窗户没有防护的房屋,现已转变成日军在高级军官眼皮底下逐个铺面的系统破坏。日本士兵需要各自的挑夫帮助他们搬运大量赃物艰难行进。食品显然是第一需要,但也不放过任何有用的或值钱的东西。全城成千上万私宅,有人住的和空着的,大的和小的,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都一律遭到抢劫。特别可耻的士兵抢劫案例有如:许多难民营和庇护所内的难民的有限现金和值钱物品在大搜捕时被抢走;大学医院职工的私人金钱和手表被夺走,还有护士宿舍中的财物遭劫(这是美国人的房屋,与其他许多房屋一样被洗劫,尽管飘扬着外国国旗并张贴着他们可敬的使馆^①发给的布告)。

有许多奸污妇女的报告,我们还来不及加以核查。但以下案例已足

^① 这里是以讽刺语气叙述日军无视日本大使馆保护外国产业的布告。

以说明情况。在紧靠我们外国朋友的一所房屋内,昨天有四个少女被士兵抓走。有外国人在一个新近到达的军官的住所内发现八个年轻姑娘。该住所附近已没有中国百姓了。

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惟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

毫无疑问,展现在南京的(日本人)的恐怖行为,并不代表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必须要有负责任的日本政治家(军方和政界),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迅速而有效地挽回这些天来日本的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受到的损害。有一些日本士兵和军官,其举止如同绅士,与他们的职业及日本帝国(地位)相符。但是,就整体而言,这对日本的形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RG10,B102。这是提供给报刊记者的新闻稿。]

2. 致日本使馆函(1937年12月16日—27日)

12月16日

我非正式地提请您注意有关邻近贵使馆的大学财产的公共安全与秩序问题。我们全都听到日本官方的正式声明,皇军不愿伤害普通公民。我们希望任何经贵方授权的政府不难恢复和平生活。但现时平民的痛苦与恐怖甚为严重。下述案件就发生在贵馆近邻的金大校园,其他许多案件发生在我们的医院与附中,以及附近的农业专修科学校。

(1) 12月14日——士兵撕毁美国国旗和张贴在农经系(小桃园)大门上的(日本)使馆布告,抓走教师与助手,而且不等找来钥匙就打开几扇门。

(2) 12月15日——上述地点士兵数次前来,从收容于此的难民身上抢走现金与其他物品,也抢走女人。

(3) 12月15日——在我们的新图书馆,收容了1500个平民。其中有四个妇女在校园被强奸,三人被抓走,再未回来;一人被抢走,但在邻

4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近贵馆处被日本宪兵释放。士兵此类活动,给这些家庭及其邻里乃至这一地区带来莫大的痛苦与恐怖。今天上午我接到报告,在难民区其他地方有百余起类似暴行。那些案件目前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我之所以提到,无非是说明作为贵馆近邻金大的问题,乃是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巨大灾难之一例。

我们急切期望军队恢复纪律。现在恐怖是如此登峰造极,老百姓甚至不敢出来谋求食物,已不可能再有正常的生活与工作。我们恳求阁下安排官员直接指导下的例行适当检查,以免成群游荡的士兵每天进入同一地点十多次,并且从平民那里抢走所有的食物与金钱。其次,为了日本军队和日本帝国的名誉,为了日本当局与中国平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为了你们思念的自己的妻子、姐妹和女儿,我们呼吁你们保护南京的数十万家庭以避免士兵的暴行。

中国军队的溃败,给日本军队一个赢得(中国)平民信任的机会,但不幸这一机会已由于拖延与所发生的一切而失去,这无论对于人类公益或道德而言都是如此。

12月16日,星期四

请允许我对今天上午给您的信的第(2)项略加补充。

在我校农经系(小桃园)被奸污者超过30人,这是昨晚不断前来的大批日军所为。我已全部核查过此事,确知报告事项的准确。

城市这一部分的情况确实极为悲惨。我们深信你们对军事当局已有足够的表示,同时也表现出有足够的同情心。对于数万平民而言,保全性命乃是当务之急。

金陵大学位于安全区,直接受该区的环境与存在问题的影响。某些(日本)官员曾经表示友好与了解安全区工作的宗旨。其他的人表现得冷酷与猜疑。请他们弄清楚(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开办到现在所做的一切。每个办公室、房屋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行动,每天都是敞开门户接受检查。委员会将为正常局势的恢复及其不再有人道主义的救济而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仅仅是尽最大的努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那些被战争从家中赶出来而仍生活在极端恐怖中的人们,提供住

处和食物。

12月17日,星期五

在你们的建筑(指日本使馆——译者)中就能看到,在你们近邻,恐怖与残忍的行为仍在继续。

(1) 昨夜士兵不断来到我们收容大批难民的图书馆,以刺刀强索钱财、手表和妇女。人们已无钱财和手表,过去两天已被抢过多次,这些士兵打破窗户并且粗暴地推搡他们。我们有位职员在这种情况下被刺刀戳伤。

(2) 在图书馆,一如在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昨夜有多名妇女被士兵奸污。

(3) 士兵殴打我们的门卫,因为他没有为士兵准备姑娘以供蹂躏。

(4) 昨晚我们几所挂有美国国旗和张贴使馆布告的美国人住宅,被游荡的士兵闯入,有些被闯入数次。这些住宅包括我们三位美国同事正在居住的房屋。我们请求你们作一比较,这些行为只是发生在南京大量居民家里的小小事例,而贵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则声称关切中国百姓的福祉以及保护外国财产。

我们不愿强调私人事务,提出另外两个事例,目的仅在于说明无约束的士兵狂野放纵的程度。昨天我们一位美国同事被一个干坏事的军官殴打,晚间我和另一美国同事被一喝醉酒的持枪士兵从床上拖起来。

这封信并非要求对大学给予特别保护,而是强调作为你们的近邻,所有和平居民的灾祸已经异常危急。

我们相信日本军队有力量与效率来维持正常的举止,给沦陷区人民一个在秩序良好环境下工作与生活的机会。

12月18日,星期六

由于士兵们的暴虐与抢劫,到处仍然是悲惨与恐怖。超过 17 000 人,多数是妇女与儿童,现正住在我们校园,渴望安全保障。他们继续大批拥进,因为别处情况比这里更为恶劣。不过我必须将过去 24 小时这相对“良好”的处境的记录送交给你们。

(1) 干河沿金大附中。一个恐怖至极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另一个重伤垂死。八个妇女被强奸。我们的几位同事,试图为这些可怜的人送点食物并加以照料,被士兵们无缘无故地殴打。士兵不分昼夜,多次爬过围墙。三天来,许多人无法睡眠,出现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如果这种恐惧与失望导致被士兵强暴的妇女的抗拒,将要造成毁灭性的屠杀,而你们的当局将为此承担责任。美国国旗被(日本)士兵无故撕毁。

(2) 金银街养蚕室两个妇女被强奸。

(3) 胡家菜园 11 号农学院有两个妇女被强奸。

(4) 汉口路 11 号,本校职员住宅中,两个妇女被强暴。

(5) 汉口路 23 号,本校职员住宅中,一个妇女被强奸。

(6) 农业经济系(小桃园)的妇女多次惨遭蹂躏,全部逃走。今天上午我到此处查看时,六个(日本)士兵向我逼近,其中一人不断手扣扳机以手枪对着我,而我无非是客气地问他曾否在这里发现任何问题。

上述明白无误的事实,还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浪荡的成群士兵往往一天十次、一夜六次向他们索取妇女和抢劫钱财。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加强约束。获悉贵馆代表宣称,昨夜在这些房屋门口安排有宪兵(在其他难民聚集较多地点亦然)。但(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警卫。由于士兵到处爬墙,少数警卫无济于事,除非是整体纪律的恢复良好。秋山支队司令部设立于前何应钦公馆,给周围造成特殊灾难,可能直至你们的士兵被约束为止。如果将军有此意愿,司令部本来可以成为安全的象征。

此间全城民众由于饥饿而绝望,因为士兵抢走他们的食品与钱财。另外许多人挨冻生病,因为士兵拿走他们的衣服与被褥。日本当局如何处理此事? 每条街道都有带泪与悲伤的传说,哪里有日军,哪里的人和房屋就无安全可言。诚然这并非日本政治家所愿如此,所有南京居民都渴望日本人有所改进。

我深信,如果你们有时间最好与我一道前往某些恐怖与痛苦尚在继续的地区,那里和你们的住所近在咫尺。由于应付七个士兵的所谓的例行公事,他们称之为“检查”,实际上是在寻找可以在晚上抓走的女人,因此这封信的书写曾被打断。

昨晚我睡在这里,并将继续如此,期望多少能给无助的妇女和儿童以支援。其他从事此项人道工作的外国人和我自己都曾受到你们士兵的恐吓,如果我们再遭举止失常的日军伤害或杀戮,其责任由谁来承担是显而易见的。

此信纯属善意并与礼仪相符,但所反映的某些引起不愉快而令人失望的事实,则是我们自日军进城五天以来的亲身经历。亟待解救之道。

您可信赖的
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

12月21日(致福田先生),星期二

根据您今天上午的要求,陈报下列事实,其中大多为我与您会见后所亲眼目睹,其余则为有关民众向我报告并经我缜密调查。

(1) 今天下午士兵从我们图书馆抓走七个人,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职员。没有指称他们犯罪或者是士兵(中国),抓去只是强迫充当劳工,此举完全无视你们的布告。

(2) 在邻近你们使馆的头条巷4号,下午有一妇女被两个士兵奸污。难道这就意味着少数卫兵正在恢复秩序?

(3) 正当我今天与您在使馆晤谈时,我自己的房屋第四次被劫掠。本校其他七所房屋亦于今日遭劫,还有一些房屋数次被闯入。

(4) 大群士兵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放火,使数千民众无家可归并失去恢复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他们(指日兵——译者)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

(5) 双龙巷大学(鼓楼)医院大门今天被砸坏,尽管上面贴有贵馆布告。在医院其他地方,有些士兵正在盗窃一辆救护车,一个美国人及时阻止此种丑行。

(6) 我亲自掌握今天下午五起士兵抢走食物与卧具的案例,通常需要难民作为劫掠物品的搬运者。

(7) 在安乐里我们的教会学校,我回复红十字会急救站一个电话,感谢他们为晚间被索取妇女、钱财的日兵打伤的三个难民治疗。有一个妇

女昨晚在那所房屋的楼上被强奸。当我进去的时候,有两个士兵正在洗劫此处。从事医务工作而且人品很好的人士说,昨晚在高家酒馆 58 号,两名妇女被奸污……

(8) 我从五台山南部几百家穷人的草屋回来,有人说昨晚的情况略好于以往,另一些人则说情况更糟,日本兵仍然四处搜寻妇女,抢劫钱财,夺走车夫赖以为生的人力车。

(9) 昨天美国小学(五台山)的美国国旗再次被士兵扯落并践踏。士兵威吓工役及其他人说,如果有谁再升此旗则立即处死。

我感到昨晚被奸污与伤害者略少于前晚。但抢劫、非法闯入和可怕的焚烧仍在继续,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糟。国际委员会两个成员驱车数英里,也看不到一个宪兵。他们(宪兵——译者)毫无效率。

如果(日本)将军们意欲毁灭民众房屋并抢走他们最后一点衣物钱财的话,那么最好明说,而不要以虚假的恢复秩序的希望来欺骗他们(指难民——译者)和我们。

12 月 22 日,星期三

据报告,少数地方昨晚和今晨的情况略有改善。但可耻的罪行仍在继续,一如所陈下列事项:

(1) 今晨将近 5 时,金大图书馆的七个男人突然被抓走。士兵破门而入,尽管有宪兵目睹一切。下午以前,士兵横暴之至,没有任何人敢给以警告。稍后士兵又抓走另一个男人。昨天从此地抓走的七个人,其中包括我们的职员,自此毫无音信。如此恐怖与危险,已不可能找到承担日常事务的工人。

(2) 昨晚 10 时,四个士兵乘摩托车来到大学校门。一个士兵用刺刀阻止看门人去找(日本)领事馆警察劝他们离开。今天上午 10 时以前,士兵进入校园五次,撕毁宪兵通知。

(3) 今晨士兵继续进入校园宿舍包括美国人住房抢劫。

(4) 我和我的三个同事,今天上午分别到几条街道办事,没有看到一个宪兵。我们知道有宪兵,但为数极少且过于宽容,所以很难维持纪律。

(5) 用卡车有计划地抢劫,继之以焚烧。这就使得无家可归、贫困失

业的民众与日俱增。

(6) 昨夜七个士兵进入金陵女子神学院寻找并奸污妇女。

(7) 据报告,(日本)士兵公然在宪兵注视下进入几处难民营搜索妇女与金钱。

(8) 昨夜金大农经系(小桃园)被士兵骚扰,大量门户损毁。两天以前士兵拿去钥匙,他们抓走工役至今未放。

(9) 今天上午,士兵一如往常,多次闯入金大蚕桑系。其中一人喝醉了,抓了三个难民搬酒,到处偷窃,在难民群中抢劫并开枪三次。

(10) 想必您会对一位可靠的邮局职员的陈述感兴趣,大量信件已被游荡的士兵拆开,不知道有多大损失。这些信件,既有寄往国内的,也有寄往国外的,在此前作战的日子里未曾寄出,安全保存于邮政总局(Chi Wang Chieh, Chien Kyang Lu 为上述邮局职员姓名)。

上述案件仅属我亲眼目睹或亲自核查之事例,表明并未真正加强纪律。许多难民早已被抢走全部钱财、手表,并被士兵殴打,特别是在晚间,因为他们已无法满足其同样的要求。

12月23日,星期四

有好几天我试图克制自己以免再麻烦你们。但每一天都出现许多麻烦,今天之恶劣更有甚于寻常。没有纪律和长官(约束)的新来的成群的游荡士兵到处偷窃、强奸并抓走妇女。下面是若干事例:

(1) 就在此刻日本兵强行进入校园,抢走为难民供应大米的卡车。

(2) 我校蚕桑系一带平均每天发生十起以上强奸或抓走妇女案件。

(3) 日本士兵仍然日以继夜进入我们的住宅,蹂躏妇女并偷走他们需要的东西。此处所指住宅,包括美国人正居住者,一如其他住所。

(4) 日本士兵经常撕掉贵国宪兵张贴的告示。

(5) 今晨我校一位美国职员被一个日本军官殴打,后者突然逼近他,试图扯掉贵使馆发给的袖章。

(6) 上面没有提到的建筑物,每天也有日本士兵无视贵方告示而多次进入,以抢劫、搜寻妇女。

(7) 虽然骚扰完全由士兵造成,但我们没有任何警卫,也没有在我们

附近派来宪兵。

12月27日,星期一(致日本使馆官员)

从一周以前开始,你们曾向我们许诺,在几天之内通过调换部队以重整纪律和秩序,增加宪兵等等。然而可耻的混乱仍在继续,我们看不到日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制止混乱。请允许我仅就邻近贵馆的校区略举数例,尚不包括校园的其他部分:

(1) 昨天下午,在上海路农业专修科学学校(阴阳营),一个士兵割断(旗杆)绳索,取走美国国旗。

(2) 昨夜11时至12时之间,三个日本人乘一辆摩托车来到金大正门,自称系司令部派来检查。他们强行阻止门卫报警,并且抓住他,随即发现并强奸三个妇女,其中一个仅11岁,另一个被他们带走。

(3) 游荡士兵继续抓男人为他们服劳役,导致更多恐惧与不便。例如,昨天一个士兵坚持要从医院带走一个工人;我们的仆役与门卫有数人被拉走。

(4) 我们的多处宿舍,每天有士兵进入,搜索妇女、食物与其他物品。例如,今晨一小时内就有两处房屋被闯入。

(5) 从金陵女子神学院索取妇女。铜银巷(Chien Ying Hsiang)被贵方士兵严重骚扰已久,我记得您许诺给予特别保护,——但并无宪兵在这里出现。昨天有3~4人一群的小股士兵,他们七次来抢衣服、食物和钱财,而这些难民早已被抢得所剩无几。他们强奸了七个妇女,包括一个12岁的女孩。晚间大群士兵,从12到14个,四次前来,共强奸了20个妇女。

所有民众的生活充满痛苦与恐怖,全由(日本)士兵造成。你们的官员许诺给民众以保护,但你们的士兵每天前来严重伤害数百难民。有少数警察在若干地点提供帮助,我们感激他们,但这并未带来和平与秩序,而只是把士兵的恶行引向那些没有警察值勤的邻近房屋。

难道日本皇军全然不顾及其名誉?难道日本军官不想履行其决不伤害平民的诺言?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一个士兵从我们一位教员的住宅带走一个

妇女,并且举枪阻止一个美国人进去。这就是秩序?

许多难民现在很想回家,但他们又不敢回,因为强奸、抢劫和抓走男人,每日每夜都在持续。除非大力增强秩序,用更多的警察与切实的惩罚,否则很难有任何成效。少数地方略有改善,但在两周军事恐怖主义(army terrorism)之后丑行依然如故。现在需要比许诺更多的东西。

顺致带有敬意的忧虑与渴望。

[RG10,B102,F865。贝德士致南京使馆信件副本开头注有“不得出版”字样,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不想过早激怒日军,使难民区遭受更大损失。同时贝德士对副本格式有所解释:“每个新的日期代表一封分开的信,但誊写时连接在一起以节省篇幅。”]

3. 金陵大学难民登记的情况备忘录 (1937年12月26日)

登记在主要是由妇女居住的主楼进行的。由于那里男性相对较少,日本军事当局把新图书馆的2000多名男性也弄了过来。在斯威泽堂(Swaze Hall)前的网球场上聚集的3000多男性,有200~300人在听了半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后站了出来。训话的大意是:“所有当过兵的,或干过强迫劳工(在军队)的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主动站出来,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还有工作。如果不站出来,一经检查发现后,你们将被枪毙。”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几名中国人不断地重复着上面这些话。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拯救他们的同胞,使之免遭前士兵和那些被错误地指控为是士兵的人的厄运。H·L·索恩先生、C·H·里格斯先生还有我自己都清楚、完整地听到这些话,许多金陵大学的中国教工也听到了。一些中国人认为站出来的那些人是由于恐惧或是误解了强迫劳工一词的意思。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相当多的人从未当过兵。

我们后来发现,实际进行登记的军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

的,当然这不是在赞扬他们,或免除他们应该对他们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所犯罪恶的责任,这些罪行是在登记过程中,在军官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天一早,那位军官就要在美国财产内进行登记,并请求我的许可,这在日本占领期间是罕见的。此外,他和其他的军官在开始时还不辞辛劳地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惧。尽管有可怕的结果,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真诚的。还有,尽管日本士兵从剩余的人中挑出了几乎 1 000 人进行检查,但当这些人排着队一个个地被检查时,许多中国人为他们进行随意的“担保”,除一人之外,这位军官允许这 1 000 人去进行登记。在索恩先生和我自己一起为这个人请求后,这位军官让这个人走了。此外,中午前,军官们要我们给那些“自愿者”(两三百人)提供两顿饭,大米由日本军队的商店提供。即使充当卫兵的普通士兵也还算和善,给(他们)的香烟要多于拳头。下午,这些人分别报了他们的姓名、职务,并被记下。同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另外两名军官来视察,他们至少在这一任务上地位更高,其中一人对所做的事情极端不满意。这人前一天来过大学,表现的非常粗鲁和愚蠢。作为本区的宪兵负责人,我们常常遇到他的邪恶行为和粗鲁的作风。快到下午 5 时时,这两三百人分成两组,由宪兵带走。其中一人后来回顾说,一些卫兵的不同寻常的友好举动使他感到担心。

第二天早上,一名身中五刀的人来到大学医院。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这个人非常清楚地说,他是图书馆的一名难民,但不在网球场,他是在街上被抓的,那天晚上他与来自网球场的那一批人被带到西面的某个地方,大约 130 名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大约 500 名类似的被俘者。

这名受害者后来苏醒过来,发现日本士兵已经走了,并设法在夜里爬了回来。他对南京的这一地区并不熟悉,对具体地方比较模糊。

27 日上午,另一个人被带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是前一晚上被带走的 200~300 人中之,他们中像他这样侥幸逃脱而活下来的有 30~40 人。这个人希望(我们)帮助他和正在排队登记的他的一两名同伴。由于我周围有不少宪兵,我不得不对他说今天是妇女登记,此刻最好不要再说了。后来,我找(他)三次,但没有结果。

在同一天和第二天(27日和28日),我听到消息,并核对了一些详细的报告,内容是被抓走的人中的一部分被5~10人一组捆在一起,然后从一个大房子的第一个房间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或是一个院子,那里有一堆大火。当每一组进去后,其他的人能够听到呻吟和哭喊声,但没有枪声。在绝望中,剩余的60人中大约有20人从后墙逃脱。据说从金陵大学被带走的一部分人被住在附近的和尚救了下来,和尚们向日本士兵请求饶他们一命。(所有间接的报告都提到五台山,这些报告部分是来自和尚的)。里格斯先生在26日晚也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但凭推测,不是同一事件,因为这一消息来得太快了。这些报告的混乱和复杂化令人气馁。几次进一步的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同时,(我们)每天都有其他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压力很大。

31日,两名男子来请求帮助,并向图书馆难民营的一名可信的助手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该助手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进行确认。其中一人坦率地承认他是一名士兵,因此可以假设他的可信度较高。他们称从金陵大学被抓走的200~300人被分成了多组。他们自己先被带到五台山,然后到汉西门外的河边,在那里一挺机关枪向他们射击,他们倒在死人堆里,并用血在身上涂抹,其中一人受伤。

1月3日,安排了与12月26日事件中的五位幸存者中的两人进行面谈,他们都是图书馆难民营的。其中一人是第一批从金陵大学被带走的,他证实了27日、28日在五台山有关房间和火的描述。他估计他们当中有80人遇难,40~50人逃脱,其中一人被刺伤,现在图书馆,可以过来讲述同一事件。第二个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在描述和回答质疑时非常清楚和具体。他是在第二组,被带到五台山一座寺庙对面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一地点被很有把握地确认为上海路上的两座建筑之一,或是在与上海路连接的一条小巷,该巷离美国学校南面不远)。在那里,他注意到中国和日本和尚在悲哀地祈祷,并在庙的入口处挂长纸条,他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第一次听说南京有日本和尚,我怀疑地问他,他怎么知道那是日本和尚。他回答说,他的袜子的大脚趾是单独分开的。后来我得知他在天津住过,在那里他自然地了解了这一细节。几天后我自己在上海路上看到日本和尚)。由于感到气氛不对,他向一名比较友好的卫

兵表示了他的担忧,该卫兵用树枝在地上写了“太君命令”。他和另一个人被用电线在手腕的位置捆在一起(他没有说到其他的人)。三十多人被带到汉中门,过了河,在这里,有四五个人在绝望中,利用黑暗和城墙逃离队伍,找了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根据月亮判断,他估计时间大约是1时,他听到从北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绝望的叫喊声。黎明时,他在离那个方向不远的地方看到一排尸体,是被刺刀刺死的。尽管非常害怕,他还是安全地通过城门,并悄悄地溜回安全区。

对这个人描述和他证词还必须补充两点。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可靠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到汉中门外去查看那里的一大批尸体。国际委员会的克勒格尔先生告诉我在他先前的一次出城冒险期间,他亲自看过这些尸体,但从城墙上看不到这些尸体。城门现在被关闭了。

最初来的那个男子(27日)显然预感到他在登记时会有麻烦,所以话比较多。在1月7日,金陵大学恢复登记后宪兵从他们面前排队经过的登记人中挑出了十个人,我相信他也在其中。在那一星期,从事这一工作的军官似乎得到命令每天必须抓那么多的人,或者也许他们认为不少于这个数就能使他们的上级满意。(很自然,已经没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曾在军队服役过,整个登记程序和开始时已大不一样)。同以前一样,我密切注意这一过程,并根据不断变化的日本人的情绪、个性,尽可能地提供一点帮助。当我发现那个人在日军挑出的十人当中后,在间接的努力失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把一名较好的军官找到一边,称(多少有点歪曲事实,对此我希望被原谅)我认识那个人和另一个在这十个人中看起来最有希望被释放的人,并愿意为他们担保。第二个人被释放了,不知什么原因,我认识的那个人却没有被释放。进一步的努力造成很大的负面效果,由于担心伤害到其他人,我不得不终止。结果可能是(他的)死亡,尽管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另外两个难民间接报告说他们从大约几百人的队伍中逃脱,这批人在(汉中门)以北,三汊河附近的一条河边被刺死。

最后,应该记住整个事件只是持续了两个星期的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主题是大规模地屠杀被指控为前士兵的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些指控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

这里不是讨论国际法的地方，国际法规定战俘的生命将得到宽恕，除非有非常重要的军事需要；这里也不是讨论日本人行为的地方，日本人不顾国际法，公开声明为部队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复仇，现在这些部队占领了南京。其他的事件（将中国士兵带走屠杀）涉及到的人比此次要多。我对本事件感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背信弃义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人们使自己走向死亡。第二，由于我们学校、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保护的难民与这一严重犯罪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令人痛苦的密切的联系。还有，屠杀的方法、地点、时间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而对那些大批被带走，再也没有返回的人我们只有一些零碎的消息。作为一个总体的判断，很明显被从金陵大学抓走的人大多数在当天晚上被屠杀了，其中一些是在与其他队伍会合后被屠杀的。

即使是在腥风血雨的星期里，从这些网球场经过也是件困难的事。与这些军官和士兵打了多天的交道，而这些人在这罪行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了数以万计的来金陵大学登记的难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笑脸相迎，表示顺从，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人们感到他和他的基督教的机构成了谋杀 200 人的合伙人，并应该对那些依靠他们的可怜人处境负责，如果这些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那么那些军官和士兵呢？他们中的一些与我们所面对的暴力的歹徒相比是仁慈的，其中许多人一定有妻子和孩子，这些军官和士兵对待他们是和善的。

贝德士

[RG10, B102, F865。此件已收入《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田伯烈说明：“去年 12 月下旬，日本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的难民三万余人，要进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教授（即贝德士——译者）根据 12 月 31 日所拟草稿，以及 1 月 3 日所留记录，于 1 月 25 日写成上面的报告。”]

4. 致朋友函(1938年1月10日)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戳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准备通过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国船只——一艘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它们送出去。上海的朋友们将从总领事那里得到这些笔记，并将设法利用一艘不受检查的外国船只将其送出去。

新年以来，拥挤的安全区内的形势已经缓和多了，这主要是由于大批主力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时有时无，连宪兵也强奸、劫掠与玩忽职守。由于新的部队的进驻及不确定因素，局势随时可能再度恶化。这里没有可以看得出来的政策，外国外交官终于(在本星期)被允许重新入城，这似乎表明一种需要稳定的愿望。

1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的士兵，还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指国际委员会拉贝等——译者)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我想不会少于8000起，也许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房产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在由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象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的女孩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面，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三分之一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包括美、英、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甚大的所有外侨财产，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他们猎取的主要目标。抢劫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除了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队的商店外，南京别无其他商店。大多数商店起先是人人可以闯入行窃，继而被一伙一伙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

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再放火焚毁。我们现在每天仍可见几处起火。许多住宅区也被蓄意烧毁了。我们弄到了日本兵纵火用的化学片剂的几个样品,并已调查了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

难民大多被抢走钱财,连微薄的衣物、被褥和食品,也至少部分遭到抢劫。这种行为极其残酷,结果在第一周或开头十天,人人脸上都露出绝望的神情。这个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商店和机器完蛋了,至今还没有银行和通讯系统,几个重要街区被焚毁,其余的一切都遭到劫掠,剩下的是面临饥寒交迫的人们。这里大约有 25 万人,差不多全呆在安全区,足足有 10 万人完全依靠国际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他的人则靠剩下来的一点点米勉强糊口。日本供应部门出于金融和政治上的原因,正开始发放少量的从中国政府相当多的供应物资中征缴来的大米,但当兵的烧毁了不少储备物资。更料想不到的是,当我向日本官员问起邮政时,他们答道:“没有计划。”

国际委员会的帮助很得力,其事迹堪称奇迹。三个德国人干得很出色。为了同他们保持伙伴关系,我几乎愿意佩带纳粹徽章^①。一个丹麦人和三个英国人在初期阶段提供了大量帮助,可是在中国人(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前,这几个人就被他们的公司和政府调走了。这样,大部分工作就落在美国传教士身上。由于医院里挤满了枪伤和刀伤的伤员,他们都投入抢救伤员的紧张工作而无暇顾及及其他。自然,我们有些人承担了各种职责,也有职责观念。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帮忙与合作,而且大部分琐事不得不由中国人或通过中国人去做。但有时如果没有一个在紧要时刻能勇敢面对枪炮的外国人在场,便什么事也行不通,哪怕是运一车大米。我们冒过一些巨大风险,受过一些沉重打击(既有实在的也有比喻的),但还是侥幸取得远远超过目前形势所能允许的许多成绩。对发生的每件事,我们都注意,都过问。我们提供食宿、进行谈判、提出抗议和采取保护措施等一般工作,此外还阻止了许多抢劫案的发生,劝阻和吓退了许多小群士兵的强奸和蓄谋强奸。难怪一个日本使

^① 这是夸赞拉贝等人的诙谐语言,不可简单理解。贝德士一贯主张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与纳粹主义是对立的。

馆官员对我们说,(日本)将军们对他们不得不在中立的观察员(Neutral Observers,指国际委员会成员——译者)的注视下完成其占领而感到愤慨,他们声称(纯然出于无知)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完全失败了,但成功的百分比也很大,足以证明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是应该的。虽然某些方面的关系还远远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日本大使馆为缓和日本军方和外国利益之间的冲突作出了努力,领事馆警察(数量甚少,并非尽皆善良)比较合乎礼仪,加上这项事业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发起“反对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协定”的德国人和本国船只遭到(日军)野蛮攻击后需要安抚的美国人,我们获益匪浅。由于大量财产案件和国旗(撕毁)问题,日本人两度拒绝我们转达的美国(使馆)官员返回(南京)的温和要求。虽然本周情况有所改善,我们与乡村和江边还是隔绝的,只有美国海军有机会通过美国使馆进行范围有限的通讯联系。

大约从12月1日起就没有邮件了,以前的邮件也大多在途中耽搁。昨夜我们室内的电灯是特别给安排的(我们有七个美国人,其中有人与电厂员工有私人关系)。日本人枪杀了电厂54名技术人员中的43人,诬指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还有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和枪弹射击,公共设施恢复之极为缓慢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缺乏保障是主要的绊脚石。自来水得靠电泵抽取,不过在城市地势低的地方开始有了涓涓细流。至于电话或者公共汽车,即或是人力车,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我们安全区的面积大约是两平方英里,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个集中区域内,我们没有发生过值得重视的火灾。除了日本兵的犯罪和暴行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犯罪和罪行。直到本星期,日本兵又转向安全区外门户洞开的房屋大肆劫掠——特别是抢夺燃料。没有武装警察。

有3万难民住在金大校舍各处。管理的问题很令人担心,哪怕是维持很低的生活标准。我们当中金大的正式教职员和工友寥寥无几,但他们大多数工作非常出色。志愿帮忙的人很多,由国际委员会把他们迅即召集在一起,他们前来的动机相当不纯。现在我必须谈到告密以及日本人恫吓和收买特务的问题。我本人此刻就遇到三起以上此类麻烦,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想使我或金大陷入绝境。例如,过去三天中发生的两件

事使我对金大附中遭受损失的报告自相矛盾,这样看起来我在撒谎和欺骗日本人,并使我与这个大难民营中的负责人形成强烈反差。另一件事是,一位人格高尚的翻译,不屈服于他们的威胁,拒绝离开附中难民营去为他们工作,就被他们像绑赴刑场一样抓走,我试图打听他的情况,结果被别人猛地推进可怕的宪兵办公处的大门。恰巧那个办公处的宪兵昨夜从金大一所房子抓走一批妇女并残暴奸污她们。他们从事此项罪行时,用刺刀对着我们一个叫 R 的人,他不该碰巧在那个时候去那个地方。当奋力为那些可怜而又特能忍耐与令人好感的人们做点什么时,你就能领略我们日常生活的滋味了。

南京的真正宪兵只有 17 人,而同时则有 5 万多士兵放任自流,一连几天我们见不到一个宪兵。最终,发给一些士兵以专用的臂章,权充宪兵,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作恶而可得到特别保护,不至于被当作普通人对待。我们见过有些人强奸时被军官发现而受责骂,然后又毫无约束地被放走了。还有的人抢劫后只向军官行个礼便了事。有一次他们夜间开着摩托车来金大抢劫,实际上是军官亲自指挥干的。他们把我们的门卫逼靠墙壁,强奸了三个难民妇女,还将其中一个人带走(另一个是 12 岁女孩)。

L(Lilliath 的简写,即贝德士的妻子)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帕奈”号上死了或受伤了,因为我仍在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她那里,而东京的各种报纸则暗示所有外国人都被带上了这条船。经历 48 个小时悲痛之后,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不久,一对笨汉打听到我的下落。为了回答她的朋友们的感谢,这家报纸于 17 日匆忙派遣几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前往(日本人 13 日进城;“帕奈”号 12 日沉没,这些消息报道得很慢)。元旦那天,他们中的一个人给我带来一张照片和一封信。日本使馆恪尽职守,当然已经读过此信。这样我俩就免得长时间相互担心。虽然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给我写过许多信,拍过许多电报,可是 11 月 8 日后,除了这封信,我别的什么也没有收到。12 月 17 日,她预计元月的第一周到上海,此外我再没有获知其他消息。也许通过新来的炮舰最近拍发的一份无线电报,可以得到来自上海的一些消息。

可是他们不允许我出南京城,而她呢,即使交通工具对她是开放的,她也不会获准出上海往西走。我们不知道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中国

人非常害怕把这些美国人或所有外国人赶出南京。迄今为止,他们似乎更害怕我们走,而不害怕我们留下。同时,我设法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一些半官方日本人,甚至一些不那么凶暴和奸诈的警察和士兵保持友好关系。但是事情进展很困难,到今天已经四个星期了。只要我们事先知道,炮击和轰炸几乎不再让我们感到不安了。前途未卜。……

附言: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激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这一点几乎不用说明。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

[RG10,B4,F52。这封信极为重要,除田伯烈收入《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件已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如王世杰之得到此复印本,即在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溥教授宴会之际。此处译文系根据原信稿重译。]

5. 致美国使馆阿利森函 (1938年1月14日—6月16日)

金陵大学
南京

1938年1月14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昨晚四名日本人窜进附中的一间教室。他们所干坏事的细节尚不得而知,因为守门人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带走了一位姑娘。他们是宪兵,至少部分人是被派到附中门口站岗的。他们穿着中国布鞋,部分中式服装。

这一情形十分严重,也十分可耻,需要根本解决。如果日军不顾法

律和我们的抗议,每日出入美国财产区为非作歹,我们不得不终止与其友好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忍受已久,这将是不可宽容的。

至少应对目前宪兵采取措施,他们并没有提供保护。我们有许多理由不信任设在小粉桥 32 号靠近附中的宪兵办公室,宪兵是由该办公室安排的。

刘文宾太太(Liu Wen-pin,音译)得知她丈夫被枪杀于山西路 21 号。我刚好收到这个报告,对此我再也无话可说。人们在附中受到的威胁和对复仇的恐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获取全部事实,他们也无法正常工作。

这封信的书写被打断了半个小时,我去汉口路 19 号驱赶一个宪兵(佩带特务处发的宪兵臂章)。这座美国人的房子悬挂着美国国旗,大门上贴着日本和美国的告示。宪兵翻墙入室,在金大教员和医院柏睿德博士(Dr. Brady)^①的住宅里翻腾了一个小时。住宅离上面提到的办公室约有 250 码远。

今天上午我们得到一个间接报告,江塘街(Kiangtang Chieh,音译)教堂在 15 日或 16 日晚被焚,目击者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佣人,他于 17 日上午回到那里,看见梁木仍在冒烟。佣人在布莱斯特小姐(Brethorst)家工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夏天。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报告是教堂的一位年纪大的女雇工提供的,日军多次闯进教堂后,她 15 日上午离开教堂,当时还好好的。14 日晚上两个日本兵睡在那里,另两个在 15 日上午开始抢劫和威胁他人。

尊敬您的
贝德士

1938 年 1 月 15 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昨天下午 4 时 45 分,三名领口带黄领章的日兵坚持闯进平仓巷 3 号,这是我们的居住区。他们钻进两辆汽车,要求提供帮助,准备开走。庆幸的是林查理在附近,工友们把他喊来,他终于赶走了这帮家伙。像往常一样,有两名士兵对美国国旗、美国(使馆)或是日本(使馆)的布告

^① 柏睿德(Richard F. Brady),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

毫无尊重。他们进门时这些布告都清晰可见。

昨晚 6 时,金大门口的宪兵撤走但并没有换防。我们没得到他们对此举的解释。

我尚不知道附中和其他单位昨晚过得怎样。

我很感激你们关心昨天所发生的事以及刘文宾的命运。

附件是麦卡伦先生关于国家剧院被焚的声明。我们很有可能仍能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进一步的消息。

1938 年 1 月 24 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向您报告 1 月 22 日、23 日晚间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职责。一名日本兵翻过我们小桃园的高墙,找到一名妇女。昨晚他返回来时许诺他要为这个女人再回来一次。大门上贴着日本与美国的告示,上面悬挂着美国国旗,而且大门与在小粉桥 32 号的宪兵办公室是斜对门。对此,我们不断提出抗议。

昨天,一位士兵和一名中国助手结伙闯进金大正门,找到三名愿意跟着他们走的妇女。从这儿到他们宿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关于日军索要劳工和妇女的其他问题需要我们具体讨论。同样,威胁的后果也需要具体讨论。

1938 年 1 月 25 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除了强奸和抢劫,(日本)士兵和警察还频繁出入美国的建筑物,他们似乎觉得这么做是合法的,由此引发了许多问题,我们官方应表示反对。我特别是指搜查、威胁,或多或少的强迫搬迁,抓捕劳工及掳掠妇女。

我们已尽力以公平、理智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并希望与日方当局及你本人保持良好的联系。为了在我们建筑物避难和在我们机构和家庭工作的人们,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

(1) 我们不反对有序、适当的官方搜查,如果你对搜查程序满意。

(2) 我们不会保护任何一名做坏事的人,也不会干扰(当局)对百姓

适当的政治和军事控制。

(3) 我们反对(日军)非正常、未经批准或是强行闯入我们的建筑物,并指出目前形势下武装人员的进入是粗暴的。

(4) 我们反对(日方)任意干扰我们的雇员及在美国建筑物里的从事合法事业人员,包括威胁和绑架中国助手。

(5) 我们赞成并鼓励(日方)从我们的难民中挑选劳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但过去六周来的事实非常糟糕,(日方)在挑选中公开或暗中威胁。我们的工作人员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帮助,但必须保证他们不再继续受到军方人员的辱骂。他们要求我们职员在指定条件下提供一定数量的男女难民。他们只能提要求,并带走自愿跟他们去的任何难民。但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人在场就形成了一种压力,因此他们应该待在学校(金大)之外。如果他们想派他们自己的中国代理人进来,这样也行,但条件是,他必须得到学校一位负责人的同意。

(6) 如果(日本人)继续滥用权力的话,我们有必要记下所有被引诱出校园的人员姓名及离开、返回时间。但我们希望没这个必要。

(7) 我们建议在这几点上与日方协商后应有一个清晰和统一的协议,适用于所有美国财产。日方有责任通知他们所有的军官、警察,要在这件事上严加管教,或者由他们或你提供给每座美国建筑物用日语书写的告示,这样可以提醒并教育那些准备闯入的士兵。

(8) 我们建议警察在调查时应通知你或由使馆警察随同,使馆警察应着常见的制服,除非这个人和我们很熟悉,这样他才能对在我们这里的行为或与我们的职员的关系负起责任。我们不想看见谁因为调查的原因而被从我们这里驱赶出去,除非你提前通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案件。

1938年1月25日

在全面向您报告昨天金大所发生事情之前,先讲给您上午11时一群带浅色臂章的日本兵,闯入胡家菜园11号我们农具商店的情况。

他们用枪威胁店主并搜身,然后带走一名妇女,把她强奸了。后来有两人听说日本兵把她放了。这个妇女认为她能找到被带去的那个地方,我们想尽量获得更多有用的细节。

这个案例关涉到随便闯入、以武力相威胁、绑架和强奸。可能是宪兵干的。根据臂章可以判断,另外一个惟一的可能性是特务处的人。

我们没有秩序、安全。(日本兵)不尊重以布告和国旗为标志的美国财产,也不尊重日本使馆的布告和命令。

附记:写完这封信后,我得到确切消息,日本兵把门上贴的日本告示撕了下来。

1938年1月25日

接着上午写给您的信,我再补充一点。林查理先生和我带着昨晚在胡家菜园11号被绑架的这名妇女,小心翼翼地访查了她被迫走过的路线,我们不带偏见地给她一个机会。她很清楚地指出了她被强奸了三次的建筑物。而且,她回来时走错了路,因为夜间行走看不到明显的标志。……错误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座建筑物就是这一地区宪兵的办公室,即小粉桥32号。

我们对这些正派的人们的敌人所作所为进行连篇累牍的报告,并没有使局势缓解。似乎早就该对整个军队进行清理,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毫无疑问,只要他们在这—地区,此地就无安全可言,这已经被完全证明了。同样,日本大使馆的人们直到今日也是毫无办法。

今天中午,我被叫到金银街8号帮助驱赶日本兵。这座房子和我们的蚕桑系大楼在同—道篱笆围起来的区域,但不是我们的财产。昨天,一些日本兵经过我们的建筑物到了那座房子,强奸了一些妇女。这些妇女昨晚被送到金大避难。今天士兵又来了,没找到妇女,怒气冲冲地抢劫了一个男人,还打碎了窗子。这件事说明美国人的福祉完全依赖于整个城市纪律的维持,而不仅仅是日方当局对美国财产偶尔的关注。在过去一周,这座房子被日兵闯进五次,不止一次是从蚕桑系过来的。只是今天当他们感觉到越来越严重时,房主才冒险向惟一能救助的人求救。

1938年3月20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昨天下午3时30分至4时,一名日本士兵在小粉桥3号小桃园强奸

了一位避难的 19 岁的姑娘。士兵来去都骑着一辆带黄色标志的自行车。

我 4 时到了那里。我走近士兵时,他上了刺刀,很无礼地说:“我要姑娘。”紧张局势持续了几分钟,但最终他决定抽回刺刀。没有迹象表明他喝醉了酒。

通过与个人直接接触,我们每天都知道三起或四起士兵所干的谋杀、伤害或强奸案例。还有更多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通常有一些案例我们不一定注意到。我们没做正式报告,因为这些案例很少发生在我们的驻地。但他们很关心我们的救济工作,并且表示,缺乏秩序和纪律有可能使事态更糟糕。3 月 11 日,我和宋煦伯看见两名士兵在我们院墙连接处强奸了一名妇女。

新部队最近进驻南京。即使不从人道的立场出发,而仅仅为了他们军队的荣誉,难道日军当局不会停止持续三个多月的犯罪吗?如果不给士兵明确地下达严格的命令,很显然,日军将领是不会在意这类犯罪的。如果命令清清楚楚,那么士兵这么做就是蔑视将军。无辜者遭遇不幸,毫无安全可言。

尊敬您的

1938 年 5 月 6 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5 月 1 日,星期天,我和史迈士博士在城南散步,我拍了一些街景和运河的照片。大约在(下午)4 时 15 分我们转向中华路,朝北走去。我拍了街对面一张照片。照相机一直在我手里。我们没看见有日本兵,在任何时间我也没拍过与军事有关的任何照片。

突然,载着士兵的几辆卡车从我们后面急驰而来并超越了我们,车后面拉着大炮。我不想惹出任何麻烦,赶紧把照相机揣进口袋。卡车朝北驶去,一切都很平静。我又拍了街对面一张照片。大约三四分钟以后,一队士兵向南跑来,挡住了我们的路。一位军官坐着汽车跟在后面。

军官用英语问我是否拍了照,我说是的,并拿出相机给他看。我说我拍了一些建筑。很显然,军官听信了那位指着我和他用日语交谈的士兵所讲的话,说我拍摄了日军。我回答说我没有。

军官很有礼貌,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劝我把胶卷拿出来,我费了很大劲,而且损失不少,因为这卷可以拍摄 36 张,而现在只用

了一部分,并且我不习惯如何在胶卷拍完之前把它取出来(我的照相机要求用完所有胶卷,然后倒卷取出)。军官要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说三天后还我胶卷。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史迈士博士一直在近旁,如果有需要他就回答问题。这个陈述可以作为下周日下午与您谈话的记录。

您的真挚的

1938年5月6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今天上午我口头向您汇报了与日本使馆人员会谈情况,下面是其书面报告。

5月5日,星期四,我去日本总领事馆找粕谷先生。我不在家时,高玉曾打电话找我。粕谷先生说总领事想和我谈谈“5月1日事件”。花轮先生和我会谈时粕谷先生一直在场。

“军方对你拍照十分愤怒。请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做了陈述,和向您报告的一样。

“这与军方讲给我们的差别很大。据他们的来信,我们得知你正在拍摄时被士兵阻止。”我否认这是事实。花轮先生然后说:“那么,是在你准备拍照时(阻止了你)。”我画了一张图向他解释了士兵如何超越我们后来又返回,强调这一过程我都没有拍摄。我建议他问问当时在场的那位军官,还有史迈士也可以作证。花轮先生看了一眼军方的来信,说它并没有具体细节表明我是在拍照时被阻止的。

花轮先生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不该拍照。我说,在大街上只拍摄景物,没有任何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如果这也被认为是侵犯,那么军方最好提前给予通知。当然,没有一名外国人会认为这是侵犯,因为好几家商店在卖摄影器材,日本人到处随意拍照。

花轮先生说:“但军方认为南京外侨是支持汉口政府的。”他和粕谷互相看了一眼,言不由衷地大笑。我回答说,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没有卷入任何政治、军事活动,他们只从事了正当的事,军方的这种态度是没有根据的,与事实完全不符。

有一次他们很诚恳地问我,我是否收到返还的胶卷。他们似乎对返还胶卷的保证不甚明了。

花轮对我的报告表示感谢,并答应再和军方谈谈。我问他是否同意我把谈话内容写下来,要求得到明确的答复。然后我把我刚才谈的话摘要记下来,并承蒙粕谷先生仔细检查了一遍。

整个会谈气氛十分友好。我的感觉是,军方的信件言辞含糊,总领事很想缓和此事,如果我的陈述可以为他这样做提供一个基础的话。

关于一名美国人因被诬指侵犯他国(人)而被一名日本官员传唤的适当程序及权利问题,我留给您来判断。我仅做如下几点说明:

(1) 由于一名士兵的无端猜疑,我被指控为反日,(他们)毫不考虑我本人、史迈士博士及胶卷的证据。(2) 我公开做这一切是在一条大街上,那里没有哨兵,也没有任何限制的指示。我没有逃避检查,我费了很大劲并蒙受了损失,把胶卷交给他们以备调查。关于我是否拍摄军事设施的核心问题,(他们)并没有通过检查我的胶卷做出任何报告。我的“诚意”只换来猜疑。(3) (这里)有一种普遍的对外国人的敌意,用不明确的词汇表达出来,很显然,他们制造这个案件无任何具体证据。(4) 不仅领事馆警察部门的高玉先生来这儿传唤我,他还宣称他传唤了不止一个外国人,我是因拍摄军事照片而陷入麻烦的。

我憎恨与犯罪有任何牵连,并相信日方当局为了我所在的组织和从事的事业,以及其他外国人将来的利益,应向军方彻底澄清此事。极端猜疑会产生严重后果。

1938年6月16日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日军又多次光顾我们在汉口路1号的大学花园。他们对日语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并严重干扰工人的工作。通常他们要几枝花就很满足,我们并无怨言。但昨晚7时~8时之间,三名士兵难为工人很长时间,他们要一些很有价值的树及灌木,并用刺刀威胁,命令工人砍掉树木。至少有两个日本兵喝得半醉。他们去了位于中山路和汉口路拐角的前司法部。

在同一建筑物后面设置的宪兵随意搜查行人,抢劫现金。这一做法

使得我们自己的职员只好绕道走。

我们并非要指认个别士兵并控告他们,而且这的确并非为形势所允许。我们要求整个这一地区士兵,特别是那些在我上面提到的建筑物里的士兵,受到充分严格的管教和监督,保护我们免受虐待。

尊敬您的

[RG10,B4,F67。]

6. 致妻子函(1938年2月1日、13日)

1938年2月1日

最亲爱的:

没有为米尔士和我们中的两三个人找到奶粉,史迈士极不情愿地用几个月前订购的“锚牌”奶粉替代了“雀巢”奶粉。但在包装中与你提到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并不特别需要奶粉。

我在三楼找到了你的旧床罩——但若不搜索一番恐怕还找不着。我想不会认错。

我不知道你以何种方式制定夏天去日本的计划,但同意你冒一些经济上的风险,如果你很想去。我可能不会去很久,无论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特定时间和地点考虑,对我们来说前景都是不确定的。但我们不得不为可能发生的事而工作(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在人类事业的积极方面没有一项可能性值得一提),如果你能和孩子离开上海当然更好。

这一周主要问题是(日方)下令发布为期七天的公告,人们必须于2月4日之前离开难民营回到自己家中。而且,在安全区内临时搭建的商店也将被迫推倒,并暗示其他人必须从私人房子返回家中。例如,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下属宪兵2月4日来到金大,告诉难民,在士兵逐出难民后将封锁校门,任何人不准带出铺盖或其他财产。

当然我们不会束手就擒,但也不敢直接反对军方命令。各种各样的呼吁及间接的抗议,可能促使外国政府直接向东京呼吁,而不是当地的军官。(这

就是阿利森事件^①以及林查理与我遇险的原因。因为这使得这些家伙特别憎恨我们。)这也可能导致媒体刊登比我们以前所呼吁的更为大胆的言论。

数千名妇女跪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发誓宁愿死在难民营,也不愿回家被日军强奸、杀死,因为这一周许多试图住在家中的妇女又被强奸(还有一些被杀害)。今天上午我试图找到昨天因拒绝士兵无礼而遭杀戮的两名少女的尸体,她们的母亲担心被日军驱逐,带着她们离开难民营,连铺盖也未带。我们的报告中还有许多其他案例,通常是强奸。

星期五,我们可能会遇到一次屠杀^②,在日本兵用刺刀刺向依赖我们的妇女和孩子时,我想我不会躲在一边。使馆人员明白,任何粗暴的行动都会被见证并被迅速报道。一方面日军给回家的人们免费发放食品,同时又在别处关闭(难民营)。随信寄去在安全区外张贴的一张布告。

[RG10,B126,F8.]

1938年2月13日

最亲爱的:

昨晚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未署日期),另有一个邮件。你12月6日的第九封信也是由法国轮船捎来的,该船经过香港、汉口再返回。

……一个医生正常住在这里是可能的——这是我们及外交官努力的结果。肯尼(Kearney)作为法国代理人在这里仅仅呆了三天,他们(指日本人——译者)发现他是美国人时,很快地打了他几个耳光(用言语)。

请告诉田伯烈、米利肯女士和你自己,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否定(军方)有强迫难民营离开安全区的计划,事实正好相反,一位级别较高的官员曾向我们的难民营负责人明确宣布过该计划,然后又通过到各营地拜访、张贴公告等形式强调过。公告内容还包括了要全部推倒上海路和宁海路新兴起的市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他们决定暂时不实施高压手段。同时,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回家的很多人经历了恐

① 指阿利森领事被日本兵打了耳光一事。

② 指日方下令2月4日(星期五)所有难民必须回家,否则以武力驱赶。

怖和很大痛苦。足足有 200 名妇女在回家被强奸后又返回,其他许多人回来后表情非常冷漠,一句话也不讲。

现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今天一名妇女带着她的女儿来到金大,要求为由于日本人强奸而怀孕的女儿做流产手术。

这里有一个军乐团的音乐会,用于拍摄一部精心准备的新闻纪录片,向我们展示日本军官和艺伎——在南京的友好国际关系。演奏很不错。军官学校乐队来这儿访问了两天。

.....

我高兴地收到许多报纸,希望明天能读读。

军方不让我们卸下海军允许从上海运来的大豆。为争取时间我们不顾一切作了很大的努力,少不了一些忙乱。上海军方建议他们应将大豆移交给自治政府,而不是委托给外国人。实际上我们已和自治政府的一些人合作,正安排由他们来接受这批大豆,给我们仓库收据,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发放——如果日本人接受这一要求。但他们有可能拒绝大豆以任何方式进入安全区。如果他们按以前规章办事,我们只好以少量方式秘密输入。同时关于供应的争吵仍将持续。

[RG10,B1,F7—11.]

7. 田伯烈致贝德士函(1938 年 2 月 17 日)

亲爱的贝德士:

您 2 月 11 日来信证实了你带给鲍引登(Charles L. Boynton)^①的消息,鼓励我写作这本书,而且意味着您同意费吴生顺便访问美国。在以后的通信中我将附上我给浩恩伯克(Hornbeck)信的副件。

昨天我去鲍引登的办公室,仔细阅读了他们有关南京和其他地区的文件。仅南京一地资料就很多,我真想把这本书限定在这个主题,写成本个

① 鲍引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时在上海。

案历史,书名叫《在南京的考验》(The Ordeal of Nanking)或其他类似的名字。

经过进一步研究,我想把与南京安全区相关的全部文件,作为费吴生、你和其他人书信后的附录。你认为我这样做合适吗?是否会有一些文件你认为不宜出版?如果你能得到更多目击者的故事,这对书的第一部分十分有用。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哪些文件或哪部分文件应当删除,这将会帮我大忙。

我希望能给贝德士夫人提供一些速记帮助,减轻在鲍引登办公室拷贝材料的负担,并为公众目的搜集其他资料。

我担心我没有多少消息给您,除了下面这段。这是从昨天收到的香港温源宁(Wen Yuan-ning)来信中节选的:

一名在香港的知识人刚刚从汉口返回,上周六我们共进午餐。他告诉我们,中央政府仍不与八路军真心诚意地合作。他们对以前红色政权仍极感恐惧。举例来说,苏联虽然表示免费提供 80 架飞机和其他一些装备给红军,但中央政府拒绝接受。他还告诉我们,在汉口的苏联飞机飞行并不多。但他说汉口的士气还不错,虽然他认为中国的军事能力比起日本仍然很弱,但在其他方面,经济与政治方面,中国还是更强一些。

良好祝愿!

您诚挚的田伯烈

[RG10,B4,F65.]

8. 致田伯烈函(1938 年 3 月 3 日)

亲爱的田伯烈:

你一定收到通过贝德士夫人发出的无线电报,这份电报表明,我们更喜欢你早先提出的建议,而不是你在 2 月 17 日信中提到的建议。我们注意到,这是你看了鲍引登有关南京的文件后提出的,并打算“做进一步研

究”。这是我和史迈士、米尔士所能安排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成果。外界很难体谅我们现在所干的事情,因为对这方面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是我们的若干想法。为了让远处公众了解已经和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残酷,最好是超越市区范围以增强效果。在整个南京变得异常以后,外面的人很容易感觉到——这个地方集中了政治的憎恶,时常有人发生意外,如此等等。而如果在—一个时期,在上海、松江、苏州、无锡、湖州、杭州都传出类似的故事,整个效果将更有力度和可信。如果你到一个城市,主要以我们的文件为基础而做出估量,就会为个人与团体的复仇心倍增而感到不安。这些文件大多来自作为秘书的史迈士、作为副主席的米尔士(在拉贝离去以后他成为真正的主席),而我则是金陵大学最勤奋的通讯员。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日本军方甚至外交官现在对(我们)委员会是多么仇恨。他们不断迫使自治政府禁止我们与任何单位联络(这就有趣地戳穿了他们要求我们“合作”的荒谬范式,实际上我们尽可能与自治委员会合作,只要他们敢于冒险为自己狡辩或者干脆向日本人扯谎)。(日本)使馆主要官员正式指认我为“反日”,并且急不可待地问别人我是否有“精神病”——他们真是可笑。后一个称号(指“精神病”——译者),是我在一天下午,由于拒绝他的“容忍”的范式(指所谓“合作”——译者)而获得的。军方正在尽全力改善局势,因此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①。他认为我一定是激动或是害怕,因为我坚持无秩序和危险的事实。这里某些外国人小群体经常恳求我(还去找史迈士和米尔士)——费吴生在这里时也一样——完全停止报道、抗议或非直接的公之于众(指对日军暴行——译者),以免所有外国传教士都被赶出南京。这仅仅是建议,为了某种原因,此间必须谨慎从事。费吴生和我曾被(日本)大使正式传询,他“保护”我们,至少是为了一封给阿利森的无线电报(所有这些都放在你的帽子底下,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它的意义)。通常广泛发行于上海与华东的宣传机构——《新申报》,曾制造一系列谎言攻击金陵大学。我真想以武器固守,但又不能因任何方式判断错误而危害学校的未来与教会利益。我简单地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的案件比他人更属“私人性质”,但是国际委员会无日不受某些日本人的窥伺。我

① “军方……”这句话是日本使馆负责人说的,贝德士对此并非同意。

随寄一篇《朝日新闻》的译文,这清晰地表明了他们的整个立场,并非侧重叙述这个特殊事例。请你仔细领会其排他性的含意,这意味着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会因重视真理去加以改正,正如你已深刻了解的那样。

同时,我们这里的同事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报道与国际委员会的报道是完全不同的,它无从给以裨益。似乎可以认为前者眼下更为重要。无疑你可以为苏杭地区安排某些接触,这将使你得到此间的信息。史迈士的整个“案件报告”(指日军暴行——译者)已达 460 件,很快你就可以在上海收到正式的文本。我们能够对此作若干补充,详尽讲述你需要的信息。芜湖的消息可以通过布朗博士(Dr. Brown)、盖尔先生(Mr. Gale)和其他人士得到。我认为扬州,还有镇江也是这样。

关于安全区,米尔士想写一本小书,大约 100 页。不过他和我们都无法保证,文件的完全公开不至于给本地区需要的救济工作带来危害,也不妨碍外国人将来在汉口服务(指难民救济工作——译者)的可能性。我也考虑为“国际和解”写一篇文章(或你建议的某种其他媒体),这或可使西方人考虑整个即将来到的战争幸存者问题时增强信心。这种经验无法搬用,但它可以鼓励其他的人在特殊处境下捕捉可能性。此间未曾谈及对你的禁止,而只是打听你的会议。确实,主要趋向有利于你采用我们提供的任何事实,深信你的目的、方法与经验,对你如何去做更感兴趣。你对 1 月 16 日浩恩伯克的信感到兴趣并加以采用,别人可能会提醒你注意其中小的错误。^① 马约翰(即马吉——译者)是美国人。可惜城内没有英国人,直至你们那谨慎而压抑的外交官到来。我们赞赏布劳恩(Brune)、杰弗里(Jeffrey)的优良品质和多次对我们的帮助。在布劳恩回国期间,威廉可能是杰弗雷的助手。附寄阿利森为大使索取的若干经济材料。它们提供破坏和停产的概况。本周在自治委员会小心翼翼的掩盖下,开展了两项调查计划。史迈士与我们的中国同事调查农业方面,我则着手大量调查以说明城内情况。

[RG10, B4, F65。田伯烈(H. J. Timperley), 英国《曼彻

① 指田伯烈所引用的信件,把马吉误为英国人。

斯特卫报》驻华资深记者。曾利用贝德士及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所提供的资料编成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于 1938 年在伦敦、纽约出版, 同年出版中译本, 名为《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9. 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 年 4 月 12 日)

亲爱的朋友:

这封信是在上海写的。经过长期努力, 我终于拿到一张为期 10 天的军事通行证, 是作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 同时也有家庭的原因。

并非想吓唬你们, 我只是希望事先为你们提供信息, 以便你们为夏天可能出现的震荡做好准备。这里提出的问题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一可能性。

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 H·J·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书, 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的资深记者, 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田伯烈先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新闻工作者, 他与北京、上海的基督教领导人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他保存着来自此间救济团体陈述的中国战争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

尽管不能对这项工作承担法律责任, 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 曾经参与商讨计划及其发展, 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 此书还利用了我在(1937 年)12 月 15 日起草的一份报告, 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 年)12 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 1 月 10 日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 但南京和上海(即或不包括东京)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 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 多少也受到牵累。

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 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

不过南京一项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因此,日本当局将有可能特别憎恨南京这个小小的外国传教士群体,尤其是我。费吴生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都将严重受牵累。

我们早先赞同根据这些原则出版这本书,期望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明事实真相,但不希望透露材料来源。然而田伯烈先生和他在上海的顾问愈来愈倾向于采用全部资料或从中选择一大部分。他们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同时又受到作为他们出版代理人的伦敦、纽约朋友紧迫催促。我们对整个工作进程全无所知。但所有传教士都关心南京的资料,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上海教会领导人认为这是正确的并希望尽早出版。

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者与我们一道工作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其他的人只有通过间接方式或半商业方式才能逐渐自由地接触这些材料。一方面,这样或许可以缓解日本人对我们攻击的强度,同时也可以促使我们寻求全面地、正面地描述中国人民的经历。我无需讨论所有与此相涉的原则与问题,你可以自己想象或思考。

有可能出现针对外国传教士个人或团体的报复。我们不认为此类行动必然出现,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过去一年我们所曾预言的大多数可怕之事并未出现。在积极方面,我们确实希望在战争持续的中国其他地区,日军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此外,中国其余地区的人民,东方的人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有权知道我们时代经历的有意义的篇章。这本书将译成好几种文字,其所有收益将归国际难民基金所有。

很抱歉,这封信写得过长,但是考虑到宣传方面的其他问题,而不是目前的问题,这可能对你是有价值的。此外,如果我们之中某些人遇到严重困难时,你将理解我们就此问题所提供的背景和观点。我不相信怯弱会改善我们在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去做并且同样地承担其后果。

您的挚友
贝德士

附言：这本书预定6月由高兰兹(Gollancz)在伦敦出版；稍后在美国刊行，出版商我尚未得知。

[RG10,B4,F52.]

10. 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

妓院是“东亚新秩序”的政治工具
——皇军在被占领的首都大街上肆意行恶

海报照片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这种特殊招贴有两大张展示于中山北路，离广场不远。经调查属实，它正对着一所规模很大的女子学校，也靠近宪兵司令部。南京居民常常回想，在国民政府治理下，这里是不允许有有伤风化的淫秽展示的，市政当局严禁各种恶行。现在他们正在了解日本首相声明的意义，他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把中国提升到日本的文化水准”。

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淫秽的混合物，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友好关系”，最好别印出来。

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以及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

定 指 站 兵
所 安 慰
館 善 親 支 日 四 第
米 〇 〇 六 方 先 已 沿 河 日 是

支那美人

(Translation Of the officially approved
poster pictured above)

CHINESE BEAUTIES

Designated by the Base Camp Authorities

HOUSE OF RESTFUL CONSOLATION

NO. 4 Hall fo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600 meters along

The bank of the stream from here.

[RG10, B102, F871。这则新闻稿标题下面有一张海报，下面注有“译自上面官方同意之海报的照片”，其译文与海报上的汉字相同，海报照片如图所示。日文意为“由此循河边前行 600 米”。]

11. 关于南京经济的一些事实及记录 (1938 年 5 月 1 日)

除了种植蔬菜及少量家庭用品的制造外，本地没有生产。30 万人口中，除成群的小贩外，是否有 1 万人得到赚钱的工作我都表示怀疑。除了路边小摊或极小的店铺外，当地没有一家中国人私人开的商店。在 20 或 40 家日本人开的商店中，有 13 家现在已经被指定可以自由地向中国人出售商品。没有银行。据我观察，没有正规的货币兑换行。自治委员会开办了一家规模相当大的食品店，兼做粮食和新鲜食品的批发与零售。

尽管除了日军外，实际情况外人很少了解，但据信，限量供应的大米只能维持几周之需。由于海军和陆军的需求量没能计算在内，因此这个需求量是不可信的。自治政府极力从上海求购大量大米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现有的购买力情况下，蔬菜可能会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家禽和鸡蛋不多，肉也一样。由于很少有人去享受这些奢侈品，它们的价格也

降了一些。从江北搞过来的蚕豆、食油和花生也能见到,但数量不多,因为运输能力依然十分有限。贸易的风险非常高,以致原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价大得不合情理。

附近地区的庄稼收成前景非常暗淡。据村长们估计,在龙潭、汤山和南京之间的三角地带原本有 3 000 头耕牛,现在只剩下 300 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靠人力种植的水稻产量也只是靠借助畜力所生产稻米产量的三分之一。大路沿线及临近地方的所有建筑物和农具基本上都遭到焚毁或抢劫。金陵大学想靠其位于太平门外的五个农场养活七个劳工都很困难。往年这个时候,除了几头水牛外,农场还需要 50 名劳工。日本兵每天都在社区转悠,看到有用的或能吃的东西就全部抢走。即便农民们有牲口或食物储备,也不可能想到拿它们去冒险。在较大的农场及其储备中,幸存下来的只是些小的建筑 and 一堆豆子而已,后者还被拿进城里藏匿起来。一些农民拒绝回答与种子有关的提问,声称明天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请金大农场的邻居们帮忙拔除去年庄稼地里的棉花秆。他们答复说,很乐意帮忙,只要给点吃的就行,钱一分不要。因为钱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过去的一周里,有 500 辆人力车领取了执照,做些小生意。我想,正常情况下应该有 1 000 辆车。有计划要让干线公共交通恢复起来,不过有人说有希望能够重新运行起来的汽车只有 20 辆,自治政府也期望开通定期往返上海的由卡车运送的商业性包裹业务,这表明上海至南京的铁路并未真正开通。事实也正是如此,上周开行的火车除两列是运送上海籍难民返回的外,其余的都是军用列车。自治政府希望尽快开通到扬州的小轮船。据我们所知,日清汽船会社的船只只是偶尔为了日本人的利益在运送货物而已。

日本货卖得最多的是香烟、火柴、糖和蜡烛。煤油、汽油紧缺。

这些记录对众所周知的(日军)放火、掠夺的说法表示认可,且后者几乎是普遍性的。

贝德士 南京
(姓名请勿公开)

金陵大学难民区损失情况表

	闯入 次数	日军盗 走金大 财物	盗走金 大员工 的财物	盗走金 大难民 的财物	造成 损害	抓走 男子	强奸 妇女	其他暴力	扯毁 国旗
主校区	175	\$ 1 500	\$ 30	\$ 200	\$ 200	2	5	殴打 5 次	
图书馆	200		10	700	100	200	25	刀刺 1 次；殴 打 15 次	
女生宿舍	100			800	50	6	4		
花园	120	2 360		300	30	3	6		
商店和农 学院	40	100	100	150			3		
小桃园	80	70	500	1 000	150	5	36		2
附中	240	300	200	2 500	60	48	44	杀死成人 3, 儿童 2 人	1
蚕桑学校	150			1 200		140	80	刀刺 7；殴打 多人	
乡村干部培 训学校	120	3 300	200	800		235	55	殴打多人	1
美国人寓所 (15)	160		8 000	1 500	50	2	7		1
中国人寓所 (37)	300		1 600	2 500	300	3	25		2
大学医院	35		450	200	150	13			
总计：	1 720	\$ 7 630	\$ 11 090	\$ 11 850	\$ 1 090	647	290		7

说明：

1. “闯入”是指通常由三或六人或再多一些人组成的小股日本兵在个别场合下强行或非正常进入。

2. 货币单位为中国货币。

3. “抓人”是指以曾经在中国军队当过兵为借口或为得到劳工而抓人。这其中还不包括在我校各处避难的难民进行登记期间被抓走的 400 多名男子(大多数被立即杀害)；也不包括以部分强迫条件征召的劳工。

4. 遭强奸妇女人数是指在我校各处被强奸的妇女以及(日本兵)为了满足淫欲从我校各处抓走的那些妇女的总数。被抓走的妇女回来之后将事情经过作了报告。

在这些妇女中,许多人被多次奸污,但本表只记一次。另外,实际被奸污妇女的人数肯定远远比现在报告的多很多,因为耻辱以及担心遭报复导致这类案件报告的比率大大降低。以找人洗衣为借口,而被日本士兵抓走的妇女包括在里面。

5. 国旗事件包括一起损坏国旗案,一起拿走案,以及另外两起践踏及不敬使用案。

6. 本报告所依的证据:难民营负责人给我和国际委员会的每日报告,这些负责人中有多人是我们自己经验丰富的委员;为了弥合差距所作的谨慎的估计,而且(本文所用的)所有的数据都远远低于杰出的美籍、华籍委员认为真实无误的数据;拿学校员工们的日记进行核对。尽管我们用来维持治安和巡逻的人力加在一起只相当于一个全日工,但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被报告案例是由美国人所亲眼目睹的。

7. 所有(外国人)财产都醒目地张贴美国大使馆的公告。从12月20日以后,日本宪兵方面的公告也张贴在这些财产外。但(日本兵)习惯性地不予理睬,并频频撕毁这些公告。

8. 1月10日前,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10份书面抗议书,之后又通过美国大使馆又递交了12份。这还不包括向二者提出的口头抗议。

9. 我们确信,1月2日、3日,日本兵烧毁了(金大)农场价值约23 000元的财产。但证据尚嫌不够充分。

(文俊雄 译 杨夏鸣 校)

12. 致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函(1938年5月11日)

Y·花轮先生

日本总领事

南京

亲爱的花轮先生:

我非常感激那天你在拍照问题上的友好态度,因此我曾希望早点解决问题。但从事情开始发生到现在已十天,从我和你谈话起也有六天。事情就这么搁在一边,我很不满意。

第一点,同我用英语交谈的军官接受了我的条件,让他带走胶卷作为证据,他主动许诺三天后还给我。在西方国家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军官的话有信用”。我相信日本军官也会一诺千金。他怎么能不还给我胶卷呢?

第二点,我被诬指拍摄日军。实际上,无论何时我没拍过任何军事目标。我本人、史迈士和我的胶卷作为证据被弃之一旁,而一位士兵没

有根据的怀疑却成了指控我的基础。这种立场应予以澄清。

而且,你告诉我军方认为在南京的外侨是汉口政府的支持者,因此怀疑我在拍摄军用目标。我向你保证,不论是我还是我的外国朋友都没有参予任何军事或政治行动。我住在南京很久,很清楚国民党制度的缺点和优点,实际上,在 12 月份我在帮助成立安全区保护各处美国财产时,和中国军方及当局交涉时遇到很多困难。

另一方面,只是在日军失去秩序的情况下,我们才感到与日军打交道很困难。的确,我鼓励很多中外朋友留在南京做各种有益的工作,从日军过去的记录和声誉来看,我们本期望日军从一入城就应该有严格的命令和纪律。其他外国人的态度与我相似。任何士兵、军官或公民干了坏事或伤害了他人,不论他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德国人,我们都一律反对。我们尊敬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做的有益工作。我们并没有采取支持一个政府反对另一个政府的立场。军方对我或其他中立人士采取行动,把我们当成汉口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是对日本有敌意的人,这是不公正的。只有日军逼我时,我才会对日本有敌意。

你作为一名外交官,有机会通过帮助军方理解南京外侨的真正立场,来减少日本与外国利益之间的摩擦。因此,我以坦诚友好的精神给你写这封信,以感谢最近你在办公室的会谈中所表现出的值得称赞的态度。

尊敬您的
贝德士

[RG10,B4,F59.]

13. 关于毒品问题的公开信(1938 年 11 月 22 日)

(送交某些日本友人,并刊载于上海各英文报纸。略去零售网络与征税。)

致日本与中国关心南京地区民众公益的各界人士: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民众进步与福利的南京老居民,我有幸获悉,本

周“维新政府立法院”有所运作,可望修改毒品供应政策。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叙述确认这一正在运行的巨大邪恶,品德高尚的人士应立即努力求得改革整个系统,而不只是小小的调整。

在过去数月的不同时期,我曾经告诉日本友人和从外地来南京的客人,毒品问题已极为严重。他们有些人说从未获悉此事并要求提供信息。

我开始加强了解,鉴于最近一个月的急速增长,深信热心公益的人士应该立即关心此事,以期把城内及邻近地区民众从日益严重的伤害中挽救出来。

信息来源如下:

a. 我与相关友人的直接观察。

b. 督办公署(Tupan's Office,管理南京地区的伪政权——译者)关于建立鸦片管理局(the Opium Suppression Bureau)的条例;鸦片供应机构与零售店细则;关于烟馆贩卖与特别执照的临时规定;本地烟民申请登记表(贴有当天鸦片印花税票)。

c. 通过私人接触获悉的商人与官员的陈述。

关于南京毒品贸易的报告

I. 形势急剧恶化

现在的一代人从来不知道鸦片在南京的大量供应与消费,以及它以吸引穷人与愚昧的方式公开出售。

特别是过去五年,由于政府长期认真坚持禁止此种贸易,加上过去30年教育的努力,鸦片的使用量甚为微小,海洛因则毫无所知。

但1938年的变化带来了“邪恶的革命”(an evil revolution)! 现今市政当局或受庇护的人们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数以万计的民众上瘾,包括儿童和许多男女青年。数千人从事这种行当。在统治当局压力下,出现了沉溺吸毒的新的一代人。某些官员公开吸毒、声名狼藉。财政收入来源于人们身体与心灵的毁坏。

公开的注册烟户在街上张贴广告,吹嘘他们的产品可以使吸食者增进健康与活力;一家官方报纸引诱市民进入暗室(指烟馆——译者)。

II. 贸易性质

A. 鸦片

1. 公开系统。

为了行政目的,整个南京市(包括下关)分为五个区。每区估计有一个土膏行(Opium Supply Establishment, T'u Kao Hang),每天获准出售750 盎司。实际上鸦片管理局可以把鸦片直接交给下属代理商,我们对此即将有所说明。

根据规定,市区有五个零售店(T'u Kao Hang,亦称土膏行)。它们大致按营业额分三级缴税,每夸脱(quarter)分别交纳 4 000 元、2 840 元或 1 420 元。每区预定设立 10 家吸烟店(“休息所”),其中 40 多家于 11 月 15 日开业。

它们根据使用烟灯数纳税:九盏灯交 150 元,六盏灯交 100 元,三盏灯交 50 元。不过在这个报告起草时,政府规定已改为允许这五个行政区各设十家土膏行和三十家烟馆(休息所)。我注意到有好几家在 11 月 19 日开张。一位朋友根据我的要求,花了一天工夫在城南查清了 52 家土膏行与烟馆的名称及地址。

2. 调查公开系统。

鸦片管理局隶属于督办公署市财政局。最近警察的压力和罚款,对于麻醉剂比鸦片还要重些。管理局的规则与细则,意在把全部私人的交易与消费都纳入税收网络。

据含糊然而善良的说法,似乎有一个戒烟机构,但更多的是约束系统内不轨行为的措施,以保守这个“公开”企业必要的秘密。社会上广泛认为,鸦片管理局奉命发给旅馆和妓院执照,甚至是私人执照(限于七天,不过倒是发得很慷慨),包括婚丧和其他社会礼仪活动。

3. 私人交易,鸦片供给来源。价格,营业额。

A. 鸦片

查阅官方档案,人们可能认为南京只有 75 家(现在是 200 家)土膏行贩卖鸦片。但不要忘记还有为数众多的各种名称和各种规模的旅馆、妓院,加上私人家庭设置的烟灯,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都在履行超越家庭的职责。我家附近一个小小地区,并非市区人口稠密的地方,就发现

有 14 个明显的交易与销售中心。

在过去几天,一家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机构,就买进 80 箱鸦片。公家系统一个重要的贩卖者说,两周以前日本代理人运来 200 多箱伊朗鸦片,而这船货似乎与鸦片管理局有某种关系,因此可以不受留难。有足够证据表明,鸦片主要从大连经过上海供应南京。

有关官员控制下的每日销售,原则上限制为 6 000 盎司。不少销售是在附近乡村进行,实际销售总额必然高于法定限额。不过,就算 6 000 盎司,每天批发价也有 6.6 万元,或是每月 220 万元。

B. 海洛因

正如鸦片贸易一样,海洛因也具有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在邪恶方面,海洛因远胜于鸦片;在涉及的金额方面,两者大体相当;在吸食人数方面,吸食海洛因者可能已超过了吸食鸦片者。

海洛因更方便吸食,而且只要极少量就可生效。普遍认为,按现时价格,一个有中等烟瘾的人,每天要吸食 5 角到 1 元的廉价鸦片,而吸海洛因只需 3 到 4 角钱(官方烟馆烟土和烟灯的特殊价格从 2 角到 5 元不等,视土膏的规模、质量与烟馆的档次而定)。

有个合理的估计,现时约有五万人吸海洛因,相当于南京人口的八分之一,有些估计更高于此。海洛因贸易纯属私营,广泛散布于零售小贩,由代理人通过亲友关系掌握。有位朋友知道 72 个销售点。

据普遍报道,日军特务部门与海洛因“半组织”(Semi—Organized)贸易关系密切并加以保护。一位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说,特务部门曾有记录,以南京为中心,这一地区的每月贸易额约为 300 万元。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此项赢利贸易大部分归日本公司经营,它们表面上经营罐头食品或药品,但在背后经销海洛因。

C. 结论

人们不能想象还有较此为甚的短见与利欲熏心,即利用战争时期一个相对良好的社会的瓦解,把饥饿、疾病和失望引向通往毁灭的歧途。在大多数情况下,开始吸用海洛因是由于受骗或不了解其真实情况。

廉价供应以满足广泛的需要,利用广告促进其吸用,通过扩大销售谋取公私暴利,这是一种既愚蠢又不人道的贪婪的政策。无论是中国或

是日本的未来利益,难道需要一大群烟民,短命而孱弱,生活懒散而道德堕落?这就是今天由鸦片管理局和形形色色海洛因商造成的在南京正在培养的那种人。

这是对“维新政府”及其支持者的人格与政治才能的严峻考验。没有任何真正的中国人会信任或帮助一个在他眼前破坏社会的政府。反过来说,如果新政府需要民众中的善良分子支持,作为示范的第一步就是立即阻止毒品泛滥。

上述这些话不是对于那些大抵都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的军官的盛气凌人的劝告,只不过是强调原先对日本和中国朋友的呼吁,他们还没有察觉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希望他们能够立即发挥积极的影响。

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乃至某些文盲,都能辨别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实的政策。现今的伪善只能增加善良民众对此项贸易的厌恶。

正当大批新领执照的烟馆开张,并且宣传2角、4角各种优惠时,谋求特别税收(甚至包括家内吸食者)的规定出笼了,佯装正经地宣布:“凡吸食鸦片而因疾病或年长无从戒绝者必须登记。”

设立公共烟馆一是由于怜悯穷苦劳工的艰辛,官方文件不止一次表述此意。再就是廉价与方便出售,维护民众以免受私人营业(它们未经相关部门核准)剥削。三就是出于人道考虑,使民众免于被更猛烈的毒品缠绕终身而无法摆脱。总之,这意味着海洛因已遍布各条街道,甚至在儿童中间(但海洛因的利润则流入另外一帮人的荷包)。

最后,请想一想,这种政策难道符合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合法经济利益?它每月至少要从这个地区已非常贫困的民众那里攫取500万元,削弱了他们对于正当商品的购买力以及他们从事各种正当生产的劳动力。

确实,人们将改变其现实判断,这个地区中日合作的第一位的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难道“远东持久和平”就是一盏烟灯致命的梦?

如果我作为一个外国的客人和朋友说话不当,请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从事有益工作的普通民众的福祉作更有效的进言。但千万别白费口舌与墨水去宣称鸦片管理局的宗旨已被误解。

[RG10,B4,F52。这封公开信是贝德士1938年11月29日写给朋友信函中的一个附件,上海的几家中英文报纸都曾摘要发布。贝德士于1939年曾去上海向中外人士介绍南京毒品贸易真相,此举激怒了日本当局,日本总领事曾致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表示抗议。]

14. 致朋友的传阅函(1938年11月29日)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大多数只收到我于一年以前与今年1月10日写的一些信,此后再也未收到我的信。这个报告将由“中国快帆船”号送到旧金山,此时我正在前往参加12月13日—30日举行的国际传教士大会的途中。在印度再逗留两周以后,我将回上海,大约(1939年)1月29日到达,只要得到必需的军事通行证,我将立即回到南京。

南京罪恶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虽然很少有人了解其全部意义。田伯烈的书——《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是一本很直率的作品。不幸的是有些人在现今世界的邪恶面前畏缩了,不愿相信他们所谓的“暴行故事”(atrocity stories)。为了和平与进步事业,首要的工作,是真诚地面对现实,然后说明事实,拟订计划,率先行动——根据新的事实需要去缓解。某个朋友采取一种立场,于是抹杀或篡改若干事实为其立场辩护,这就使他们都流于虚幻。

南京平民被杀数字最后是12 000人,其中九成与军事行动无关,包括许多女人、儿童与老人^①。这个数字意味着现时尚在城内的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人被杀。我们有来自居民家庭的报告,由于害怕报复而有应付

① 这是根据史迈士主持的调查报告推算的数字,即“现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被杀”,并非是指日军在南京地区(包括城内外)屠杀的总人数。贝德士是受过严格历史科学训练的学者,他尊重经过认真鉴别的事实,因此他对日军屠杀中国人总数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

与隐瞒,这个报告估计每五个家庭有一人被杀、受伤或被抓走未归。三万以上业已抛弃武器的俘虏被残杀,大多是捆绑成行在江边被机枪扫射而死。数千妇女被奸污(早先提出 8 000 人是很谨慎的数字,也是所有目击者中最保守的说法)。

城外的房屋曾被中国军队由于加强城防而纵火焚烧。城内的房屋及屋内财物在撤退时则丝毫未曾触动。但在日军进城一周以后,他们连续焚烧六周,烧毁数千处建筑物(超过 4 000 个街道门牌号码)。这些全部属于普通平民,他们已到“自由”区,没有人曾咒骂政府与党(指汉奸伪政权及其御用政党——译者)。全城有 24% 的建筑物被焚毁,此外有 63% 被洗劫。起初是士兵抢走几乎所有民众未被焚毁的家具、钱财、衣服乃至食物。上述数字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已以《南京地区战争损害》为题出版),他们视察了城内 40 000 户的门牌号码,并且对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了详细调查。这种损害行为是可耻的,因为仅 2% 是由于军事行动造成的。

可怕的伤害并不限于南京城内。为了估算剩余物资与各类难民的需要,我们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史迈士博士指导的调查,发现在广大乡村有 40% 农家房屋被焚,农具与家畜损失近半,每七家有一人被杀。对农村的残暴破坏仍然持续着,不过是在特定的地区,通常是由于愤怒的农民攻击抓走他们妻女的巡逻小队,或是由于本地居民处于游击队(这里不是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译者)与日本兵索取粮草、夫役的相互冲突之间。

你能想象如此没有自卫能力的民众在长期恐怖与危险中的生活状况吗? 当一个日本兵出现于街头,或是门上有一声敲击,或是可耻的警察局雇佣者的一个假报告,立即意味着大祸临头和可怜的财物丧失殆尽。有三个星期情况非常严重,直到 6 月份才逐渐缓解,生命和(财产)才有了基本的保障。但仍然存在任意没收土地和房屋的现象: 南京超过 20% 的不动产被军队、被他们各种名号的奴仆、被 3 000 日本平民强占。302 家日本商店,强占了未被焚烧的南京城内最好地势的房屋。我不知道有任何一起是属于商业性转手,就我所熟知的大量事例而言,在广大占领区只付给数千人每家 5 元作为补偿。这就是(日本)外交官在午餐

演说中讲过的“经济合作”。一方提供资源与劳力,另一方手持武器,凭借武力获得名义上的投资,加以控制并攫取利润。根据我们的经验,从电厂到街边商店的私人房产,做法大体如此。相比之下,阿提拉只是一个新手。^①

这样的政治不是我们的业务,我们只是关心我们城内民众的生命与公益事业。为救济难民工作了一年,从6月开始特别注重调查了解经济状况(损失与破坏、谷物、乡村情况、燃料、衣被、就业),我获知大量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普通民众无缘无故受害如此之深。从(去年)冬天直到(今年)5月,我参与国际委员会的一般性工作,并奉命重点照看金大的校产及人员,校园内在同一时间接受了3万难民,直到今年春天仍保持15 000人的平均数。

秋天,我们(金大)努力在不同地点开办了一所略具规模的小学、一个青年农民培训班、几个为初中程度失学儿童补习语文、数学的班,还为扫盲做了一些工作。到目前为止,只有宪兵来过,而且没有干涉。由于人手与经费有限,以及我们估计今春“维新政府”得向其主子显示“新教育”的某些成果,我们遂不敢贸然扩充(尽管市政系统已经瘫痪,而教会学校仅向部分儿童与应受某些职业培训的青年开放)。

但我主要还是从事救济工作,大多数日子里承担着混杂的职责。去年12月国际委员会为25万人提供住所(极其相对的安全),包括住在25个难民营的70 000人。直到5月,对这70 000人中的大多还需要提供食物,尽管人数随着秩序的恢复而逐渐减少。至今已花费345 000元(中国货币),主要用于食物(汇率是3.40元换1美元,现在已超过6:1)。现金救济、难民营管理、工赈项目、衣服、医疗卫生和对启动贸易和生产的小额信贷,成为援助的其他主要方式。

现在手头还有将近185 000元现金和食物可以用于冬季工作,面对的是一群身无分文的人们。表面上好像钱很多,但就以贬值的中国货币计算,仅南京城内可怜的贫民,每人也摊不到一块钱。只够他们两周食

① 原文是“*Attila was a simple greenhorn*”。阿提拉是433(?)—453年期间的匈奴王,世称上帝之鞭,这是暗喻日本侵略者的强取豪夺。

粮所需,或者只能为他们每人买一件最廉价的棉衣。委员会的大部分物资来自原南京市政府提供的大米与现金,还有5月间中央政府救济委员会提供的赠款。美国许多团体,一个英国难民基金会,一群中国银行家和其他移居上海的南京老居民,也有相当的贡献。委员会对救济申请进行严密的调查,所有账目均经过上海著名会计师的审核。

这个毫无保留的账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际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与困难。这个为救济难民而奋斗的罗曼史,实在值得付出生命、鲜血、人狱与眼泪;这个德国纳粹、英国生意人和我们美国传教士合作的故事,已经超越了我们国家的本分。在我们群体内还有一部分是回教徒、佛教徒与天主教徒;应紧急召集而来的许多中国职员显示的优秀素质;面对武器,表现为不断要求“解散”并命令中国人不与我们合作的不信任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所有这些,都需要你们现在的服务扩大空间与增强技巧。

南京人口现已增至400 000(相较于难民区时期的250 000和战前的1 000 000)。最近增加的大部分是来自乡间的难民,其中有些人原来是从城里逃难到农村的,他们把钱花光,或被来历不明的偏僻地区的“游击队”和强悍的盗匪抢光(通常包括他们的衣服)。农民、小商人和某些日常用品的生产者已经努力重谋生计。但我们至今仍然很难说明半数民众何以为生,对此,我们正在进行职业和收入方面的专门调查以期有所判明。

有大量普通劳工从事军需与运输服务,还有满足士兵各种需要的社会不正当行业。我早已不愿谴责一个苦力,他替祖国的敌人服务只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或是一个姑娘为了免于饥饿而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不给别人带来太多直接的伤害(譬如参与武装劫掠或贩卖海洛因、吗啡等)。因为高尚的道德难以抵御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战争早已给我们带来数以百万计的经济的与社会的破坏。我们现在偶尔可以看到官方报纸刊载的规模很大的公开妓院的广告。一个全新的厚颜无耻的少女人群,在餐馆当女侍,开了南京“风气”之先河。

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其生活也是严峻的。他们连续数日亲眼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飞机)带有美国装备,而且几

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也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他们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的友人正受到谴责，因为害怕法西斯国家不高兴，（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艰难地走向世界政府，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际意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做经济调节，而不应以武装的贪婪掠夺他们弱势的邻居。

这不完全是一封私人或圣诞节的信。我们在奋斗中舍去周围的一切，包括家庭生活在内。今年1月，丽尼娅（Lilliath，贝德士的妻子）把鲍比（Bobby，Robert 的昵称，贝德士的次子）从日本带回来，留在上海进美国学校直至6月，然后她回野尻湖与孩子们度过一个正常的暑假。4月，我为救济事务乘军用船只到上海工作十天，才得以与家人团聚。8月，我利用访问日本期间的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及其他国家的老朋友们交换信息。9月底，丽尼娅与鲍比回到上海、南京，我们在自己的房子里享用家宴，因为我们的损失还不算惨重。幸好留在南京的六个外国儿童之一大卫·麦卡伦，也是个男孩，刚十岁，读五年级。所以他和鲍比办起“麦克湾学院”（MacBay Academy，戏称，指两个孩子只能在家中读书——译者），聘用了两位母亲和一位中国教师，还有两只小狗，一对来自新加坡的草莓莺（Strawberry finches，只有蜂鸟那么大），还有偶尔兼课的严厉的父亲们。

同时，摩敦（Morton，贝德士的长子——译者）幸运地进入神户的加拿大学院（对他非常殷勤），虽然有许多担心，我们还是把他留下，明年可以读7~8年级混合班。在8月俄国战争和9月捷克危机发生时，我们的信念与判断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上海或南京的形势毕竟比神户更容易恶化，我们常常只有以此自慰。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单独写另一封圣诞节的信，叙述我对丽尼娅的赞赏，她在战争带来的许多家庭离散的情况下，给予我亲密的合作。她巧妙地玩这个游戏，而这就是莫大的帮助。春季，她为金陵大学和南京救济委员会驻上海临时办事处做了大量跑腿与办公室工作。

还有许多事情急需叙述，但这封信已经很长了。但我想就中国最近

战争总体形势作一简要补充,连同—个关于南京毒品问题的公开信。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情,使—个善于思考的人很难再相信那些仁慈的天意、善良的信仰。在残酷与贪婪席卷世界的浪潮中,我没有看到上帝的暗示。但人性的价值,人的生命需要和耶稣显示的景象,从未变得黯淡。在极端危险中手无寸铁地为人们的生命战斗,当你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未曾注意的力量所毁灭而仍捍卫真理与人道——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震撼。如果我们解除作为时间的奴隶状态,这样的生命可能是永恒的。这是一种新的自由感觉,在(上帝)给予的光明的指引下勇往直前赢得可能到来的一切。即使生命现在结束,它依然具有价值,仿佛是为他人的养育与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其价值之贵重永远不会消失。迄今为止,一个公开的紧急战斗的进程,一个化解狭隘宗派意识的企望,已经赢得了持续。但是,一个意欲报复的宪兵,一个心胸狭窄的密报材料的读者,就能粗暴地毁掉—个人的终身事业。

“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Peace on earth, good will to men)。但是,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性灵的观念似乎都不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形势之下,接受考验,但我知道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Be not overcome of evil)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overcome evil with good),需要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途径。所以我们这个圣诞节必将如此去做。按常识判断似乎没有多大希望,但有大量的爱,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与令人沮丧的地方也可发现。

贝德士

[RG10, B4, F52。这是贝德士前往印度马德拉斯参加国际宣教会议途经香港时写的信。]

15. 贝德士夫妇致国外朋友函(1939年11月28日)

南京,金陵大学

汉口路21号

1939年11月28日

亲爱的朋友:

“在过去一年中你有过危险的想法吗?”一位宪兵向一个从日本某地到另一个地方旅行的传教士提出这个问题。在目前所处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回答呢?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现今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上一封信是瑟尔(贝德士)在去马德拉斯^①参加国际传教大会的途中写的。他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与“教会与国际秩序”小组的工作,并从事与远东相关问题的研究。非洲代表团报告他们在教会工作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还有很多个人作出的杰出奉献,如印度的阿扎瑞主教(Azarian)、莱顿(荷兰一城市)的奎莫教授(Kraemer)、菲律宾的拉巴克博士(Laubach)、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初期的干事维瑟特(新西兰人),很多德国或其他大陆国家的基督徒热情维护“终世论”,而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则把“进天国”(striving toward the kingdom)看得很重要,人们对此常持不同观点,所有这一切,都使瑟尔很受感动。

通过在旅行中与杰出的中国代表几周来的密切接触,大会的意义得到了加深。中国代表以其坚定的信念给所有人(包括日本弟兄)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来自正在挣扎的、灾难深重的国家。他们在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作短暂停留,与具有广博学识的朋友进行了密切接触,了解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基督教团体的工作情况。这些都使他们颇受启发。印度通过观察变化和比较,恢复了22年前的工作兴趣,在紧张的两周内把工作拓展到新地区:德里、阿格拉、阿拉哈布德(在尼赫鲁家逗留一天)和伯纳瑞。基督会在中部省份的布道站:

① 马德拉斯,位于印度东南部,濒孟加拉湾,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南部、特里诺玻里和马杜拉等历史宗教中心。印度人对中国很感兴趣,对中国人的遭遇深表同情。

现在,让我们跳到几个月之后。丽尼娅再次把鲍比带到日本,是为了把摩顿从神户接出来,他的宿舍要关闭,他们将去野尻湖度暑假。贝德士不能离开南京太久,但他对有机会与在东京和其他地方的老朋友相聚一再表示感谢。他仍与许多日本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虽然很难把平和及调解的态度与他所真实面对的战争罪恶结合起来。

日本宗教活动向中国进行半政治化的扩张,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开会讨论。派到中国的日本基督徒一定是得到了军方的允许或支持的。派来的个人中,有醒悟的人道主义者,也有厚颜无耻的军事征服者的代理人。当局促使日本宗教人士说服中国人加入到他们国家办的慈善事业,从而挑拨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之间业已存在的真诚关系。传教士和中国牧师是如何回应“和平、合作”名义下提出的动议呢?这些问题必须在上帝面前回答,也要让宪兵听到。侍奉两个主很难。

我们没敢把摩顿送进神户的高中,即便是近期那儿的环境与关系都很好,现在应该把他从加拿大学校中转出,很难设想我们愿意让他在那儿再读三年或四年。摩顿已经适应了沪美学校的生活,虽然他在课堂上和体育方面不是最棒的,他已是童子军的一员,并当上了巡逻官。鲍比现在在家学习六年级课程,认识了很多中国小伙伴及其父母,以及小鸟和邻居家的狗,已习惯了没有同龄美国小伙伴的生活。明年他将12岁了,如果再长大一些,就能在上海寄宿读书了。我们的健康状况还算令人满意,只是丽尼娅时常被细菌感染。她除了在家教鲍比外,也在各种活动中做一些教学或辅助工作。

金陵大学可以说分散于四川各地,虽然主体部分还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慷慨接纳了几所学校,金大作为其中一员不得不面临人员拥挤和相互合作的严重问题,但他们仍担负着许多社会服务工作。在南京只剩下瑟尔、史德蔚博士(植物学家)和三位中国高级职员,还有100名助手和劳工。维持和紧急服务是两项主要工作。有四幢在城里的主要建筑,

包括许多额外的住房；城外有农场、花园、托儿所和林场。三所附属学校：一所很大的小学，一所不大的男子中学（尽管你们不会用这个名字），还有一所一年制的农业实习学校。这个负责任的群体在面临着许多难题时形成了亲密的同志般的感情。

贝德士和史德蔚博士是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他们利用金大教堂贮存了数百吨大米，女生宿舍成了大米发放处。去冬今春，委员会已给130 000人发放了救济。今年工作面临着同样的需求，但现在资金减少，而米价大涨。到目前为止，日本当局仍未允许委员会从南京境外购买大米（这由获得特许权的日本商人经营，他们可以在天津、上海和日本运输，价格3倍于成本），我们无法多用我们的钱换成粮食，即使以现在南京垄断高价两倍的价格。

我们准备由委员会的三个组成国家（美、英、德）代表通过外交途径，正式提出抗议。我们大部分现有资金来自美国捐献者，我们应在东京利用这一点，对剥削占领区的贪婪行径施加压力。

局势仍然是难以描述的糟糕，这篇报告仅仅是说明（日军）在几百万人的废墟上持续进行的没收、刺刀下的暴利和经济占领。什么重建？什么发展？什么合作？这是职业宣传家的欺骗性语言，与事实完全不符。

去冬今春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日军对基督教徒和外国团体怀有敌意。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多次被长时间拘留，或被试图驱逐出境。但数月以来在南京的日军实际上没有干扰我们，也几乎未干扰附近地区我们的同志。局势的缓解是日本宪兵没能制造出所谓“反日运动”的案例吗？或是来自负责的一类日本军官的改进？或是来自对美国抗议高压政策的安慰？假设是最后一条，日本人对华北与英国有关联的教会和医院的破坏，以及对中国牧师的监控，表明我们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尤其是在美国将减少对日本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是在这个省，不久以前，一名日本哨兵杀死一位加拿大天主教传教士，还打伤一名，拘捕一名。

同时，南京的20家教会在社会服务方面都很活跃，各类教会学校有6 000学生，虽受到严密监视，但并没被强迫按政治目的来工作。（当局）打印了一套新教材的草稿，但样式和质量很难也许根本不可能为教会学校接受。但他们还没有决定出版，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国际关系急剧变

化,这使得为小孩子们准备的精神食粮变馊了。在一个全能(但很愚蠢、困惑)政府还没重新确定谁是盟友谁是敌人的时候,一个人怎么能写儿童的启蒙书籍呢?

贝德士的主要工作包括金大南京部分的行政、救济;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进行调查,还有教会与学校的服务工作。这学期他每月去上海一次,为金陵神学院讲授一周西方文明史。这次要求他用中文讲,而以前上历史课时没用中文;他还要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人员会谈,与曾是公共事务专业的学生的老朋友会面。国际传教大会刚刚提出一项新任务,要求他们与日本一名同事合作研究马德拉斯会议提出的东方问题。根据目前贝德士在南京的职责,很难评判这个特别项目,尤其是一个不能预料未来几个月将会出现的危机。

战争的情况如何?何时才能结束?结局又会如何?这些问题折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第二个问题,通常还有第一和第三个问题,日本人也同样为此痛苦。今年,中日双方军队的战线没有明显的变化。日军试图向汉口西南方挺进,并从山西根据地向西移动,现在都成功实施。另一方面,日本顺利地占领了南方一些港口,(对内陆)封锁得更为严密。

游击队的战果(这里不是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译者)通常让中国人失望,日本人的傀儡企业同样也让日本人失望。没有哪一方不用让步即可找到打破僵局的方法,但谁也不会让步,直到有从未经过的压力降到头上。妥协尤其困难,因为一方(日方)决定迫使另一方(中方)放弃独立,选择领导人、决定对外关系和它的经济、文化的未来的权利都要归于军事占领者手中。日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毁灭性的成功,但它的目标太庞大,几乎不可能实现。

“自由中国”(指未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时称“大后方”——译者)值得大大赞扬,它保持了士气和合作,创建新军队,在新运输线上艰难前进,努力解决迫切的工业问题。财政金融管理也不错。有效的军事实力与既定目标还相差甚远,但期望它是恢复统一和自由的一个因素。日本到目前为止还能支付起战争的费用,现在费用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但对金属、油料、棉花、燃料的需要超过了供应,一般工业和消费者开始为军队毫无怜悯心的需求所苦。如果大陆(指欧洲)那边形势轻松些,另一

方面,日本和轴心国已经失去了目前成功的希望,最后,它会期望美国人的经济政策;近期也不可能期望在中国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欧洲战争使得日本更多依赖美国的物资,才能完成统治中国的目标。山姆大叔(指美国——译者)可以继续成为这场罪恶事业的主要伙伴,或者扣留最重要的物资,它现在可以要求重新考虑并减少以后爆发冲突的危险。

很难冷静地想一下这一地区人们的处境,一吨煤的价格已由 25 美元涨到 145 美元。和刚占领的头几个月相比,现在的局势确实改善了不少。士兵大规模的强奸、谋杀被宪兵的斥责和粗暴及毒品对大众的慢性摧残所替代。焚烧和掠夺已让位于日本人的专卖和没收政策,成为更有秩序的掠夺。但就业和工资滞后于人口的部分恢复和价格飞涨。南京现有 55 万人口,战前则有 100 万;现在有 7 500 日本人,战前只有 100 人;现在有 100 名西方人,战前有 500 人。政府和所有公用事业都瘫痪了。学校很少且质量低劣。文化成为一个宣传部门。公私道德大大恶化。在 1 000 面墙上(on a thousand walls)写满了新生活运动有些抽象但确实可信的信条,现在让位于日本人明显的药品广告,为东亚新秩序增光。关于毒品,你通过附件可以自我判断。

在这种情形下,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爱如何才能战胜征服和仇恨;真理如何超越政治宣传和被歪曲的“新闻”;正义如何取代自私(剥削)?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个人价值,不分国籍,必须帮助任何一项能把人类团结在一起的事业。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能够并且会见了许多日本人。但最大的问题是磨石仍压在数百万人的脖子上。他们能保持不受伤害吗?或是仅仅通过和解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上帝的仁慈及它对顺民和贫苦人的关爱,与可怕的痛苦及对自满权力者的谴责紧密联结在一起。

这封信到圣诞节才能发出。因为我们想让它带去真挚的节日问候。现在,又到了我们再去向军方申请准许办慈善事业的时间了。

丽尼娅

贝德士

附记:如果你们想再次收到我们的信件,寄来一张明信片就行。老朋友的真实来信是最受欢迎的。不过,请记住怀疑的眼睛可能会读到它们,不要把我们卷入“公

共福利事业中去”，就像这封信一样。鸦片问题是我们通常限制的必要例外。那个问题（指关于南京毒品贸易的附件——译者）可以出版。

[RG10, B1, F7—11.]

16. 在纽约的演讲记录(1941年6月25日)

国外布道全国联合会会议(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 A.)

纽约市第5大道156号

绝密 不得出版

东亚委员会, 1941年7月10日

给曾在中国工作的各会董事会的秘书们——

亲爱的朋友们：

下面是贝德士博士1941年6月25日为纽约市一个社团所作的演说词。请注意已注明“绝密和不得出版”。只要读一遍此份文件，就会明白这个资料何以不能刊布，而贝德士何以不能署名。贝德士是在华传教士中最富有才能的观察家之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他正好在这个城市，而且一直居留到今年5月。在此期间他曾访问日本数次，至少访问中国西部一次。他是基督会的一个传教士，也是金陵大学的一个教师。

您的忠诚的

芮思娄(John H. Reisner), 代理秘书^①

东亚委员会

中国沦陷区基督徒的工作背景

(The Setting for the Christian Task in Penetrated China)

I. 经济形势

交通完全被日本人垄断，并用以维持对于货物运输与出售的控制。

^① 芮思娄，曾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

实际上所有大规模企业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有公用事业被日本人垄断,建筑材料、棉花、棉纱、羊毛和机械亦复如此。

普通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仅缺乏粮食,而且缺乏各类贸易。由于军事行动和敌对的经济封锁,整个国家被分割成许多块。城市与乡村分离,工业与农业分离。

由于货币不统一情况更加恶化。现时有三种货币在南京流通:1. 原有中国货币;2. 中国储备银行(傀儡政府中央银行——译者);3. 日本军用券(用于所有交通和公用事业以及各种大规模贸易)。

华北地方傀儡政府另有单独发行的货币,以后在内蒙亦然。华南也有自己的特别货币。

南京和扬子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物价指数,如果以1937年头六个月为100,则(今年)3月底为825,大米指数已超过1000。

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指数)约为250,相对于1937年的100。熟练工人只能养活自己而无力赡养家庭。如果他不吃饭,第二天就难以工作;如果他吃饭,妻子和儿女就得挨饿。

II. 汪精卫傀儡政权

在傀儡政权的代表人物中,我们不可能看出性格与智慧。他们很可怜……他们之中许多人从南京或沿海地区来寻找工作。有些人曾经坚持两三年拒绝为汉奸政府工作,但由于找不到其他职业,只有就伪职以谋生。他们内心有愧,却无力自拔。他们聊以自慰的是,当正义到来时他们乃是处于怠工状态。此种工作网罗了大批人,其品格与见识均较低下。现任社会安全部长是中国最著名的杀手^①。他的朋友告诉我,已知道有138个政治刺客为他效劳。他们有一个专家注册局,乃是出售日伪政府职务的机关。他们自身的道德素养极差。

去年12月,伪教育部长曾有意帮助南京金陵大学复课,据说其用意是利用我们的校舍办他们的公立大学(指其后设立的汪伪统治下的中央大学——译者)。他请我到他的公馆讨论此事,在公家俱乐部有两个宴会,然后在我家里回请,并且必须请汪精卫的两个卫兵共餐。我们利用他的癖好

^① 指汪伪政府特务头子丁默邨。

加以搪塞：古代哲学研究和急欲通过我们了解国际新闻。他不愿由于在学校问题上的压力过大而失去新闻来源。这位部长在我家里发表 2 小时 45 分钟的演说，其间曾为南京伪政权表示歉意，结束语指出：“无论我们在南京如何没有希望，重庆那帮人也没有希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惟一的机会有英国在美国帮助下打败德国，那时日本人将不得不离开中国。”

汪精卫自己并没有从南京溜走，事实上，最近访问东京乃是他一年中的首次旅行。普遍认为，他在伪政府任职多少带有暂时性。很少中国人认为（南京政府）任何举办之事可以维持很久。最近不少伪职人员向我们这群人送相片，目的是在自由中国政府返回时，可以证明他们与美国人的社会服务有联系，其中包括一些声名狼藉的人。有两个人私下到我家访问，详细打听我何时回来，如果在我回来以前重庆军队就来了，其中什么人可以庇护他们。

III. 教会工作

一般来说，日本人和伪政府没有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在各方面严重干扰教会工作。我们有许多比预期要好的机会。我们常常可以猜透日本人的程序中的某些漏洞。

同样，在华中与华南，日本人并非十分自信能够长留，他们投资不多。以短暂停留的心理处理许多事情，他们不能把这些事情引向日本人认为是自然的结论。这就给予我们机遇。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把伪政府审订并提供的教科书推荐给我们的学校，我们曾经为此担心，但终于得以推脱。

当然，你们已经听到山西省伯利恒（Brethren）教会的严重事件。去年秋天或初冬，那里有 13 个基督徒，包括若干负责人，在日本人极力威胁基督徒割断与外国传教士的联系时被杀死了。这就造成一种道义压力，迫使（外国）传教士撤离。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极端事例。还有其他相当恶劣的案件，但这些案件很少被关注，或在更大范围中传播。

如何推进传教士工作，与过去相比，教会能做些什么？当然，答案将因不同地区和各级人员而异。不过医疗有所进展，从接受医疗的病人数字方面看，取得了一如往昔的成就，而在反应方面则胜于往昔，因为这里很少有别的什么（医疗）可以提供给民众，也因为民众非常钦佩医生和护

士在处境艰难的条件下所作的贡献。大多数医院失去大部分他们的中国医生和受过训练的护士,并且非常缺乏职员。有少数德籍犹太医生和(外地)逃难的医生补充进来,他们大多能提供切实的帮助。虽然所有医院都为房屋、人员、设备的损失所苦,但他们能够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坚持其服务。我们担心药品难以为继的情况趋于严峻,因为日本人对此类商品日益加强控制。来自美国的货物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IV. 学校(指教会学校——译者)

学校现时情况复杂。你们当然了解学院与大学的局势。中学总数与战前相等,约为250个。许多学校质量下降,因为他们失去了最好的老师,加上他们的房屋和人员损失严重,大多数学校现在不能付给教师适当的生活费用,不过他们的服务质量普遍得到好评。公立学校更加衰落,他们的质量比教会学校最次者还要差,非基督教学校的精神及宗旨与家长的期望相距甚远。

至于小学,未能得到适当的信息。教会通常愿意在少年儿童中恢复工作,但这些工作往往与宗教活动或类似课余圣经学校等项目相联系,而不怎么努力遵循政府的规定。不过也有若干办出成效的常规小学。

V. 紧急工作

在沦陷区提供的紧急服务是大量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救济工作。他们也在某些学校工作,比往常更加强调职业的训练。他们也参与全国儿童基金会领导下的儿童保育事业,由全国基督教委员会从行政上为此提供经费。还有许多直接救济方式。这工作使传教士与外国牧师负担甚重。但除少数人外,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负担。你不能向一大群饥饿民众简单地说:“将给以温饱”。当你进入一个教堂,那里有三分之二的人衣衫褴褛,除非你尽自己之所能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否则你将难以心安理得。救济任务确实繁重,但他们(指参与救济工作的中外人士——译者)并未被压倒。许多教会的报告说,他们通过救济工作在精神上受益甚多,而常常更多的抱怨则是那些以宗教为生的人们(rice Christians)的陈旧包袱。

VI. 结论

我的结束语很简单:沦陷区的传教士决心在向他们开放的道路继

续走下去,他们必须面对那儿伟大的人类的需要。精神与其他方面的回应是非常显著的,我们感到,当急需把人员与事业转移到自由区并立即开展有益的工作时,如果把一大批曾经将紧急服务工作做得格外出色的人们完全弃之不顾,那将是一个错误。即令外国传教士明天被撤出,这些地区的教会也不会消亡,它将重新在严酷的条件下成长。教会的故事即令美好到极点,也将有一个艰苦的经历,我们期待于它。我们执著寻求,无论日本人在这儿停留多久,我们预期政权的转移将带走破坏与暴力。日本人的撤走不会有预期的愉快,政府继续留在边陲(指重庆——译者),也不会有预期的愉快,没有人知道谁将接管这些地区。即使日本人走了,仍将有大量的麻烦事在前头。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特别高兴地看到,自战争初期以来曾受到严酷打击的基督徒与教会已经归来。

(以下为演说后自由讨论的记录——译者)

问:我们的救济工作是否会巩固傀儡政权?

答(贝德士,下同):对问题的答复是,日本人从中受益甚微,而对于中国人的道德与品格的裨益,远远超过我们为日本人做的任何事情。日本人不欢喜我们的工作,他们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

在重庆,我发现大部分领导人对这一时期沦陷区教会的工作甚为满意。他们没有把政治因素置于显然是善良的人性之上,他们同情在沦陷区被隔绝的同胞。蒋介石将军知道我留在南京并曾给我写信,其目的在于表示对基督教传教士在长江下游一带工作的称赞,他常常通过各种渠道这样做。他提出两个问题:1. 一般民众情况如何? 2. 鸦片问题如何?

问:你们怎样得到医疗供给?

答:没有通过药品商转运进来,不过我们可以作为个人财产得到它们。

问:你估计现在的状况将维持多久?

答:我们是在与非理性的人(指日本侵略者——译者)在不负责的情况下打交道。我们敢于前进,但没有人能对未来作任何恰当的预言。

问：鸦片情况如何？

答：主要趋向是鼓励整个沦陷区种植鸦片，甚至在城市边缘。

问：日本人(自己)是否开始食用毒品？

答：日本人自己吸食并不太多，虽然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他们控制严密，检查审慎。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举报有哪些日本人曾来光顾。在朝鲜，官员已要求某些农民开始种植鸦片。

问：中国人的伤亡总数如何？

答：比较公认的数字是 300 万人死亡与重伤，而日本人所说的数字是 100 万人。在这类战争中，100 万人的伤亡可能从来没有记载。

问：日本的态度有无变化？

答：日本态度的变化，据说表现在对其中国事业的精神沮丧，他们对此很伤脑筋。我有第一手证据，因为(他们)努力谋求利用米尔士先生和我的影响去推动美国出面调停。我们曾与一位日本将军有过不寻常的会晤。我在与一位无党派日本人士的交往中，获悉一个十分完整的和谈故事，或许可以说是从去年 8 月到现在和平企望，在此期间他们断断续续地进行。日本人准备提出极为慷慨的条款作为(议和)代价，但这些许诺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完全一致，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他们最后说，愿意从中国撤军。不过在同一时间，军方则希望维持在华北与(内)蒙古的驻扎。他们说：“我们希望这能被理解为日军既有的合法调动，同时将与中国人达成协议，认可我们留下以抗御苏联。”他们未曾离开(日、苏)双方水火不容的立场。他们最近谈到的无非是一年以前的(日、苏)交战，这是日本将军们付出可怕代价的发端。

问：目前苏联状况对日本的影响如何？

答：(苏)俄日协定没有任何意义，日本将军们的声明早已澄清。我认为目前局势的影响，将会使日本军队“做好应变的准备”(“remain poised for an emergency”)；这意味着在他们决定采取骑墙政策。(日本)的一个重要派别将要求在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进攻西伯利亚。

问：日本如何南进？

答：南洋方向的进展并非成功。在东京，内阁长期在一个问题上权衡得失，即是继续与德国联盟，还是在未受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开溜？

问：在日本以及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有多少德国人？

答：在中国不多，在日本约有 10 000 人。他们获得各种优越职务，占有很多新闻、企业部门的位置。他们正在努力推进（战争），而他们的言论充满诉求。他们说：“假如你们等待而英国赢了，你们将一无所获；假如我们摧毁英国而你们现在不帮助我们，你们亦将一无所获。”这种机会主义在日本方面得到积极反应：此乃千载难逢的时机。

问：德国与日本之间有无摩擦？

答：是的。（德国）与日本自由派人士之间有矛盾，而与主张采用暴力行动的日本人没有矛盾。

问：在沦陷区，是否有些地方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现而增加了中国人的困难？

答：是的，不过为数甚少。除有一个我曾告知你们的之外，就没有长期存在的矛盾。不如用另外一种方式回答，只要美国不与日本开战，美国传教士在一个邻近地区出现，也可以为当地中国人提供多方面的极大帮助。

问：如果日本人战胜，美国公民是否会被监禁，而美国财产将被没收？

答：我们可以预见，所有外国人将被监禁，大量属于美国或与美国有关联的财产，将被日本人或傀儡政府接管。我不大相信会有许多对教会的直接干扰，但医院与学校或许会受害较多。另一方面，中国就是中国。在中国基督徒与傀儡政府的中国人之间，通过不同渠道形成复杂的关系。许多地区由于这种关系，至少形势有所缓和。在更大范围内将发生什么事情，我无从预言。日本人，还有傀儡（政府）都在打（教会）学校财产的坏主意。在许多城市，有一半的公共建筑被严重毁坏、洗劫与废弃。我知道许多地方，傀儡政权的官员和日本要员们说：“只要你们照常做你们现在做的与政治无关的事情，你们不要担心没收。”这尽管是细微的（变化），但也反映了某些方面的态度。

[RG10,B98,F800.]

二、费吴生

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是长老会传教士乔治·费奇和玛丽·麦丽兰的儿子。1906年在渥斯特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9年受任牧师并返回中国在上海青年会工作。

南京大屠杀期间,费吴生是南京青年会负责人。他积极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任安全区总干事。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被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第一个获准离城的外国人带到上海。正如费吴生所写道:“我的故事在上海引起轰动,因为这是首都弃守后有关此处情况的第一则新闻,它被复印和油印并广为流传。”^①

1938年费吴生在美国各地旅行,介绍南京大屠杀并放映记录影片。他回到中国为青年会和联合国救济总署服务,随后在朝鲜和台湾青年会工作,1961年退休。

本书收录了费吴生日记及写给朋友的两封信。

1. 日记(1937年12月10日—1938年1月下旬)

我要叙述的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实际上是很不愉快、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难以想象的太多罪恶与恐怖,这是一伙具有无可比拟的兽性的下流盗匪残害他人的故事。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的、友善而守法的人民。即令这个故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觉得也必须讲出来。只有讲出来,我才能安宁,是不幸还是有幸,我就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他们有责任讲出这个故事。它很不完整,因为它仅仅是整体的一部分,只有上帝知道,何时它才能结束。我祈祷它早点了结——但我担心它将延续数月,不仅在这儿而且还包括中国其他地区。我深信这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现在是圣诞节前夕。我先从12月10日讲起。在短短两周里,我们在

^① 费吴生: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在华八十年》), 台北美亚出版社, 1967年。

南京经历了围城、中国军队败退和日军进城。往日的南京曾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美丽城市，依然有着法律与秩序，今天则是一座废弃的、充满仇杀和洗劫而大部分被焚毁的城市。完全无政府状态已有十天——这是人间地狱。

我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面临严重危险，淫欲疯狂并且喝醉了的士兵，强奸妇女以后走出屋外。谁也不能确知自己命运如何，当他发现刺刀对准自己的胸膛，或是手枪对准自己的头，就明白已被掌握在某个有心要干掉自己的人手中。日本人不喜欢我们不顾要求外人离去的劝告而继续留在这里。他们不需要旁观者。但是我们还得留在这里，当他们抢走赤贫者最后一点财物——最后一枚铜板、最后一点卧具（已是寒冬季节）、黄包车夫的车辆的时候；当数以千计解除武装的士兵向你寻求庇护所，连同数百无辜平民从你眼前被拉走枪毙或用以练习刺杀，而你曾听到枪杀他们的枪声的时候；当成千妇女跪在你的面前歇斯底里哭泣，恳求你把她们从野兽蹂躏下解救出来的时候；当你的国旗多次被扯下践踏，你站在一边无能为力，而你自己的家也被洗劫的时候；然后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定居并热爱的城市，你曾为之奉献青春年华的学校，被有计划地、成片成片地焚毁——这是一座我未想到的地狱，绝无仅有的地狱。

我们经常问自己：“这将继续多久？”我们日复一日被日本当局告知，一切将迅速好转，“我们将作最大努力”，但是每天却比前一天更糟。我们已得到通知，一个两万人的新师团正在到达。他们是否也将通过抢劫、杀戮和奸淫来攫取自己的苛捐？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剩下的财物可供抢劫，因为这个城市几乎已被抢得精光。在过去一周里，士兵忙于用卡车从商店抢劫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商店。令人悲痛的事实是：我们只有可供 200 000 难民维持三周的米面以及十天的煤炭。你能想象出一个人从睡梦中被惊醒而再也无法入睡的情景吗？即使我们有足够三个月的粮食，那在此以后他们又将如何填饱肚子？而且，他们的房子都被烧坏了，他们到哪里住呢？他们不能再在这样十分拥挤的条件下生存；否则，疾病和瘟疫将随之而来。

每天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我们的抗议、呼吁和经过核实的日军所犯罪行的报告。我们受到日本人很有礼貌的接待，但实际上他们也无能为力。取胜的军队一定要获得奖励——这些奖励就是对他们向全世

界大声宣布要保护的这群人任意抢劫、谋杀和强奸,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野蛮、粗暴行为。在全部现代历史上,的确没有一页能像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样黑暗。

要把过去十天来发生的故事全部讲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悲哀的是,当世界上其他人明白事实真相时,它也许会受到冷淡——它将不再是“新闻”。然而,日本人确实向世界宣告,他们已经在这座被他们洗劫、焚烧的城市建立了法律和秩序,被他们蹂躏的人们张开双臂、挥舞着小旗欢迎皇军。无论如何,我要记录这一时期发生的一些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就像我已经在日记里所记的那样,因为,至少我的朋友会很感兴趣,而且,这些不快活的日子有了永久的记录,我对此很满足。时间可能会超出这封信的日期,因为我并不期望这封信能在一定时间内发出去。日本人的检查制度将决定此事!在南京沦陷前登上不走运的“帕奈”号和美孚油船及其他船只的我国及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和一些商人,在他们离开时都满怀信心地期望一周内就能返回,而现在仍在江面上或某个港口等待着(指那些还没有被日军炮弹和机关枪炸死或炸伤的人)。我们认为还需要有两周时间才能获准返回,这比禁止离开南京的时间还长。我们是这里真正的囚犯。

在南京陷落前的两周里,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人、中国人都进行了协商,确认这一地区不准有(中国)士兵和军事人员,日军也不能轰炸这一地区,这里在形势恶化时可容纳南京 100 万人中的 20 万难民,因为这很明显,中国军队在上海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精彩抗战现已崩溃,士气也大大低落。日军先进的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毁灭性惩罚使中国军队不堪忍受,并且日军在杭州湾成功登陆,从侧翼和后方展开进攻,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南京很快就会沦陷,这是不可避免的。

12 月 1 日,星期三

马市长对我们设立安全区的建议给予正式的反应,并提供警察 450 人,三万担(2 000 吨)大米^①,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还答应给十

^① 3 万担相当于 1 500 吨。

万元现金，实际收到八万元。唐将军，正如前曾告知，他负责首都防务，在极其艰难条件下密切配合，从安全区内撤除军队与防空设施，维持良好秩序直至12日日军进城。除了一小部缺乏供应的中国士兵抢劫以外，基本没有抢劫行为，全城外国人的财产都受到尊重。一直到10日我们都有水，第二天还有电，电话一直到日军进城时还畅通。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严重的危险，因为日军似乎想让难民区避免空袭和炮击，而且和日军自侵犯以来造成的地狱相比，南京是秩序和安全的天堂。但我们的运输确实有些困难——大米都贮存于城外，我们的一些司机不愿到正在交火的地方。一位司机被霰弹碎片打瞎了一只眼睛，有两辆卡车被军队抢走，但这些和我们以后遇到的困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2月10日，星期五

大批难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安全区。我们已经占用了大部分学校房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军事学校和其他学校，现在只有启用最高法院、法学院和外侨房屋，打开他们锁上的门并且派出我们自己的警卫。紫金山外可以看到两只日本飞艇，可能是用为炮兵观测。猛烈的炮火轰击南面城墙，炮弹落进城内。第二天早晨有几枚炮弹正好落在安全区与城南之间，在金陵女子神学院和福昌饭店附近炸死约40人。我们的视察员，一个德国人施佩林先生(Mr. Sperling)，在他居住的福昌饭店受了轻伤。美国炮舰“帕奈”号开进长江，但在它离开以前，我得到我们使馆帕克斯顿(Paxton)的电话，告诉我南京最后收到的两份海军电报(最后一座城门已经关闭，我们已失去登上炮舰的权利)。当然，他是从城外打电话进来的，这是威尔伯(Wilbur)和鲍引登带来的信息。

我们现在形成一个27人组成的团体——18个美国人，5个德国人，1个英国人，1个奥地利人和2个俄国人。城外江面“帕奈”舰上有2个使馆留守人员帕克斯顿和艾奇逊(Acheson)与另外6个人。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机动船上有更多的人，这是一艘准备做水上旅馆的废船，载有包括德国大使馆罗森先生在内的大约二十个外国人和四百多个中国人，还有其他的船只。所有人都期盼着早日返回这个城市。我们不知

道他们中间会死多少人,不过任何人回家都必需花费很多时间。他们将见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南京?

12月12日,星期天

我作为难民区总干事^①在办公室忙碌终日。我们正在利用现任外交部长张群将军的住宅充当总部,所以装修得很舒适,而且有一个全城最好的防空洞。

过去两天飞机经常光临,不过现在没有人注意它们,而轰炸曾经是很可怕的。城墙已被破坏,城南部分损坏尤大。没有人知道中国伤亡如何,想必数量极大。日方说攻占南京时他们自己损失了40 000人。普遍的骚乱从今天午后开始。(中国)士兵从南面拥出城外,有许多经过安全区,但他们行为良好,很守秩序。唐将军请求我们协助安排与日军休战,施佩林先生答应打白旗送信——但为时已晚。他(指唐生智——译者)于当晚逃走,很快传出消息,全城已陷入混乱。当他们出城走向下关和江边时已造成恐慌。好几英里路上随地抛弃着步枪、弹药、皮带、军装、车辆——各种各样军事辎重弃置路上。车辆挤压、倾翻、燃烧;城门那里有更多车辆挤坏、燃烧——一次可怕的大屠杀——死尸堆积逾英尺。城门紧闭,极端恐怖的是:士兵爬上城墙,用绳索、绑腿和皮带,或者是把衣服撕成布条,把自己垂下城外,许多人跌死。但江上的情景或许最令人伤心,有一队大帆船,显然难以承载大群意欲逃向江北的人群,超载的船只倾覆沉没,数千人淹死。还有好几千人试图用江边木材制筏,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另外数千人得以逃离,但其中许多人可能会遇到日机(一日或两日后)的轰炸。

有三个连的一小群残余官兵,渡过长江上游三英里的三汊河,企图攻击正在从那个方向开来的日军,但由于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似乎

① 费吴生的职务名称以《拉贝日记》为据,与杭立武晚年回忆略有歧异。按杭立武的说法为,原由他担任主任,费任副主任。他离开南京后,才由费吴生代理主任。按译者的理解,当时有可能中外双方各有一人任总干事,所谓“副”者,英文并非“vice”,而是“co”,即“coordinate”,有“协同”与“同等”两层意思。

只有一个人活着跑回来。他恰好是我一个朋友的兄弟，次日早晨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并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和另外一名军官驾木筏渡过了长江，但在试图渡过其支流时这名军官被淹死。天亮之前没人注意时，他爬过城墙来到城里。

我们在南京曾度过的愉快、平静、有秩序的时光就此结束，而在这里我们曾经期望更好的未来。由于日军已经进城，随之而来的便是恐怖、破坏与死亡。

12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1时，安全区首次得到有关他们（进城）的报告。我与委员会两位同事开车去会见他们，正好在安全区南面进口遇见一支小分队。他们未显露敌意，尽管稍后片刻就枪杀了20个由于害怕他们而慌忙逃走的难民。似乎自从1932年在上海已形成一条通例，凡逃跑者必被击毙或刺杀。

与此同时，我们赶忙在总部帮助中国士兵解除武装，他们已无法逃走，只有到难民区寻求庇护。我们向他们保证，只要放弃武器，日军将予以宽恕。但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们即令是战死，也胜过被抓去枪毙、刀砍或供刺杀练习。

当天仍有若干炮击，但很少落在安全区。上午我们曾在医院中发现若干榴霰弹碎片。一块碎片正好穿过威尔逊医生（Dr. Wilson）的手术室，当时他正在做手术，幸未受伤，还有一颗炮弹穿过金陵大学新建的一幢宿舍，亦未造成伤亡。交通部被焚毁，但不知道是由于炮击还是溃散士兵纵火。那是全南京最美的、有精致大厅的建筑。

12月14日，星期二

日军大举进城——坦克、炮兵、步兵、卡车。恐怖统治开始了。在接连而来的10天里，残酷和凶暴与日俱增。他们是中国首都可恶的蒋介石政府所在地的征服者，他们奉命可以为所欲为。飞机散发的传单遍布全城，宣称日本人是中国人绝无仅有的真诚朋友并将保护善良民众，当然这无非是空话连篇。为了显示他们的“真诚”，他们任意强奸、劫掠与屠杀。成群

的人被拉去,我们原以为是充当劳工——但他们再无音信,不知生死。一位(日军)大校带着属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花了一个小时打听“6 000 个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在哪里。那天来了四批日军,试图开走我们的车辆。在同一时间,他们在别处偷走我们三辆车。在宋宅^①,他们扯掉美国国旗并抛弃于地,打破一扇窗户以便跑走,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于他到史密斯教授(Prof. C. Smiths)家的五分钟之内。他们策划偷卡车——已经到手两辆——这是两位美国人大部分时间用以运输米、煤的必需工具。他们与这些日本偷车贼周旋的经验,本身就是很有趣的故事。在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译者),他们取走护士的手表与自来水笔。

《纽约时报》的德丁(Durdin)那天开车去上海,虽然我们无人相信他会顺利到达。我赶紧写信托他带走,但他到句容就被迫折回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News)的斯蒂尔(Steele)打算出城到江边,报道多艘日本驱逐舰刚刚到达的消息。一位日军尉官告诉他“帕奈”号沉没的消息,但语焉不详,也没谈到其他沉没船只。在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帮我们出走之余,最后只给我们留下一截绳索,我们可以用以从城墙上垂下到达江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帕奈”号炸沉了,而我们依然安全。

拉贝先生,我们的主席,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和我们的秘书史迈士先生,访问日军司令部,希望会见司令官请其制止难以容忍的无序行为,但他们必须等到明天,因为司令官还未进城。他们的拜访毫无所获。

12月15日,星期三

我开车绕行我的房子周围,它正好在安全区外,看看是否一切无恙。昨天门户还是完整的,今天侧门已被破坏,南门也开着。我没有时间进去检查,只有拜托一位刚搬到街对面似乎还较友善的少佐顺便照看,他答应了。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等着我,他深切关怀“帕奈”号的损失,但也未能提供详情。(日本)海军愿意派一艘驱逐舰到上海,把所有美国社区愿离去的成员送走,并且可以代发纯属私事的电报。他似乎对我写的信太简略而有所失望,我写道:韦尔伯,上海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在南京的

① 指金陵神学院的宋煦伯牧师(Rev. Hubert L. Sone)。

全体外国人平安无事，请转告有关团体。当然我告诉他，除几位新闻记者外，我们剩下的人全愿留在南京时，他也感到失望。

我开车送他回船——他还得步行 40 英里——行至一半路程，我们即被一个日军少佐阻止。他告诉我们，市民不允许再往北走，因为他们继续搜捕若干中国士兵，而这是很危险的。当时我们是靠近军政部，这里显然正在继续处决数百解除武装的士兵和许多无辜平民，这才是不许我们继续前进的真实原因，所以“濑田”舰的关口先生只有步行其余路程。但下午我打了这位阴郁的少佐一个马马虎眼，在归途我驶向下关。我被阻止于城门，但与我一道的路透社的斯密司和斯蒂尔还留在驱逐舰上，最后我们还是得以通过。我已经描述过城门的情况——我们确实是在两三英尺厚 90 英尺长的成片尸体上开车通过。情景难以形容。我永远难忘这段行程。

在“捷蒂”(Jetty)号我们发现《纽约时报》的德丁和派拉蒙电影公司(Paramount)的阿尔特·门肯(Art Menkon)早已来了，我们刚和他们去过西北的山西和西安，由于他们要继续旅行，我只有答应德丁把他的车开回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的冈村先生刚从上海到达，他也在这儿并且告诉我们“帕奈”号和美孚邮船上的伤亡名单，所以我把他带进城。但我们在城门再次被阻止，这次卫兵坚决不让我们进城。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南京，即令我刚才从这里出去也于事无补。甚至连冈村先生的恳求也无效果——大使馆管不了日本军队。我们只有等候冈村开一辆车去军政部并送来一张特别通行证。花费了一个半小时，但我有一份 11 月(号)《读者文摘》，这是我得自外界的最后一份邮件，有了它时间就过得快些。但城市一带恶臭熏天——到处是大嚼尸体的野狗。

当晚我们职员开会时有消息传来，日军将离我们总部很近的一个难民营 1300 人全部抓去枪毙。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是以前的士兵，但拉贝在那天下午曾经得到一个日本军官保全他们性命的许诺。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他们即将被处决。人们被排行成列，并用绳索捆绑成大约百人一群，由士兵持刺刀监视。那些人戴的帽子被粗暴地撕毁丢在地下，凭借汽车前灯的灯光，我们看见他们走向自己的末日。从整个队伍中听不到一声耳语，我们的心如同铅块。那四个跋山涉水来自广东的士兵，昨天勉强地把武器交给我，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他们？或者是那个来自

北方的满身绷带的中士,当他决定自己命运时仍然用混浊的眼光企求着我,我是多么愚蠢,告诉他们日本人会保全他们的生命。我们曾经真诚地希望他们在日军许诺下继续活下去,至少当日军到达时秩序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建。我们很难想到,我们将亲眼目睹当代无与伦比的残暴与野蛮。因为更恶劣的日子继续到来。

12月16日,星期四

由于日本人继续偷我们的卡车与轿车,交通问题变得严重起来。我前往美国使馆,中国职员仍然留在那儿,借了艾奇逊的车让米尔士去运煤,因为我们大的难民营和三处大的粥厂都需要煤和米。我们现在有25个难民营,其中分别安置200至1.2万人。仅金陵大学校园一处就将近3万人,金女大专门收容妇女儿童,人数从3000激增至9000,后者连广场都塞满了。我们曾设想人均住处为16平方英尺,但实际上远远比这更为拥挤。由于当时没有一处是安全的,我们希望把最安全的区域放在金女大,其次则是金陵大学。华群小姐(Miss Vautrin)、戴籁三夫人(Mrs. Twinem)^①和程太太^②勇敢地全力保护妇女。

从那天早晨开始就有关于强奸的报告。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抓走,其中七人是从金大图书馆抓走的,比这多无数倍的妇女是在她们家中被强暴的。数百人在街上寻找安全处所。午餐时,房屋副总管林查理(Riggs)哭着进来。日本人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抢空了,特别是抓去的人生死未卜。难民区50名警员也被一并抓走。林查理曾经抗议,但被士兵粗暴对待,并且两次被一个军官殴打。向难民索取金钱,把能找到的任何财物从他们身上取走,甚至连他们最后一点卧具也不放过。下午4时职员开会,我们能听到附近成群处决的枪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恐怖的一天,而对于可怜的难民来说,则是惨不堪言的一天。我利用到卜凯教授家(我和其他六个人住在那里)吃午饭的时间,

① Mrs. Twinem, 又称 P. D. Twinem、Mary Twinem, 中文名戴籁三夫人, 金陵大学教授, 南京沦陷期间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帮助华群小姐安置难民。后入中国籍。

②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舍监程瑞芳。

匆匆去我自己的房屋看了几分钟。两面美国国旗仍然飘扬，使馆的布告依旧贴在门上，但侧门被毁，门户洞开。房内一片狼藉。每个抽屉、衣柜、箱子都被打开，锁都撬掉了。阁楼上垃圾成堆。我不能停下来检查哪些东西被拿走，但是多数卧床、衣服、食物都不见了。一条挑花桌布被撕掉镶边，这是王正廷博士的礼物，还有一张沉重的橡木餐桌被砸坏。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的叶兹·麦丹尼尔(Yates Mcdaniel)，我们的最后一位报人，也于下午乘另一艘驱逐舰前往上海。我托他带走另一封短信，但愿能送到。

12月17日，星期五

屠杀、抢劫、强奸继续横行。粗略估计至少有成千妇女在昨天被强暴。有一个可怜的女人被强奸37次。另一妇女有五个月的婴儿，在日军强奸母亲时婴儿被残酷闷死，因为他啼哭。抵抗就意味着挨刺刀。医院迅速挤满日军残忍和兽性的牺牲品。威尔逊，我们惟一的医生，手肿了还得工作到夜深。维持人们生计的黄包车、家畜、猪、驴子被抢走。我们的粥厂和米店也受到骚扰，我们只有关闭米店。

晚饭后我送贝德士去金陵大学，麦卡伦去鼓楼医院，他们在那里过夜，然后送米尔士和史迈士去金女大，因为我们每夜都派人去那儿值班。在金女大门口我们被似乎是搜索队的士兵拦住。我们面对刺刀被粗暴地从车里拉出来，我的车钥匙被拿走，排成一行搜身以寻找武器，帽子被丢掉，电筒对着我们的脸，并且检查护照并诘问来此目的。我们的对面是华群小姐、戴籁三夫人、程太太和一群跪在地上的难民妇女。有个能说点法语(同我差不多)的中士坚持说这儿有中国士兵藏匿。我则保证除了大约50位本校职工以外，这里别无任何其他男人。他不相信，并说如发现其他外人则将统统予以枪毙。他要求我们(包括女士们)全部离开，当华群小姐拒绝时，立即被粗暴地推进汽车。接着他改变了主意，女士们可以留下，而我们必须离开。我们试图留下一个人，但仍未获准。我们在撤离之前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次日我们得知，那帮匪徒从学校绑走12个姑娘。

12月18日,星期六

住处离安全区仅一条街且常与我们一起进餐的林查理,在早餐时报告,昨天当他和我们共进晚餐时,有两个妇女在他的住处被日军强奸,其中一人是我们青年会干事王廷(Wang Ding)的表妹。威尔逊报告,有个5岁男孩被刺刀戳伤18处,一个妇女的脸被砍伤17处,腿上也有几处受伤。下午有四五百名惊恐的妇女拥进我们总部,她们只有在露天过夜。

12月19日,星期天

一个骚乱至极的日子。几处大火蔓延,由少数士兵发端而更多是得到(上级)许可。好几处美国国旗被撕破丢在地上。美国学校横遭践踏,看门者说如果他再干下去就可能被杀死。贴在美国和其他外国房产的日本使馆布告,日本士兵对之不屑一顾,有时故意撕掉。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五至十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有些人无缘无故被残酷处死。有一个区我们的七人卫生小队,六人遭到杀害,第七个逃走了。他受了伤,跑来告诉我们这件事。今天薄暮,我们有两个人跑到柏睿德博士家(他离开了),赶走四个可能是强奸犯的家伙,并且把这里的所有妇女都转移到金陵大学。施佩林整天都忙于这类事情。我也曾到我们使馆的道格拉斯·詹金斯(Douglas Jenkins)^①家,国旗仍在,但他的家仆死在停车房。另一仆人死在床下,两人都是惨死。房内混乱不堪。街上仍有许多尸体,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平民。红十字会愿意掩埋他们,但该会的卡车被偷了,用于送尸体火葬的棺材和若干佩戴会徽的工人都被弄走了。

史迈士和我携带载有55个新增暴行案例(均经证实)的表册再次拜访日本大使馆,并且告诉田中和福井先生今天情况更为恶化。他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并希望事情将“迅速”好转,但很显然他们对军方的影响很小甚至全无,而军事当局对士兵毫无约束。我们还被告知,最近有17个宪兵到达,他们将协助恢复秩序。用17个人来应付一支约有五万

① 詹金斯任美国大使馆三秘。

人的极端邪恶的罪犯大军！不过我们仍然喜欢日本使馆这三个人。他们或许真在尽最大努力。但当他们请我帮忙提供一部轿车和一个修理工人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这个要求恰好是在许多车辆已被偷走以后。我本想劝他们不如去找自己的军事当局，但结果还是带他们到美国使馆，为他们借了大使和其他两个职员的车，稍后又为他们派去我们修车的俄国工人。

12月20日，星期一

汪达尔人行为(Vandalism,意为肆意破坏文化——译者)和各种暴行完全无约束地继续着。市区正整片被系统地焚毁。下午5时史迈士与我开车出去。整条太平路都在燃烧，这是市内最重要的商业区。我们在火花四溅和燃烧的木材中行驶。往南可以看见暴徒在商店里纵火，更远一点则是他们把掳获物品装上卡车。青年会(它也起火)附近地区显然刚在一个多小时以前被烧掉。周围的建筑物尚未遭殃。我们无心观看，所以飞快前驶。夜间我通过窗户看见14起大火，其中几起覆盖相当大的地区。

我们在这所房屋中的一群人，起草了一封致上海美国总领事的信，要求立即派外交代表到这里来，因为情势已极为紧急，然后请日本大使馆将此信以海军电报发出。不用说，此信根本未曾发出。

12月21日，星期二

下午2时30分，我们14个人拜访了田中，递交一封22个外国人全体签名的信，抗议焚烧城市与持续混乱。拉贝为他的房子担忧，因为对面街道的建筑物在燃烧。有四百多难民露宿在他的花园里。食物问题日趋严重——金陵大学有些难民因饥饿而骚动。我们的煤很快就要完了，林查理正在找更多的煤。日本人封锁一切煤、米供应。士兵今天越墙进入我们这里，乘我们外出试图偷车，另有一次几乎把宋煦伯的车偷走。拉贝今天通过田中接到德国大使馆罗森的信，说他在停泊于下关的“蜜蜂”号舰上，但未能获准上岸，并且打听德国财产状况。拉贝回答说，使馆和他自己的两处房屋幸免劫掠，两部车也依然存在(南京有五十多位德国侨民)。

12月22日,星期三

今天早晨5时,一小群人在我们附近纵火。大约有100次枪声。金陵大学晚间被闯进两次,门卫被刺刀拦截,门被捅开。最近受命在这一带值勤的日本宪兵睡大觉。新的日本宪兵队负责人打电话来,答应在元旦恢复秩序。他们又要求借轿车和卡车。(我)与施佩林去离总部东南四分之一英里处,一个泥潭中有50具尸体。全部是老百姓,双手绑在背后,有一个人的头被完全砍掉。难道是他们(指日军——译者)练习刺杀?回来吃午饭的途中,我们停车帮助青年会一位干事的父亲,他正被一个酒醉日兵以刺刀威胁,可怜的母亲吓疯了。在坐下来之前又得与两个同事把齐^①和丹尼斯^②家中的日本兵赶走,他们正准备在那里强奸妇女。看到这些士兵翻越装有倒钩铁丝网的围墙,我们只有嗤之以鼻。

贝德士和林查理没有吃完午饭就得把周围房屋中的日兵赶走,其中有几个喝醉了。刚到办公室,施佩林和克勒格尔(Kroeger)^③就给我和拉贝打来呼救电话,他们遇到酒醉日兵以刺刀相威胁。幸好有日本使馆的田中和某位将军同时赶来,将军狠狠打了日本兵两记耳光,但我不认为他会受到更重的处分。我们从未听说违纪事件受过任何重罚。如果一个士兵被军官或宪兵抓住,他得到的无非是不要再犯的温和劝告。晚饭后我与林查理步行回家——就在我们到达以前,一个54岁的妇女在他家被奸污。如果听任妇女让命运摆布,这自然是很冷酷,但我们也确实难以花费全部时间去保护她们。位于下关的电厂的吴工程师,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消息,曾经勇敢地坚持电厂工作至最后一天的54个职工中的43人,避难于江边一家英国工厂——和记公司,已被当作国营事业职工抓去枪毙——其实电厂并非如此。日本官员每

① 指齐兆昌,金陵大学校产管理工务室负责人、工程师。

② 丹尼尔,即J. H. Daniel,中文名谈和敦,金大医院院长。

③ 克勒格尔,即Christian Kroeger,德国人,德国礼和洋行在南京代表,曾任国际委员会司库。

天来到我们办公室,要求提供能够启动涡轮发电的技工。告诉日本人是你们自己的军队杀死绝大多数电工,这使我得到一点点快感。

12月23日,星期四

宋煦伯是今天横遭暴力者之一。在斯坦利·斯密司(Stanley Smith)家,他发现一个军官和士兵正在扯美国国旗,强迫住在这里的难民离开,宣称必须利用这里作为登记中心。他(指宋煦伯——译者)必定经历一段很不好过的时间,最后被迫签字,答应把这座房屋借给他们使用两个星期。宋煦伯也不是一个能忍耐的人,他向日本使馆抗议,终于使士兵撤走。日军从我们设在农业专修科学学校的难民营里抓走并处决了70人。没有任何章法——士兵可以抓走任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手掌上的老茧足以证明一个人是士兵,这就是枪毙的正当理由。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劳工经常被捕。中午有一个人被送到总部,头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没有了,鼻子残缺不全,形象可怖。我开车送他去医院,几小时以后就死了。他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汽油泼在他们身上而后点火。他可能是靠人群外边,汽油只淋到头上。不久又送来一个与他类似而烧伤更甚的受难者,很快也死了。第一个人身上无伤痛(指刺伤或枪伤之类——译者),而第二个人有。再往后我看到第三个头、臂烧伤,死在我家附近路边的受难者,正好在鼓楼对面。显然他死前曾拼命挣扎。难以置信的残忍!

12月24日,星期五

美国使馆唐先生报告,住在使馆的中国职员及其亲属,昨晚全部被一军官及其部属抢劫。帕克斯顿办公室的门被戳破,(日军)从停车场偷走两辆轿车,今晨又偷走两辆。稍后我不无幸灾乐祸地告诉田中,昨天答应借给他的蒙孔的轿车正好是被偷的一部。良民登记今天开始。军方说安全区内仍有20 000士兵,他们必须清除这些“魔鬼”。我怀疑这里是否还有100个士兵。不管怎样,更多的无辜者将蒙难,而大家都要为此担惊受怕。中国自治委员会(the Chinese Self Governing Committee)前天应田中邀请组成,也许不无小补,但间谍早已在这里活动。我抓住一个,为使他免遭毒

打,把他关在地下室,稍后交给中国警察。他们将如何处理他?绞死他?——但我劝他们谨慎从事。今天日本人不断打扰我们,抓走我们更多的卫生队员,还有大学校门的警卫,而他们经常想得到我们的卡车。他们查封了我们一处煤站,但林查理终于说服他们开放了。

圣诞前夕。克勒格尔、施佩林、特里默医生与我们共进晚餐,这是一次有烤猪和甜土豆的盛宴。拉贝不敢离开他的房子,因为日本士兵一天要几次越墙而入。他总是让他们按进来的方式出去而不是通过大门,如果他们有人拒绝,他把纳粹臂章出示在他们面前,并且指点纳粹徽志,德国的至高无上之物,问他们是否知道它的意义。这一着经常奏效。稍后他在晚上参加我们(宴会),并且送我们每人一本皮革封面的西门子记事簿。我们唱圣诞歌曲,威尔逊弹琴。

圣诞节。美好的一天,天气同样晴好,情况也有所好转。街上行人颇多,还有一些售货的小摊。但午餐时,正当我们与作为客人的华群小姐、鲍尔(Bouer)小姐、布兰奇·吴小姐、吴珍珠(Miss Pearl Bromley Wu)小姐^①,一齐品尝烤鹅时,我们必须回应三个求援电话,并且从芳威廉(Fenn)^②和其他中国教师住宅以及蚕桑系把日本兵赶走。这一天,农业专修科学学校的美国国旗被扯下。今天晚间和昨晚,七个士兵在金陵女子神学院过夜并强奸妇女。几乎就在我们邻近,在我们赶往救援之前,一个12岁女孩已被三个士兵奸污,另一个受害者是13岁。还有更多的刺刀伤害事件,威尔逊报告,仅在医院就有240个案例,四分之三是日军占领南京以来滥施暴行所致。在金陵大学开始“良民”登记。人们被告知,如有以前的军人,必须站出来,加入劳工队即可保全性命。他们被成群抓走。有两三个人受伤后装死得以逃出,来到医院告诉我们可怕的故事。一群人面对行刑队,只有个别人带伤逃出,或是整天躺在同胞尸体中并以此作掩蔽,直到晚间才走向医院或朋友家。就日本人而言,这是他们小小的粗心大意。

① 鲍尔,金大医院工作人员。布兰奇·吴(Blanche Wu),中国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讲师。吴珍珠,中国人,美国浸礼会海外布道会布卢姆里夫妇(Charles. L. Bromley)曾收养其为女儿。

② 金陵大学英语系教授。

12月27日,星期一

日军占领的第三周开始了,日清汽船会社的商船从上海开来以示庆祝。四个公司(指轮船公司——译者)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许诺船上即将提供正常服务。有一群(日本)女士参加招待会,并作参观市容的短途旅行。她们送给若干儿童一点甜食,似乎自我陶醉,同时也为日本的大胜庆贺,当然她们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我想,外面世界同样也无从得知实情。士兵仍然全无约束,军方与使馆不相互合作。军方甚至拒不承认使馆授意成立的自治委员会,其成员被蓄意轻视,并被告知系被征服民众,不要指望可得任何优惠。我们关于骚扰、暴行的报告与日俱增,但毫无反应。今天又有数起:两周以前日兵抓走一个13岁男孩,以铁棒殴打又以刺刀猛戳,因为他们不满意这孩子的服务。昨夜一个日本军官带两个士兵乘车来到金陵大学,在屋里强奸三个妇女并带走其中一人。金陵女子神学院被闯进多次,老百姓被抢劫,二十个妇女被强奸。医院夜班总管被抓走,尽管鲍尔小姐抗议。城内继续燃烧,今天城南两所教会学校被焚,一家德国糕饼店“起士林”(Kiesling & Baders)也被焚。但(日本)使馆警卫负责人高谷打电话来,许诺现在保护所有外国人房产,并与施佩林一起着手查看德国财产。我私下认为,他的许诺似乎超过其职权范围。所有申报表册送交日本当局都毫无效果,南京数百处外国产业几乎全都被他们的士兵抢劫过,轿车也被偷走。我几乎忘记叙述,昨天史迈士和我访问英国大使馆,它位于远离安全区的城市西北部。所有11辆轿车全被士兵抢走,还有两辆卡车,幸好仆役处境尚佳。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废弃的车辆——偷走以后跑坏了。它们的轮胎、蓄电池和其他有用的部件被拿走,车辆通常是翻倒放在那儿。

今天有一线光明,邝富灼博士(Dr. Fong Soo)^①的信经过日本使馆

① 邝富灼(1869—1938),广东人,13岁时受一位中国牧师资助作为劳工去美国。曾就读于加州大学普蒙那学院,1906年获加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后任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编辑。他在青年会全国协会服务达30年之久,其中6年任会长,并在多家基督教与慈善机构任职。

由日清汽船会社的商船送到——这是三四周来我们收到的第一封信。他想知道我们的难民工作是否需要基金,为了回应我们通过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发出的呼吁,已提供一笔现金。这就是富灼,完全、彻底!我们确实需要基金——许多,许多。它像梦魇一样老是缠着我,但我们从哪里得到它?

12月28日,星期二

这是我们所害怕的坏天气,阴雨连绵接着下雪。可怜的难民住在茅屋里,许多只是稍比狗棚大一点,多数棚里都无防雨设施,他们将度过一段难熬的时间。道路很快就泥泞不堪。幸好在此前有一段理想的天气。多数难民由于拥挤和无法保持清洁而处于悲惨境地。我们难民营的管理者及其助手都是义工,在整个维持秩序、提供膳食医药等方面都能恪尽职守。但我们怎样才能维持这些难民营?何时这些难民才能获准回自己的家?——多少人还有自己的房屋?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秩序?

今天我第一次去青年会学校。它离我的住处不远。每件东西都被翻倒,许多物理实验仪器被故意毁坏。体育场躺着一条死牛,有一半尸体被野狗吃掉。贴在门上的使馆布告被撕毁。

12月29日,星期三

今天天气稍好,运气不坏。“良民”登记在继续,效率极低,人们不知道何时,到何处去登记。又抓走一些所谓“以前的士兵”。妇女和老人前来跪下并哭泣,恳求我们帮助他们找回丈夫和儿子。有极少数案件我们处理成功,但军方憎恨我们的干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从下关带来信息,江边大约有20 000难民。他们要求进入难民区,但我们这里已经太拥挤。无论如何,日本人不许这样做,也不许我们到城外提供援助。他们暂时只有依靠自己了。

日本人终于在各个使馆设置警卫。但何以不在两周以前设置?我们的家仍无保护,少数设于难民营的警卫不仅无助于事,而且还是讨厌的人。他们向难民索取燃料、食品、床铺和其他东西。

12月30日,星期四

今天我召集青年会 18 个仆役,工资付到本月 15 日,并通知他们另谋他职。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其中有些人曾共事多年,人品极好,忠诚可信。王廷和我曾想一旦恢复秩序就在旧校舍开始做点事情,但我们的成员留下的已很少,加以目前在南京很难找到新的赞助者。王廷出色地履行房屋助理总管的职责^①,难民营监督 Y. S. 张也干得不错,同时我们的工友全部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下午我访问日本使馆时,他们正在指示 60 个中国人怎样庆祝元旦,其中大多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员。“五色旗”(南京伪政府的“国旗”)取代国民政府旗帜,要赶制 1 000 幅五色旗和 1 000 条日本国旗以庆贺新年。超过千人规模的难民营必须派 20 人出席,较小的难民营出 10 人。元旦凌晨 1 时,鼓楼将升起五色旗,那里将有“适当的”演说与音乐(按节目单进行)——自然,将拍摄快乐的人群挥舞旗帜欢迎新政府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仍在继续焚烧,三个 12~13 岁的女孩被强奸或被抢走。在蚕桑系(金大一部分,美国财产)周围划一条警戒线,而日军正在搜捕等等。

12月31日,星期五

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天。第一次没有晚间暴行的报告。日本人忙于准备过年。宣布休假两天。我们很担心,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喝醉酒的士兵。难民被劝告留在室内。拉贝邀请我们到他家赴宴,并且为我们点亮了圣诞树,每人得到一张有会标的贺年卡——会标是一个内有红十字的圆圈——上面有南京国际委员会所有 22 个人的签名。他还讲述自己在南非经历的某些故事以款待我们。在他的墙上悬挂着若干他狩猎的辉煌战利品。

^① 王廷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拉贝日记》说他是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Y. S. 张则是该会委员,与费吴生此处所说有歧义。译者认为应以费吴生此信为依据,因为他是安全区具体管理的总干事。

新年前夕。对家庭和亲人的思念萦绕心际。我将不惜一切以求一封“家”信。我得到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10月28日,当时她将从横滨出发;玛丽安(费吴生的女儿——译者)信的日期是同一天,恰好是在她与妈妈登上“胡佛总统”号之前,阿尔伯特与艾迪斯(费吴生的另外两个孩子——译者)的信更早一点。我曾在11月下旬从西安返回的飞机上见过金普顿(Kempton),我猜想他仍然在长沙。显然我们还要继续学会忍耐,因为日本使馆告诉我们,还要过好几周这里的邮政服务才能恢复正常。他们还告诉我们,至少还要过一个月,我们才能获准离开本市去访问上海。实际上我们是这里的囚徒!记述这些恐怖行为的故事似乎已没有意义了。现在是1月11日,局势有所改善,但仍然没有一天无暴行,有些简直是暴乱。随着美国使馆三位代表在6日到来,英、德使馆代表各三人于9日到来,我们感到局势进一步好转,安全略有保证。但就在昨晚我开车外出时,四起新的火灾刚刚开始,并且看见日本兵又在一家商店点燃第五起大火。自12月19日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日军纵火。克勒格尔曾从东门溜出去,他告诉我们,他所到过的城郊20英里以内的乡村都被焚烧,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乃至家畜。

我们终于通过收音机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这真是太幸运了,因为上个星期天我们的房子接上了电线,现在有电了。幸运的是我们贮存的蜡烛与煤油恰好用完。我们委员会总部稍早数日通了电。当时似乎只有日本人可以用电,所以我们没有宣传此事。我们曾经看到上海一家日文报纸的几篇文章和《东京每日新闻》的两篇文章,它们告诉我们,甚至早在12月28日,商店迅速开张,贸易恢复正常,日本人与我们合作,为可怜的难民提供食物,市区已经根除中国抢劫者,和平与秩序笼罩全城。如果在南京发生的这些事不是如此悲惨,我们会被这谎言逗得大笑。

我写这个报告毫无复仇之意。战争是残酷的,特别是征服的战争。根据我此次的经验,还有1932年上海战争的经验,我觉得日本军队毫无基督教理想主义的背景,现在已变成一种残酷的破坏力量,不仅威胁东方,而且也将在某一天威胁西方,世界应该知道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我们现在必须应付的局势究竟怎样,我愿让比我更有才能的心灵去判断。

故事也有光明的一面,这就是我们中国和外国朋友在服务中显现的崇高精神,以及我们在共同事业中分享的亲密友谊。由于难民们曾无数次表现出对我们努力工作的肯定,我们内心经常感到温暖,而且与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的损失与不便就无足轻重了。我们委员会中三位德国朋友赢得了赞赏与好感。他们曾是力量的高层次(指其德国国籍与纳粹背景——译者)——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怎样才能坚持下去。

领事官员们——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都返回了,但日本军方对他们不屑一顾,使馆官员也无力约束他们。美国领事约翰·阿利森因为试图“干预”而被煽了耳光——一次屈辱的经历。但难民吃饭问题才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我们贮存的盐快用光了,米还有一些,但很快就会告罄。周围数英里的地区完全成了废墟,任何物品不准带进城里,除非是给日本人。脚气病例开始出现,我们急迫需要大量物品供应来阻止这场灾难。

经过和日军的长期谈判,我最终获准乘“蜜蜂”号去上海,英国领事和他的随员刚刚从此舰登岸。我回想不起来我登上这艘英国炮艇的准确日期,但一定是在一月份晚些时候。我在上海的第一顿午餐是与后来深受尊敬的海瑞·雅呢儿舰队司令在他的旗舰上举行的。他像其他人一样急切想知道南京的最新消息。我不得不讲述很多遍,而且还要面见一些人。但同时,我安排购买一船大豆、大米、面粉和其他物品,要尽快运抵南京。一群美国人还要求我要尽快飞往华盛顿,向我们政府报告南京的形势。我已向日军当局许诺,无论如何我都将返回——这是准许我离开的条件——当然,我也想确保这些食物能安全运到。我向我的朋友许诺,不管怎样,我一返回就立即着手与日方谈判,争取再次获准离开。

回程乘坐的是由雅呢儿安排的美舰“瓦胡”号,一路很平静。我到达后得知日本军方食言,不准卸货,这真令我沮丧。船继续航行到达芜湖,等候谈判结果。幸运的是我们又一次被获准,我们的船返回,货物运到城里,没受什么阻挠。这也许是日本人满城张贴的布告起了作用,布告说他们正在照顾全城人民的福利。一张海报画了一名微笑的中国妇女和儿子跪在一名日本士兵跟前,这名士兵正递给他们一块面包。一张带星点的海报,虽然标题是“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接下来便是关于南京人民是如何受抗日军队迫害的彻头彻尾的谎言,说他

他们没有饭吃,也得不到医疗,但“幸而皇军入城,收起刺刀,伸出慈悲之手……向优秀的真正的居民散播恩惠之露……数以千计的难民放弃了以前荒唐的反日态度,为生命得到保障而拍手鼓掌”,接着又有几段令人作呕的文字,以下面这幅景象作为结束:“日本兵和中国儿童在公园里一起游乐。南京现在是有所有国家都应关注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呼吸到安宁生活、愉快工作的空气。”这是我的一名职员做的翻译,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能保证这是千真万确的。

日军占领南京现在已有两个月,暴行每日不断。1月18日,两名男子来到我们这里,都是因为没钱给日本兵而被他们用子弹打穿胳膊;另一个人被带到医院,他的上颚部和颈部被子弹射穿,原因是他没有力气搬运重物,而另一个人头部受了严重的刀伤。他们厌倦了自己不人道的行为吗?或者,也许军方试图显示对他们进行管制或纪律约束?我不知道。况且,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在上海的韦尔伯给我发了一封电报(事先安排好的):“23日前来上海。”我仗着这封电报又一次获准离开,第二天早上6点40分乘日本军列到达上海。我和一群恬不知耻的士兵挤在一起,感到一点紧张,因为八卷关于日军暴行的16毫米电影胶片缝在我的驼毛大衣的衬里,其中大部分是在金大医院里拍摄的。毫无疑问,当我们进上海时我的包会被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胶片会发生什么事?庆幸的是他们没有发现,并且我一到上海就立即拿到柯达公司冲洗。大部分底片是由圣公会的约翰·马吉制作的,他后来成为华盛顿圣约翰教堂主教。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柯达公司代表给我赶制了四套胶片,当然我被要求在美国社区教堂和其他地方放映这部影片。

和解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Murial Lester)碰巧看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片,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她提出要到日本并在那里放映给一些挑选出的组织观看,如果我们愿意给她提供一个拷贝。我对她的计划并无太多的信心,但还是给她我当时手头的一份拷贝。几个星期之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但即使放映得再多,他们也只是感觉受伤害,因此她最终放弃了放映计划。

许多人来跟我谈论关于南京的事情。我最后跑到虹桥路(Hunqiao)看我的家。这儿位于租界以外,我承认我冒险,到这里有些胆颤心惊,因为到处都是日本兵。在花园角落处有一块烧焦的地方,直径约为 10 英尺,我的藏书(除了带到南京并毁在那里的那些书)连同从 1902 年开始的所有日记(共有 1 500 卷)全被焚烧一空。附近有一只浴盆,是从三楼浴室拖出来的,很显然,他们是想把它拿到其他地方。室内也是一团糟。我快步离开。

未来如何?短期内决不会是光明的,但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无论如何,我将永远是快乐的,因为我已与他们一起奉献。

费吴生(签名)

[RG11,B9,F202。该日记曾收入田伯烈《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徐淑希所编《南京安全区文献》。但日记首次披露是由费吴生在上海时的同事马洛尼(John Maloney)在 *Ken*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在南京的掠夺:一名在中国居住 20 年、南京陷落后留下来的美国人向约翰·马洛尼的讲述》(*The Sack of Nanking, as told to John Malony by an American with 20 years experience in China, who remained in Nanking after its fall.*)此文被 1938 年 7 月号《读者文摘》全文转载,很多读者认为难以相信这是真实的。由于以前的译文不甚确切,编者据原件重新翻译,并据费吴生的《在华八十年》第 10 章增补了少许内容。]

2. 致朋友函(1938 年 1 月 6 日)

南京,1938 年 1 月 6 日

亲爱的××:

我们的外交代表终于回来了,阿利森、艾斯皮(Espy)和麦克法第恩

(McFadyen)是第一批获准返回的领事官员。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们。他们 11 时到达,和我们共进午餐,他们带来许多外界的消息,我们也给他们讲了许多。英国和德国的官员将于 10 日返回,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何时回来。当然,有很多人将永远不会回来。这儿已没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回来。因为南京已被系统地抢劫和焚烧,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大部分外侨建筑仍在,虽然无一例外都被抢劫,大部分政府建筑也是如此。大部分商店和中国人的房屋已被烧掉——在胜利者从中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之后。

青年会大楼和其他建筑一样,是被故意纵火烧掉的。我赶到时火已烧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我写的很简单的一张便条,里面提到大楼“浓烟滚滚”。我们已有数周没有收到信件了。

.....

现在,我们的确成了这里的囚犯。我们甚至连出城门到下关都不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虽然……总的说来,我们过得还相当不错——我们共有 22 名外侨,到目前为止,吃用都还说得过去。

但南京已是一座人间地狱,如果曾有过的话。我做梦也没想过,在现代还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当然,不仅是避免了和“帕奈”号舰一起被炸沉的厄运,而且我能和这里的人一起在南京服务,没有我们,南京居民的处境将会更糟。虽然有时候我们想事情可能越来越糟。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就在今天中午,阿利森和其他人都在这里,驻上海总领事冈崎来此做短暂的访问。他刚刚进门,我们中的三个人不得不跑到柏睿德家中把日本兵赶出去。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又有人拦住我们去农业专修科学学校驱赶日本兵。日本兵在安全区的这两处地方索要妇女,而这是严令禁止的,况且这两处地方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贴着日本使馆发布的告示。昨天,日本兵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门房,逼他开门,他们上午、晚上都去抢劫,而且前天他们也在那儿。但这些都算是轻微的,和以前相比真是好多了——这就是我们要感激的。

是的,我的房子被抢劫了。我想你能想象得出室内有多乱。但实际上每一个外侨家里都遭洗劫,甚至连一些使馆房子也未能幸免。幸运的是,我早把一些箱子提到卜凯家里,因此,损失并不严重。有些地方则损

失惨重,即使房子在安全区内——我家在安全区外。那一天俄国使馆被烧成废墟。有一天,我开始写关于日军在南京强奸的文章……读这样的东西是不会让人愉快的!我并没有夸张——仅仅是把在这儿发生的,而且是我个人注意到的那些事例讲出来。

[RG8,B2634。原件未写明收信人,题头注有“秘密,不得出版”字样。]

3. 致施彼得函(1938年2月14日)

亲爱的施彼得:

我很久以前就想给你写信——自从我们互道“再见”,到现在已近三个月,我每天都会想到你。当然,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有可能写信,接着我又忙于救济工作,没有时间写,非写不可的除外。我现在手头上仍有很多工作,但我认为我不能再拖下去,我要告诉你这里的形势。

我想你也许已听说(南京)青年会建筑在12月20日被烧毁。除了后面餐馆、洗澡、淋浴设备以及主楼一楼西南角的你的小房间还完好以外,实际上整个建筑都毁了。保险柜在我们赶到前已被砸开,所幸大部分文件还在。钱自然没有了,我担心所有的文献都被毁掉。张S. Y.、刘华和陈一雷(皆是音译)现在都在那里,抢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学校未被焚烧,但遭到严重洗劫。它先是由中国军队占用,接着又被日本军队占用了一段时间。我上周在上海与龙S·C·和威尔伯(Wilbur)商量后,决定放弃学校建筑,把仍旧有用的家具搬到中华路22号,租权还给耶稣复临派(新教的一个派别——译者)。我本期望我们能利用学校及时开展某种计划,并在那儿经营一个旅店,但从现在事态发展的形势看,作为一个协会,即使有机会做一些有用的事,希望也很小。经费问题,当然面临着最大的困难——这儿好像没有选民可以支持我们,(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也只有很少的钱用于战时急救工作。虽然我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停止我们这儿目前的工作。理事会是另外一个难题——目前,

没有一名理事会成员在南京,我想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有人返回这里。

关于人员——王廷和张 S·Y· 是这里仅有的职员,此外还有 17 名工友。我和王廷目前在安全区委员会服务,全国委员会付给张和两名工友看护财产的工资。其他工友我都辞了,工资发到 1 月中旬,其中有两个人,小何和老李(音译),我让他们在委员会总部工作。我让三名工友清扫学校,但这个月底也要辞掉他们。除了周,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职员的消息,周现住在重庆。我已写信给他,建议他在四川找一份工作。我为邵、谢和茹(Ru,音译)担心,你认为他们能找到事做吗?很奇怪,我没收到他们的信。还有高,他许诺在 11 月底前回来,但他可能害怕了,或是什么事耽搁了。

邵也许诺在他把家人带回漯河(Luho,音译)之后返回。如果你有他们中任何一位的消息,请赶紧告诉我。写信寄到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上海博物院路 131 号,因为这里邮政尚未恢复,全国委员会通过沿江而上的炮艇把信件带来。这也是我下周再次去上海的机会。此前我去过一次,1 月 29 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南京,(2 月)10 日乘美舰“瓦胡”号返回。我费了很多周折才获日方当局批准。

看到今日的南京,你一定会极为痛心。约有 80% 的商店和近 50% 的住房已被烧掉。王廷家在三周以前被烧毁,损失了所有东西。我不知道你家情况如何,因为(日军)不允许我们走出城门。

幸运的是,现在形势已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将离开安全区回家——那些房屋尚存的家庭。难民营的人数已从 70 000 下降了一半。两个月来,这里充满了恐怖、暴力和肆意乱为,可怜的人们都被吓坏了。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区以及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还会更糟,因此,我总是很自豪我留了下来,经历了这一切。也许有一天,我有机会告诉你我们的经历。

我真希望我能写得长一些,但现在不行。请你尽早给我写信,并让我知道一些有助于这里形势的建议和信息。把我最诚挚的问候送给你,也送给你在 W. A. S. C. 的同事——J. L., 塞姆·梅(Sam May,音译)(请告诉他我上周看见过他妻子——在青年会招待午餐上我坐在她旁边)、辛格福(Singfoe)、泰第(Teddy)、杰克·容(Jack Young)、李杜(Doo

Lee)、斯梯恩(Stean)以及其他好朋友。

顺便提一句,如果你是用打字机写信,再寄一份副件到九龙青年会,因为我有可能在本月 28 日与下月 2 日间去那里——但这事请不必公布。

良好祝愿
您诚挚的
费吴生(签名)

附言 关于将来,一旦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我希望我和你仍能继续在一起工作。我们在哪里找到另一处房子当然是个问题,但可以找找愿意帮我们的美国朋友们。我们要看能否结清有关手续。

[RG8,B103.]

三、福斯特

福斯特(Ernest H. Forster)1895 年生于宾州,1917 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巴尔的摩圣保罗小学担任校长助理两年以后,作为圣公会传教士前往中国并在扬州马汉学校(Mahan School)教书。

1936 年他与名律师汤森(Irving U. Townsend)的女儿克拉丽莎在波士顿结婚。福斯特夫妇一同回到中国,住在扬州。南京沦陷前一个月,他们从扬州移居南京,在圣保罗圣公会教堂服务。1937 年 11 月底克拉丽莎从南京撤退到汉口,1938 年 1 月中旬经过香港到达上海。福斯特与另一位圣公会牧师马吉,留在南京度过大屠杀的全部岁月。

福斯特夫妇保存于耶鲁神学院的文献中的信件、报告和照片,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全面而生动的记录。

1. 致妻子函

(1937 年 11 月 23 日—1938 年 2 月 13 日)

11 月 2 日我们离开上海,乘船往南京方向去,同行的还有准备回扬州的格林先生。次日中午到了通州,我们得在那儿等待,直到第三天傍晚我们才安排好继续前行。我们与另外三个外国人和一些中国海关官员一起雇了一只私人小艇,花了二十三个半小时由内陆运河直抵扬州。福斯特先生和我决定在扬州逗留,打点行李,等什么时候把物品运走再动身。我们包租了中国帆船的部分空间,让厨师随一些家具、被褥和我们的食品等物资先出发去南京,在那儿我们要帮马吉看守房子。其余物品我们锁在扬州宅寓楼下的两间屋子内。我们呆在扬州时,那儿只有两次空袭。

在扬州呆了一周,我们便动身去南京。开始我们想乘船,可天气不太好,我们不想冒险乘坐逆江而上的无拖驳的小机动船。菲尔德先生决定和我们一同前往,以便与福斯特先生查看扬州账目,再把账本带回扬

州。账本以前被福斯特先生带去了南京。我们于11月12日(星期五)早上出发,但到镇江发现火车晚上才开,于是白天我们就呆在内地会。从上游来的军队奔往苏州前线,他们拥挤在火车站里,我们得多次停下。从镇江到南京花了四个小时。我们当晚约11时抵达下关,得知麦纳第先生于中午刚刚离开返回苏州,我们在无锡的驻地被轰炸了。

马吉为伤兵的救援工作忙得晕头转向。他们拥进火车站,但没有足够的设施与给养。我们计划冬天在下关与马吉住在一起以节约燃料与食物,并合作开展工作。福斯特先生立即着手整理差会的账目,在紧急时候,他经管着上海以西的主要事务。阿奇·曾先生在他不在时提供帮助,他刚刚从汉口来,准备马上去上海。福斯特先生还前往圣保罗教堂结识那儿的工作人员并开始工作,与源源不断的来访者、政府官员、红十字会会员、士兵、新闻记者、学生、教区工作人员进行私人会晤,从早上一直忙到深夜,一天下来可真不轻松。

11月15日,星期一,经过一周的行程,我们的厨师、家具和物资终于到达驻地的后门。五位来自无锡的难民,李医生、罗伯特医生、戴尔先生、林哈尔小姐和西尔泽小姐则坐在李医生的车里去了前门,他们是当天早晨5时离开无锡的。直到星期四,我们的住处还是乱糟糟的,有10个人住在这儿。为政府做宣传工作的罗夫·苏丝小姐有一天也与我们为伍。11月16日,星期二,菲尔德先生去了扬州。11月18日这群无锡人乘船去了上海。

那时士兵企图进入市区和下关,后又据报道,士兵来到并占据了CTS,没有汽车或出租车等交通工具,我开着李医生留给差会以备急用的车,11月21日(星期天)去了CTS。福斯特先生则和董主教会见了负责的军官,让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对此十分礼貌,说从名称看以为属于中央大学,将立即撤走。

我们的外国朋友离开后,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转向火车站的伤兵问题。我们发现那儿的所有地方:站台、候车室、售票处,全是火车运来的伤员,大部分人都没有草垫或被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晚上有一阵子虽有两个苦力扫地,但到处一片狼藉,情况很糟。马吉和戴赖三夫人去找些卧具,我们就向最严重的伤员分发一些小物品。福斯特先生和我留

心给那些急需的人们递一杯杯热水、一碗碗米粥。找那些受伤最重的人,又去找医生来照料他们。我们还把重伤员用两辆救护车送到大学医院。当时有很多士兵死亡,我们却找不到人负责把尸体抬走,所以他们就被堆放在伤员旁边。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火车站,随着战事临近,伤员数量增多,有关组织越来越无法应付当前的局面。许多火车上下来的难民走到尸体堆或奄奄一息的伤员之中,拿走属于士兵的食物。黄上校捐了一笔可观的现金给士兵们提供卧具,政府卫生官员 J. Hueng·刘博士许诺说,他的助手和一批工人要来,而他们的工作却是间断性的。在我们房间里,我总是备有热咖啡,因为晚上随时可能有人被送进来。我在那儿时,有两个受伤的军官在这儿过夜,他们第一次享用了一张真正的床和可口的食物。

伴随着要求所有政府官员撤至上游的命令,南京陷入一片恐慌。难民们逃进城里,其他的人则拥向城外。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运输工具,家什物品、办公设备都被堆放在街道和人行道上。外国使馆也在撤离,我们的许多基督教家庭也准备转移。美国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敦促所有外国妇女离开此地。我不懂中文,而且其他的外国及中国妇女都在撤离,看来我也应该离开,好让男人们更加自由地开展工作。两天来,我们一直想通过电话与扬州取得联系,想知道那儿情况如何,并催促布里默小姐和我一起离开。但线路不通,我们无法联络。后来我们得知当时他们已在镇江。周日晚,我得知有机会登上德国政府包租的一只船,于次日上午 11 时离开,前往汉口。另外惟一的可能就是登上美国的“帕奈”号。从早上 7 点开始,南京一整天都有空袭,投下了许多炸弹。我们的船直到 21 日午夜才开,上下颠簸,躲避轰炸机。船在芜湖停靠,我见到了康斯坦丝嬷嬷、克来希尔先生和安德森医生,他们和兰佩尔先生未打算离开。

我带着玛丽·帕克小姐的行李,克来希尔先生曾发电报给她,让她在南京乘炮艇经九江去牯岭。因为德国船随意停靠,我委托九名红十字会的护士看管行李。她们在九江下船,改乘一条小舢板,并许诺我将行李交给中国旅行社。我们圣公会的一位中国医生在这条船上,他帮那些护士换船,我给了她们拉尔夫·蒋牧师在九江的地址。我于感恩节中午

抵达汉口,和艾尔西·得克斯特小姐住在一起。我在汉口住在语言学校,直至两周后收到罗伯特主教的电报,说:“让妇女由香港返回上海。”我和其他人一道登上开往香港的国际列车。尽管当时距南京陷落只几天,但从那儿发出的信件仍能正常抵达,我还通过两次电话。所以我知道到那时为止情况尚好。我离开汉口前,郭牧师夫妇和来自南京圣保罗的家庭也到了汉口,他们与 Dss. Steward^① 呆在一起。圣保罗的传教士夏先生也来了汉口。我还在街上遇见了几个马汉学校的学生,他们和家人一起逃难至此,在我离开前还来看过我。

(以下是福斯特先生的书信摘录)

193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二

刚刚传来空袭紧急警报。火车站的局势今天比以往更可怕、更混乱。我到达时有 250 名伤员,天亮前又来了 750 名。有一些男童子军在协助工作,但由于下雨、严寒和缺少交通工具,没有其他的志愿者出现。大部分是重伤员。——马吉还在设法通过卫生部找更多的志愿者和救护车。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今天传来电文:“无锡团体抵达。电告扬州关闭机构来上海,马吉与福斯特如有可能撤离时即来上海。罗伯特”

11 月 24 日,星期三

我开车去市内看玛丽·陈小姐,她是金陵大学校长的妹妹^②,她把难民和救济的经费转交给我,并带我看可供士兵和难民使用的物资。无休止的电话、来访者、委员会会议——邵小姐和蒋小姐昨晚从扬州来,我刚同她们谈过。她们报告说格林先生、菲尔德先生和布里默小姐已离开——关于建立一个中立区的事可能有希望。中国当局已同意,上海的日军最高统帅松井将军据说也认为可行。鉴于南市类似计划的成功,指定的地点应包括

① Dss,似系 CSS 之误。CSS 为 Celia Speak Steward 的简写,即史德蔚夫人,金陵大学职员,其时携子女从庐山来汉口,即将取道广州、香港返回美国。

② 玛丽·陈,陈裕光校长的妹妹,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妻子。

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卫刚刚跑进来说,士兵们骑着马欲进入住地,于是我设法劝说他们离开。我开车赶到金大,商讨如果中立区获得通过,我们和中国工人的住所位置,而且要在市内的住地墙上贴出公告,大意说这是美国财产。今天有空袭。从9月25日以来,他们第一次往市内投掷炸弹,这是转入恶劣形势的开始。——据说死伤达40人。

11月26日,星期五

马先生22日从镇江寄出的一张明信片上说,他正在往安徽的回家途中,艾尔西娅、斯蒂文和莱丝莉和他在一起(这解释了他对扬州人撤退至上游而非下游到上海的误解。)——扬州的寇先生寄来一封快件,说省政府想“借用”我们马汉学校的建筑作为办公室——昨天下午,我们去做感恩节礼拜,参加了大使馆的茶会。这是一次很好的礼拜。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博士给我们作了精彩的感恩节演讲。参加礼拜的还有美国炮艇“希伯干”号(Sheboygan)上的舰长、医生和年轻的海军上尉,后者说他是圣公会教徒。他和其他军官们都非常友好,并对传教士及其工作表示同情。——火车站的情况有所好转。黄上校又出了一大笔钱建立一个医疗站,委员长本人昨天去了火车站视察情况。

11月27日,星期六

昨天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来访者。一群15岁的少年男女前来要求为伤员服务。他们来自苏州,8月份结队在后方工作。女孩子们曾接受过急救训练,帮助包扎伤口,男孩子们则帮忙抬担架。他们有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被军队开走了。随着战线向内陆推进,他们往北撤退,现在想在南京为伤兵服务。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基督徒,表现出蓬勃的朝气。他们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每天两顿饭,风餐露宿。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啊!中国好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看到那么多麻木不仁与自私自利之后,你又欣慰地看到牺牲奉献的精神……

11月28日,星期日

我赶早去城内的圣保罗教堂,行圣餐礼,进行早祷仪式。参加的人

不是太多。自从政府各部撤离后,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或正在撤退。我想这也好,让我们操心的人越少越好。郭先生非常担心他的家人,他们无法离开芜湖。我们建议他去芜湖和他们呆在一起,我相信他只要有办法一定会去芜湖的。我给扬州的寇先生发了一封信,让他带给地方官员,拒绝他们使用马汉学校的建筑。我想去扬州看看,但这儿的事太多,而交通状况如此不稳定,去一趟得花好几天工夫,局势又变化得这样快,我们的生命是以小时计算的……扬州来的两位女工作人员——邵小姐和蒋小姐——在大学医院表现得十分勇敢,卷绷带、包扎伤口,很有爱心。——日本人还未答复中立区的问题。外国人都猜想这个计划能获得通过。德士古石油公司的经理汉森先生请马吉、我和我们的中国朋友去他们的公司所在地,那正在我们设定的中立区范围内。昨天我们又去察看地点,那儿很大,还有个很好的防空洞。我们的那群少年男女信徒仍与我们在一起,他们要坚持下去,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神。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今天早晨我取出保险柜内的东西,下一步就看该怎样处理它们。我们得为这 15 位在战斗中远离家人、辛苦跋涉到南京的少年准备食物和必需品。我们这些天真是忙极了!

11 月 30 日,星期二

昨天帕克斯顿先生来看我们说,如果想乘轮船去汉口,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他并没有坚持让我们撤离,但指出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我们离开,那时就只有坐炮艇了。有人说城市会被坚守,能抵挡一阵子,其他的人都说中国人没打算抵抗。我想金陵大学是今天搬迁,几位妇女和男人要随之一起离去。我们大体决定,如果日本人开始炮轰城市和扔炸弹,我们就搬到汉森家去,否则我们就要留在这儿尽我们所能。我们需要很多东西,而物资却这样少,真让我伤心。人人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能做的许多事情,而此时你却只能袖手旁观,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12 月 2 日,星期四

昨晚我在火车站过了一夜。那儿的情况很不好,原来帮忙的一些机构现在关门撤走了,那些应该负责的人现在漠不关心。一切重担都压在

我们肩上。英国使馆的几名官员曾过来察看情况。士兵们受的罪惨不忍睹，负责机关的失职让人不可容忍。我们经历的这些场面让我们意识到是多么有必要向人们宣讲这样的教义：依从罪恶本性生活的人必死，由上帝圣灵引导的人必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贫病交困而且无依无靠，那你可惨了。在卑微的人们中似乎会见到更多的忠诚和仁慈。——显然，扬州仍是静悄悄的。

12月3日，星期五

今天马吉和我参加了中英文化协会的新闻发布会。南京市市长和南京卫戍官员的发言人也在座。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外国人还在这儿，得到了日本人关于我们设想建立中立区的答复，他们故意用一些不甚确切的措辞，但已足以让我们相信计划将被允许实施。住房委员会、食品委员会等机构已开始运作。市政府已发放了大量的大米和面粉，在中立区以固定价格出售，以防牟取暴利。最大的困难是运输，因为卡车弥足珍贵。昨天我们搬了自己的一部分物品到中立区汉森先生的房子里。每次卡车进城，我们都想带点东西。我们不能把家具放上去，不过我打点了马吉和我的衣物和被褥。有10至15名从青岛来的人在帮邵小姐和蒋小姐包扎伤员和卷绷带。中立区将由一位德国人负责，费吴生是干事之一。

使馆发布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美国人离开南京，让我们选择以下三种途径：（1）自行撤离；（2）乘美舰“帕奈”号撤离；（3）留在城内。马吉和我选择了最后一条。我们觉得应有尽量多的外籍人士合作，以保证中立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这是提供给我们工作人员和信徒的惟一办法。而且，我们留下的决定也能鼓励护士和卫生员们忠于职守。我们不能反悔，我们的存在帮助了不少人在这种危急关头仍然施以援手。帕克斯顿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说艾尔西娅、史蒂文、莱丝莉已于11月28日抵达上海，令人欣慰。

12月5日，星期日

从昨天起，马吉、我和克拉先生住进市内舒尔兹的宅寓。随着日军逐日逼近，要顾及这么多人，我们觉得最好离开下关，把中国工人也带进

城。昨天一直忙于打包搬运。仆人们下午进来说,粥厂已准备好。我们让苦力搬来所有的食品盒,我们要靠它们维持一段日子。我们还带来了电唱机和唱片。我们带来两张床,因为可能会有更多人搬进来。我们没有住在汉森先生的石油公司,因为他手下一批原本打算离开的人又回来了,住进了我们原想住的屋子。不过我们也从那儿带了一批人过来,他们像住寝室那样打地铺——我去了卜凯的宅寓。戴籁三夫人叫我去做英文礼拜,很简单,我简要说明了《圣经》的目的,这是主日——今天早上我正准备去圣保罗教堂主持礼拜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司机说如果我不害怕就可以外出,因为街上不再有警察阻挡行人。我急于赶到教堂,因为这是本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将举行晚圣餐礼。我们刚行至半路,三颗炮弹从头顶咆哮而过,高射炮开始反击。我们不得不离开汽车,躲进掩体。我们的礼拜很好,人不多,但比我料想的多一点。奇怪的是,大部分是妇女。——救护伤员的工作使这一周显得十分漫长。去火车站的人越来越少,人们以更快的速度撤退,后来我们的卫生员几乎是24小时连续工作。我很高兴我们终于取得些许成就。随着战线越来越临近南京,他们得找铁路之外的其他方式运进伤员。事实上,有50至60人从丹阳徒步而来。他们说不少人中途落了队,有的人死去了。

今天早上马吉在汉森宅寓楼下的一间大屋子做礼拜,在那儿他们设了一个圣坛作日常之用。马吉说礼拜给人印象深刻。我想有一些非信徒也参加了,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以具体的方式应用基督教。——战线日益逼近城市,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人建议中方不要守城,但他们坚持要防守。他们能守多久很成问题,因为他们的卫戍部队都是老弱病残,而精锐部队已被消灭殆尽。我们希望为百姓着想,战斗不要拉得太长。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做基督信徒的忠实见证。我们是无助的,但上帝不是。——寇牧师来信说扬州仍是一片安宁,很多人已从市内逃走。我们的马汉学校仍然完好,目前还未被占领。

12月7日,星期二

目前日本人还未破城。关于他们多快到来意见不一。邮局不再发送邮件。——我们听说昨天芜湖有两艘英国轮船被炸。

12月8日,星期三

中国人在焚烧城外的大量草棚,以免在敌军到达时阻碍视线。这对那些住在草棚里的人可糟糕透了。我们还听说他们砍掉了灵谷寺孙中山陵园的许多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可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战争实在是一种浪费!有人报告说距城市不远的地方听到了枪炮声。看来陆军要比舰队先到达南京,我们的麻烦可能少点儿。但我们不用着急。我们都在上帝手中,他会关怀他的子民。城内没有什么新闻。昨天下午看上去一片荒凉,但在J. L. 陈牧师的教堂那里,一切生活都与往常无异。

12月9日,星期四

从今天早晨6时我就一直想与你通话,但等到电话终于接通时,你已出去了,但我与弗朗西斯·卢茨谈了一会儿,得知一切都好。顺便告诉你,我们在南京的电话号码是31678,地址是鼓楼四条巷10号。——正午时日本飞机开始向战略地点投掷炸弹。显然引起了一些大火,我可以从我们窗户这儿看见。我们忙着让难民进入这片地区。我想我们对自己负责的大部分人都是有所了解的,但总有新的人出现。例如,昨天来了一位童子军领队,请我们找个地方,因为他的一队助手和一队信徒已进入城内。他是上海诸圣堂的成员。我真希望你能来看看这么些人从城市的各个方向拥进这一地区的情景。所有的道路上都挤满了一群群的人,他们拖的拖,拉的拉,尽可能地多带些家当——不倦的人力车,有的甚至是学生在推,手推车、卡车、小马车,有轮子的不管什么车,当然人们手上也绝不空闲,尽可能地拎着包。模范村的人们被安置在我们隔壁,为了不阻挡视线,中国人把这个村子全烧光了。值得注意的是,J. L. 陈牧师把他们组织得有条不紊,他们都依赖于他和教区委员会的照料,他和他的教堂在人们心目中肯定很有地位。——很长时间没有来自上海的消息,据上次扬州来的报告,有两个中国牧师和两个传道师还在那儿。——我听到远处有连续的大炮轰击声,看来(日本)军队很快就要到了。上帝对我们十分仁慈,他把和平安宁置于我们心中,我们不感到害怕。——飞机又来了,高射炮开始轰击,人们令人惊异地保持着平静。

他们就像在闸北那样往下扔炸弹，我们可以听到远处的爆炸声。

12月12日，星期日

城门除对军队开放之外业已关闭。日本人还在城外。我们听说有一两个先遣队突破了防线，但又撤了回去。炮火时断时续，但今天显然更近了。你从未见过如此混乱！到处都是人，但都在不该呆的地方。我想其实中国人最好是尽快撤退，让日本人平静地占领城市。前天有几枚炮弹落在新街口附近的中山路。15个人被炸死。昨天仍有九具尸体横卧在人行道上。其中有一位老妇和一个年轻姑娘，手里都挎着篮子，一个以经营流动餐饮业为生的中年男子，一名士兵，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位30岁的男子等。所幸的是他们很快死去，因为伤势太重。

昨天克拉和我骑自行车去鼓楼医院看能否帮得上忙。在路上遇见一个伤兵，帮他叫了辆救护车。又有空袭，我们可以看见城南的上空飞机在采取军事行动。好几个地方都有大火在蔓延。事态稍一平息，我们又赶往圣保罗教堂看那儿情形如何。我们看见白下路我们住处对面的一家中国饭店已被炸得面目全非，炮弹的碎片飞溅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并在门上炸了两个窟窿，穿透了门上包着的锡片，铁栏杆也被撞凹，扭曲得变了形。我们找到好几块炮弹碎片，一块还是热的，我把它们留着以后给你看。我们正在巡视时，中国饭店的一扇窗户打开了，紧邻的另一扇窗已被炸坏，两个胆颤心惊的人探出头叫我们。他们说这儿是刚刚被炸的，我们便让他们转移到安全区。一会儿又有个女人走过来，我们让她赶快离开，她只是微笑并点头同意。我们转过身，她却从饭店的地板上捡起一些碎木头，我猜想可能是拿回去做晚饭。

在太平路，沿途我们都遇到士兵搜遍商店里的苏打水、果汁和其他食品，或他们便于拿走使用的小物品。附近的士兵不多，但店门都被打开了。看来全无组织纪律，都是些散兵游勇四处闲逛。我们遇见一个男子和他的妻儿从白下路匆匆赶往一个较危险的地点。我们让他们别去，但他们坚持要回去拿大米，因为他们在安全区住的这两天已断了粮。我建议他一个人回去，他说他的妻儿不愿留下，如果他一个人，士兵会强迫他去当夫役。如果他被害死了，他们要死在一起。

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下关的大部分地区已被烧毁。阿奇·曾的住宅仅剩一片烧焦的废墟。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建筑尚完好。——成千上万的人除了随身携带的物品外,已一无所有。有的人连携带品都没有了。还有约1500人在江岸,没有遮蔽物,他们希望设法渡过长江。国际委员会给他们提供了能维持一个月的大米,但这已是我们所能为他们做的一切。除非政府和军事当局能关注到下关人民的疾苦,不过很显然他们压根没有考虑过这些老百姓。他们最后答应在运送完伤员之后把人们送过江。伤兵们也处境凄惨。派去治疗、看护他们的一支支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在饥寒交迫中痛苦地死去。鼓楼医院更惨,只剩三个大夫:威尔逊、特里默和一个中国人。只有威尔逊一个外科医生,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平民伤亡人数太多,他们无法继续照料伤员,尽管昨晚有40至50名伤员强行进入医院要求接受治疗。——安全区挤满了人,已经无法控制。——供水已经停止,我们只得从池塘或井里抽水,极有可能供电也会马上停止。——今天早晨,我将礼拜地点转移到汉森的屋子,我们教堂的人大部分住在那儿。我主持了早祷仪式,有相当多的非信徒在场,最后以圣餐礼结束。马吉在我们住宅内领着模范村的人做了礼拜。

12月14日,星期二

城市陷落。我们尚平安,忙于照看伤员和贫民。我们已组建了国际红十字会。别担心!这封信我让《纽约时报》的德丁先生带给你。

12月15日,星期三

《纽约时报》的德丁昨天没去成上海。星期天日本士兵开始进城,(中国士兵)匆促撤退。周六、周日扔下了许多炸弹——我们听说炸毁了三座建筑:外交部大楼、军政部大楼和铁道部大楼。一开始就有许多人受伤,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食物,没有水。我在门口时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扬州来的一名人力车夫,他住在二龙庙。他被拉去当苦力受了伤。我把他领进屋,后来送他去了鼓楼医院,在那儿他得被截去一条腿。马吉忙于理顺军政部的事务。刘先生(一位中国人)和我则在铁道部。我希望你看看中山路的情况。有一处被炮兵卡车、拖着轰炸机炮弹的

马、骡挤得水泄不通。一辆卡车被炸了,余烬仍在燃烧。载有弹药的马匹与车轮、自行车等捆绑在一起。我们松开了一头未受伤的可怜牲畜,另一头已被烧焦,其余的我们也帮不上忙。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的混乱无序。漂亮的交通部大楼也成了一片废墟,很可能是星期天投下的燃烧弹所为。那天日夜都有大火在燃烧,包括紫金山顶和周边树林。

昨天忙了一天,我们三个外国人和一名中国翻译想找城里的日军最高统帅,让他了解安全区和红十字会的情况。他住在圣保罗教堂附近的宾馆,我们便骑车去那儿看情况。教堂完好,几扇窗户被打破了,还有塔楼下的一扇门。一发炮弹击中了前门和接待室所在的后面那间屋子的房顶。梁木还在,我没有进去看,所幸还没有着火。我们看到罗伯特住宅里有两个日本兵,一个人手里拿着斧头,另一人正从三楼往下拖一辆童车。他们一见到我就溜了。抽屉都被翻得底朝天,保险柜未动。我们取出了保险柜里的银两和文件。房屋和院门都敞开着。一旦安全时,我要找人来照看此地。

我们估计今天建立起(日军)总部,希望尽快恢复秩序。——日本人在强迫人们充当苦力。有些我们认识的人被拖走了,昨天有七个人,不过三个人后来回来了。安全区,虽然不很理想,仍解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城市南部被炸情况最严重。昨天我们在路上经过时看见不到 25 具尸体。周六、周日、周一,安全区的人急剧增加,起码有十万人。我们原打算把外交部作为红十字会医院,但昨天日本人占领了此地,不让任何人出入。我们只能为困在里面的人们祈祷。他们不喜欢我们外国人在旁边,因为我们的存在限制了他们的活动。城门已关,我们无从得到下关建筑的消息,最后一天那儿间或有战事发生。我们对那儿能保持完好不抱什么希望,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按计划保护了人民。困难的时候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的信徒和其他很多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12 月 19 日,星期日

自托《纽约时报》的德丁给你们捎去我的上封信以来,未能再给你写信。他和其他新闻记者离去以后,我们的处境更为恶劣。不可能记下所

有的事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竟有这样的人面兽心者存在于世上,而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他们不喜欢我们外国人,因为当他们不愿我们在这里目睹其全部罪行时,我们坚持留了下来。15日和16日,他们搜寻士兵,成批抓人而不问是否背过枪。他们残忍地屠杀其中的绝大多数。我们听说,他们把两三百一群人带到一个池塘边,逐个枪杀并抛进水中。另外一大群人被迫走进一座昏暗的棚屋,周围架着机关枪,他们被活活地烧死。几天以前,他们从陈先生在模范村主持的宗教集会上抓走14个男人,至今未归。其中有陈先生大约16岁的长子,他也没有回来。日本兵还肆无忌惮地抢劫和强奸。马吉和我经常整天把妇女与受伤市民送到医院,并且守护两处宿舍,我们基督徒中的大多数和其他的人,特别是青年女子,在这里避难。我们的出现有助于赶走日本兵。我们还在这里过夜。

克拉和他的鞑靼朋友也留在这里守卫。我们的房子收容了大约100人,其中包括尼姑。当强奸如此猖獗时,(收容)人数不断增加。士兵显然已经失控。今天多少有些好转,因为下午有若干军官巡查。但今天上午连续不断有士兵进入房屋取走他们需要的东西。许多市民被杀死。昨天上午马吉与一位日本使馆秘书前往下关。我们仅存的建筑,扬子江饭店和 Socony Installation 被抢劫。他说街上散布着几百具尸体。日本使馆的人员还不错,但因对军队无可奈何而失去面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财产全被抢劫并毁弃乱置。我们希望情况略为好转。

今天下午我与一个日本士兵谈了很久,他在 Benton Dori,原来是横滨的商人,他说日军到达时粮食很缺乏,接近南京时得不到任何补给。所以接连几天士兵对粮食补给很失望。现在水路已经畅通,公路正在修复,他们重新获得补给。他举止得体,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希望尽早允许外国人回南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少数人已经难以承担如此重任。

金女大聚集着三千多妇女,有些已被士兵抓去;妇人和女孩在金大图书馆被奸污,其他校园房舍挤满难民。昨晚几个士兵进入大学医院护士住处,许多姑娘被吓得惊慌失措。昨天下午他们强奸了模范村的一个妇女。昨晚他们强奸了几个尼姑,她们曾从我们房屋过街吃晚饭,随后不敢回来,因为日本兵在街上。

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外国使馆人员无

一归来,我们怀疑日本人在一段时期不愿他们回来。

现在是 20 日,我们享受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我刚刚回到这座我守卫的房屋。只要人不变软弱,这种生活还是挺不错的。日本人想要克拉让电力公司重新运行。他是个很有趣的聪明小伙子,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总有办法帮忙。

12 月 26 日,星期日

我们刚刚在 25 号进行了早祷,在那儿我宣讲了“圣司提反”,替陈牧师为两个婴儿行了洗礼。马吉在我们的住处(舒尔兹·潘亭的住宅)为模范村的信徒做了礼拜。昨天他为七个人行了洗礼。昨晚他没呆在 25 号。他回家吃晚饭,返回的路上滑倒了,重重地摔在尾椎骨上。所以我来负责守卫 17 号和 25 号。两个士兵翻过 25 号的门,打算捣鬼时被我及时制止,把他们赶出去了。我不知道其中一人偷走一块手表,不然我会找他要回来的。他们盯着一两个女孩子打主意,幸好我及时赶到制止了他们。他们一见到我,一听到我的声音,便不自在地走开了。马吉早上还好,但那一跤叫他吃了苦。给你带信的那个士兵,我想今天早上离开了,我希望你很快得到我的消息。

昨天我听说有五个日本士兵加入了礼拜,显然他们都是基督徒。礼拜是由美以美牧师在女子圣经学校举行的,他们捐了 5 元钱。野上先生不是基督徒,但我给了他一本中文《圣经》让他带走。还有两盒沙丁鱼、两块香皂和两元钱,旅途中用得着。他举止得体,表示感谢,急切地想为日本的家人带点什么。我恐怕他们会发现,在南京可以获利的剩余物极少。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无法得到物资供给。他们弄不到水果、鱼,或是合口味的东西。我们的水源依赖于池塘和水井,他们也没有好喝一点的水。我们的存在能帮助这些痛苦的人们,并为福音书作见证。

圣诞节^①

我很想知道你们在哪儿,怎样度过这个圣诞节。今天天气非常好,我

① 原文如此。

们刚刚在 25 号汉森家做了礼拜。蒋牧师和董博士主持礼拜,因为我觉得应让中国的基督徒们自己去解释教历中这些伟大的日子。而且,我还在行使着警察的职权,不让非法士兵进来。在礼拜时,我也得采取行动。有 3 个(日本)人进来东张西望。其中一人能讲一点英语,他逗留了一会儿,其余两个则溜了。显然他们以前曾经来过,马吉和我都不在时,他们曾在这儿喝过咖啡,偷走了一些人的被褥等。今天上午他们来要咖啡,但汉森先生的厨师说没有,那个逗留在这儿的人便用茶加糖满足了自己。

情况一天天有所好转,我想不久人们就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了。整个城市南部都被烧毁了。我们在太平路和白下路的房屋和少数几间房屋令人惊异地成了惟一的幸存物。星期二我想去看我们的建筑是否完好,发现一位女信徒在日军到来前拒绝与其他人一起离开,她逃脱了围困。上上周我曾找过她,但没找着,所以我们猜想,她要么是去了别的地方,要么是被杀害了。在狂轰滥炸、烧杀抢掠期间,她在教堂里呆了 10 天,一点伤也没受逃走了。她是圣保罗教堂原来的一位传教士的遗孀。她也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我们希望她能留在大学医院工作,那儿的伤病员已是人满为患。星期四下了雨,使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睡在露天或半露天的难民们很为难。学院里有数不清的妇女和儿童。

华群小姐和戴籁三夫人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照看那些难民。宪兵在那儿值勤已有几天,情况稍稍好转。今天,有一个 10 天前被士兵抓走的男子回来了。他说上海诸圣堂的一位和他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信徒,至今还被扣留在城外,被迫帮他们煮饭、干活,不过他得到许诺说两周后释放他。他的名字叫徐安声(音译),是诸圣堂原来(或现在)的传教士的侄子。被士兵抓走时,他刚从上海逃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你可将此事告诉诸圣堂的魏先生。有人返回这一事实给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其他熟人可能还活着,也会返回。这儿的外国人都好。没有外界的消息。我们非常希望其他的外国人能尽快回来,他们能在各方面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他们能否获许进城又是一大问题。我们假设新闻记者们能顺利回来,自他们离开后又发生了许多事。除了日本人以外,没有外交官员返回。日本外交官已尽力而为,但他们似乎对军队也无能为力……我得打断这封信,有两个士兵前来看我们的一间屋子。他们是今天早上礼拜时

来的其中两个。一个是警察大坂,他们刚刚离开。

这是一个平安无事的圣诞节,但上帝赐给了我们基督耶稣,我们不必再要什么。

12月27日,星期一

几分钟前,日本中尉带回了徐安声,他是一周前被抓走的。他们把他释放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待他不错。我们希望被他们抓走的其他人也同样幸运……昨天上午,我开车和常小姐一起去圣保罗教堂,想再拿些她的东西过来。我们把教堂的钢琴搬到郭先生的屋子,它曾被移到草地上,而郭先生的钢琴被抬走了。炮弹击中教堂时偏了一点,穿过房顶,沿对角线方向穿过室内,再穿透前门,前门得重修。地板没被损坏,但掉了一些灰泥。另一枚炮弹落在教堂院子正门内的水泥车道上。墙被榴霰弹撕裂得不成样子,但还没倒。木门都塌了,整个院子都敞着。我们现在还不能做什么,因为一切都还未恢复正常。常小姐作为护士进了大学医院。昨天下午我花了几个小时帮助戴籁三夫人从她被劫的屋子里抢救出一些物品,她现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听到有关外面世界所发生事件的传闻,但没有确切的报告。有一件事是说火车站的情况稍微好点,但对此我表示怀疑。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外国人返回。仍和以前一样,我们只有很少的人。

12月28日,星期二

在17号和25号我再次履行警察职责,但并未处理什么麻烦事,感谢主。过去几天我有机会读点书。马吉在25号值夜,我在17号这里(轮值)。随后我回家吃早饭,马吉随即也回来了。他经常到8时左右才起来,而这时我正进早餐。他没有回到这里来接替我,所以我决定不回家并吃中式晚饭。两个仆人很好,余福似已康复,但显得消瘦苍白。他们行动相当困难,因为房中挤满难民,他们寸步难移。情况大体好转,大批军队似已出城,市民在街上行走略有自由。他们仍感恐惧,游荡的士兵仍然抢劫与奸淫,被怀疑当过兵的男人仍然被处死。但在许多方面仍比以前有明显改进,我们感激不尽。只要有更多外国人回来协助,便将

大为缓解目前的紧张情况。仅在金女大就必定超过1万妇孺。我们不知道何时允许市民自由出入。为这么多人谋求食品,问题已很棘手。我们听说城外农民也缺粮,因为他们的谷物、耕畜、农具损失太大。城市仍有几处起火,城南基本荒废。人们祈求似无任何效应,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还行。

12月29日,星期三

每天早上我们都聚在一起祈祷。我选了几首赞美诗,为新年和主日练唱。我们打算在新年前夜做一个礼拜,可能采取连祷文的形式,在忏悔室进行默祷,唱赞美诗。人们分成五组准备查经,你知道了一定很高兴,他们都是在我们这里避难的人。还有为信徒组织的查经班,很多人在帮着制作加内衬的大衣,这很急需,因为许多人保暖的衣服和被褥都被士兵抢走了。这种情况随着部队撤往其他地方而有所好转。城市的所有男子都被要求向军事当局登记,他们要清除所有被怀疑当过士兵的人。昨天机关枪又响了起来。我们不知道那是常规演习还是在摧毁中国军事体系,是否有人被杀死。数不清的人,平民和军人,都被杀死了。上帝会让这一切尽快结束的。上帝是这样的仁慈,我们已将自己的身心全部托付给他。

12月30日,星期四

至现在为止,这是安宁的一日。今天一早,我们这儿的人都出去登记了,我们发现只要求男人登记。日本人要“肃清”——可能用另一个词会更准确一些——他们在有组织地把有士兵嫌疑的人清除出去。报告说年龄在18岁至40岁的男子一律不许出城。他们呆在城里若是不被骚扰,情况倒是不坏。我们听说他们(日本人)强迫人们当伪军背叛自己的同胞。我上午的大半天时间用于准备新年前夜的礼拜式。现在我们在17号读莫顿的《踏着主的脚步》一文。

12月31日,星期五

马吉刚刚进来说,国际委员会请我去查看一下为难民开办的粥厂。

有一个悲惨的消息。今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卢先生的钱包和一张便条(他曾在汤山和东流当过传教士)。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他变得忧郁、孤僻,在便条上他暗示已决定投水自杀。他应是今天登记,这个倒不用担心,他已四十多岁。他早上是一个人出去的,我去附近的池塘查看,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我希望他已改变了主意。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存有轻生之念,昨晚休息前我还鼓励他要为了中国而活下去,上帝要他这样做。他是个沉静温和的人,但我担心他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也不可能轻易动摇他。

西门子公司的南京代表,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先生,通过日本领事得到了他妻子来自上海的三封信,从信中我们得知你们对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听说有一些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正启程来南京,他们的到来不会受欢迎,因为我们的存在就不受欢迎。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情况还是有所好转。现在已快1时了,我们只查看了一个地方,有3000人在这儿受到保护。尽管条件恶劣,但大体上说人们已在困境中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的仆人登记完已回来了。我们和他们都大大松了口气。我随信寄上一份今晚礼拜式的副件,我希望能不被打断而顺利进行。记得去年新年我们在长崎吗?我们希望士兵在庆祝新年时不要太过分。我们只能警告人们尽可能呆在室内。我希望南京上海间的正常交通得以恢复,以便信息和人员往来,但恐怕离恢复正常还有一段时间。我听说有些日本商人用汽车运来一些物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得到一些补给。现在我们主要依靠扬州带来的食品,有几样主要食品如牛奶和糖很快就要吃完了。鸡蛋一直很难买到,圣诞节前余福买了三个,用两个做了巧克力蛋糕,但我们得知别人几乎没什么吃的时候,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充满快乐与惊喜的新年!

附:转述有关南京的情况时请斟酌,日本人急于尽力掩盖真相。

1938年1月2日,星期日

想让你知道马吉和我都好。我们无法与外界联系,只好等碰巧有人去上海时请他带信。这次是几个运货的商人,他们给日军送来一些物

资。我很高兴到目前为止天气还不算太糟糕,不然人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马吉和我将主要的精力花在行使警察的职责上。前几天我一直在视察几处难民收容所,看人们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昨天是例行假日,随处可见旗帜和烟花,我不知烟花从何而来,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摆脱了前两周的紧张和压抑。局面稍稍受到控制。(由日本人带此信)

1月3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我们国际委员会成员去视察两个难民中心。为庆祝“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举办了几处群众集会。非常显眼的是旧日的五色旗与日本旗并用,没有看到中央政府的旗帜。事实上,在出席人数甚少的群众大会上,演说者揭露后者的全部罪行,并且宣布民众可以期望得到新政府的福祉。马吉和我被邀请出席金陵大学的新年宴会,我们决定由我前往而马吉留守。费吴生劝说马吉无论如何也要赴宴,所以他只得去了。但当我们刚吃完饭,范传教士和保罗·董跑来说,有几个日本兵进入17号并且正在强奸妇女。我立即乘费吴生的汽车赶去,但这些日本兵大约在三分钟以前离开了。我们试图追踪他们但未能成功。我了解的情况如此:两个日本兵走进来自浦镇的中国牧师蒋的房间,偷走他的汗衫和一双手套。他们看到蒋太太,决定回来找她。但她设法从浴室的门逃走了。于是一个士兵跑上三楼,想强奸一个未婚姑娘。她反抗并成功地摔倒这个士兵后逃跑。随后日本兵在二楼袭击两个已婚妇女。我们把她们送到医院治疗。一个士兵用刺刀捅伤其中一个妇女和试图保护她的周太太。

汤山和东流的中国助手卢先生显然是自杀了。自从12月31日清晨起,他一直没有回来。邻居告诉我们,他们在附近池塘里看见一具尸体,想必就是他了,但我们尚未得到当局允许去打捞尸体。这是使人非常悲伤的事。他似乎早就有此想法,南京沦陷后民众的痛苦增加了他的决心。

昨天我为模范村的基督徒布道。我们有很好的仪式,人们认真聆听。午饭后我到17号接替马吉,他已经与来自下关和圣保罗的基督徒做过礼拜。我利用下午时间为我们所进行的视察报告打字。马吉回 25

号住宅过夜并报告两起已发生的事件。大约 4 时 30 分,一个日本兵企图强奸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在家并与日本兵搏斗,所以妻子得以逃跑。日本兵悻悻离去,后带着步枪回来打死了这个男人。马吉去报告此事,发现费吴生已经前往拉贝家报告这起案件。当他们正在商谈时,邻居跑来说有一个日本兵在附近小屋中正要强奸一个妇女。马吉和费吴生冲出去把这个坏蛋赶走。

日本兵在金陵女子神学院大肆奸淫掳掠。经不断抗议之后,一队宪兵在此驻扎。一天夜里,其中一人进入并强奸了一名妇女。

昨天下午几个男人前来报告在汉西门外德士古公司所发生的事情。此处被日本兵抢劫,取下两面美国国旗,说是由于美国与日本为敌,不能悬挂它的旗帜。他们用枪威胁仆人在一个声明上签字并按指纹,证明他们已经把这些掳劫物卖给日本兵以换取一笔现金,然后逼迫一个人和他 63 岁的老父亲把属于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小车和卡车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些人三天来只吃了一顿饭。他们(日本兵)在公司内及其附近杀死许多人。其中一家九口只有一个女人和小孩逃脱。日本兵向他们开枪,然后在防空洞放火。这个女人用厚棉被把自己与幼儿裹住,随即冲出火焰逃走。这只是此地发生的情况之一例。

虽然日本军方和行政官员都明显控制不住士兵,但情况略有好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已被重复,我害怕这一切都循着行军路线延伸。昨天我们观看中国飞机往下关和南门外机场丢炸弹。高射炮射击了几分钟。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有传闻说扬州现在已经落入日军手中,还有泰州、宜陵(I-ling,音译)、泰县等地,所以我猜想可能还有更糟糕的消息。今天是几周以来我们第一次重新有了电灯,这意味着我们能收到无线电广播。可惜马吉的收音机坏了……

我刚刚吃完中饭,带一位妇女去医院治疗。茹远(音译)和我一起去看他的一位人力车夫朋友,他的一条腿自膝下被截断了。他的情况还好,出于种种考虑,我让他做了我的仆人,因为他肯定不能再以拉车为生,而他还能做别的事。他非常感激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

我当然非常想听到你的消息,也许我马上就会得到。听说有德国和美国外交官员返回。圣诞节拉贝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精致的西门子

公司日历记事本,上有西门子的祝辞。新年他制作了一种特别的贺卡,正面是安全区的徽章,反面是南京的我们 22 个外国人的签名。它将成为我们这一经历的一个很好的纪念品。不知你是否收到我托野上先生带的信。我又让日本商人带信让你知道我们都很好,你别为我担心。

1 月 7 日,星期五

昨天我非常高兴地收到罗伯特主教、艾尔西娅、莱丝莉、斯蒂文和 K. P. 的信,是来大使馆的美国官员带来的,都是(去年)12 月 12 日至 20 日的信。但从信中我得知你已平安抵达香港,我真太高兴了。从某些方面看,局势略好。交通有望恢复正常。目前我们一直与世隔绝,我不知道扬州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大使馆的人员说我们芜湖的财产尚好,兰佩尔和康斯坦丝嬷嬷也平安无恙。我把我写的信积累在一起寄给你,你自己看着办,看哪些内容可以让别人知道,有的可能对我们在这儿的处境不利。我们是日本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任何信件或文件现在发表出来,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而这儿的人民非常需要我们。我想你一定能理解。

1 月 10 日,星期一

这封信是让你知道我很好,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把这批信捎给你。这些信会告诉你这里的一切。今天上午我带了好些人去医院,又骑车去我们的教堂和宅院。那儿还和以前一样。老公馆的一部分被烧毁,但烧得不多。所有的物品都遭到抢劫,剩余物品乱七八糟地堆着。今天早上我把一个日本兵从西姆丝小姐的屋子撵了出去,他吓坏了!然后我去大使馆(我还一直没机会见到来自南京的官员),和原济南领事阿利森先生谈了一会儿。

我们觉得我们的地方还会再遭抢劫,除非有外国人住在那里。这很困难,因为我们人数太少。不过,百姓比东西重要得多。英国和德国使馆的官员也回来了,局势应该更加好转。昨天我一整天都在 17 号和 25 号值勤。在 25 号进行了早祷,是由浦镇的蒋牧师主持的。参加的人很多,许多是非信徒。昨天上午马吉在金大主持了礼拜,下午又在联合教

堂举行了英文礼拜,我不能脱身去参加。我们在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卢先生的尸体,他是12月31日自杀的。很令人伤心,但我想,即使我们这次劝阻了他,他也还是会自杀的。阿利森说有人通过国务卿询问马吉和我的安全情况。我想可能是父亲^①或伍德博士。我们俩都好。

1月11日,星期二

昨天下午,我得到了绝妙的圣诞礼物!马吉给我送来了你12月16日、26日和1月5日写的信,还有父亲、贝蒂和索菲亚的信!我正在给艾尔西娅、K. P等人写信时,他给我送来包裹,我真是太高兴了!欣喜地得知你离开汉口沿途都顺利,而且现已平安抵达上海。你大概已知道,你离开汉口的那天早上我给你挂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弗朗西斯·卢茨接的电话。日复一日,这儿的生活没什么变化。昨晚平安无事,马吉和我回到舒尔兹先生的屋子吃早餐,然后我开车去大学医院,和我同去的一位是在无锡圣安德鲁受过训练的护士。她当时没有毕业,因为在她参加N. A. C考试前她的祖母病逝。但她接受过四年的培训,医院正好缺人手,可以给她工作机会。我们和露丝·陈小姐一起从医院驱车去长老会女子学校取发放给难民的衣物。然后我又去大使馆,放一些信在那儿,并告诉他们有关我们住的德士古石油公司财产情况。听起来好像我早上没干什么事,但我们每到一处都要等半天。马吉和我非常感谢所有有关差会的消息。听说这么多人都病了,我们很难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听你谈每个人的情况,请代为问候他们……别担心我们的食品,我们还有一些物品,还会有更多的东西送来。大使馆会帮我们争取一些物资,费吴生在帮我们通过上海的军需处订购。

两个仆人都很好。他们不敢单独外出,因为士兵还在抓男人去做苦力。至今我们的仆人没被抓走。昨天我在医院见到那个人力车夫,他情

^① 这里说的父亲,是福斯特夫人克拉丽莎的父亲欧·汤森,波士顿的名律师。福斯特与克拉丽莎在1936年才结婚,又在南京沦陷前一个月从扬州迁居南京。由于音信隔绝,老汤森非常焦急,曾通过国务院打听福斯特夫妇的下落,国务院对此事也极为关注。

绪很好,正在逐渐好转,伤口基本愈合了。他非常感谢我们救了他的命。马吉和我还在执勤,不过我想很快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通常总是在无人守卫时才有麻烦事发生。马吉和我都好,昨天我给家里(纽顿和菲拉)发了电报,大意说我们都好,预计你是在上海,那时我还不知道你已经到了上海。今天我想给伍德博士发封电报。现在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圣诞节是如何度过的。他们装饰了25号的大客厅,看上去一切都很漂亮,天气晴好温暖,我又站了一整天的岗。

圣诞节那天,马吉为陈牧师集会中的几个人行了洗礼。圣诞后的一天我施洗了两名婴儿。我知道你一定爱呆在这儿,但局势太不稳定,你们怕还是不能进城。我得赶快把这封信放到大使馆去,好让他们带上船去发。

1月12日,星期三

我在等理发师来帮我理发,从11月1日起一直没有理发。首先是找不到理发师,其次是没有合适的时间、地点理发。马吉和我刚刚吃过早餐。9时我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讨论恢复问题。委员会调查了不同的难民收容所,并做了报告,请求建立恢复委员会,并计划安排难民们回家并工作。昨天上午,我忙着把医疗用品送进大学医院。市医疗卫生部在我们仍在下关时,给了我们许多医疗用品,我们将其带进了城,现在都已送往医院,因为我们用不着。我们除了小汽车外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得来回跑几趟。我还带上了陈小姐,她顺便去长老会女子学校给难民拿些旧衣服。妇女们想把那些衣服改一改,需要时能用得着。

情况比较平静,马吉和我便回舒尔兹的屋子吃晚饭,这是我们几周以来第一次这样。形势的改变得益于美、德、英使馆的官员们。日本人需要正视他们的军队抢劫了外国财产(甚至使馆)这一事实,他们没法把责任推卸给中国人,因为通常是外国人去查看他们的财产时,在现场看到的是日本人在抢劫。他们把弄得到的汽车都偷走了,甚至连存放在美国使馆的小汽车也开走了。现在日本使馆正在尽力追回被军队偷走的车,作出挽回面子的姿态。但我看此举并不合外国官员的胃口。如果诸如此类的事在这儿发生,那么不难想象在扬州和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

当然我们仍然没有扬州或镇江的消息。我非常想知道你是否已收到我用种种途径发出的信件，一次是托一个日本士兵，另一次是托一个日本商人。一位老妇，她是模范村一名信徒的姑母，今天早上死于医院。她69岁，不知得的什么病。昨天，通过大使馆的好意安排，马吉和我一起给伍德博士发了份回电。我们听说日本人想让百姓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说得倒是容易，可许多人的家已是一片废墟。尚且毫无运输工具，所有的都被（日本）兵抢走了。人力车都没有车轮，不能用。自行车也是同样的命运或者是被搬走了，汽车也一样，所幸我还留有我们俩的自行车。我想，除了两把柔软舒适的大靠椅，我把我们在下关的东西都搬来了。不知道那两把椅子还在不在。你能否给我寄一些两分的邮票？我们这儿买不到。舒尔兹先生的房屋又通电了，但还没有水。

1月13日，星期四

马吉昨天本想把信放到大使馆，但没办成。所以今天上午我再加上一行字让你知道我们都好。昨晚我睡在家里（舒尔兹的房间），我们想我们两个人再不必去17号和25号守夜。

今天多云，像要下雪。我要出去一会儿，调查另一个难民收容中心的情况。然后带一位女病人去医院，再把信送到大使馆。

希望你一切都好，请转告基尔默，我会很快给他寄一份报告。只是一份简单核查他存款的报告，并把我的账目打出给他。我们晚上无法工作，因为17号和25号都没有电，而白天总是被安排得满满的。

我热切地盼望着你的下一封来信。没准我去大使馆时会收到几封信。

1月14日，星期五

今天轮到我在家里过夜。现在我在餐厅——惟一有炉子的地方——写信。……马吉送一些病人去医院，还拍了几张照片。我则在这儿值班，给家里人写信（随信附上）。另有两份副件你看谁合适就寄给谁。下午马吉来替换我，我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戴簪三夫人和华群小姐，我好长时间没拜访她们了。戴簪三夫人一人在家……她给了我两罐

百果馅,这是她从家里抢救出来的。她的屋子被士兵洗劫一空,连汽车也偷走了。他们拿出火柴准备烧屋子,这时一位仆人急中生智,把她的访问证出示给他们,证明她是个外国人,尽管她获得中国市民身份。士兵于是离开了,但未把火柴带走,我们留有样品。

今晚我们从收音机里听了一些美妙的音乐。马吉的收音机从下关带来时坏了。但我们从中英文化协会找来一个好收音机,我们将保管它直到(协会)负责人回来把它取回。刚刚在播放帕岱莱夫斯基的康帕涅拉舞曲和肖邦的F调小夜曲,还有一段华美的歌剧。

今天是安宁的一天。我听说前天晚上有一个日本士兵翻墙进入金大附中抓走一个女孩。当她反抗时,他开了两枪,有一枪击中一间满是难民的教室里的黑板。他把这个女孩推过墙,可他自己翻墙时,那个女孩跑走了,并从另一个方向翻进学校,所以他未能得逞。但昨晚另有一名女孩被抓走,很不幸,她未能逃脱。贝德士博士昨天被叫到柏睿德博士的住处,发现两个日本人(一个士兵、一个军警)在那儿观望。这种事常常发生,害得人们都不敢回家。

今天下午马吉和董博士一起去中央神学院,看见那儿一团糟——东西都乱七八糟地堆着,许多被劫走了,四处的房屋也是如此。

……现在我感觉自己减轻了10磅,年轻了10岁,你猜为什么?今天早上我理了发!我们几次找金大的理发师,但那位先生觉得8时开始做生意似乎太早,没办法我只得去找那个住在街对面的理发师。他的手艺不错,我感觉好多了,这么一点小事竟有这么大的差别,真有意思。例如一个舒服的热水盆浴或淋浴,或把我的衣服拿去干洗……

1月15日,星期六

在我去17号过夜之前,我想给你写几句话。我刚听说明天有一只英国船要离开,所以我想把这封信让其带走,我想信的内容会解释一切。

今天上午我很忙,先是开车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帮那儿的难民开展福音传播的事情。我们同意每周去五个下午——每次去两个人——从下午2时开始向各妇女组传道,然后我得送几个病人去医院。他们看完病,我们回来时已是中午了。马吉整个下午

都在外面,现在他和另外几个人被邀请在日本使馆吃火锅晚餐。明天早上我要去为模范村的信徒庆祝圣餐礼,明天下午还要主持一个联合英文礼拜。今天下午我看了会儿书,写了会儿信,又和 17 号的孩子们玩了一会儿。我们一起踢一个网球,他们非常喜欢,我们都得到了锻炼……

1 月 24 日,星期一

在广播开始以前,恰巧有点时间写信,我们把(广播内容)打印给我们附近的朋友,他们没有其他途径获知新闻。昨晚克勒格尔先生已到上海。他在昨天早上 7 时 30 分离开此地。能提供的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敞篷货车。至少他的视线不会受阻,或许他沿路目不暇接。昨天我与首都饭店的一位经理外出,他是我们恢复委员会的成员,到五个难民中心分发调查表格。回来后我们于 10 时 30 分在 25 号做礼拜。我们听说作为难民中心的原语言学校,昨晚有一个妇女被日本兵抓走。我们的礼拜参加者甚多。我们缩短了由我主持的晨祷,接着是董博士主持圣餐礼。他也布道。礼拜以后,我们有一小群人应邀参加刘先生举办的中餐宴会,他是首都饭店经理。这天是刘太太的生日,也是费吴生的生日。刘太太在上海,但我们的一流盛宴却从 12 时 30 分延续到下午 3 时 30 分。然后马吉和我去参加米尔士主持的英文礼拜。

今天我度过了又一个繁忙的日子。我必须在 10 时到使馆会见某位日本宪兵,他在礼拜天下午来过,当时我正好外出,(他)是要我看一架钢琴,可能是从我们教区的礼堂中偷走的。昨天我不在家,他们约我今天上午(会面)。领事馆的艾斯皮先生也被约定去视察德士古公司,那里的大量汽油和其他物资被抢走。所以他先离去,我则前往金女大送新闻摘要,并且与华群小姐、戴籁三夫人闲聊一会儿。她们谈到一个男人,他在 12 月 18 日被日本兵抓走,大约在一天以前回来了。他被抓到浙江长兴,被安排为一个官员劳役 8 天,此人虽然很苛刻,但没有虐待这个男人,他告诉后者可以返回南京。归途中,这个男人在靠近无锡的宜兴被另一群日本人抓住,再次被迫服侍一个军官,这个军官很和气并且待这个男人很好。他们交换了通讯地址,服侍 18 天以后,他们给这个男人一点钱让他回家。他循着乡村小路返回,经过 8 天跋涉到达南京。乡下人对他非

常和善,当他们听到他的经历都沿路帮助他。他说大刀会在安徽很活跃,他们保卫乡土,抵抗日本和中国的军队,也抵抗土匪,所以当地农民生活富裕,粮食充足而且便宜。这非常有趣。他经过许多地方:徐州已荒废,90%被破坏。长兴、广德、宜兴、溧水、溧阳、句容也荒废了,一片瓦砾颓垣。

我们看到的钢琴并非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回来了。我们刚吃过中饭,邻居就跑来说,有个日本兵打算强奸一个妇女并用刺刀威胁她。我们三个人,马吉、克拉和我跑过去。那个日本兵惊慌地跑开了,但克拉和我盯着他并且追赶。我叫喊,克拉也叫喊,两人一起追,日本兵拼命逃跑,他把刺刀丢下了,我们把它经由美国领事交给日本使馆,并附有此案的报告。这个日本士兵再次回来取他的刺刀,我们又一次追赶,越过泥沼,跨过壕沟,但他还是跑掉了。这场骚动平息后,我前往17号,然后与建筑过我们教区房舍的金大建筑师约定,请他为我们圣保罗(教堂)的财产损失估价。明天下午我还得在金大主持一个查经班。

事故继续发生。星期六晚上,我们的使馆人员刚吃过饭,一个仆人来报告,有几个日本兵进入使馆车库。他发现其中两人与一些中国人玩麻将。他要求他们马上离开,他们照办了。但当他正在考虑是否应把他们赶出去时,另一个仆人来说,有个日本兵抓走了他的大女儿。当两个日本兵进入3号车房玩麻将时,这个家伙走进5号车房,蛮横地将这个女孩抓走。于是阿利森和另外一些人跑上大街寻找她。他们碰见那个女孩回来了,她说抓走她的日本兵正强迫她乘上摩托车时,那两个被赶出来的同伙告诉他,由于他们侵入了美国使馆建筑,所以最好把这个女孩送回,否则可能要倒大霉。

这里已有若干案件结局都不大愉快,但我们听说有两起非常严重的案件似乎证据确凿。有个妇女被一个日本兵强奸,他强把一个空啤酒瓶塞进她(体内),随后将她击毙。另一案件是一位英国使馆职员目睹的。一个妇女被强奸,她(体内)被戳进高尔夫球杆,被虐待至死。似乎不可能有这样披着人皮的魔鬼存在,但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不断传来。另外一天上午,一个颞部进有子弹的男孩被送进医院。一个日本兵要他抓一头猪,他抓不住,所以被击中颞部。我们还知道另一个孩子的案件,

他无法给日本士兵提供一头猪,便被剖腹并丢进池塘。就在同一地区附近还有一起事例,有个人被日本兵抓到芜湖。他成功地跑回来,发现自己的家已搬走,妇女都藏匿起来。他又累又饿,刚烧好了一锅卷心菜,有个日本兵进来要钱和女人,他两者都无法提供,这个日本兵便往这锅卷心菜里小便,然后走了。

阿利森和英、德领事并未袖手旁观。当他们的抗议等被日本使馆官员搁置时,便通过华盛顿、伦敦和柏林与东京直接联络。这使得此地的日本人气得发疯。你可以想象,他们被告知:我们的政府认为,我们的公民财产被掠夺,在我们产业中避难的平民被未加控制的(日本)军队抓走,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有个日本领事馆警察特别愤怒,因为阿利森向华盛顿报告他到金陵大学索要洗衣妇,但他拒绝所提供的洗衣妇,而索要另外一些年轻貌美者,其动机显然非常可疑。另一天,他还来到我们的住处,要求克拉为他提供中国姑娘。克拉问他,他们把数以百计的日本和朝鲜姑娘带到这里来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他想要的不是她们,而是中国良家女孩。现在他试图了解中国人向当局报告他拜访金陵大学的内容,今天他们抓住一个负责管理金大附中难民营的牧师,想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信息。所以,我们过了一天又一天,从来不知道新的一天会带来什么。由于阿利森通过华盛顿直接与东京联络,本地日本官员变得稍微好打交道了,虽然他们并非人人如此。相信他们很想杀我们,一个一个地杀。

我们期待明天或后天经由“阿非司”号(H. M. S. Aphis)驱逐舰发出信件。请你让罗伯特主教和贝绥·西姆丝尽快给我送来一份他们留在房内的财产清单,以便我核对哪些东西被偷走。还得向冯·弗斯特小姐要一份清单。领事希望我们尽快发出一个预备声明。我们的大使馆现在有海军送来的配备操作员的无线电台。日本人最初想阻止,但阿利森获胜了!他与艾斯比和麦克法吉两个副领事一样,都非常优秀。告诉戴尔,无锡一位姓李的基督徒的妻子,昨天在医院死了,我想可能是血液中毒。他们在下关和这里与我们一起避难。他们有一个小女儿。这个妇女患痢疾已有一段时间。如有可能,请问郭先生留在教区礼堂的钢琴号码,以便辨认。

1月25日,星期二

晚饭后我前往17号过夜。我以沐浴作为一天的开始,不是用澡盆,而是站在浴室里,并用两个煤油炉。正如马吉事后所说的那样,我看起来很重尊严。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他也想洗个澡,但终未如愿,虽然他比我更有此需要。早餐后到委员会总部参加各难民中心负责人会议。这是一次特别会议,为质疑花费许多时间,而结果却发现这种质疑与我们无关。会议延续到12时以后,于是我回去吃中饭并为金陵大学的会议做准备。这是一次真正的福音会议而并非查经班,虽然我们采用的是以《马太福音》第29章为基础,因为到会者大多是非基督徒。金大一位教授(下关的基督徒)告诉我,他估计听众有400人,这是他们曾经有过的最大聚会。会议在理学院大教室举行,确实拥挤不堪,但人们听得很专注。你看,上帝没有减少我们的机遇。我相信度过烦恼忧伤必有丰硕收获。

我步行回家时,经过一处开阔的田野,这里放着许多棺材等待埋葬。我看见有个男人在一个孩子的棺材边哭泣,显然这是刚刚放在这里的。我立刻想到应该去试着安慰他,劝他转向主耶稣寻求安慰。我已经走了一段路,但很快折回来同这个男人谈话。他说这个孩子是他的小女儿,她刚刚死去。他告诉我,他曾经常常在不同布道堂听福音,他不再流泪,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但他突然看见一群人,包括一名警察从附近街道走来,他非常慌张地离开我并迅速跑走。但我很高兴我一时兴起与他谈话。另外一个人在路上送给我一块俄国茶砖。他说这是他买的,可能是真的,但我婉言辞谢,因为我想他可能比我更喜爱此物。人们似乎确实感谢国际委员会为援助他们所做的(事情)。然而如我前封信所说,又来了一些新的日军队伍,妇女们又会遭殃。我高兴地得知格鲁(Grew)大使的抗议已经送交东京外交部门,我们都希望能有效果。我们听说有个日本兵进入(南京)外交部,我们曾经努力在那里建立一个收容伤兵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在日军进城以前已有一部分(伤员)离去。马吉安排若干“医生”和卫生员在那里照顾伤员,但日本人占领这座建筑后,即不再准许我们外国人进入。甚至现在我们也未得到许可。我们间或听到里面

的人谈到其中的情况。这个日本兵昨晚闯进去,用刺刀杀死一个苦力,当时此人拒绝为他寻找正在睡觉的女护士。接着他威胁另一个苦力,此人终于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五个姑娘,门开时有三人冲出去跑走了,另外两人领着日本兵经过一连串房间,来到有一个中国医生待的地方,拖延时间以求阻止日本兵的企图。他自然非常恼火,但已杀死一个人,足够完成一整夜的为非作歹。北风正在劲吹,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 17 号就寝。

1 月 26 日,星期三

由于北风劲吹天气很冷,但大部分时间阳光灿烂,稍减严寒。我为难民高兴,因为他们缺乏御寒的衣物。今天上午我花了若干时间写海德兰(Headlan)的《基督教神学》的笔记,这是一本出色的书,有许多资料可用于向非基督徒布道,特别是知识阶层。他们为李太太举办预备葬礼,她是一个无锡基督徒的妻子,星期天死于医院。我们把棺材放在邻近 17 号的竹林中传福音者卢先生的棺木旁边,我利用了相同仪礼。我在多数美国人居住的卜凯家中吃午饭,因为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讨论我们恢复委员会的若干计划。一直讨论到 2 时以后,我回到 17 号检查一个 14 岁女孩被枪击(的案件)。事情发生在昨天下午我们房屋附近。她和妈妈、弟弟来自无锡,现今住在一个难民中心。女孩和弟弟到附近田地挖点萝卜,这时一个日本兵出现了。他想抓住这个女孩,但她惊恐地跑开了,于是日本兵开枪,击穿其头部,差点儿死掉。

我们不断向日本使馆诘问日本士兵造成的一起又一起暴行。他们假装审讯这些肇事者,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罪犯受到如同在任何西方军队中应有的惩罚。我告诉你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我们的领事阿利森先生被一个日本兵打了耳光,金大的林查理先生也受到粗暴对待。日本兵在金大一所校舍中抓走一个少女并加以奸污。她回来时,将案情上报领事,他和林查理陪同少女前往她被抓走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于宪兵司令部的地方。有几个宪兵陪同领事出去。少女被叫进这所建筑,也许是为了辨认施暴者,但不许阿利森和林查理一同进去,他们站在门内约两英尺处。有个士兵试图把他们推出去,当时一个官员走过来,怒气

冲冲地吼叫他们是美国人，一个士兵从背后冲上来并打了阿利森一个耳光。当一个曾经陪同阿利森的宪兵告诉别人他是美国领事时，另一个士兵抓住林查理，揪着他的外衣衣领猛揍，直到把它撕破。但他们（坚持）等待着，直到女孩被交还他们。阿利森还拿不定主意是否报告这起事件，因为事关两国关系，他担心会产生严重后果。就细节而言，他不该进入宪兵司令部，但士兵和军官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后者从前亦曾打过林查理的耳光，他们认为他还曾把贝德士博士推下楼，当时（博士）是为一个被日本人强迫充当翻译的金大附中毕业生求情。这个青年给他妻子送回一封信，说自己将被处死。这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未能归来。

今天上午他们打捞起一大批男人的尸体，他们是在日军进城不久被机枪扫射并丢进一个恰好是我们所住街道尽头的池塘里。他们大多是平民，但被怀疑是以前的士兵而遭枪杀。马吉今天前往一座房屋，住在那里的14个人在日军进城后不久全部被杀死。其中11人是妇女，都是被强奸后杀害的。这些尸体还在那里。马吉对此有充分证据。上午有个妇女进入医院，她一个多月以前被抓到城南。她的丈夫同时被抓走，还没有回来，也许永远不能回来；他们结婚已四年，但没有孩子。日本兵每天强奸她七至九次，最后当她不再有用时才释放了她。其后果是她患有极为严重的三种性病，但日本军队自然不会干出这种事，这是我们外国人捏造谎言以鼓动中国人！（这是反话——译者注）所以你们看我们不大受欢迎。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日本人随心所欲，中国人会遭遇什么。在核实昨天女孩被枪杀的案情后，我参加恢复委员会另一次会议，一直开到5时。

1月28日，星期五

早上收到“阿非司”号送来的信和包裹，得知你们的生活情况，这真是一件乐事啊！没看见你说的寄给我的袜子、信和30元钱。我猜想被日本人拿去了，不知你是否还让那个日本商人带了别的东西，他应是两周后带回一车新鲜物品，可现在还未露面。克拉向他订购了牛奶和收音机的电子管，另一个人还托他带50元钱从上海寄走，我们不知他是否带着这些东西潜逃了，或者没法返回，或者回来的途中受阻。最近我发现

在执行公务时抽烟斗非常有用而且舒服。我发现偶尔给日本士兵递递烟十分起作用。我们不需要寄来现金,因为我们可以从国际委员会支取,而且马吉手上也有一笔可观的钱。昨天我没工夫写信,我忙于准备我将主持的周日礼拜,然后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中国宴会。17号的一个 人过 30 岁生日,因为又临近中国旧历新年,他们便借此机会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下午,我和克拉,以及一位中国老师和金大的中国建筑师(他建了圣保罗教堂的房屋)一起骑车去圣保罗教堂查看损坏情况。我们到那儿发现教堂剩余的部分已全被烧毁,地上有些木材还在冒烟,砖瓦都是烫的。这是周三上午发生的,因为我们的一个仆人星期二从早到晚都在罗伯特驻地我们日校的房子。教堂是星期三早上大约 7 时烧的。阿利森星期二曾来过驻地,那时房屋还完好无损,我们查看了每一间屋子,和上次来时没有什么两样。士兵是在教堂的圣器收藏室点的火,明显的证据是红色的节日彩带被烧了,门和衣柜的一些其他部分都有焦痕。所幸火势没有继续延伸,同时也说明日本兵仍在这片建筑里肆意游荡。

我们想给我们的仆人弄到去那里居住的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仍是件危险的事,因为他们有可能被抓走。他们的钱、衣物和被褥都可能被抢走,或者如果(日本兵)问他们要女人而他们有时,就有可能受到伤害。究竟该做什么很难知道,但我们会尽力想办法。士兵们如此不负责任地四处纵火,任何不测都有可能发生。西姆丝的缝纫机不见了。我找到了一小盒机器设备。钢琴,如果她有的话,也没了。昨天罗伯特的钢琴还在那儿,但他们的电唱机不见了,唱片撒在地上成了碎片。他们的地毯和樟木柜(里面空无一物)还在。我本想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一起带过来,但我们没有交通工具,就算能带来,我也不知搁在哪儿才算安全。若我们能带些仆人去,我们就可以把东西搬进一间屋子,再把它钉死。现在这样做已经没用了,没人守在现场仍是不行。过会儿我得去金大主持聚会。今天我们学习《马太福音》第 20 章。我听说“阿非司”号明天上午要回去,所以所有的信得今晚 9 时前送到大使馆去。马吉和我都很好,克拉也好,但他得流感病了几天。我很高兴为基尔默开那个意外的晚会,他当然表现得相当勇敢。关于扬州的消息令人不快,但我们得静观事态

发展。没什么大不了的,要被他(指上帝——译者)接受,就得保持平静满足……今天金大的聚会很好。马吉马上要把信带去大使馆。我们知道星期二还有另一个机会发信。

1月28日,星期五

马吉今晚把信送去了大使馆,还带回了一大包邮件,我现在才看完,已是11时了。他还说我们最迟可于明天9时收到所有的信。今晚我们得到的这些信一直堆在南京的一角,日本人刚找到。包括你从汉口写来的信,家里来的信,还有K. P和斯蒂文的信以及你上周日写的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允许一些人去其他地方却硬是不许任何人进入南京。费吴生急着要去上海,他的牙齿及其填充物都要掉了,但他获准离开,却不允许再回来。他试图耐心一点。我希望斯蒂文能回扬州。下关木材进出口公司的一个英国人已经回来几天了,但克拉报告说,他收到一份最后通牒明天上午之前得离开。但这个英国人说不可能,因为他的汽车坏了,他们让他把车修好再走。据今天1时的电台广播,日本已对阿利森事件发表了声明。今天下午在金大的聚会非常好,人们听得很专注。陈教授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一群年轻人和姑娘们学习两小时的《圣经》,他希望马吉和我以后能为他们施洗。今天下午我的经历颇滑稽。我刚准备走进金大校门,一个年轻人看见我,用明显的扬州腔调说:“洋鬼子,哦,我是说,外国人先生!”

我们当然很高兴能不时得到物资补给,我们非常喜爱那些糖果,两听烟草使我的烟斗总装得满满的,在这动荡的日子里,它给我以极大的安慰!

1月30日,星期日

昨天没有机会写信,星期五的信实在让我高兴,以至昨天我又全部重新读了一遍!上午,我带了一个仆人去医院,舒尔兹先生留下的一个老看门人在那里帮忙照应。趁着等医生检查他的病情时,我去了校医院办公室,鲍尔小姐在那里主持一个声讨大会。因为过年,她想给护士们加顿餐,就让厨师去买了些猪肉,他花了4.5元买了9磅。回来的路上

他被一个日本士兵截住要他买的肉。他抗议说他是给医院买的，得送回去，于是他们给了他6角钱，把肉抢走了。这种事常常发生，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都怕离开安全区，尽管安全区内也可能发生这些事，而且日本人正在逼迫平民离开。事实上他们通过“自治政府”颁布了“最后通牒”，要求人们必须在2月4日之前离开难民中心，否则就用武力驱赶。提到这里，我要说刚刚发生的另一件事，那个被日本人抓住当翻译的金大附中学生的妻子，或遗孀？她丈夫被一个日本领事馆警察抓去审讯，他一直没回来，我们想一定是被处决了。这位妇女准备去难民区外的一个地方买点东西，那儿被日军指定为平民居住的安全地点。但她和另外19位青年女子被路过的日军拖进一辆卡车，带进一幢军官使用的大楼。一位被迫为军官服务的中国人悄悄告诉她，她惟一逃脱的办法就是迫使自己呕吐不已，她照办了。于是她得以逃脱了比死亡更可悲的命运。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都不敢回去。昨天一个女孩子被拖进17号对面的一间棚屋，被三个路过的日本兵蹂躏了一个多小时，想象一下当日本妇女的丈夫们染上各种(性)病回去后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

昨天上午，我和麦卡伦先生一起去圣保罗教堂，一切都和我上回去那儿时差不多，有传闻说这儿要作为被士兵保留的特殊地带，我们也许不能再回去。返回的路上我们经过江苏银行，克拉和桑格林先生住在那儿，他们的办公室也在那儿。有人往一辆卡车上装楼里搬出的家具。我告诉克拉，他下午跑去看，发现许多办公室和房间里的家具都不翼而飞，他们的两把舒适的靠背椅也被搬走了。此刻虹口和闸北的“二手店铺”一定是生意兴隆！昨天下了一整天大雪。我在17号度过了一个舒服的夜晚，早上7时回来吃早点、换衣服。我在25号布道、主持晨祷，蒋牧师则主持了圣餐礼，参加的人很多。午饭后我又回25号参加我们刚给小孩子们办的一所主日学校。来了约16个孩子。邵小姐给他们讲幼儿摩西的故事，董保罗主持礼拜并教了几首儿童歌曲。上回我去圣保罗教堂的大厅拿了一些写在布上的赞美诗，以前在那儿的孩子们用过，还有悬挂赞美诗的木架。在日校大楼里，我们也抢救了一些赞美诗和图片，所以感觉设备还算齐全。

马吉和我应邀参加一个新年晚餐(年夜饭)，还有25号和17号的难

民在一起,他们都是从我们粥厂拿食物(也有许多人自己做饭)。把所有的食物围成一圈,摆在 25 号的地板上,我们围坐着或跪在坐垫上吃。为了节约大米和钱,人们每天只吃两餐饭,他们主要吃素食和稠米粥。管理委员会要求允许给他们吃干饭,额外加一碗其他食物。马吉立即答应了。另外我以我俩的名义捐了 5 元钱,马吉以他和菲丝(马吉的妻子——译者注)的名义也捐了 5 元,这样他们就都可以多吃两道荤菜。晚餐颇丰盛,来了约 50 个人,每个人都尽情地享用。很幸运,至目前为止,我们之中没人染上重病。来自青浦的 15 个难民孩子看上去挺健康,脸儿红彤彤的,让我想起丹尼尔和他那 3 位爱豆子胜过爱宫廷的美酒佳肴的朋友。我们不能让年轻人缺乏营养,除非能为人们弄到更多数量、更多种类的食物,否则情况将十分危急。他们习惯吃的食品短缺且价格昂贵。鸡蛋,如果买得到的话,每个得要 8 分,肉类,按其成色,一磅约 5 角,鱼约 7 角,鸡鸭按大小约 1.5 元,包括这些在内,所有的食物都非常少。城外渐渐有人试图将更多的食物带进来,但如果他们运进或购买食品,极有可能被日本兵抢去。每天都有事件发生,但上帝一直眷顾着他的人民,我们深深感激他的慈爱……告诉家人,他们可以用我提供的任何消息,但要小心,不要把我的名字和任何令日本人反感的读物连在一起。不是我害怕,不敢承认我写的一切。但我讨厌我的作用会受这些出版物的影响。我打出了父亲信中有关外界对南京情况反应的摘录。贝德士建议我这样做,因为有些外国人在这种紧张生活的压力下需要一些鼓励。费吴生星期六乘“蜜蜂”号去了上海。他的牙病犯了,还有人说他得暂时换个环境。他希望下周乘“瓦胡”号回来。他没有军事通行证,日本民事当局觉得他可以坐美国大使送信件至下关的往返船只返回。马吉就想明天以这种方式去下关。新闻的报道对日本不妙,对吧?他们发现中国游击队正在作战,黄矛会(Yellow Spears,疑为红枪会之误,译者)、大刀会很活跃,他们不但杀死日军,很多人在交战中受伤以至战死,而且极大打击了(日)军的士气,我听到了确切消息,他们对这些亡命之徒怕得要命,对他们感到带迷信色彩的敬畏,他们自称刀枪不入,并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对上帝、人或鬼都无所畏惧。这种持续性的骚扰使日军得分散兵力,从而多次延误战机,使军队不可能对一个确定的目标采取

一致行动。这就使中国军队能重组队伍、巩固阵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毁灭日军的狂妄自大。如果他能去那儿,我想知道李在无锡和斯蒂文在扬州的情况如何。我想李前不久做的手术已恢复,我希望他健康,再坚持一个月。

马吉和我给模范村的难民分发了同样数量的(食物),他们没有粥厂,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用钱的。

2月1日,星期二

刚刚听说必须今天下午4时以前把邮件送到大使馆。幸运的是,我的感冒已经好多了,昨天不必卧床休息。大约在11时,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要我去看他们收集的几架钢琴,辨认其中是否有属于圣保罗教堂的两架。但是没有,这显然使某些宪兵不悦,他们私下说我是企图拖延以索取新钢琴。克拉与我同去,他懂得他们说的话。他们要我挑选两架钢琴了事,但我拒绝接受显然不属于我的东西。在我报失以后,他们开始搜寻钢琴,他们坚持说我应该说明钢琴的确切号码及其生产(厂商)等等。他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诈骗贼帮。

昨天马吉获准偕同比舍普立克先生(瑞记行经理祥泰木行的美籍人员,经许可返回南京)前往下关,去视察那里的教会产业。他发现其境况甚佳。那里曾有若干抢劫,但不如预期为甚。一些房间和私宅没有像到处发生过的那样被破门而入。我们的两把扶手椅仍在那里。两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仍在马吉房屋的主室,另一具尸体在院内。由于是旧历新年,有些日本兵也决定庆祝。他们于上午来到17号和25号,当时马吉在那里,日本兵似乎高兴过了头,令人无法相信。日本兵昨天有所收敛,所以我出去了,幸好没有日本兵进来。昨夜我在10号就寝,今天感觉不错。

今天上午我参加难民中心主任会议。目前在这些中心约有58 000人受到国际委员会照料。这些中心全部在安全区内。考察他们如何分布是有趣的。36 271人或62%在美国产业,601人或1%在德国产业,17 900人或31%在中国政府产业,3 139人或6%在中国人的私人产业。日本人坚持这些难民必须在2月4日以前从各个中心搬出,否则将强行

驱出。相关通知已张贴在各个中心。有些难民开始迁移到日本当局划定的安全地区。但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实际上每个难民营主任都报告了导致难民重返中心的事件。妇女苦于日本兵强奸而男人则不堪其劫掠。自1月28日难民开始返回以来,仅金女大就发生40多起确凿无疑的案件。其他中心也报告许多案件。这些报告全部送交日本当局,说明他们没有履行保护回家难民的承诺。

就在5分钟以前,马吉和我被叫到邻舍,那里有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把一个少女关在房中加以强奸。我们打开门把他们赶出去,把其中一人交给正在邻街值勤的日本兵。我们听说东京派来视察南京状况的高级军官今天到达。他将在此停留两天,但三国使馆希望携带保存的所有日军暴行(记录)与他会晤。我们饶有兴致地听见广播报道东京已为殴打阿利森领事表示道歉,这说明他们得正视有如“帕奈”号那样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许有一天他们将会相信,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的军队不是那么太好……现在马吉要我为他打印几份有关日军进入大学医院施暴的报告,他曾在现场摄影。我将随信附寄副本。

2月3日,星期四

这封短信写于我去17号之前,希望明天比舍普立克先生能带走它。我写好了一封长信,但想到用别的方式可能更安全一些。

比舍普立克开车走,谁也无法预料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我只想寄几行字告诉你我们安好。许多人按上面发布的命令回到自己家里,但我们还未解散,因为拿不准我们是会一起住在下关还是住在城南,一个在城外,一个是为军方设定的区域。今天下午我在圣保罗教堂,带了四个仆人,已为他们从美国使馆取得通行证,说他们是派去保护我们产业的。我们还得往返两趟,因为小汽车一次塞不下所有人和他们的被褥。当我们到达教堂驻地,我发现街边排了长长的一列军用卡车,约有一个街区长。在我们驻地,12至15人一组的士兵正在吃东西。他们在教堂大厅外的草坪上生了两堆火,还把一个沉重的柚木做的牧师座位拉出来,上面架着铁条,铁条上悬着米桶。这把木椅背后有一片木头被砍了,正面的一侧也被削了。还有一些士兵在室内或通向公馆会议室走道的地板

上生了火并围坐着。另有一个士兵在守门人的屋子里烤食物，也在地板上生火。我把所有的士兵都赶了出去，并让他们抬水把火浇灭。但我已有足够证据让自己相信，上周这幢大楼的其他部分曾遭受怎样的厄运。我把这事报告给阿利森先生，他准备今天下午去日使馆赴晚餐时面陈此事。我也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给他。在我抗议坐在火边的士兵时，另外一人从教堂后面过来，手里是几把很好的椅子，我想他要么是准备拿走，要么是用来当柴禾。现在我们就在那儿安置了四个仆人，两个在教堂区，两个在住宅区。我还看见一个酗酒的日本士兵在罗伯特的钢琴上取乐，我也把他赶了出去。我已让仆人尽一切努力守住入口处，把房间地板上的零碎物品和所有家具放进一两间屋子以便看管。天又阴又冷。下午开始下雪，地非常湿。

上午我送一些妇女去医院治疗，还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美国使馆。我听说新的卫戍部队司令与他的前任个性截然不同。他原来掌管镇江一带，当他调任的消息宣布后，中国人都恳求他留下。还有日高先生，他是来接替川越大使的。中国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所以我们都祝愿总体情况会有所改观。你上月寄的袜子、钱和信仍然不见踪影，恐怕我们得和它们吻别了。广播里提到大运河畔扬州的战况，我不知那意味着什么。我问阿利森我是否有可能获准去镇江和扬州，他对此不甚鼓励。我的感冒已经好多了，只需运动一下便可痊愈。我想你大概有机会见到费吴生和克勒格尔吧，我们听说有个商人从南京回上海，并给一群人讲述了一些这儿的状况。你在那群人中吗？我们明白下封信得等到14日才能到。日子真够长了，不过总比压根儿收不到信好。

2月4日，星期五

又有机会再给你写几句话，今天比舍普立克先生还不走，因为又是个湿冷的雪天。一大早就送一位妇女去医院，回来又去25号带另一位妇女，途中去美国使馆为我们派到下关和CTS守护财产的仆人们拿证件。她们在医院治疗时，我又去了圣保罗教堂，昨天留在那儿的仆人们昨晚平安无事。今天中午马吉和我应邀去住在17号的圣保罗教堂

的一个成员家里进餐。算不上赴宴,主要吃一种时令小面饼,有些里面塞了肉末,有的塞着青菜,有些塞着糖果和碎果仁。有的是煎的,有的是煮的。今天是难民中心的人们必须搬回城市其他地方的日子,据说不愿自动搬出的人,(日本兵)要用武力胁迫他们搬出去,但我高兴地说,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去了几个收容所,一切都很平静。

2月12日,星期六

马吉去国际委员会开会,在我等他回来吃晚饭前,我有一点时间给你写信……昨天一天,马吉都忙着把信件准备好,让比舍普立克先生带走。通知我们说得4时以前到使馆,但马吉让我亲自把一封信送给比舍普立克先生,并请他把马吉在上海的影片拷贝一份。马吉要在金大的查经班讲课,比舍普立克先生和德国使馆的罗森博士在一起。我到那儿时他们正在会晤刚到南京访问的一位法国军事参赞。比舍普立克先生说他很乐于亲自把信送到,他就住在豫园路,与你的住地不远。你有机会见到他,这真是太令我高兴了!所有的信我们都没有贴邮票,我想你也许想增加一些内容,反正你总会读它们。写给上海朋友的信,你大概能帮我去发了。马吉开完会回来。费吴生也在会上,我想“瓦胡”号是下午3时到的。我收到一封贝蒂写来的信。既然你没读过,我猜想是否还有别的信你没有收到。你上封信说你会将信件通过“瓦胡”号送过来。马吉非常失望,因为这一回和上次“蜜蜂”号来,都没有菲丝给他的信。明天我们又有机会发信,基尔尼神父将坐法国轮船回上海,我想他是昨天才来的,每次有机会收发信件总使我们欣喜万分。我总算把我们留在扬州的家具等清单列出来了,随信我还寄了那个黑色笔记本。车尾箱里的东西还未列出,我想你得凭记忆把它们记下来。我还没来得及核查西蒙小姐和罗伯特的东西,希望尽快去做。昨晚我去17号过夜。今天上午,马吉、我和我们的一些中国同事一起商量难民回家的事。他们看来一点也不想如此,恐怕除非我们先做到,否则无法让其他人都回家。近来我常常想,也许我该搬回圣保罗教堂,还可以带上愿意和我同去的人。下关在城门以外,很麻烦。我考虑的问题是,我若搬回是否还能像呆在这里一样发挥作用?我想

除非试一试,否则不会有答案。今天我就此事问了米尔士先生,他觉得我若能在城市的一端看护财产也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的恢复委员会将建立第一个救济办公室,地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中华路的圣公会建筑。也许我能去那儿帮忙。另一件事是交通问题。我的自行车天气好时还凑合。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试。我讨厌看到人们返回各自的地方时,所有的教堂都大门紧闭。我的前往会给回家的人们带去自信。我想我应在那儿过夜,但仍和马吉在10号吃饭。这样我就能有机会判断形势,看这样做是否值得。我希望你和贝绥·西姆丝能很快回来。我们见面的那一刻将多么令人激动啊!

今天下午我们恢复委员会开会讨论可能的财政预算。我们希望为这项工作筹到10万元,用来帮助人们修缮住房以重返家园,给寡妇孤儿与极端困苦的人们发放救济金。我们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听说费吴生在上海为救济工作已筹得一大笔款项,这真是太好了。一直没工夫去见他,希望明天有机会。你在上海见到他了吗?马吉的影片效果这么好,真把他乐坏了。使馆好几个人都想要拷贝。罗森也要了一套打算送给希特勒看。我给你寄的一卷胶卷中,我想有斯蒂文在扬州拍的我们的房子。要是我记得把相机从17号带过来,我会再寄给你一卷,里面有在17号对面的寺庙人们被杀害的照片。你能否再给我寄些胶卷来。我可能还会拍些有意思的照片。我还寄去了一些我在箱子里翻到的其他几件小东西。东西乱塞在箱子、抽屉里,不记得在哪儿,可真是头疼,我希望一切很快会理顺……克拉和辛德贝格今天上午从栖霞山过来,吃过中饭又离开了。辛德贝格认识桑格林和苏尔先生。从我们上次去那儿到现在,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是吧?(11月2日从上海到扬州)。今天下午有中国飞机光顾。日军用高射炮反击,噪音不小,但都没命中目标,所以没造成什么损失。春天很快要来了,我在想现在是否应该在圣保罗教堂的花园里播种一些蔬菜种子。这样做不一定有用,但也许是明智之举。你能否给我寄些种子来?我想金大这儿估计弄不到。我刚刚把今晚广播里的新闻打出来,好把它送给其他的人,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读,以至我一出现他们就把我包围了。明天我要为隔壁陈先生的信徒们布道,现在我得去睡觉了。

2月13日,星期日

不到一小时信就会被送走,我再加写几句话。今天上午的礼拜很好,尽管下雨,参加的人仍很多,而且大家从头到尾都听得很专注。我给他们宣讲使徒书信。我又和马吉谈了搬回圣保罗教堂的事,他觉得这主意很好。我们还是会在一起吃饭。他要一直呆在舒尔兹先生的住宅,直至下关情况好转为止。我打算这周就搬,我想起你可以给我寄几听香烟,我好发给随时进来的士兵。用最贵的牌子。马吉和我都好,都挺忙。我很想去扬州我们的“老屋”呆上一周,请代为问候所有亲友。

[RG8,B263—5。福斯特致妻子函前面的数段文字是由福斯特夫人所写,记叙了她离开南京前的一些情况,用仿宋体字排出,以示区别。]

2. 致家人函(1937年12月7日)

四条巷10号

鼓楼,南京

1937的12月7日

亲爱的家人:

上周末能给你们写信,这周我尽量补上,请原谅。上周非常忙,最后我们总算把家当从下关搬到上述地址,这是一位德国人的宅寓,他请克拉丽莎登上德使馆为其国民包租的轮船前往汉口。一位被我们称为克拉的俄国人(他的真正名字太难念)在为舒尔兹·潘亭先生照看房产,你知道我们下关驻地在北面的南京主城门以外。我们实际距城门仅一步之遥。在日军兵临城下,形势日益紧迫之时,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信徒一起搬到城内,以防万一城门突然关闭,我们被关在外无处可去。德士古公司的经理汉森先生好意邀请我们及我们的人去他的公司所在地。那正好是在国际委员会为保护无法撤离南京的平民

而保留的安全区内。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和信徒,所以决定让他们搬进来,安顿在这里。其他地方都挤满了,马吉和我便住进这幢房子,以便我们开展工作时有更多自由。这样我们也就安顿下来。我们忙着尽量把更多的东西搬过来,因为若是中国军队真要守城,我们在下关的住宅肯定会遭炮弹光顾。要把所有的东西收拾整理好真叫人手忙脚乱。我想以后我若不能再当传教士,我就出去给人打工做搬运工!从我们得到的消息看来,日军很快就要到,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方面会怎样抵抗。他们肯定在为防御做准备,但究竟能抵抗多久却没有把握。上海附近,他们的伤亡十分惨重,其中还包括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那些参加保卫南京的要么是战斗力不知如何的新兵团,要么是已参加过好几次战役的老兵。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我们确信他会实现他的目标。是他召唤我们来到这里,日复一日地交给我们任务去完成,我们毫不怀疑地信任他会自始至终地眷顾我们。对于我们的中国信徒来说,这是极大的安慰,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无处可去,还有一些人是从被炸被毁的地方逃出来投奔我们的。没有人抱怨什么。他们在现在住的房子里垒起了一座圣坛,每日早晚在那里祈祷。马吉在那里主持了圣餐礼,那时我在圣保罗教堂也进行了同一仪式。在圣保罗教堂参加的人不是很多,但在这种时刻能有这么些人已经是很令人振奋了。去教堂的路上我们遭到空袭,得跳下车躲进掩体。这辆车是无锡那些人前往上海时留下的,现在我们意识到它珍贵无比,因为南京城非常之大,而三周来几乎所有的汽车、人力车都停了,而小汽车又雇不到。下周便是决定城市命运的时刻。我们希望尽快结束,好让一切恢复正常。今天下午我骑车去圣保罗教堂,城市一片荒芜,只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人。

我们救援伤兵的工作总算有了一点点成果。以前士兵刚到达时火车站的情景实在是骇人,请来工作的人压根就不见踪影,伤兵有时几天都无人过问,无人为他们包扎伤口、供给食物。我们亲自到那儿帮忙。我们的这一举动总算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采取了措施,现在那里一天24小时都有医生和护理人员,伤员被迅速送往医院。现在从那边来的人已不多了,因为战线已经这么近,无法继续使用铁路。马吉遇见一位与中国空军打了四年交道的美国人,他刚从上海回来,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才到这儿。他是乘一艘小船来的,

他说扬州到处都是从镇江撤退的中国士兵。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房屋已被他们占领了。我们的中国牧师寇先生写信给我说,扬州地方官员已两次试图把马汉学校的建筑作为江苏省政府所在地,我们当然拒绝了。若答应了就可能牵扯到我们的政府。我们允许难民和伤兵使用我们的房屋,但不许用于军事或政治机构。如果他们强行占用,我们也没办法。我从寇先生处听到最后说法是建筑未被占用。南京已收不到邮件,我们与外界隔绝已有一段时日了。信还可以发出去,我每天写信给克拉丽莎,用航空信发到汉口。我只收到她一封来信,告诉我她于感恩节当天中午安全抵达。没有收到她其他的信。上周她总算拨通电话打来长途,说她很好,收到了我的信。这真让我高兴。她每天上午都在语言学校学习。在南京的经历使她意识到掌握中文是多么必要。我很高兴她能和其他人一起学习,这比一个人学习更容易、更有规律。她和得克斯特小姐住在一起。一天,大使馆打电话说国务院询问克拉丽莎在汉口的计划,所以我想你一定收到了我通过大使馆发出的电报,上面提到她会离开汉口。我想她在那儿会很好的,如果她得离开,她会和其他差会人员一起在适当的时候走。她可以通过香港去上海或向西随西迁的中央政府进入四川省。无论如何,我觉得没必要担心她的安全。

有一些中国人仍留在南京,大部分人对各种活动或人员负有责任。委员会努力使战事发生时双方都尊重“中立区”。金陵大学医院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正英勇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其中有两位外国医生,一位中国医生;两位外国护士及几位中国护理人员。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缺乏人手已使他们疲惫不堪,中方管理者及 49 位其他医护人员都已撤往汉口。这是我们必须忍耐的伤心事之一——那么多这里亟需的专业人员都撤走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许多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英勇行为。我们意识到基督关于被雇者与好牧羊人的故事是多么真实可信,我们更加理解了为他人而牺牲自我的含义。

我们希望你们一切安好。并向你们致以最好的祝福和深切的爱。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福斯特

[RG8,B263—2。]

3. 致朋友函(1938年1月14日)

南京

1938年1月14日

亲爱的：

自从我上次写信给你，一周又过去了。这封信是让你放心，我仍然很好，谢谢你的来信和关心。由于美国使馆的善意帮助，几天前我给你发了电报，刚把电报发走我就收到了克拉丽莎给我写的几封信，说她已从香港安抵上海，这是自她离开汉口后我第一次得到她的消息。得知她与上海我们差会的人员在一起，并一切安好，我感到很宽慰。她在这些我们被迫经历和目睹的艰难困苦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她在信上说她已收到你寄的好几封信，她把这些信都保存在上海，等到她确信没有困难时再寄回南京给我。她给我寄了父亲12月12日写的信，还有贝蒂和索菲亚为我的生日写来的信。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父亲写的诗非常好。她还寄来你圣诞节发的电报，所以你看，当所有这些邮件送到我手中时，我拥有了如此之多的圣诞礼物。

我们仍被困在南京城里，允许通航的河道极其有限，我们听说铁路刚开始被军方使用，日军在用公路和飞机。但没有军方许可，我们哪儿也不能去，而这许可又不是现成的。上周，美、英、德三国代表获准来南京。我们当然非常高兴见到他们，总算能和官方人员打交道了。日本当局由于他们的士兵肆意抢劫焚烧而丢脸、丧失体面。尽管有日本官方和外国使馆的告示，并已贴在市内外国房屋及财产区，士兵仍继续抢劫。通常是使馆官员在这些地方巡视时当场抓住他们，这样他们就无法抵赖（他们过去总想抵赖），说抢劫与焚烧是中国士兵与平民所为！但从总体上说情况有所好转，许多队伍已撤至其他地方。但我们仍然感到让人们回家不安全（假如他们的家还在）。或让我们照顾的这些人留在德士古石油公司的几处产业和其他地方。我们当中有一人仍在白天执勤，一人夜晚在一处房产值夜。城市大片的地方被烧毁，每天都有纵火事件发生。

我没有得到有关扬州命运的消息,只知道那儿有战事,城市已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我不知道他们对待那儿的平民是否也像这里一样。我担心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大主教已令格林先生、菲尔德先生和布里默小姐前往上海,他们已于11月底安全抵达。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个外国人留在那儿,是南浸礼会的斯坦普斯先生和X(原文不清)小姐。他们拒绝离开。

至今我们这儿冬天的天气比较温暖。8日左右的几天很冷,这是中国农历的“小寒”。“大寒”约在20日。计算得这么准确真是让人感到吃惊。“大寒”过后寒流退去,春天日渐临近。令我们高兴的是,总的说来天气较为干燥,不然的话,成千上万难民的苦难将更为深重。除非正常秩序能有所恢复,否则今冬明春我们面临的形势将极为严峻:这么多人除了他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外一无所有!他们的家、做生意的地方、他们的财产都没了,而且现在没什么工作机会或回到以前的地方重操旧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租金收入生活。现在他们已持续好几个月收不到任何租金,因为他们用于出租的房屋已被大火焚毁。我已被要求参加恢复委员会,其目标是调查经济情况,可能的话给人们提供必需品,帮助他们寻求谋生之道。数以千计的人被士兵抓去枪决了——通常是最野蛮的方式——他们被怀疑是以前的士兵,但由于法官和陪审员都是同一伙人,他们往往不过是个陆军下士或中士,你可以想象无法计数的无辜者都被处死。现在这种事情已比城市刚陷落时减少了,但仍在持续。太可怕了!任何(日本)士兵都有权力决定(中国)人的生死。

昨天我为我们的福音传教士:汤山的卢先生举行预备葬礼。汤山是圣保罗教堂的一处农村布道站。卢先生对在南京、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绝望,12月31日投水自尽了。我们曾试图劝说他,但没有用。几天后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后来又将他棺葬了。这很悲惨,在我们目睹的众多悲剧中又增加了一个。

我想克拉丽莎会给这封信加些内容,我打算把信寄给她,再让她从上海发出去。这儿邮局已经停业,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寄信给你。她在上海很好,请不必为她、为我担心。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呆在一起!我大概

可以从这儿出发去上海,但可能就不能再回来了。

现在我感到这儿非常需要我,我不能离开,但我肯定,上帝定会安排时间让我们团聚。上海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救援工作,她当然会去帮忙。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上海的人也和我们在哪儿差不多,被困在城内,不能随意离开上海进入内地。

我希望收到这封信时你们一切都好,我常常想起你们,请不要过于担心。祝福你们,爱你们。

厄内斯特·福斯特

[RG8,B213—4。原文未注明收信人。]

4. 致家人函(1938年1月21日)

南京

1938年1月21日

亲爱的:

这封短信只是让你知道我仍安好。一两天后又有机会送信到上海,所以我把此信连同申请函请克拉丽莎转发给你。很高兴昨天下午通过国务院收到你的电报,得知你已收到我10日发出的电文,知道你们都好。这真让我高兴!我希望祖母和杰鲁德阿姨也如所期望的一般健康。

近来这儿没什么新闻。情况和以前差不多。自南京被占领后,(日军)暴行仍在继续。当局正要求人们重返自己的家,但没什么成效,因为许多人已无家可归,回家也十分危险。一批部队撤离后,又会有新的队伍替代他们,所以艰难困苦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说,形势有所好转。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因为许多人已用完了他们带往安全区的食物和钱。交通、商业完全停滞,他们无法得到任何补给。昨天又下了一整天雨和雪,天气又阴又冷,和以往这个时候的天气一样。但总的说来今年冬天比较温和,对此我们真是心存感激。

很高兴得知共和党议员汉密尔顿·费希在国会对海军拨款法案做了修改,呼吁召开海军限制国际会议,现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措施不免有些迟,但对此最好还是持乐观态度。它毕竟于事无损,也许还能作为准绳使这个古老的世界免于陷入混乱的深渊。

我不必向你讲述军事情况,因为你可能从收音机和报纸里了解得比我们多得多。更不必说我还没有收到你、父亲忠实地每周写给我并寄往南京的任何一封信。大概信件都滞留在上海,很可能克拉丽莎已收到了。我们听说下周二可能有艘英国船来这儿把信带来。能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和你们的情况是多么好啊!

从1月10日收到信后,我一直没有克拉丽莎的消息,不过我想她一定很好,不然使馆会发电报来的。什么时候我们能聚在一起尽情叙谈,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日子啊!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

给你们我的爱

[RG8,B263—5.]

5. 致家人函(1938年2月10日)

南京

1938年2月10日

亲爱的:

我上周写的信未能如愿发出,所以我这周又补写了一些新内容,明天下午一起送走。昨天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一天,因为我收到了从上海带来的克拉丽莎和你们写给我的信件:有妈妈1月11日写给克拉丽莎的航空信,爸爸的第52、55和61号信,以及爸爸51、60、61号信的复印件。后面这几封信是1月初写的,你瞧,还寄得挺快的。我们非常高兴了解到你们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如以往一样你们欢度圣诞佳节。我们也高兴地收到贝蒂12月29日的信。克拉丽莎在信上说她又收到了更多的信,并将很快由下一趟来这儿的船捎给我。所以我未提及的那些

信,你们知道我暂时还未收到。

爸爸,你问在空袭期间我读了哪些诗篇,我记不确切,但第 46、27 和 71 篇我的确读过,你猜对了。我还给你寄了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做的两次演讲的复印件,我想你会感兴趣。他思维敏捷,曾在困境里给南京市民们无尽的帮助与关爱。他是英勇无畏的,你可以从他的两篇演讲中看到这种精神。

你从新闻影片中看见我的照片,这可真有意思。其实我本不该在照片中,因为我不是为安全区设的国际委员会执委会的一员,我只属于分委会。但门肯先生坚持所有那天上午出席的外籍侨民都一起合影,马吉那天没去,所以照片中没有他。我们也饶有兴致地收到有关美国公众态度改变的报道。我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战争。这儿尚未发生任何需要(美国)迈出这一步的事情,但我觉得如果英国和美国采取其他措施——例如经济或政策压力,那么日本就不敢肆意妄为。这种行动其实早在 1931 年日本刚刚开始疯狂进犯(中国)时就应采取了,事实却是当时的疯狂导致了今天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俗话说“上帝要人灭亡,必先叫他发狂”一点也不错。假如外国势力立场更坚定,假如满洲里的国联调查委员会明确宣布日方是错误的,那么过去 7 年的历史就会大不一样。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能只顾自己,希望上帝之国的行为准则使它们之间的关系生效。

罗伯特主教这次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让我参加他 1938 年的顾问会议,但我想除非能自由往返南京和上海之间,否则我是没法去参加会议的。从目前军事当局的情况看来,似乎不太有这种可能性。由于我们目睹了他们的丑恶行径,他们已在公众舆论面前丢了脸,他们显然十分不悦。日本人比中国人更不能容忍批评。例如,有一天新来的指挥官请几位外国外交代表去日本使馆喝茶。他给他们朗读了一篇很长的日语演讲词,由使馆的一位秘书翻译。演讲中他提到日军在世界上享有纪律严明的良好声誉,在中国华北根本没有不幸事件或暴行。这种事发生在南京的(他不得不承认的确发生过!)惟一原因是这儿的人对抗某外国国民的调查(指我们)。他的演说旨在驳斥并为整个事件做辩解。后来外交代表们找他要一份他的演讲词时被当场拒绝,他说这是即兴发言(事

实上是照原稿和译稿念的)。上周一为日本死难者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据说这是日军最肃穆的仪式之一,在这种场合,任何一篇演讲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地区的日军统帅松井将军做了演讲,他强调了日本军队在此地区保持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绝对必要性。我们又一次证实从最高当局来看,迄今这种纪律与秩序尚未被遵守。

这种厚颜无耻竟出现在日本高层人物中,尤其是当真相以无可辩驳又令他们难堪的方式返回给他们时,如枪击英国大使、杀害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帕奈”号事件、闸北及南京的暴行等,这一切不得不使人怀疑日本人的智力,怀疑他们对外国人的心理完全缺乏理解,无疑是出自于他们的极端无礼和狂妄自大。

在实施军事当局下达的命令时,许多难民搬出了安全区,住进军方为他们划定的区域。那些返家难民的种种遭遇使他们不能再去相信(日军)许下的保证他们安全的承诺。我们的信徒群体尚未被打散,但可能很快我们也得解散,现在我们在差会驻地上已安置了仆役,以免剩下的物品再遭日军焚烧或市民抢劫,那些平民想重新开始生活。我可以高兴地说,迄今我们的仆役未受骚扰。我想日军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十分过分,他们与其他国家为敌,终将导致自己日益孤立。他们已干了太多坏事,该停止了。

我希望收到信时你们大家都好。马吉和我都好。白天越来越长,阳光越来越耀眼、暖和,我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罗伯特主教让马吉和我尽可能久地呆在南京,因为现在南京的这个外国小团体已成了除上海之外仍坚持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惟一途径。我们的休假计划目前暂时搁置,看看事态发展情况再定。我们中有一些人要回国去设法筹募救济基金帮助中国人。

爱你们,给你们我最好的祝福。

福斯特

[RG8,B263—6.]

6. 致主教函(1938年2月10日)

南京

1938年2月10日

亲爱的主教：

很高兴昨天收到你的信，从中得知了许多有关教区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家人的消息。我已把你的短笺交给了董保罗，他得到姊妹和未婚妻的确切消息之后心里宽慰多了。我也把你的另一便笺交给了盲人蔡，我们从普通基金里拿出一部分经费照料他，现在他不愁用度。他自丢掉饭碗后十分艰难，我希望他能重新开始生活，并能做点事情以打发时光。

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去查看你的财产清单。现在有两个仆人住在住宅区，两个住在教堂区。我几乎每天都去查看他们的情况，迄今一切都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想方设法阻止(日兵)进入驻地。在教堂区，三扇木门都被炮弹炸坏了，门口通道和院墙也被损坏。日本兵在教堂南端的墙上开一个口以便他们从居住的中国饭店那儿进来用水井。后来这堵墙剩余的大部分也倒塌了，我们得重修它。困难是得找工人，还得找材料。就在日军进城之前，隔开你的院子和饭店的那堵墙塌了一部分，当时没法修复，我们暂时用竹篱替代，饭店未被占领，所以它还凑合。我想你的大部分家具以及书籍都还在。可能的话，我很乐于把它们寄给你。军方要求人们返家。我们也觉得此为明智之举，因为城市卫生情况极差，仍有一些尚未掩埋的尸体横陈街头。无法将粪便清理出城，天气越来越暖和，我们极有可能面临各种流行性疾病。人们集中在各个难民中心，聚集的人口使疾病的流行变得更为致命。而他们回家后，人员分散则可以避免这一情况。不过这样一来，进行调查和帮助救灾工作的难度就增大了。我们的恢复委员会正在开展这一工作。我们在人们返家的各个地区都设了办事处。中华路的圣公会建筑里就设了一处，双塘的长老会建筑设了另一个办事处。我们还拿不准马吉是否能搬回下关，尽管那儿是被指定人们可以返回的区域，但

守城门的士兵可能为难(而且已经为难)老百姓。我们在市内的两处驻地正好在日军指定为他们使用的区域。在那儿自治委员会没有司法可言,但我知道如果人们愿意冒险也可能住在那儿。所以我们仍是进退两难,马吉和我还没决定这时我们是否该兵分两路——他去下关,我去圣保罗。他已写信告诉你们我们在这儿实施教会工作的机会,你将了解有许多事情等我们去做。汽车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我们被分散,而市内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的时候! 你知道这儿的距离有多远!

我想克拉丽莎已告诉你,如果对差会有利的话,我们愿意放弃今年的休假。如果有可能,马吉和我都愿意尽量在这儿呆得更久一些。我在考虑现在让郭先生去美国学习一年是否是件好事。他的家人现在在上海比较安全,他能平静地离开他们,他们也不用为他的安全焦虑。这一学期让他去学神学课程可能太晚了,但我理解他的动机主要是花些时间做考察和一些实践性的工作。这些他现在就可以开始做,并为秋季入学做准备,然后按时返回南京,这样我们就能抽身去休假了。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可能有一些我想不到的实际困难。

目前还无法为将来在南京的工作制定具体的计划。公馆除了剩下一些砖块,以及门卫住的小部分尚保存外,其余全被毁掉了。我们原来的选区是否还能归还南京很成问题,因为没有谁能预料城市的哪个部分今后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我想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形势也将决定我们从哪个方面着手工作,我毫不怀疑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得与寡妇、孤儿和其他穷苦的人们打交道。然而,我们面临的的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相信,上帝会赐予我们智慧去完成我们的事业。

致以良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

诚挚的
福斯特

7. 致美国大使馆函(1938年3月10日)

南京

1938年3月10日

美国大使馆

南京,中国

先生们:

以下是我作的有关属于美国圣公会财产被抢劫、损坏情况的陈述。我们的财产位于白下路209号和太平路□□号。前者是住宅区,后者是教堂区。我相信损坏和抢劫是由日方军事行动和日军造成的。

1937年12月11日,星期六,下午约2时。克拉·波德希沃洛夫先生和我骑自行车去上述两处。途中我们停在大学医院,那儿我们听到城南方向传来剧烈的炮火轰击声,我们也看见被炸建筑上方升起的浓烟。我们经过太平路上我们的教堂驻地,那儿尚完好无损,但我们去住宅区时,则发现院子的铁门已被一发炮弹击中,毁坏了混凝土门柱,铁门的一块被炸变了形。地上有炮弹碎片,还是热的。同时,街对面一家中国饭店被完全炸毁,两个住在被炸饭店附近的中国人告诉我们,爆炸是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发生的。

1937年12月14日,星期二。在拉贝、史迈士和一位中国人孙先生的陪同下,我又去我们的两处驻地匆匆看了一下。一路上都没有中国平民或士兵,只见日兵在太平路沿路闯进商店和民宅进行抢劫。在我们教堂的驻地内,我们看见一发炸弹击毁了大门,教堂大厅也被炮弹击中,损坏严重。圣保罗教堂的门、窗都被震碎,房顶上的砖也被损坏了。院墙和混凝土走道上被炸弹碎片炸了无数小孔。院子里的一座中式住宅也被击中,损失惨重,好几处房顶都塌下来了。一进入我们在白下路的住宅区,我们就发现那儿已被抢劫者闯入,尽管有美国使馆的官方告示贴在院门上,院子里还悬挂着美国国旗。我在以前罗伯特先生的住宅里遇见两个日本兵。他们手里拿着斧子,其中一个正从屋子里偷走一辆童车。我一出现,一个人很快溜走,另一人放下车也逃走了。但后来童车

和另几辆自行车还是被偷走了。

在院子里我还发现了一本相册和几件衣裳,表明这儿确实发生过抢劫。

1937年12月17日。我又去这两处地方查看,并在现场遇见日本兵,我把他们赶走了。他们随身带着斧头,住宅的门被砸坏,箱子、柜子被撬开,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日本兵住在圣保罗教堂附近的一家中国饭店。他们在分隔两个院子的墙上砸了一个洞。他们用教堂的井水洗蔬菜等。一个士兵在教堂后面磨刺刀,当我指出他无权擅入我们的领地时,他便从墙洞跑了出去。我看见另一个日本兵在抢劫我们一位中国牧师的住宅,这座住宅也属美国财产,且位于教堂大院之内。

1937年12月23日。我又去看了教堂大院,在那儿见到陈太太,她是教堂一位工人的遗孀,是个护士。她在教堂塔楼内避难时,看见日本兵进进出出地抢劫我们的财产。她目睹我们一位中国牧师住宅里的钢琴被抢走了。

1937年12月26日。我和陈太太一起去看了教堂大院,她想去看能否取回她留在那儿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钢琴已从我们教堂大厅搬出,放在中国牧师住宅附近的草坪上。

1938年1月10日。我和圣公会的麦卡伦牧师一起去看了我们驻地,他住在白下路我们驻地内的一处住宅。我们看到教堂院子里中式房屋的东北部已被炸毁。教堂大厅的钢琴还在,上次我已把它从草坪上搬到中国牧师的住宅内。由于置于露天及士兵的野蛮,钢琴损坏严重。我在白下路西姆丝小姐的住宅看见有个日本兵在抢劫,我把他赶走了。罗伯特先生房子里的瓷浴缸、几张床、所有床垫,还有西姆丝小姐的所有床垫都被抢走了。

1938年1月15日。我察看我们的驻地时,发现一个日本兵在罗伯特先生的房子里弹钢琴取乐。

1938年1月17日。我同戴籁三夫人一起察看,发现教堂大厅的钢琴(就是我从院子里搬进中国牧师家的那架)不见了。

1月17日至26日,我又去察看了几次。好几回看见有日本兵在那

儿,更多的东西被抢走了。

1938年1月26日,教堂驻地的中式房屋及其房内物品全被烧毁。

1938年1月27日,我和金陵大学的建筑师齐先生一起察看,发现中式房屋的废墟仍在冒烟。

1938年2月2日,我又察看一次。

1938年2月3日,我发现一列日本卡车运输队停在教堂大院前面的街上。他们拿走了属于我们的一些家具,在街上使用。院内我看见一群日本兵在草地上围坐在篝火前。他们用教堂里做工考究的柚木牧师椅支撑一个铁杆,上面悬挂着米桶,置于火上烤。座椅正面被削坏,背后的木条也伸了出来。篝火余烬里,我发现有几件家具和门锁。

在中式房屋的一间小屋里,我看见另一群日本兵,他们在房间地板上生起火围坐着,他们的座位就是从我们驻地抢的家具。一个士兵正在从我们的建筑里搬出几张椅子,估计是用来充当柴禾。我要求他们离开,并要他们在离开前把火熄灭。

后来我又去察看了一次,刚刚有一个日本兵又跑回那间屋子生火煮食物,我要他把火灭掉离开。士兵们还在教堂圣器收藏室内生了火,他们烧了节日悬挂的银色饰物,以及一个窗框和衣柜的一部分。

约在2月10日,我让两个仆人去两处地方照看房产。从2月17日起,我住在白下路的住宅区。从那时起,我们再未遭到日本兵骚扰。

如上所述,我能肯定对我们建筑的毁坏和抢劫都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所为,因为我频繁察看,一次都没有遇见中国人在现场抢劫或毁坏我们的财产。

滥用、野蛮对待我们的财产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的两处地方,大门上都贴有美国使馆的官方告示,领地内悬有美国国旗,也用日文贴了日本使馆告示,指出此处为美国财产,日本军队不得骚扰。

福斯特

四、马 吉

马吉(John G. Magee)牧师 1884 年 10 月 10 日生于宾州匹兹堡。在康州完成中学学业后,1906 年在耶鲁得到学士学位,1911 年又在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912 年被圣公会任命为牧师并派往中国。他在中国结识内地会英国女传教士菲丝·E·巴克浩司,1921 年 7 月结婚。他们有四个儿子。

马吉参与援救成千上万面临日军屠杀的中国平民,设立难民医院治疗受伤的士兵与平民,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在南京拍摄并带到西方的影片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最早的影像文献之一。这部影片发现于纳粹德国的波兹坦档案馆,并于两个德国统一后解禁,受到传媒关注并引起全世界众多人士的兴趣。在德国档案馆保存两套拷贝,系马吉用 16mm 摄影机拍摄的以英语解说画面的 4 卷影片。这两部拷贝,尽管编排不同,但内容一致;亦与在耶鲁发现的福斯特文献中的拷贝相同,但后者包含 12 卷而不是 4 卷影片的解说。以马吉次子大卫提供的影片为基础,王彼得编辑制成《马吉的证词》录影带,曾在美国、日本等地播出,引起很大反响。战后马吉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泷谷次郎《目睹南京屠杀事件》(东京,1993)一书记载了大屠杀期间马吉的工作。

1938 年夏天,马吉在中国服务 28 年之后,首次回到美国,曾长途旅行讲演介绍南京大屠杀。1953 年 9 月 9 日马吉在匹兹堡去世。

本书收录了马吉牧师写给夫人的日记体书信,他所拍摄影片的解说词,还有一篇报告及一封重要信件。

1. 致妻子函

(1937 年 12 月 12 日—1938 年 2 月 5 日)

南京 珞珈路 25 号

1937 年 12 月 12 日

亲爱的:

过去几天对这个城市可怜的居民来说真是可怕。据我们所闻,今天下午日军突破水西门,中国士兵正沿着中山路和其他道路撤退。在我写

这信的时候，城里响着密集的炮声以及步枪和机枪声。有一些部队显然在继续抵抗，而主力部队正往下关行进，并试图渡过长江。城里有许多地方起火，有的是中国士兵放的火，有的是日本炮击造成的，我无法区别。一发炮弹几乎从我们隔壁的房顶上飞过，落在街对面。我们的一些人以及来自圣保罗教堂的基督徒们都吓坏了。

我将把我从星期三以来所做的一些事告诉你。要是我每天都能以日记形式把每天所见所闻写一点下来就好了，但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很难将每天的事记下来。我已记不清我是哪天给你写的航空信，但我想那封信是星期三寄出的，即邮局最后一天接收信件的日子。我在我们的住地正忙着把一些东西运到城里去，我们已设法把我们的钢琴和路易斯·哈蒙德(Louise Hammond)的钢琴运进城，但阿奇·曾(Archie Tsen)的没能运来，我们的也是勉强运进的，因为我必须从卫戍司令部得到特别许可。当时从下关来了许多人，部队不让他们进城，一名哨兵甚至也不让我进城，但我绕过他，与在城门的一个军官交谈后才得以进去。

当我在那儿时，许多四所村(Su So Ts'uen)的基督徒来了。我本来不认识他们，但陈汝林给他们每人一块印有“圣公会”的布条，因此我可以认出他们并担保他们进城。那个中国军官告诉我，他们担心有间谍混入。许多人也想和我们的基督徒一道进来，但我无法给他们担保。

第二天(星期四，12月9日)，我听说火车站有些受伤的平民，便驱车前往。我忘了提，前一天我发现一名来自无锡或那一带的老妇人，她的双手被炸弹严重炸伤，我把她和她的女儿送到鼓楼医院，在那儿她的一个指头被切除了。她的女儿现在同我们的无锡难民，也可能同四所村的基督徒住在一起。

星期四，我和J. L. 陈一起去了火车站，城门的那位军官答应让我们再次进来，我们就放心地出城。那儿没有伤员，但我们从鼓楼医院出来时，让救护车装满了伤员所需的药品和毯子，于是J. L. 陈和我驾着福特牌汽车到四所村去接一位几星期前腿上受伤不能行走的姑娘，还有一名头部受伤的小孩。这一家不是基督徒但有时也去教堂。这个地方的人已逃得差不多了，不过附近仍有些人。那个女孩不想走，只是在我们反复催促下，她才同意离开。我们告诉她，四所村肯定要被烧掉。第二天

果然就发生了,我从下关能看到。

星期四,我在下关时,士兵们正在烧兴中门外(Hsing Chung Men)^①的房子,我不知道现在大桥饭店是否被烧掉了。姜家圩阿奇房子后面的建筑物着了火。我看见士兵们在阿奇房子附近跑来跑去,房子是我刚离开后被烧的,因为稍后费吴生路过那里时,看到房子正在燃烧,第二天烧得只剩下墙壁。我在那儿时,郭子爽(Kwoh Tz-shuang,音译。),就是那个拒绝把我们前门附近那块地卖给我们的人,带着他所能带走的东西,站在路边哭泣,指着他燃烧的房子说,他们不让他进城。我叫他和我一道走,并告诉他我将尽力帮助他。但哨兵甚至不想让我进城。郭绝望地回去了。要是他能等到我找到军官,我本是可以把他带进城的。焚烧平民住房真是太无情,也太愚蠢了。如果让他们占领这个城市一个月,那情景将不可想象,这也许不会发生。

我将一些伤兵带到江边,因为他们将尽快搭乘从浦口来的火车撤走。我还听说那边有受伤的平民,我想找到他们。码头上有数以千计的人,有些人在那儿等着过江已经几天了,许多人已经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前一天费吴生和我向代理警察局长建议,让他们设法遣送这些人过江。我很高兴地看到渡船在运送伤兵之后,开始送他们过江,但昨天我听说仍有约1500人在等着过江。

昨天(星期六,12月11日),我用鼓楼医院的救护车把伤兵送到首都剧院门前的包扎中心。就在我到达之前,一发炮弹落在街道上,大约有11人被炸死,首都剧院对面福昌饭店前停着的两辆车燃起大火。我刚把伤员放下,这时日本轰炸机从头顶飞过,附近的高射炮猛烈地开火。我们尽快离开了那里,回到鼓楼医院。不久有人来说,安全区内有数人受伤,我们开着救护车和那辆福特牌汽车前往。这次走的是小路,经过金陵大学附中后,在到达华侨路之前,我们已看到路上有好几具尸体。有一发炮弹击中了一所房子,约有20人被炸死,其中7~8人被气浪抛到街上。一对可怜的老夫妇哭得死去活来,他们33岁的儿子脸上被炸了一个大洞,躺在那儿死去。他们悲痛得难以自制。出于好奇,很多人站

① 兴中门在挹江门北面,邻近火车站,临江有太古、怡和、大阪、招商等码头。

在那儿围观。我叫他们立即离开,并需躲在某些物体后面。中国人显然对这种事不很了解,因为随时都有另一发炮弹飞来的危险。

今天早上福斯特为道声(Tao sheng)和圣保罗教堂的信徒主持了礼拜。这些信徒目前住在我正在写信的房子里(汉森寓所)。我在我和福斯特住的舒尔兹·潘亭宅邸的一楼主持礼拜仪式。我布道时讲了耶稣再世的希望,神再次给了我表达的能力和启示,但和上个礼拜天不一样,尽管我事先没有做准备。我正在布道时,电话铃响了,由于电话靠近我,我接了电话(在布道时接电话可是第一次!),要我立刻去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总部。信条讲完后,我叫J. L. 陈继续我的工作,就匆忙过去参加有关安全区新计划的讨论。

下午我到金陵大学医院去看看能否帮点忙。在那里或是离开总部时,听说日本兵已破城,中国人准备守卫这块阵地,在鼓楼公园附近架起了枪炮。这是在安全区以内,中国部队不该这样做。由于药房离中国士兵正在构筑的工事很近,我们担心遭(日军)炮击或轰炸时整个医院的药品被毁,于是大家忙着把药品从药房搬走,干了一阵以后,我到对面马路舒尔兹·潘亭的房子里,在那儿吃了晚饭,然后又到这里来。因为城市的这部分还有电,故我还能够写这封信,写着写着枪声逐渐稀落,我猜想中国士兵的阵地被占领了,或是他们被缴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一些步枪声。

12月15日(早上8:50),星期三

前天晚上写完信时我以为战斗已结束,但后来我们附近又响起了激烈的炮声,还有机关枪、步枪声,并且比以前更加激烈。

说得温和些,昨天是注定的最不愉快的一天。星期天下午中国士兵开始撤退时我去了外交部,在那儿我发现许多伤兵但没有医生和护士,后来福斯特和我到三牌楼的军政部,在那儿发现有更多的伤兵,大约有10~20名军队医护人员,但没有一个人在为伤员做事而是准备撤退。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为那儿的伤员服务的话,国际红十字会将把他们接收过来。前一天我们已组织了一些有意于救助伤员的志愿人员,有德国人、英国人(然而像其他英国人一样,门罗·福娄被命令离开南京,住

在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军舰上)、中国人和我们的俄国朋友——年轻的克拉,但大多数为美国人。我被选为(南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主席,福斯特为委员会的秘书。

安全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同某些日本军官取得了联系,他们说只要医院不藏匿士兵,医院将受到尊重,放下武器的士兵也不会受到伤害。这以后我们许多人都忙碌起来,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把消息传递给中国士兵。我们把他们的武器拿来扔掉。军政部门前的街道是最混乱的地方——轻重火炮、骡、马、炮弹、手榴弹以及各种战争物资拥挤在一起。我们停下来放走了一只骡子。走过手榴弹和炮弹堆放的地方,使人感到非常不自在。一次,一颗子弹就在我脚边炸响。当我们回到军政部时,那些我要求等我的医护人员已无踪影。可怜的伤兵留在那儿无人照管。

晚上,一百多名急救员开始工作后,救治伤员的医院才稍有秩序。

第二天我带着载满伤员的救护车到外交部,当我们设法使能走动的伤员朝台阶上走的时候(另一些用担架抬),一队日本兵来了,其中有些像是野兽。我正扶着一名可怜的伤兵,他痛苦地向前迈步,一个日本兵把他从我身边拖开,猛地扭他受伤的膀子,把他的手捆在一起,并把另一名伤员的手也捆在一起。幸运的是,我发现一名刚过来的日本军医,我指给他看伤员们身上的血衣。他会德语,我用不流利的德语说这是伤兵医院。他叫日本兵给伤员松了绑。在这之前,一名日本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过,有些日本兵很坏。随后,我找到一位会说英语、比较正派的上校,告诉他我想到日军司令部去,以取得照顾伤兵的许可。他用我们的救护车(从红十字会借来的)把我和那位年轻的俄国人送到位于励志社西面的中央饭店,见到一个矮小、光头、浓髯的人。我通过克拉说,陆军部前有许多伤兵,我想得到允许把他们送到外交部去。他走到里面一个房间,日军在南京的最高指挥官住在那儿。过了一会,他出来说,我必须等几天。我说他们已几天没人照顾,甚至没人送水给他们喝,但那个日本人说我们必须等待。我们失望地走了。回到安全区委员会,看到那儿有伤兵,我送了两车伤兵到外交部的伤兵医院。每次我们都遇到些麻烦。一些坐在汽车里的军官担心我们把伤兵带走,我告诉他们是带进来而不是带走。他们允许我们再运一车。第二趟归途中,我们在门口遇到

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军官,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人!他说话声音听起来像狗吠。如果我是可燃品的话,他的那副模样就像要把我烧掉。他通过克拉说,不要再让这个美国人(指我)到处跑,美国人很坏。克拉说我们得到允许再运一趟,他说:“我是这个城市的司令官。”我们好不容易才要回我们的救护车。

12月19日,星期天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就在前天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人被日本人杀死在我们住所附近。许多中国人很胆小,一遇日本兵掉头就跑,这个人就是这样被打死的。由于现场在我们能看到的竹篱笆的一个拐角,他具体是怎么被杀死的我们看不见。后来克拉到那儿去看,说他们在他头上开了两枪。这两个日本兵一直抽着烟,谈笑风生,杀一名中国人就像杀死一只老鼠。J. L. 陈的大儿子陈昌,今年16岁(中国算法),两天前从我们住所附近与五百多人一道被抓走。我认为他生还的机会不大。在这批人中还有11名来自四所村的基督徒,自那以后我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昨天我把我们被抓走人员的名单给了最近刚到南京的日本总领事田中。

我们学校厨师的儿子五天前在塘边淘米时,同其他一百多人一起被抓到四所村,所有的人双手都被绳子捆着,快到四所村时,他们被一个个地枪毙。幸运的是,他和鼓楼附近一家商店的一名店员在队伍后面,他们的双手被捆在前面,而不是像我多次看到的绑在后面。他们用牙齿解开了捆绑的绳子,躲在一条阴沟或涵洞里,有一个半白天加两夜。他们出来时,遇到一名日本兵,他抢来一桶酒,拿不动,叫他俩抬。这样他们安全地回到城里,并最终回到了我们下关的住所(汉森寓所)。我的汽车司机的两个弟弟与陈昌等一批人一道被抓走。由于这批人集中在离我

们住地很近的地方,我同司机的妻子一起出去,她自己不敢去(确有理由)。她最终看到她的两个小叔子。我朝一个领队的军官走去,可能是个中士,我伸出两个手指,用英语说:“两个平民,不是士兵。”我走近他时,这名军士用极其仇恨的目光看着我,嘴里恶狠狠地说了一些什么,我猜是让我“滚”。我转向那女人说:“毫无指望了。”于是我们就回来了。要是我知道陈昌也在这批人里面,我一定会设法再去找上一级军官去营救他。前天董(T'ung)先生的儿子(他们是三牌楼的基督徒)在附近被打死。大约在星期二的晚上(12月14日),我遇到两批人,他们四个一排被绳子捆着,其中有一人没穿裤子,他们在街上被赶着走,人数众多(当我遇到第一批时,天还没有黑,因此看得很清楚),大约有5 000~6 000人。几天来,我们都能听到机枪的声音,不仅这五六千人,还有城市其他地方的许多人被枪杀。没有办法能算出多少人被枪杀,但我估计,包括街上被杀的人,共有两万多人。或许更多,也许少一些。

大批中国士兵一定是在星期天夜里逃走了,日本人因没能抓到更多的俘虏而怒火万丈。

昨天我同日本新来的总领事田中一起到下关,他想在外国财产上贴上通知,注明这是美国人的财产,那是英国人的财产等等。

下关仅存的建筑物是我们的房子,美孚石油公司、瑞兴行以及扬子江饭店。我们房子的前门被砸得粉碎,房子里面一团糟,所有抽屉都被堆在地板中间,三楼所有的箱子被砸开。所幸的是,我的一只镶铁皮的小箱子没上锁,橱子也没有锁,因此免遭厄运。地上、床上及地板上有许多血,有一支枪管坏了的枪,我猜是一个或一些中国士兵曾被困在这里,至少在这里躲过。也许是中国士兵砸開箱子找衣服换下他们的军装,其他值钱的东西似乎没有碰。我很高兴我们的房子没有被烧掉,我一直担心这点。下关一片狼藉,所有熟悉的景物都消失了,大桥旅馆不见了,我为西姆斯(Sims)夫人感到难过,在她这个年龄重新开始确实是件令人泄气的事。毫无疑问,下关是中国士兵烧的,因为他们不想把它留给日本人,也许还有助于掩护他们撤退。在堤岸上有三堆黑乎乎的尸体,部分被火烧过。我想像过去的四五天许多处地方都是日本人放的火,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屠杀后的尸体烧掉。在我写信的时候,又有两处起火,一处

在下关,另一处在南面。

在整个一星期,日本兵在南京抢劫了他们所能抢到的东西,他们甚至把德国使馆的小汽车也抢走了,并几次进入美国大使馆,但都被赶了出来。日本军官也参与抢劫。昨天他们来到我住的房子(汉森的寓所),企图把剩下的一辆汽车抢走(其他两辆汽车已被抢走)。和这伙士兵一起的还有两个“浪人”(非军人日本流氓)。我指着日本总领事贴的告示和美国使馆的标牌给他们看,并试着关上一扇大门,一个日本兵把我推开,直往车库走去,但那辆车坏了,因此留了下来。一个浪人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要护照,我给他看了,他说了声:“谢谢。”抢劫持续了许多天。日本兵不断地抢人们已经贫乏的食物,然后是铺盖,抢他们所能拿走的一切物品。人们不能离开汽车,哪怕是一分钟,要不然就被抢走了。

但现在最可怕的是强奸妇女。日本人以最无耻的方式干这些勾当,街上到处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兵。福斯特和我,或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随时留下和注意圣保罗教堂信徒和随我们来的其他难民的屋子和舒尔兹·潘亭的房子,那里有我们的衣服和食品。克拉和另一个土耳其鞑靼族的机械师住在(舒尔兹·潘亭的)房子里,隔壁则住着来自四所村和三牌楼的基督徒。日本兵不断来抢劫这些人仅有的一些东西,而对付这一批批来的日本兵真像梦魇一般可怕。我们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满了妇女,有的甚至睡到了我们的饭厅里。她们终日惶惶不安,惊恐万状。几天前,隔街一个小寺院的和尚过来说,日本兵带走了两名尼姑,他恳求我能让几个尼姑也来躲躲,我照办了。房子里真是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罐头。楼上楼下的房屋里都住满了人,一会儿工夫,我们的卫生间里也住进了一对母女。还有一些女孩子作为护士在鼓楼医院帮忙,尽管正式护士都干得很好。昨夜一个日本兵闯进了这些姑娘的住所,并摸到3个女孩子的床上,这些女孩子大声叫喊,吓住了那个日本兵。他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接着威尔逊医生赶到,把他赶走。这个家伙曾掏出枪对准威尔逊,似乎要对他开枪。约有4 000名妇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据我所知,昨夜有12名妇女被抓走。几天前一个晚上福斯特和我在附近散步时,一位妇女哭着跑了过来,一个日本兵在后面叫她。我们把她带进我们住所,让她同其他妇女住在二楼。第二天,她叙述了她的遭遇:

昨天下午6时,来了4名日本兵把她从家里抓走,她有一位28岁的丈夫和三个月的婴儿。他们把她塞进汽车,开了3至4英里之后,三人轮奸了她。然后给了她一些他们抢来的食物,开车至半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把她放走。天很黑,她不知道如何回家,碰巧遇上了我们,要不然她也许还要遭受一夜的凌辱。第二天早上,我把她带到鼓楼医院,威尔逊医生给她进行了一些治疗。昨天下午一名德国人施佩林(Sperling,原文作Sherling,系笔误,译者注)和我去一些日本兵强奸过妇女的房子。我们走进一间房子,有位妇女正坐在地上哭泣。人们告诉我们她被强奸了,并说楼上还有一个日本兵。在中国人的指点下,我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我愤怒地敲门,房子里的日本兵有一些反应,我用英语和德语大声地喊“开门”,随后施佩林也来了,敲门并喊“开门”。最终那个日本兵出来了,他下楼时我对他喊道:“畜生。”楼下一位日本兵懂一点中文,上楼时,听到我的骂声,很不喜欢。类似的可怕的事在全城都有发生。当我把这些事告诉刚从美国来的日本总领事时,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我把这些事告诉《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他也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日本人经常轻蔑地谈论中国军队是多么的无组织纪律,但日本人自己比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最坏的土匪还要坏。田中总领事说,日本高层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已发布了两道命令,但情况继续一天比一天更糟。

近来,晚上我一直睡在我们住所的地板上,但这两天睡在靠椅上,舒服极了,不过我最需要的是洗个澡。一个星期前在卜凯家洗过一次澡,那里住着一些美国人。

我只告诉了你我所做的一小部分。昨天早上当我把那名妇女送到医院时,我对他们说另外还有一名妇女,她脖子被一个日本兵刺伤了,那个日本兵掀她床上的被子。医院的人说:“她今天早上被送来了。”于是我走近她的床前,发现不是她,知道这是另一名受害者。我匆忙离去,把那位吓坏了的、精神有些错乱的41岁的妇女和她的老母亲带来。海因兹小姐今天告诉我,有个8岁的小男孩腹部被刺了四至五刀。当然我们所见所闻只是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暴行的一个零头,但我想这足以使你

了解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所经历的地狱般的遭遇。这简直是场恶梦,但我在夜间或是早上醒来时却恐怖地发现这并不是一场梦。昨天我听说在贵格会教堂后面有一些姑娘,我开着医院的救护车赶到那儿。其中3位姑娘已被抓走,其余的都被吓坏了,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她们塞进车里,一共18个人,然后送她们到鼓楼医院。昨夜又有日本兵闯入她们房间。

12月20日(晚8时),星期一

过去四个晚上,当大多数人睡觉时,我在给你写信。昨天是基督降临节,我和福斯特都没有参加礼拜,因为我们得时刻防范这些可恶的贼来偷我们教徒的东西和奸淫妇女。从四所村和三牌楼来的信徒到舒尔兹·潘亭的花园里参加礼拜,因为天气很好,J·L·陈主持了早晨礼拜并布道,还在草坪上演奏了小风琴。他布道时,我用摄影机拍摄。

正当我们结束礼拜时,有人敲门,来了两名日本报社记者,后来证实他们是正直的人。我邀请他们进来,并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拍照。他们照了陈汝林身穿教士服,演奏风琴,其他人坐在草地上的照片。接着我同《朝日新闻》的记者谈话,他会英语。我告诉他发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们14个人,不是我开始认为的12个人,刚才布道的牧师的儿子可能已被杀害,和街对面寺庙和尚请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能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我说我当然知道,并告诉他我以前曾几次去过日本。然后我告诉他关于伤兵问题,屠杀无辜平民,以及我个人在中国生活的一些事。他似乎很感兴趣,直到吃午饭时才离开。他说他希望能再来,我说我可以尽力帮助他。

和通常一样,我和其他外国人为各种事情忙碌着,大多数情况是忙于保护妇女免遭日本兵的侮辱,因此仅在街上见过他一面。

今天事情很多。一大早福斯特到舒尔兹·潘亭家去了,我呆在这里直到他回来。我在这儿时同范(Fan)家一起吃饭。回到我们住所时,立刻忙着把日本兵从两所房子里赶走,这座房子紧挨着从四所村和三牌楼来的基督徒住的地方。在我回来前,我们的一名女基督徒(或是慕道友,我不清楚)被日本兵强奸了。我把她与另一名被强奸的妇女送到医院治

疗。在我即将离开时,我们被抓走的14名教徒中的一位竟奇迹般地从同时被抓走的一千多人的队伍中逃了回来。他还说在日本兵向下关江边人群扫射之前,陈昌被释放了。毫无疑问,他的年龄救了他一命,尽管我们知道许多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或者比他更年轻的都被杀害了。这个名叫苏宽伟(Su Kuan-wai,音译)的人说他在电力公司看到了陈昌,因此明天我去找他。J·L·陈今晚对我说,他认为陈昌已死了,因为从上次他被人看到到现在已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到苏叙述的经过:他站在人群后面,一只脚几乎碰到了江水,当其他人中弹倒下时,他也倒下,尽管他并没有被打中,他藏在三具尸体之中,一动不动直到他认为安全后才爬上堤岸逃走。不久一个日本兵抓到他,叫他给他们烧饭,干了两天后,日本人放了他,并为他写了一张路条。他这才能进城。

今天下午,在我们住所附近,来了几名妇女,要我们救救她们,福斯特也在那里。后来我领着一批人到金陵大学,因为现在那里有宪兵把守。当我们站在那儿谈话时,隔壁出来了一些人请求我去看看,因为一名12岁的小女孩被强奸(按我们的算法,她只有10岁或者11岁)。我到那儿正碰上三个日本兵,我阻止他们进去。为了安全起见,这家人已把这个小女孩送到医院去治疗,然后用一辆小些的车子从我们非常拥挤的房子里送走了几批较年轻的妇女或姑娘。在我们这里,她们只能紧挨着站在楼下大厅里或坐在楼梯上。男孩子只能睡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楼下地板上挤满了人,楼上也没有空房间,有些女孩甚至睡在我们的饭厅里。当她们收拾行李卷铺盖时,有人从巷子南面的房子里跑过来说,日本兵在那儿找妇女,我跑过去,在二楼过道上看见了几个日本兵,我用毋庸置疑的语气把他们镇住,并指着楼梯叫他们下去。中国人指着同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说里面有个日本兵。我猛地撞门,门开了,这只野兽正在强奸妇女。我大声地骂他“畜生”,他似乎听懂了。我进去,他立刻出来,并很快离开房间,我跟在他后面一直到他走出小巷口。

我忘了提及,早上,在我们那儿,来自四所村的张文明跑来告诉我,一个日本兵正在追他的妻妹,我尽快地跑到那所房子里,那日本兵正同几个姑娘在一间房子里,我指着门叫他离开。

刚吃过中饭,跑来一个人告诉我,一个日本兵打了从三牌楼来的董先生。原来午饭后他们查经班正在读圣经,一个日本兵来到他们中间,人们都站起来,董打开圣经给他看他们在读什么,日本兵捡起一个带有铜烟锅的长烟杆狠狠地砸在老董的头上,当我到那儿时,地上还有许多血,他的脸上也是血,头上缠着止血的毛巾,我把他带到急救医院,这个医院是我用手头的基金在金陵大学医院后面开设的。

这就是今天我所做的事,如果你能理解,城里许多外国人每天都有同样的经历,并且要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外国人的地方发生着同样的事,你可以想象出这几天的恐怖。

今天我在医院时,有两名男病人在挂号,他们都是被日本兵刺伤的,一个人给我看了他脖子上的伤口。在门诊部的包扎室里,一个妇女正在包扎脸上的刀伤,她脸上、前额、脖子上伤痕累累,我猜她是在反抗侮辱时受伤的。她说是日本兵砍的,我没有问细节,以免在几个男护士面前使她难堪。“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我的上帝!”

12月21日,星期二

我很高兴地说,今天事情不多。我一直希望一有可能就同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一起去下关,看看是否能找到陈昌。9时离开这儿以前,在我刮胡子时,几次被各种事情打断,处理住在我们这儿的妇女的要求——在这里人是那么多,我走动时无法不碰撞到她们——然后又到隔壁,因为一个日本兵来,要我们的人修理一些黄包车。待我到达领事馆时,已迟了好久。见到总领事时已是大约12时了,无法去下关,因此我安排吃过午饭后再来。但吃饭时史迈士来了,要我和克拉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内容是要求日本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停止目前整天在南京放火焚烧房屋的行为。他要我同其他外国人在下午2时去递交请愿书。这事结束后,田中先生给我派了一名使馆警察一同去下关,但这名警察十分粗鲁,不想帮助我找到陈昌。我们一直开到通向下关火车站的热河路。这个日本人说我们不能再向江边走了,我说:“但是人家在发电厂附近看到他的。”说了半天他才同意继续向前走,但走到扬子别墅附近时,他不同意继续向前进了,说如果再前进,日本兵会刺死我的。

我们开上了经过传染病医院的路,过了几个电线杆的距离,看到一具尸体。他停下车说,必须掉头了。然后我们开上热河路(通向火车站),看到了更多的尸体。他说:“下关没有中国人。”再次停车。实际情况是他不想让我看到日本兵所干的坏事,但他不知道,几天前我已到过江边,看到了大批的尸体——约有 300~400 具。

今天情况有所改善,尽管强奸仍在继续。抢劫的主要是些床上用品、食物和士兵所需要用的东西。但可悲的是这些物品主要是从穷人那里抢来,而穷人是经不起这种损失的。

福斯特和一名曾在日本一家商店任过职,并会说英语的日本兵谈过几次。他认识我们差会中的瑞芙妮德女士(Reifsnider)等好几个人。他说日本已在战争中损失了 20% 的有生力量,在攻占南京中损失惨重。他认为日本已损失很多,持续不了很久。他似乎很正派。很高兴知道日本兵中也有好人。领事告诉我驻在南京的第九师团将要撤走为第十六师团所替代,该师团声誉要好一些。他说情况会一天天好起来,到 24 日,城市将恢复正常。我也希望如此,能有一个平安的圣诞节该有多好呵!

12 月 22 日,星期三

今天日本兵又在到处抓人。我又多次听到机枪声和步枪声,这意味着更多的屠杀。45 分钟前,我看到 60~70 个人被抓走。几天前几个日本官员和一名技术人员到我们委员会找一些熟悉发电厂的人,因此拉贝先生和其他一些人找了 54 名工人,这些人开始在发电厂工作,住在和记洋行。昨天日本兵杀死了其中的 43 人,没有杀死其余人的惟一原因是洋行看门的锡克族印度人认识他们,说他们以前就在这里工作,而杀死其余人的借口是发电厂属于中国政府产业,因此他们是政府雇员,应该被处死。实际上发电厂并不是完全属政府所有,但对日本兵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在鼓楼医院看到了怎样的情景啊! 一个七岁男孩的尸体,肚子上被刺了四至五刀,已无法抢救。一名 19 岁的姑娘怀了六个半月的身孕(第一胎),因反抗日本兵强暴,脸上有七处刀伤,腿上有八处,肚子上有一处深约两英寸,正是这一刀伤导致了流产。医生们正在抢救她。

我还看到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她当时和父母站在难民营的一个工事旁，看着日本兵过来杀死了她父母。

她的胳膊被狠狠刺了一刀，这一刀可能要使她终生残废。另一位妇女是和记洋行的雇员，当日本兵来时，她正在下关的一所房子里，日本兵毫无理由地杀死了其他所有人，在她的脖子上砍了一刀，这一刀伤得很重，日本人以为她死了。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不过威尔逊医生说，她将永远无法使用她的一条腿和一支胳膊（她后来还是死了）。另一位是农民，他与其他人一道被抓走，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平民一样被机关枪扫倒，但他还没死掉。不过医生昨天说他活不了多久。

12 月 23 日（中午），星期四

昨天我在舒尔兹·潘亭家隔壁时，居住区另一家的一位妇女跑来哭着说，一个日本兵刚刚抢走了她的 80 块钱，但对此我无能为力。另一个会点中文的日本兵来到我们教徒住的地方，显然他是属于新近部署在安全区的那个师团。他以及随后来的一名军官又在找中国兵，我告诉他俩，这些人都是圣公会的，并把我的名片递给军官。他们比较文明，很快就离去了。

今天早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洗了一个澡，自从上次在卜凯家（一些外籍教员住在那里）洗了个澡后，我已有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了。今天不很冷，我站着用两大盆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洗，换了衣服觉得自己又像个样子了。我将衣服交给张阿姨去洗（张是路易斯·哈玛德的胖女佣）。由于日本兵不断地来，我和福斯特不敢同时离开，在晚上我们俩都睡在这里，我睡在汉森家，他睡在斯坦恩（Stines）的家，离从圣保罗教堂来的教徒们，浦镇来的 C·T·蒋一家以及我们收留的其他一些人住的地方很近。妇女们睡在楼上，男人们睡在楼下，不过也有些例外。最近我不得不又从 J·L·陈的教区接来了一些年轻的女基督徒，因为那里已有一些妇女被强奸了，我们无法保护她们。有一段时间我睡在地板上，尽管在 12 月 12 日中国军队开始撤退时，我在楼上有张好床，当时我们这儿还不那么拥挤。过去的四个晚上我睡在有垫子的长靠椅上，因此还算比较舒服。福斯特一开始就睡在 17 号斯坦恩房子的地板上。为了使

你了解我们是多么拥挤,我举个例子,楼下一间大房间,包括相连的一个封闭凉台,共有五十多人,包括孩子睡在里面。房间一端由一张长靠椅隔开,给J·L·陈牧师家年轻的女佣住。白天铺盖全部卷起,沿墙摆好。这个房间还是圣保罗及道声等教堂的信徒们礼拜的地方。当我写信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人正在吃少得可怜的午饭。我和范家一起吃。每天我们都吃稀饭,以节省大米,一个大问题是蔬菜和肉非常少。日本人几乎把一切都抢走了。昨晚,我们美餐了一顿。一位来自横滨的日本兵给了福斯特一块牛肉,他曾在一家旅游者光顾的丝绸店工作,并认识我们差会的瑞芙妮德,今年38岁。我们还有一盘咸肉,咸肉是范家在我们搬到市区时从下关带来的。另外还有一些白菜。在舒尔兹·潘亭家我们吃了一顿饭(以前从未一起在那儿吃过),比以前吃得好多了,因为福斯特能烧一手好菜的厨师也在那儿。我们各自的存货都带去了。福斯特家有许多存货,夏天,他们的厨师贮存了许多坛水果和豆子。我在其他人家吃饭比在福斯特家要多。我从济南带来的麦片至今还有,真像是寡妇的坛子(widow's cruse)^①,取之不尽。

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然而我们还是听说了有关“帕奈”号舰被炸沉的消息,以及罗斯福总统拒绝接受日本的道歉而要求日本天皇亲自道歉的事。我们还听说了日本人企图轰炸英国军舰及西姆斯女士和许多外国人借住的B&S轮船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一位丹麦人,他住在栖霞山(离十堡桥很近),是从城市的那边进来的,显然日本人没有估计到会有外国人从那儿进城,因此在那个方向没有下令禁止外国人入城。我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知道这条路线。我们需要更多的外国人,因为目前就保护中国人而言,我们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戴簪三夫人的房子遭到抢劫,这些天她一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群小姐那儿帮忙,因为那儿住满了避难的中国妇女,一些人甚至睡在楼房之间的走廊上。今天整天都在下雨,我真不知道她们晚上该怎么办。福斯特今天也去帮忙,他告诉我,他们准备开放汇文以缓解金陵的

① 《圣经》典故,比喻貌似有限实为不尽的财源。

拥挤,但除非有位外国人守卫在那里,否则就开放不了。现在似乎找不到一名合适的人选。

今天三餐饭我都是同范家一起吃的。今晚我们吃了稀饭、花生、腌菜、大白菜和豆腐乳。这对我还行,因为我偶尔还能吃到西餐,但对这里的中国人来说真够呛,几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吃这样的食物,但能有吃的我们已是感恩不尽了。

要是日本人允许装有食品的船只进来的话,情况本会大大改善。我想我们难民委员会大概只有一个星期的食物了。日本人不愿意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他们暴行的结果——陈尸遍地。

12月30日,星期四

自我上次写信以来,许多天过去了。情况比以前有所改善,但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仍是前景未卜。所有的人,更准确地说,所有的男人必须登记,说出自己的姓名、年龄、职业。许多人前来登记,但人群庞大,登记不上,即使他们在凌晨3时起床也办不到。今天日本人宣布,到明晨2时还没有登记的人统统枪毙(这只是恐吓,但把人们吓坏了)。

我们仍与外界隔绝。听日本人发布消息说,外国人到南京仍不安全,因为仍有中国士兵在南京一带活动!从日本人的角度说,真正的危险是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可怕的事。现在强奸和抢劫比以前少多了,但仍在继续。最坏的那个师团已经要从城里调走,但我对这个师团将去地方的人民深表同情,因为那里将没有外国人保护他们。

几天前,日本兵去了金陵大学,那儿大约有4000名男性难民。日本人向他们宣布,如果中国士兵主动站出来,不仅不会杀害他们,而且还要给他们工作。日本人给他们20分钟的考虑时间,然后叫中国士兵向前一步走,约有200多人走了出来,接着他们被带走了。在路上日本人又抓了一些不是士兵,但日本人认为是的人。他们被带到位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下关之间的古林寺附近,在那儿他们全被刺死。你能想象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吗?

过去的10天中,日本兵在整个城市里到处放火,除了外国人在下关的最好的建筑——邮局和海关外,整个城市被逐步地烧毁了——我最后

一次去那里时,所有东西都被烧毁。公平地说,下关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士兵烧的。实际上,整个太平路除了我们的教堂和住所外全部被日军烧毁,公馆的一部分——我们用于布道讲堂的那部分,也被烧毁了(后来,在1月26日,公馆被整个烧毁了)。安全区内发生了四场大火,不幸的是这一地区,特别是山西路一带人口稠密。很难想象南京的未来会是怎样,但可以确定一点,南京要恢复元气需要很多年。我想很有可能南京将不再是中国的首都,至少,在外部威胁消除以前是这样。

12月31日,星期五

几天前,有人到J·L·陈这里来,他不在家。这个人说,他看到陈昌和日本人一道向南门方向走去。他的家人正要放弃找他,这下又有了希望。许多日本兵抓中国孩子为他们干活,因此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回来。几天前我在金陵大学医院时,看见一位十三四岁的男孩满身是血被送到医院。日本兵把他从常州家里抓走后要他们干活。他已为日本兵干了三个星期。一天,这孩子埋怨说他已两天没吃饭了,要求回家,一个士兵听到这话就用铁棍子打他,并用刺刀刺穿了他的耳朵。

类似的受伤害的病人不断地被送往医院,不过这些伤害都发生在一个星期或两三个星期前。有一天我看见一位老妇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但实际上可能只有六十多岁。她的肩上中了一枪,子弹穿过背部,进入脖子。她很幸运,伤口没有感染,开始愈合。日本人向她开枪根本不为什么原因,到目前,我能找到的惟一答案就是恐怖主义。最可怕的案例是那些被刺或枪击后的中国人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下关的一个小船主,他的身体被烧得漆黑,后来死在医院。我想这类可怕例子我已说得够多了,有成千上万。看得太多人都变麻木了,到后来也就不再感到震惊了,我真是难以想象,现代世界上竟存在着这样残忍的人。

今天我們都很悲伤,在汤山和东流工作的福音传教士卢小庭投水自杀。在日本人来到以前他对局势就相当悲观。从昨天他同我和福斯特谈话的内容及他所写的东西看,他深受中国历史上那些以死来抗争黑暗社会的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东方人的观点。昨天福斯特告诉他,面对黑暗,基督教的观点是活着而不是死。今天一大早他就出去了,留给福

斯特一张便条、一首小诗和他的钱包。福斯特过去一直同他睡在一个房间里。这确实令人悲伤,因为在这些考验人的日子里,他显示了良好的助人及无私的精神品质。福斯特和我都对他有很好印象,而我曾想过要推荐他去神学院学习。在他的信中,他说上帝不会把他的这一行为视为罪过的。

我们以非正式的形式度过了圣诞节,在汉森寓所里先是唱圣诞歌,接着是祈祷、查经。约有 250 人参加了这次礼拜,许多人还不是基督徒。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圣餐礼拜,我为 J·L·陈教区的七位信徒施洗礼,董主教布道。除夕,福斯特安排了在大方巷和董主教一起主持礼拜仪式。第二天早晨,我们同时在这两处为信徒举行了圣餐礼拜。

1938 年 1 月 3 日,星期一

我们在两个地方忙着上《圣经》课——为“教义问答”做准备。这个房子里的许多人都不是基督徒,福音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

1 月 4 日,星期二

我仅仅是记录了我见闻中一小部分可怕的事。前天下午约 5 时,我离开汉森家,有事到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去,然后再到潘亭家,准备在那里吃饭。在街上和宋煦伯先生边走边谈,一个警察跑过来说,有个人被杀死了。我们同他来到不远处的一个中国人的家,看到有些人在哭泣。据说约 4 时 30 分,一个日本兵来到这家,试图将一名妇女拖进房间强奸。她丈夫帮助这名妇女穿过房间从后门逃走。这名日本兵离开了,但 20 分钟后他带枪返回,把这名妇女的丈夫打死。这位妇女有五个孩子,他们在城南有一家小的面店。像其他人一样,他们来到安全区避难。了解这些事实后,我回到总部取车(医院的车),因为没有人敢把车子停在外面,日本兵会偷去。在我上车前,一名警察又跑来说,日本兵又回来了。我赶紧跑回,看到三名日本兵,我要他们走开,他们走了。我从小巷子一直跟着他们上了大街。然后我才上车,到安全区主席拉贝家。我要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领事馆,因为他们曾保证,不让日本兵进安全区(至少不住那里)。如果做到这点,情况就会好一些。当我在拉贝处等候时,

一个邻居跑来说,有个日本兵正在用刺刀威胁他们。现在天已黑了,费吴生已坐进停在大门外他的车子里。我又跑到那里把那个日本人赶走。

元旦,福斯特和我被邀请到卜凯家去做客,大多数男性住在那儿。我没有接受邀请,因为我们俩都去的话,就没有人守卫这三座房子了,此外,我已经吃过较为丰盛的圣诞晚餐——包括从我们那里带去的一只鹅。福斯特也不再坚持去,尽管他要我去(他总是试图把最好的东西让我)。后来费吴生劝我去,因为现在情况已好转,他说用车来接送我,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于是我就去了。对我和福斯特来说,这顿饭味道好极了,因为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这么多可口的菜了。我们快要结束时,范和保罗·董匆匆跑来,说有两个日本兵在17号调戏我们的姑娘。他们来时花了20分钟。我们马上坐着费吴生的车飞驰而去,但还是迟了一步没有抓住那两个日本兵,只看到他们一眼。一个士兵到三楼,那个姑娘很聪明,把他骗到楼上,自己逃走。我想就是这个女孩,跑到阳台上,并顺着花园里男人们为她竖起的一根毛竹竿半摔半滑了下来。两名姑娘被强奸了(这是我把她们送到医院后,她们告诉护士的)。孤儿院的陈太太跪在一名士兵面前,试图救一个姑娘,但日本兵用刺刀敲打她的头。我不知道我已将多少名这样的姑娘送往医院治疗。但更多的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根本没有被送到医院。今天,我们又收留了一位逃到这里跪在大门口请求我们收留她的妇女,她昨晚8时被日本兵强奸。我们外国人常常听到这种案例。想到发生在这一地区二十多万人群中类似事件的数目,我们永远不能确切知道!

昨天早上,我同来自汉西门德士古公司仓库的两名中国人交谈,他们说那儿有许多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丹麦人辛德贝格先生(Sinderberg)说中山门外情况也是如此,我自己也亲眼目睹了下关的数百具尸体。这两人告诉我,他们附近有一家人的房子被日本人放火烧了,这家人有10口,躲在地洞里,父亲在外放哨,叮嘱孩子们在日本兵来时不要哭和讲话。日本人真来了,杀死了父亲,发现洞里的妇女和儿童,于是用稻草把洞口堵上,点上火。一名妇女很聪明,把自己和一个小孩用被子裹起来,居然从火焰中逃了出来。这两个石油公司的人还说,他们那儿有个10岁或9岁的小姑娘被一名日本兵强奸。我问他们是听说

的还是真有其事，他们说事情就发生在他们附近。在我们安全区委员会工作的董主教把许多这样的报告译出来，并交给了我们。他说他知道有一例是三个日本兵轮奸一名 12 岁的少女。重复这些事令人恶心，但我认为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不可泯灭的事实终有一天能公诸于世。

1 月 5 日，星期三

今晨 8 时，我们陪我们这里的妇女去登记，这些妇女和姑娘分别住在汉森、斯坦恩家和德士古公司第二宿舍。后来住在潘亭家的许多妇女也一道去了。所有人都要登记，因为听说那里的日本兵比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另一登记处要正派些。一位以前在道声学校教书的刘先生，现在同日本人建立的自治会有些联系，帮了我们一把，所以进行得很快，到下午 1 时就登记完了，2 时回到住所。我同她们一道走，整个时间都和她们呆在一起，来回我们都点了名。妇女们四人一排排好，我们要求大家互相注意，所有的人都平安返回。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听说，前一天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一些漂亮姑娘给留了下来，不过我没有去核实这个消息。总的说来，士兵们还算文明，但当我们走出校门，到小教堂附近时，一名傲慢无礼的下级军官走过来，无缘无故地打了两名上了年纪的妇女的耳光，惟一可能的原因是他进来时她们正走出去。因为我在队伍的前面，他朝我走来，用日语说了些什么，我猜是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用中文说：“我护送这些人。”许多日本人懂一点中文。

自日本兵进城以来，今天我在金陵大学第一次碰到陈顺义，尽管我好几次听人说起过他。他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相信日本兵会干出这种事来。我同意，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看法。在日本人到南京以前，我也从中国人那里听过一些有关日本人暴行的说法，他们很害怕，要逃离南京。但当时我认为仅仅是谣言而已，而目前事实证明甚于谣传。

今天我听贝德士说，日本军队对于我们外国人在这里非常恼火，说没有哪个征服军会允许中立观察者的存在。此话当然非真，德国占领比利时，就有许多中立的观察员在那里。而这说明，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日本人不喜欢我们呆在南京的猜测是对的。他们试图通过使馆把我们

弄走,说南京太危险。不可思议的是,连外国驻中国使领馆的官员也没有被允许进入南京。尽管日本兵在12月12日就进城了,我们听说,除个别情况外,12月12日后就不再有任何抵抗了。日本人不如说,自他们进城后,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成千上万无辜老百姓的行动还在继续着。还可以听到进行这项工作的机关枪声,至少我前天还听到(我认为是的)。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日本人不是用枪而是用刺刀把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刺死,许多被刺但死里逃生的中国人对此有许多报告。有一天,在医院我同一名警察交谈过,他说有个日本兵强迫他同一名不是他妻子的妇女一起在街上走,这个日本兵想打这名妇女的主意,但又不敢在大街上拖着她走,想让别人看上去她是警察的妻子。当天黑时,这位警察趁机逃走,但又被另外一些日本兵抓住,在他背上刺了22刀。他没死掉真是奇迹,因为他说有两处刺刀从前胸出来了。日本人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他最后挣脱了捆在他双手上的绳子,在一间房子里睡了一夜后,终于慢慢地来到医院。

我还同一名尼姑谈过,她住在城南的一所庵里。根据送这名尼姑到医院来的一位裁缝说,日本兵在庵的周围打死25人。这名尼姑告诉我日本兵杀死一名65岁的住持和一名10岁(中国算法)的小尼姑。还有一名70多岁的尼姑被她上面的尸体压死(发生在她避难的庵里)。她自己被枪打伤臀部,她12岁(中国算法)的徒弟背上挨了一刀,她们躲在一个洞里,同不少尸体躺在一起,不吃不喝过了五天。后来这名尼姑听到一名士兵用中文说:“真可怜。”她睁开眼睛看着他并求他救救她,他把她拖出来,并叫几个中国人把她送到部队急救站,进行了包扎,几天后被送到医院。当我们听说那个背上挨了刀的小尼姑的事后,麦卡伦先生开着医院的救护车,把她接来,因为那儿没有人照顾她。威尔逊医生说,他怀疑那尼姑能否恢复过来,即便是恢复了,那条腿也会终生残废。那个小尼姑的伤不是很重,但必须住好几个星期,现在住到我们这里了。

1月11日,星期二

昨天早上,奥地利人哈茨(Hatz,他是我们这群呆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一,在外交人员到达前我们总共有20人),他看见两个日本兵把一名双

手捆着的中国人推到山西路旁的一个塘里,让他站在齐腰深的水里,那个日本兵开枪把他打死。似乎任何下士班长或是列兵都可以决定任何一名中国人的命运。

前天晚上,金陵大学附中一名样子斯文的学生(他父亲在日本经商)被日本人捆着抓走,我们很担心他的命运。这个孩子会日语,日本人想要他们为他做事,贝德士说他们以前为他编了一些借口(或是他本人找了些借口,我不敢肯定何者正确),这次日本人还是来把他抓走了,后来他给他的妻子捎信说,他不久将要被枪毙。1月29日,他的妻子被绑架,同另外20人一道被卡车送到城南的一座房子里供日本军官“享用”,后来她假装呕吐设法逃走。

昨天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要掉了。这名妇女同其他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她本人和其他一些人白天干活,夜晚要被强奸10~20次。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叫她跟他们走,他们把她带到一个空房子里,在那儿他们试图把她的头割下来。她没死真是奇迹。幸运的是没有割到要害部位。她说伤害她们的人中有一些是军官。

几天前,美国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到了,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也回来了。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信件,还可以把我们的信件带走。他们在长江上遭到日本人的轰炸,但只有美舰“帕奈”号被击中。

我不是把我所见所闻的可怕的事都记录下来,只是把听到的第一手资料或我确信是事实的某些材料记下来。我不想把一切都写成漆黑一团,因为,公平地说,一些日本人也做了一些好事。例如,昨天我看到一位妇女,在日本占领南京前的空袭中,她被机关枪打伤多处,一只眼睛也被打掉,她有好几个孩子,为了养活他们,她不得不把一个三个月的婴儿丢在城外,一些日本人发现了她并给了她一些帮助。我们的花匠被日本人抓去做了几天工,日本人每天给他5角钱,并给他好饭吃。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除了一名警察是个讨厌的家伙外,其余的都愿意帮助我们,他们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并尽量保护外国人的财产。我认

为他们不知道日本兵究竟干了多少坏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得出结论,继续向他们报告日军的所作所为并抱怨,可能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日军非常恨我们外国人,当然也有例外。他们试图使我们难民区委员会无法工作,控制我们手中的食物、油和钱。我们很乐意把我们应马市长要求代替行使的一些政府功能移交给中国的自治会,但断然拒绝交出我们的食物和钱等等,因为这些是我们用以工作的管理经费,我们建议工作要继续下去,因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难民们仍需要帮助。整个城市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即使在城市工业和商业小规模恢复前,很多人也不得不需要帮助。

我听位于外交部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说,他们得到了保护。不过自12月14日我向那儿运去三卡车伤员后,就再也没有允许外国人进去。

正是在那个入口,当我正要出来时,遇见当时的日军指挥官,他对我气势汹汹,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有对我发这么大火气的人。当时我认为原因是我去了他的总部,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后来我想原因可能是一个外国人去过这样的医院,声称这些医院是由国际红十字会赞助运行的,这使得他不能或者很难不去保护他们。毫无疑问,如果有机会的话,首批到南京的那种日本兵总会干些什么事的。不过我第一次到那儿也遇到了一名会讲英语的文明军官,正是通过他我才找到日军总部。很有可能,我们的努力拯救了那里数百名伤员及医护人员的生命。那里的妇女没有被骚扰,这一点确实不同寻常,也表明只要愿意的话,日本军官是能控制他们手下士兵的(后来有个日本兵确实想闯入妇女的房间,但被一个计谋所挫)。上海出版的一份日本报纸称(我想是12月17日或随后的报道),中国士兵是如此感激日军的同情和照顾,以至当问到他是否再会当兵时,他说:“如果我再当兵的话,我一定会为日本而战”(后来我得知,一名中国士兵被刺死,原因是他的碗被打翻而发了脾气)。我认为优待这些伤员是为了宣传而故意做出来的,这样可以抵消当时盛行的难以启齿的凶残。那儿的医生和护士没有意识到外面发生的可怕事情。日本人送来一些米,不过大多数都是用我们手中的钱购买的。我们有一个不同国籍的10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委员会的主

席。除了使用我们手中的钱,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多少事。但我认为在对伤员提供保护方面,我们的组织一直很有用。无论日本人保护这些伤员、医生、护士的动机是什么?我很高兴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感谢上帝!

1月30日,星期日

下午4时30分,福斯特和我及我们的人在汉森家聚餐,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他们邀请我们同他们一同吃饭。他们平时一天两餐,早上9时,下午4时各一餐。今天除了干饭外,还有六碗菜,对他们来说,这已是非常丰盛的了,因为平时他们吃得很差。席间福斯特进行布道,我也在隔壁为J·L·陈的教徒们讲道。下午2时我还参加了一个小型祈祷,这个活动是由J·L·陈为住在舒尔兹·潘亭家的难民安排的,几个尼姑和一名小和尚也参加了。4时,福斯特又为他自己的人举行了晚间祈祷。他宣布星期三为难民举行一次福音传道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我们的住所及金陵女子神学院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华中美以美会的沈牧师主持女子神学院的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各地活动中都出了很大的力,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人及住在我们房子里的难民,也是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听到了最令人作呕的事情,其真实性无可置疑,因为我是直接从邻居和一名在现场的8岁小女孩那儿了解到的。日本兵来到城东南的一座房子里,房子里共13人,除了一名8岁和一名3或4岁的小女孩外,全部被日本兵杀死。8岁的小女孩背上和侧面被刺了三刀,但没有死。死者中包括76岁的老头和74岁的老太、母亲和三个女儿,三个女儿年龄分别为16岁、14岁和1岁。两名姑娘被强奸三次,然后日本兵以最残忍的无以言状的方式将她们杀死,那个1岁的小孩也被一刀刺死。类似的案例在南京我一共听到四起。德国使馆的秘书讲述了一名妇女被高尔夫球杆插入体内,他称之为“日本技术”。我照了一个母亲同她1岁孩子死在一起的照片。那个小女孩说,房东的1岁孩子(不是上述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的头被日本鬼子劈成两半,这个8岁的孩子,受伤后爬到她母亲的尸体及她小妹妹的那个房间里过了14天,吃的是锅巴和井水。在那儿,其他的人都逃到安

全区去了。14天后她的邻居、一位老太太回来救了她们。日本兵还不断地来,这两个孩子就躲在旧床单下。

昨天安全区委员会开会,对付新的危机,日本人通知德国使馆(他们现在忽视我们,但我们的主席是德国人),安全区的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返回自己家,否则将强迫他们回家。尽管南京城的很大一部分已被烧掉,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有家,日本人却全然不顾这一点。日本人说将为这样的人建造营地。然而日本人却不顾当前事实,即我们已有25个营地,住着5.8万人,加上安全区内所有的房子也都住满了人。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把这些人从有外国人的地方弄走,从我们身边弄走。在过去几个可怕的星期里,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们。没有我们,这将意味着随意的强奸,甚至是更多的谋杀。因此我们将尽我们之所能反对这么做。就在今天(也许是昨天),那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而被抓走杀害的学生的年轻妻子以为现在安全了,到安全区外的明德中学买些东西,这时一辆卡车在她身旁停下,把她抓上去,车上还有其他二十多名妇女,她们被带到城南的一所房子里,那儿有日本军官,她们将供他们“享用”。那里有位中国男佣人,他也是被抓的,告诉她惟一逃脱的办法就是呕吐,把那里弄得一团糟,这样日本人就会认为她脏,把她赶走。她成功地这么做了,日本人把她赶走了,她回来后告诉我们她的经历。你可以想象,当日本人说要把所有难民从难民区赶走时,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当日本人试图将妇女从外国人住地抓走时,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他们也许会以不让食物运进安全区作为报复。日本人似乎是一个没有性道德的民族,在这个国家,一个女子为了经济方面帮助父母而当几年妓女被认为是孝顺的行为,然后再结婚。当然在这方面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与之打交道,这些日本人根本不认为强奸是什么罪行。一名领事馆的警察,他的职责似乎是刺探外国人的情况,整天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星期前,他到金陵大学附中说要找五名妇女洗衣服,那里的人为他找了五名年龄大的妇女,他说:“不行,她们必须年轻漂亮。”那里的人说:“年纪大些的洗衣服更有经验。”后来阿利森先生向领事馆报告这事,日本领事馆人员否认有这么回事,并要求把报告这事的中国人的姓名告诉他。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否则这个中国人将不是被杀便是挨打。这个日本人后

来又到我们这里来(我想是同一天),当时我们正在吃饭,他同克拉用日语进行交谈,因为克拉懂日语,他知道我们这里有许多妇女,并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得到。

2月1日,星期二

福斯特进门(现在是12时25分)说,一些日本宪兵刚才抓走了一个姑娘,她正和妹妹走在宁海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进入位于山西路的部队驻地。这儿离国际委员会总部只隔几道门,因此,史迈士赶去了(后来,克拉也去帮着翻译),在警察局没找到这个姑娘,也不知她妹妹被抓到哪个房间。我们从日本使馆叫来了一些人,他们认为她会在那个房间,但还是没找到,在我们看来真是太不幸了。姑娘被抓走了,但妹妹却不知抓到哪里去了。这姊妹俩闯进驻地时看见许多喝醉酒的士兵。

只是在昨天,我才从我们两处房子(汉森和斯坦恩)里赶跑了喝醉酒的士兵。他们很礼貌,已准备离开,但我离开后他们又回到斯坦恩的房子,并向门房示意他们想要姑娘。我阻止了他们中的一个,继续上楼去妇女住的房间,之后很快我又赶跑了另外两个士兵,他们从隔壁的珞珈路21号进入其中一座我们正在保护的房子。一个士兵已经爬到三楼,我认为他在二楼,就使劲敲门并大喊几声,他只好离去。

大约在九天前,福斯特去斯坦恩家附近看了一位被日军杀死的姑娘的尸体。她当时正在地里捡萝卜或其他一些菜,一个士兵朝她喊,她像南京大部分妇女一样,拔腿就跑,士兵就开枪杀死她。

2月2日,星期三

由于众多原因,我们再次为大量的强奸案例而抱怨——不是抱怨令人奇怪,而是案例增加的数字让人奇怪。也许来到这里的坏士兵比以往多,虽然他们之中没有多少可供挑选。昨天午饭后,我和福斯特正忙着写信准备送到美舰“瓦胡”号,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告诉我们,一些士兵跑到他家要姑娘。那儿离斯坦恩的房子很近,我们跑过去,房子主人让我们进去并指着一间卧室,我们敲门并大声喊“开门”,里面没有反应,我们把门打破,发现两个士兵和一个15岁(后来才得知)的姑娘呆在床上。

他们不情愿地结束了他们罪恶的勾当,我们非常生气地喊着让他们滚开,他们俩都跳了起来,其中一个醉得厉害,正要缓慢走开,但另一个抓住手枪和皮带(醉汉没带武器),我正琢磨他会不会朝我们开枪,但他很快转身离去。醉汉摇摇晃晃地走出去,我们推了他一把,让他从隔板的洞里穿过去,他们俩谁也不愿意经过前门,那是正门。我们真有些粗暴,福斯特用力推着他的肩膀,我抓住他的脚,摁住他的脑袋推出了门洞。后来我想我们做得不是太好,不该那么粗暴,因为他们醉得很厉害。他试图跟我们握手,但我们没理他们。福斯特到前面找宪兵,我则跟在那个家伙后面,他试图返回,我又把他推向前。他走到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在围观,他想打人,但他醉得太厉害无法动作。他醉得正好,因为他长得很健壮。我们把他送给一个哨兵,我在手上写中文,试图让哨兵明白这个家伙抓过妇女。今天,那位父亲告诉我们,他小女儿被强奸了5次,第一次是1月14日,被两个人强奸,第二次是在1月22日,被一个人强奸,昨天又被这两个家伙强奸。就在几天前,我在下关的基督徒避难房子里阻止了一个喝醉的士兵,他正朝楼上妇女的卧房走去,这个人也是喝醉了,但很好对付。

福斯特今天从“自治会”(该会由日本人建立,试图控制南京)的一位成员那里得知,上午满载武装士兵的一辆卡车来到自治会总部,要求至少提供13名姑娘,或者尽可能找到更多。妇女设法藏了起来,但他们包围了妇女住处,到下午仍呆在那里。自治会找到了两名妓女,但这远远不够。最终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

日方当局全然不顾城中大部分地区已被烧毁的事实,宣布2月4日以前中国人必须离开安全区回到各自家中。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建议为难民搭建营地,但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留在我们已安排好的难民营里呢?我们对前景十分忧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骚乱、强奸、掠夺仍会继续,还可能有谋杀。我们就此询问了德国大使馆。他们想让难民离开的真正原因,或许至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这群外国人经常倾听难民诉苦,并设法保护他们。

目前主要的麻烦是强奸,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事。军队长官并没有采取实质措施,如果能枪毙几个倒有可能制止这种行

为——我才不信他们会那么做，因为很显然，整个军队并不认为强奸是犯罪，或是很残酷的事。昨天在我们把那个醉汉轰出去后，我想，在同样情形下，如果他是个美国兵，我们就不只是责备他了。目前就我所知，他们对强奸的态度是，只有被发现并刊登在外国报纸上才算是最大的罪恶。

毫无疑问，他们痛恨这里所有的外国人。今天，克拉和一位同我们住在一起的鞑靼机械师齐阿尔走在太平路上，一些日本兵从旁经过，其中一位看了他们一眼并厉声问道：“是美国人吗？”克拉用日语答道：“不是，是俄国人。”他们继续走去，还评论着什么。

2月5日，星期六

昨天和前天我调查了大约 30 位新入教的基督徒，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其中一些人不想进教堂，如董夫人，她的丈夫是受了圣餐的，她儿子在 12 月出去找燃料时被日本人用枪打死了。目前局势还有不少危险，教堂工作不很完善以及基督徒的信念等因素，使许多人对教堂望而却步。今天，J·L·陈布道时我同意把这些人作为新入教的基督徒。参加礼拜的会众中有一名尼姑，她是来我和福斯特的房子里避难的。J·L·陈在每个周日下午主持两次晚祷，一次为非基督徒妇女，包括街对面的庙里来的三名尼姑及其他人，一次是为我们自己的人。楼下用于礼拜的房间太小，因此不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做礼拜。我们当然有机会来见证基督教的精神——通过我们，即所有的传教士和一些留在南京的商人。几个星期以前，国际委员会的一位穆斯林志愿者马先生，在首都饭店经理罗（Lowe 音译）先生的招待晚宴上对着很多人这样说过，尽管他祖父是上海穆斯林的大阿訇，但他认为基督教是最适应现代的宗教。我们所努力做的一切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多回家的难民现在又返回（难民营）了，因为强奸、掠夺和暴力仍在持续。今天，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女婿跪在福斯特和我面前，乞求我们允许这个年轻妇女留下来。他们回到家中时，一个士兵想要这个年轻妇女，并用刺刀威胁她的丈夫。我想他们可能是昨晚逃

出来的。在过去几天里有一百多起这样的例子。就在今天我带着住在汉森房子的难民王女士去医院时,一些人在街上拦住了我,告诉我在隔壁那条街,有两个士兵翻墙进屋,在一家抢走了现金 27.3 元和一枚戒指,隔壁一家被抢去了 5 元钱。在安全区有一些外国人帮助,也发生这种事情,那在安全区以外,结果又会如何呢?

今天,德国大使馆的秘书罗森说,昨晚,派到这儿恢复秩序的(日本)将军邀请了美、英和德国大使馆的秘书们共进晚餐。他念了一份稿子作为演讲,由日本大使馆秘书福田翻译。演讲将会对日军有些作用。^①

约翰·马吉

[RG8,B263。马吉的大部分书信(1937 年 12 月 12 日—1938 年 1 月 30 日)曾由杨夏鸣先生翻译,谈礼英先生校译。收入本书时,编者又根据耶鲁原件对杨先生译文重新校译,除改正了若干处明显的误译、漏译及印刷错误外,对名称(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作了一些改动,以求体例一致。此外,编者对原译文也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其他仍沿其旧。本书编者向原译、校者致谢。马吉书信 1938 年 2 月 1 日—2 月 5 日系本书编者据原件补译。]

2. 栖霞山之行报告(1938 年 2 月 16 日—17 日)

难 民

在栖霞山水泥厂内难民营,现有一万难民,由京特博士(Dr. Gunter)和辛德贝格先生(Mr. Simberg)领导。目前人数正在增加,当我走过难民营时,正在建筑新的小屋。大部分小屋用稻草建构,同时还有

^① 原文为“The speech wa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Japanese army”,此句似乎没有写完。

几处较大的席棚。这个难民营由若干负责人管理,他们在外国人领导下工作。

庙里有一个僧侣,这里也收容难民,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这里曾有两万难民,但现在只有一千多人。显然有些原住庙内的人移居水泥厂难民营,因为那里的人数激增而庙内人数减少。

2月16日晚上,我会见水泥厂总共约25个负责人,有机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向他们提出问题。我将提交有关此次会议以及我在急诊所和偕同辛德贝格先生驱车郊外的亲眼见闻的报告。

暴 行

有一位代表说,在方圆10至20英里的范围内,估计已有700至800平民被杀害。这个估计似乎被其他的人所认同。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5平方英里,或25平方英里。他们说,强奸30岁至40岁妇女的案例数不胜数,同时,已知强奸少女案件中有10岁少女受害。

暴行继续发生。他们说,2月15日,日本兵曾经来到十堡桥(音译,Shih Pu Ch'iao),距栖霞山火车站不到1英里,他们向回到家中的老人要若干姑娘。老夫妇说这里没有,日本兵便烧掉他们的房子。我问这些负责人何时回自己的家,他们说害怕这样做,因为日本兵会来要姑娘或粮食(特别是前者),如果不能遂愿,他们的房屋就会被毁掉,或者蒙受其他损害。

另外一个报告,他所在的华树村(音译,Hwa Shu Ts'uen)离难民营5英里,日本兵于2月15日来此,杀死七个人并伤害了其他的人。这些村民最近曾经接种水痘疫苗,日本兵认为这是枪伤的疤痕,因此认为他们都当过兵。

2月17日在急诊所我看见一个农民,他的手在2月15日被两个日本兵射伤,他们向他索要姑娘。这是非常痛苦的枪伤。

一个小孩被送进急诊所,当时我正在这里,日本兵放火烧他们居住的房子,他被严重烧伤。由于父亲已经逃走,日本兵问这个孩子“妈妈”在哪里,孩子未能作出满意回答,他们便放火烧屋。邻居救出孩子。母亲早已住在难民营。

我在急诊所还同一个青年农民谈过话,他的上身严重烧伤,当时日

本兵把汽油泼在他身上,点火烧他。他们曾向他要钱,但他告诉他们,他是贫穷农民,没有钱。此事2月9日发生在南京近郊。

送来急诊所的病员,也有些是受土匪伤害。当我在这里时,有个49岁妇女被送来,她在2月14日负伤。土匪夜晚来索取钱财,当她和丈夫说没有钱时,他们用凳子打她的头和胸部并且烧她的脚。直至她交出家里积攒的四五元钱。

焚 烧 民 居

管理人员估计,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离之间,约有80%的房屋被烧毁,同时他们认为,在公路干线以外的小路上,约有40%—50%的房屋被破坏。根据我在乡下的旅行,应当说这些估计大约是正确的。

粮 食

他们认为,少数住在难民营的相对富裕家庭,拥有可以支持四个多月的粮食,但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多月的口粮。古特告诉我,难民至今仍靠自己的粮食度日。

水 牛

他们说,从太平门到龙潭到汤山到南京,这一地区的水牛大约只剩下10%。有的藏匿在山里,(水牛)巧妙地逃脱了。我在难民营看见几头水牛,也看见邻近栖霞山的乡村有三头,我想它们原保管在难民营内,最近才牵回家。我问他们没有牛而只凭人力能生产什么谷物,回答说只能生产通常产量的三分之一。

他们估计,从太平门到龙潭到麒麟门然后回到南京,这一地区正常情况下需要3000头牛。他们回答我的问题说,如果银行可以提供建立合作社买牛,他们可以在三年内偿还贷款。

种 子

他们报告只有很少种子,并接着说,即令农民存有种子,在目前情势下也不敢大批回到他们的田地。

我与辛德贝格先生驱车到乡下,在栖霞山和南京之间的途中,看见路上有少数人显然是在返回自己的田园,晚上在栖霞山难民营附近这特别引人注目。有个妇女在她的田地上施肥,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妇女是如此之少。在一个村子,我看见三个男人、两个女人和若干小孩开始重建他们的房宅,那厚实的石墙仍然屹立。

医 务 工 作

在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先生给大学医院赠送若干药物、绷带等物品的帮助下,已经在水泥厂一座房屋里开设了一个小医院和急诊室。有6个以上住院病人在接受治疗,上午我在这里时还有24个门诊病人。虽然在初期完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还是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现在有一个护校毕业的护士,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包扎员,他们非常缺乏训练。这里的病人需要一个手术(室),如果他们有一个更胜任的医生,无疑将会有更多的人得救。我在栖霞山时,外国人与三个老中医开会,他们同意开始合作,在难民营为病人照料其必需的内服药物。古特博士的想法是农民可能更相信中药,而事实上急诊室也没有内科医生。这些中医正在开列他们需要的药物的清单。计划让他们到难民营另外一个部分开始服务,以免影响急诊室的工作。

无疑这里需要的是,如果有医生值班,哪怕是每周一天,大量的病痛可以消除而许多生命能够得救。在水泥厂坚固的厂房内,建立一个手术室应是轻而易举的。一旦这里具有内科和外科医疗的适当设备,消息将传遍城郊,而病人数目将会激增。

[RG10,B102.]

3. 致麦金函(1938年4月2日)

上海霞飞路99号

1938年4月2日

麦金牧师(Rev. J. C. Mckim),并转约翰·伍德博士

纽约市,第四大道281号

亲爱的麦金:

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南京屠杀的故事是虚构

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Assyrian Rape)。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我们感到这是可怕的震撼。

中国慈善协会(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曾从事大部分掩埋工作,其负责人曾告诉我,从1月23日他们开始工作到3月19日,已掩埋尸体32 104具,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尸体与此相近。其他一些团体也在从事掩埋工作,还有一些尸体是由亲友自行掩埋。例如,城门以外约1英里处我们教会公墓的守墓人告诉我,在城外被杀的2 000至3 000平民,是由当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我需要说明,就在几周前,他自己的妻子也在那里被一个日本兵击伤。子弹已被取出留在医院,她已出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知道我们自己的人,包括初步接受基督教义者(Catechumens)和同情者,有多少已被杀死,因为许多人逃到乡下,家道较为殷实者则迁居内地。12月16日,当我们正在难民区一个地方举行可怜的宗教聚会时,就被抓走14个男人,其中至少包括两个男孩,有一个就是中国牧师的儿子,有个孩子只有16岁(中国虚岁,实际上十四五岁)。这群人在江边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只有一个人奇迹般地逃了出来。他与其他人一起倒下,虽未受伤但仍装死,并以身边尸体掩护自己。他乘黑暗逃走,回来告诉已发生的事情。稍后我看到数百尸体堆积江边。另一个宗教集会的参加者自愿去找一些燃料,在不远的街上被枪击。他的父亲是一个查经班的成员,这个班由一个牧师主持已数周。一次,一个日本兵进来,全班站着,董先生(即这个牧师——译者)翻开《圣经》,向他(日本兵——译者)说明他们正在读什么。这个日本兵拿起手边一根长而且重的铜烟杆,猛砸董先生的头部,我正在附近一个德国朋友的家中,闻讯赶到时,发现董先生血流满面躺在地板上,连忙把他送往医院。还有一次,我来到一所房屋,那里有11个人被杀死了,除三个男人外,其余都是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人是76岁老翁,还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只有一个5岁(中国虚岁)幼童幸免。还有一个9岁女孩被刺刀刺伤背部和侧身,但总算救活了。上述幼童的母亲被(日本兵)强奸,阴户仍插有瓶子。这位妇女的两个女儿,分别为14岁与16岁,被剥去衣服强奸好几次,然

后杀死了，大女儿的阴户仍插有木棍，其悲惨一如母亲的遭遇。在她们被杀以前，76岁和74岁的祖父母，曾试图保护她们，当即被击毙。如果这个严重的悲剧仅仅是个别事例，也许可以说是虐待狂恣意所为，但毕竟发生了这么多恐怖的暴行，仅我个人所直接目睹的就是这样极端残酷的惨剧。我还曾送一个15岁小姑娘到医院，她告诉我事情经过。她的哥哥、嫂嫂、姐姐和父亲、母亲被当着她的面用刺刀杀死，然后她被带往一个军营，那里有200~300个士兵。她被关在一间房里，脱光衣服遭强奸，每日数次，如此将近一个半月，直至她得病（日本兵）不敢接触她。她告诉我，那里还关着许多和她同样遭遇的女孩。我曾与一个76岁妇女谈话，她被强奸两次，她那寡居的女儿被强奸18~19次。现在不知死活。这是我个人获知（受害人）最年长的一个案例，但一个查经班的妇女告诉我，她与一个81岁老太太同住，（日本兵）命令这个老太太脱光衣服，她说她太老了，于是日本兵就将她杀了。我曾把住在我们福德教堂的妇女，一车又一车送往医院，她们是在被强奸后就医，其中最小的一个女孩只有10岁或11岁。我与同堂牧师福斯特先生花费许多时间守卫两座房屋，这里住着我们的老百姓。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白天我们轮流站在街上，以便看管好几所房屋，而当日本兵企图进入某处房屋时，我们就可以及时跑过去（劝阻）。元旦那天似乎略微平静，我们两人便离开一会儿，应邀去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刚刚结束，便有两个人跑来报告，日本兵正在追赶我们那里的女孩。我们赶紧开车回去，但已有两个女孩被奸污。另一女孩设法逃走，但一个年长妇女曾为这个女孩跪求饶免，却被刺刀捅向头顶。我还可以花费更多篇幅告诉您此类事情，但我认为我所写的已足以使您知道暴行故事决非夸张。（目前）情况虽已好转，但残杀与奸淫仍在南京继续，仅仅是规模稍小而已。

据我所知，您给《纽约时报》的信，说暴行不是日军干的，而是中国军队在日军进城以前所为。就南京而言，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虽然日军入城前中国军队有小规模的抢劫，而且城外许多民房确实是被中国军队出于防御目的而焚毁的，这当然也可以称为暴行，但这样做是因为错误地认为有助于守城，但结果却未见成效。这也是事实，张学良的军队表现极差，曾于战争时期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的大学抢劫，但他们亦曾被处决数百人。把此

间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公开诿过于中国人,这确实有失公正。我认为我写的已足够让你知悉到底发生过何种暴行。如果你想作进一步了解,可以请约翰·伍德让你看一封日记体的信件副本,那是我写给妻子的。

我之所以要写此信,是由于坚信应让所有的日本朋友了解事实真相。这是给日本友人的一份真诚友谊,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信,如果日本多数民众知道在这广阔的国土上发生的事情真相,他们一定会为之震惊,正如我们亲眼看见暴行开始时一样。这些暴行事实可以用来对付日本军方,他们才是冲突的真正根源。

我希望你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给报纸的任何错误消息。我还请求你在新闻报道中要谨慎地提及我的名字。我并非害怕个人(承担)的后果,而是担心我可能被赶出南京,我们这里的外国人曾为南京民众谋求的福利将因此而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不在这时建立安全区,并且全都为保护民众而忙碌,悲剧将更为恶化,这是南京城内每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

我曾多次访问日本,并有幸全家住在摩耶与你的姐姐为邻。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人民可亲。怎样调和我曾看见过的日本与现在我在这里所看见的野蛮,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RG10,B4,F62。由于原件没有署名,又收藏于贝德士文献中,致使编者在199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中误把此信当成贝德士所写,后经马吉牧师长子大卫等人考证,确为马吉所写,特此更正。]

4. 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

引 言

下面放映的画面只能让人简单了解一下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发生在该市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假如摄影师(马吉

自称)有更多胶卷和更多时间的话,他就会拍下许多其他的场景。他像其他人那样,这期间从早到晚忙着保护这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以某种方式帮助他们,因此偶尔才有时间去摄影。此外他还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该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教会医院(鼓楼医院,下同)收治了许多伤员和日本人暴行的其他受害者,假如摄影者能在那里逗留较长时间,那么,这部电影的内容必定还要丰富得多。他特别记得一位70岁的老太太,一颗子弹从她肩膀打进去,又从她的背部钻出来。侥幸的是,这颗子弹没有打中其要害部位,伤口很快就愈合了。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就是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只是到后来才偶尔传来一些这方面真实可信的报告。

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它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的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

为了公正,必须提到,许多日本人也承认他们的一些士兵表现非常糟糕。有两个文字记者对摄影者谈了这样的看法。一个记者认为,这类事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日本总领事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他承认日本部队确实缺乏纪律约束。这对日本军队是怎样一种评价?

在战争中任何国家都会有沉渣泛起。当然也不可否认,犯罪分子和色情暴虐狂者就利用这机会,放纵自己丑恶的本性。在日本士兵身上所看到的这些残忍和嗜杀成性,在一个今天还崇尚“剖腹自杀”陋俗和让儿童阅读残暴好杀故事的国家里,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并不是为了煽起对日本的复仇情绪,而仅仅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影片的拍摄者经常到日本去,熟悉这个国家的名胜古迹,知道在它

的人民中有许多人具有高尚的精神。要是日本人民知道这次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进行的,他们的内心就会充满厌恶!

影片的解说词

1 号影片

这段影片主要纪录了 1937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日本人对南京的空袭。该影片的结尾和 2 号影片的开头出现有中国的基督教徒,他们于 1937 年 12 月 19 日在安全区一个难民收容所的露天空地做礼拜。

2 号影片

画面序号

1) 日本部队占领南京后几天,日本轰炸机飞越南京上空。

2) 1937 年 12 月 16 日,上海路。中国妇女下跪请求日本士兵不要杀害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他们仅仅是因为被怀疑当过兵而被无情地驱赶在一起。成千上万的平民也被这样用绳索捆绑起来,驱赶到下关的扬子江边、众多的小池塘边和空旷的场地上,在那里他们遭到机关枪扫射、刺刀砍杀、步枪齐射,甚至被用手榴弹处决。

3) 下关模范村四所村的中国圣公会信徒苏宽伟(音译)和基督教教友们在日本人占领城市前逃进了安全区。12 月 16 日他和基督教会其他 13 位教友被日本士兵带走,据他估计约有 1 000 个中国人的队伍被强迫赶到下关的扬子江岸边,在那里他们一排排站着,被机关枪扫射致死。当时正值黄昏,但是没有机会可以逃走,因为日本人用机关枪围住了三面,而中国人的背后是扬子江。苏本人站在将被杀害者的后排,紧靠江边。当一排排中国人被机枪打死时,他也倒了下去,虽然他没被击中,却和几个被打死的人一起倒进浅水里,得以藏在尸堆中达三小时之久。后来他拖着被严寒冻得几乎不能走路的两条腿,爬上了岸,逃进一间无人居住的草屋中,他在那里脱去身上的湿衣服,钻进在那里找到的被褥里。在草屋中他没吃没喝躲了三天。最后,饥饿迫使他出去寻找食物。他又穿上了还未完全干透的衣服,走到以前工作过的一家英商瑞记行祥泰木行,在那里,他没有遇见任何人。当他离开时,碰上了三个日本士兵。他

们先是揍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到下关的复兴街,要他给他们煮饭。几天后他们放了他,两个士兵交给他一张盖有图章和签名的证明。他拿着那张证明,穿过城门回到了安全区他的家人那里。

4) 这个 19 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六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 19 处,腿上挨了八刀,下身挨的一刀有两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这期间她的伤口已经愈合。

5) 日本士兵闯入这青年女子在下关的家里,一家人除去她侥幸不在家的丈夫外,均被他们杀死。她是一家英国公司和记洋行的职员。日本人用刺刀劈伤了她的脊柱,留下了一个可怕的伤口。她最后死于脑膜炎。她没有对日本士兵进行过任何反抗。

6) 日本人侵入这座城市时,这个约 11 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站在难民区一个防空洞的附近。这些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她父亲,开枪打死她母亲,用刺刀刺中她的肘部。她的伤口现在已愈合,但留下一只残废的臂膀。

7) 这是一个 7 岁男孩的尸体,他被送入大学医院(教会医院,鼓楼),三天后死去。他身上被刺刀刺了五刀,有一刀刺进了肚子。男孩的母亲最先被日本人杀死,这个男孩跑向他的父亲,他父亲也被杀死。

8) 这个男子是一家中国饭店的职员,就他所说,他是被日本士兵从难民区的房子里拉出去,并在该区西侧一座小山上枪杀的 80 个男人中惟一的幸存者。他自己的脖颈、面颊和手臂上各挨了一枪,现已治愈。当时他装死,后来得以逃脱,到了教会医院。

9) 这个男子的胸部挨了一枪,因为他不明白日本人要他做什么。他是个农民。在教会医院里有许多这样的情况。

3 号影片

1) 这是一具男子的尸体。他和其他 70 个人被从金陵大学的蚕厂拉出来,他们全都或是被枪打死,或是被刺刀刺死,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这个男子被刺刀刺了两刀。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

还能拖着身子来到医院,到医院 20 个小时后死去。

2) 一个日本士兵向一家搪瓷店的职员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头上就被这个日本兵劈了一刀,这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子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教会医院六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脑子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 10 天。

3) 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 4 000 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 20 个人成功地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4) 这个男子是扬子江一条小舢板(小船)的主人,他被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医院两天后死去。

5) 这个中国人当过兵,但当他被日本人抓到时,已经手无寸铁。他的头部挨了两刺刀,还有一刀刺穿了脖子,他躺着等死。但是在教会医院治疗后,又痊愈了。

6) 这个小男孩从吴淞逃到常州,被经过常州的日本部队抓走。他今年十三四岁,已经为日本部队干了三个星期活。在他们两天不给他饭吃之后,他于 12 月 26 日恳求他们放他回家,他得到的回答就是挨刺刀戳和铁棍往头上一顿打。这个画面是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时拍摄下来,当时他正血流如注。后来他痊愈了。

7) 这个男子的家在城南门内。日本人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入侵这座城市时,打死了他的两个兄弟,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部。他于 12 月 27 日以后才被送进医院。这个画面是在鼓楼医院的药房里拍摄的。这期间他必定已经死去,因为他胸腔里格格的响声说明他受了重伤。

8) 这个女子和她丈夫、她的老父亲及她 5 岁的孩子住在光华门内。日本人入侵城市时,来到她家要食物。日本人叫她和她丈夫走出去。丈夫随着叫声来到外面时,立即就被刺刀刺死;她因为害怕,留在屋里没有出去。日本士兵随即冲进屋子里,枪杀了她抱在怀里的孩子,同一颗子弹还打伤了她的手臂。

9) 这个姓吴的女子和她家六口人住在南京城隍庙后面。四个日本

士兵在 12 月 18 日闯进她家,用刺刀刺死了她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以及她兄弟的十一二岁的孩子,用刀凶残地砍伤了她丈夫并企图强奸她。由于她解释说自己有病,他们才放过她。但这些士兵每天都去要钱,还刺伤了她邻居的脸。

10) 下关电话局职员于西棠(音译)是住在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里的 4 000 个难民之一。12 月 26 日,日本军官来到难民收容所,对所有的成年人进行登记入册。这些军官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中间有当过兵的,凡主动承认者,即可免于一死,而不报告被抓出来就杀。军官们说,自愿承认者要编入劳工队,并且给他们 20 分钟时间考虑。接着约有 200 个男子承认当过兵,他们被带走了。在街上还有一批被日本人诬指为当过兵的中国人被抓走,于(西棠)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路上被抓走的。据他说,他和其他几百人被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山丘上,在那里日本人用刺刀刺杀他们。他被刺了六刀,其中两刀刺人胸部,两刀刺人小腹,两刀刺在腿上,他失去了知觉。当他重又醒过来时,朋友们把他送进了教会医院,这个画面是威尔逊大夫给他动手术时拍摄的。威尔逊大夫在这些日子里一直为他的生命担忧,但他却在此期间恢复了健康。

11) 这个男子是南京的一所房子的主人。日本人闯进他的房子里要女人,他回答说没有女人,日本人就用刺刀刺他,他挨了两刀,刺刀深深地刺入后颈部。在这期间他的伤将会愈合。

12) 一个日本兵强迫难民区的一个中国警察带走一个中国女子,因为这个日本人想避免亲自把她拖走。他们来到国府路时,天已经黑了下來,这个警察得以逃脱。可是他又落到了其他日本士兵的手里,他们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从后面用刺刀刺他,然后把他抛弃在那里,因为他们以为他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他成功地挣脱了绳索,在一所房子里躲了起来。他在那里找到一张床过夜。第二天,他身体非常虚弱,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到了医院。他一共被刺了 22 刀,但他被救活了,并且已痊愈,这确实是个奇迹。

4 号影片

1) 这个女子和其他五个女子被强行从难民区的一个收容所里拖出

来,去给日本军官们洗衣服。她被带到一所看上去像是军人医院的楼房中。白天她必须洗衣服,夜晚供日本士兵们取乐消遣。根据她的报告,年龄较大的和普通的女子一夜被强奸 10~20 次,而一个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夜被强奸达 40 次。这里拍摄下的是一个普通女子。1938 年 1 月 2 日,两个日本士兵要她跟他们走。她被带到一所空房内,他们欲砍下她的脑袋,没有成功。人们发现她躺在血泊中,就把她送进了教会医院,在那里她逐渐又恢复了健康。她的后颈被砍了四刀,刀口很深,颈部肌肉都撕裂了。此外,她的手腕有一道严重的刀伤,身上挨了四刀。这女子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她,她也不了解其他女子的情况。

2)和 3) 一个尼姑和一个八九岁的小帮手:这孩子被刺刀刺入背部,刺伤数星期后仍然因伤口未愈而发烧;尼姑因枪击造成左髌骨穿破骨折并因此引起严重感染,如果有救的话,就需要进行一次特殊的手术,才能使她恢复行走。这尼姑和别人合住在城南一座庙后面的一所房子里。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杀死了这寺庙旁边的许多人。把这尼姑送进医院的那个裁缝估计,那里被杀死的有 25 人。在这些死者中,有尼姑庵的一位 65 岁的住持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帮手。画面上的这个尼姑及其小帮手也是那次受的伤。她们逃进一条沟里,在那里待了五天,没吃没喝。沟里有许多尸体,其中有一具 68 岁尼姑的尸体,她是被倒在她身上沉重的尸体压死或窒息而死的。第五天这尼姑听到有一个日本兵看到这些尸体时说了这样一句中国话“好惨啊”,她随即睁开眼睛,恳请这个士兵救她。随后 he 把她从沟里拖出来,叫来几个中国人把她送进陆军救护站,她在那里受到一个军医的治疗。之后有了机会,她被一个邻居转移到了教会医院。

4) 1 月 11 日,三个日本士兵强迫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蔬菜挑到城南,在那里他们抢走了他的钱,用刺刀向他背部刺了两刀,一刀刺进下腹。两天后他被送进教会医院时,他的内脏从伤口里拖出来约一尺长。送到医院五天后死去了。给他摄影时,病人非常痛苦,连医生都不敢把伤口上的绷带解开。

5) 这个人听说他母亲被打死了,就离开国际委员会建立的安全区,去证实这消息是否确实。他前往第二区,这是日本人称之为安全的市

区,并催促难民返回该区居住。他没有找到他母亲的尸体,却碰上了两个日本兵,他们把他以及他朋友的衣服都抢光,只剩下了裤子(这天是1938年1月12日,是寒冷的一天)。随后两个日本兵把他们的登记证撕得粉碎,用刺刀刺倒他们,把他们抛到一条沟里。这个男子一小时后从昏迷状态中醒来时,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失踪。后来他终于回到难民区,进了教会医院。他被刺了六刀,其中一刀刺破了肋膜,导致肋膜下的外伤性气肿。在此期间他痊愈了。

6) 这个男子是4 000个难民中主动承认自己以前当过兵的200名中国人中的一个,因为日本人答应过他们:自动承认者可以免受处罚。他和其他许多在街上被日本人抓到的人(虽然他们以前是平民)一道,共约300~350人被带到坐落在五台山附近的一所房屋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10个人一组。日本人用钢丝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要把他们押到水西门外(他听人说)去处死。在快轮到他被押走时,他和房子里的另外3个人躲在一堆垫子下,但他们还是被发现了,因为他们中有一人发出了咳嗽声。他们后来被拖到外面,20人一组站着,日本人用刺刀刺他们。刺了几下,他即失去知觉,后来又从昏迷中醒来,连滚带爬地来到美国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那里的一个中国人给他解开捆在手上的钢丝。他在一堆垫子下躲藏了一些时候,最后才去了教会医院。医生诊断他被刺了九刀,此外被钢丝捆绑的手也受了伤。他现在已恢复了健康。

7) 这个中年男子在1月10日回到坐落在对过山上的太古洋行附近他的住房里。他在自己的院子里遇到三个日本士兵,其中一个无缘无故地开枪打伤他的两条腿,有一处伤口相当严重,但是他现在很可能已痊愈。

8) 1月24日,日本士兵企图命令这个男子纵火焚烧坐落在大学医院附近双龙巷里的中和(音译)饭店。由于他拒绝纵火,他们就用刺刀击打他的头部,他的头部裂了三个口子,但是没有危险。这次摄影时,他差不多已恢复了健康。

9) 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5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就立即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

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抢走,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四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四岁孩子被刺刀刺死,两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呆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只锅里找到的锅巴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将孩子的叙述与被杀害者的一个邻居和亲戚的叙述作比较,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回到这房子里,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拖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床单下面。

在发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之后,所有邻居都逃进了安全区。画面中的这个老太太14天后来到了她的邻居家,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这个老太太把摄影者领到了摆放尸体的院子里。她、夏先生的兄弟和被救出来的大女孩对我们讲述了这个悲剧的详细情况。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

5号影片

1) 这是1938年2月15日南京上海路一景,难民区的临时集市。拍这幅画面时,棚子已大大减少,因为有些人已返回城里各个城区。目前这里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人群拥挤的马路上开出一条道来。因为不

时有中国游击队出没的报告,因此日本飞机在市郊上空巡逻,偶尔还听到枪炮声。

2) 伍长德是一名隶属卫戍司令部的警察。他于12月26日被日本兵抓住,他们宣称他是士兵,被带到首都剧院对面的一处地方。这里已有被抓来的大约1000名男子,他在那里呆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被一起带到了汉中门,并命令他们坐下。他们70~80个人一组,被迫走出城门,每组人都被机枪扫射倒地。幸运的是,吴所在的组走在最后,这时天色已晚,机枪一响,他虽然未受伤,但立即倒地装死。日本人弄来一些燃料,开始焚烧尸体,一些士兵用镐把柴火堆成一堆。一个士兵走近吴时,发现他仍在呼吸,就用镐猛击他的后背,然后拿柴火放在他身上,点着火后他才离去。吴在火烧到他之前爬出柴堆。他不得不在城外呆了10天,第三次进城时他扮成一个乞丐才得以成功。这幅画面摄于2月15日,这时他的伤实际上已治愈。

3) 这位年轻的姑娘被日本兵从安全区的一所小房子抓走,在城南关了38天,这期间她每天被强奸7~10次。她患了三种最常见的性病,而且阴道大面积溃烂,士兵无法再接近她了。后来她被释放,1月26日被送到教会医院。这幅画面是几周后拍摄的。在她死去的同一天,她的当警察的丈夫也被抓,并从此杳无音信。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他与那时被屠杀的一千多人一起遇害。

4) 这是乡下人把伤员运往南京近郊的急救医院的情景。摄于1938年2月17日。

5) 病人在医院排队等候。

6) 这是驻南京某旅被打散了一个士兵。他和其余8名同伴于12月13日在紫金山向日本人投降。他们连续3天没有吃没喝,然后又和200名平民以及被俘士兵被押至紫金山附近一个地方,日本兵让他们站成3长排,然后用机枪射杀。他虽未被击中,但也倒地装死。日本人向他们身上浇一种液体燃料,点着后很快燃成大火。由于天色已黑,这名士兵乘人不备爬了出来,虽然他的一条腿被严重烧伤。他于12月18日到达教会医院。他的伤口难以治愈,但两个月过后拍摄这幅画面时,他已基本恢复了。

7) 这是南京郊区长利乡(音译, Ch'ang Li Hsiang)的一位农民。2月15日, 两名日本兵闯入他家索要姑娘。他说“没有”, 他们将其手部射伤, 当时去鼓楼医院治疗, 其伤势非常严重。

8) 这位63岁的农民姓周, 家住乌龙乡, 距南京和平门约6英里地。日本人第一次来这里时他正出去找他的水牛。其中一些士兵开枪射中了他。直到1月26日他才被送进医院。此画面是在他人院三周后拍摄的。

9) 这位49岁的妇女和她丈夫是在2月14日夜晩被中国盗匪伤害的, 他们家离南京大约有10英里。盗匪索要钱财, 他们说没有, 盗匪就用凳子砸在她的头和胸部, 然后点火烧她的双脚, 直到她说出藏了4元多钱的地方, 这才饶了他们。

10) 这位姓褚的农民56岁, 家住南京近郊的东流镇(Tung Hiu)许巷(音译, Hsu Hsiang)。日本兵先闯入他家, 命令他全家人离开房子。老人26岁的长子头中两弹而死, 次子被刺刀刺死。老人背后也中了一枪, 子弹从他下腹部穿出。他妻子及几个年幼的孙子未受伤害。

6号影片

1) 这名孩子的母亲前往一个受外国人保护的难民收容所, 但其丈夫和3岁的孩子留在家中。2月14日, 孩子的父亲看见日本兵来了就撤下孩子单独逃走。事后, 一位邻居救了孩子, 孩子告诉他, 日本兵曾问他妈妈在哪里, 他们没找到他妈妈, 就放火烧了房子。一位邻居从火中把这个已严重烧伤的孩子救了出来。这个孩子能否康复还是个问题。

2) 这是住在南京附近一位年轻农民。2月9日, 几名日本士兵闯入其家中索要钱财。他说没有, 日本兵就在他身上浇上煤油, 点着了衣服。请注意他上身的烧伤。

3) 中国士兵被处决后又被扔进了池塘。他们被处决时手臂都被绑在背后, 这点看得很清楚。这是日本人处置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的典型做法。

4) 一些四川籍士兵的尸体躺在南京近郊路上的两幅画面。

5) 这辆军用小汽车毫无疑问乘坐了一些军官, 它在南京附近一条马

路上遇上了地雷,血溅得满车内都是。或许两个骑马人也被炸死,因为附近有两匹死马。

6) 一位老妇人的尸体躺在乡间马路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她也许是上流社会的妇人,因为戴着灰色假发。很显然她正在路上蹒跚前行,曾在她躺的那块地后面躲避日本兵。她是被故意谋杀还是被流弹射杀,现在还很难说。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就这样死去,她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大约有 25 个村的村长说,在南京以东的乡村地区,每 5 英里方圆的地方,至少有 700~800 平民已被杀害。

7) 一位很本分的农民被烧毁的房子。据村长估计,在南京以东约 15 英里的地方,在通向龙潭(Lungtan)的主干路两旁的房屋约有 80% 已被烧毁,一些较小的马路两旁约有 40%~50% 的房子被摧毁。这幅画面再现了一家开始重建房屋的情景,石头砌的墙仍矗立在那里。这个村子的几户人家没有一人被杀死。

8) 一座由外国人保护的难民营 10 000 名难民集中在一起的情景。难民自带粮食,用稻草搭建棚子。这幅画面摄于 1938 年 2 月 17 日,当时,大部分难民所带粮食只够吃一个多月。他们不敢回家,因为日本兵经常去索要姑娘,而不能满足他们要求时,就焚烧房屋或干其他坏事。

7 号影片

1) 一名 15 岁的姑娘站在教会医院的汽车旁边,她乘这辆车刚到医院。她的父亲余文华(音译, Yu Wen-hua)在芜湖有一家店铺。一些日本兵闯入他家翻找值钱的物品。他们把住宅和店铺都抢劫了。姑娘的哥哥在一边帮助他的父亲,他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受过军训并有一套军装。日本兵发现了这些就说他是个士兵。据姑娘讲,日本兵想砍掉他的脑袋,要他跪下,但他拒绝了,因此被杀害。她父母跪在日本兵跟前,乞求他们饶了孩子们的性命。然后这群日本兵试图强奸姑娘的嫂子,她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护士,她坚决不从,他们就把她杀了。他们又要强奸她大姐,她也不从。然后,在她父母跪下乞求时,日本兵把他们也杀了。全都是用刺刀刺死。父母临死之前告诉她女儿,日本兵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位姑娘已昏了过去,日本兵把她捆起来带走。到了另一个地

方,她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已被强奸。她发现她是在一栋楼房的二楼,这座房子现在是座兵营,有 200~300 名士兵。楼里有许多妓女,她们很自由,待遇也不错。也有许多像她这样的良家妇女,有的来自南京,有的来自芜湖或其他地方;她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因为她们都像她一样被锁在房间里,而且她们的衣服也都被拿走。她认识的一个和她同时从芜湖抓来的女孩子自杀了,她还听说其他人也有自杀的。日本兵想强奸她,她拒绝了,因此挨了耳光。她每天要被强奸两到三次,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当她病得很厉害时,日本兵就不靠近她了。她病了一个月,这期间她经常哭泣。一天,一位会讲中文的军官进了她房间问她为什么哭。她把她的遭遇告诉这位军官后,军官用汽车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门释放了她,并在一张纸上给她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个字,这是一所著名的美国差会办的女子学院,在最危险时期曾保护了 10 000 名妇女。这个女孩子病得太厉害,第一天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都去不了,途中在一家中国人的房子歇脚。第二天,她终于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然后被带到了教会医院。

2) 在南京的几辆日军坦克,大约有 60 辆坦克列队庆祝一个日本的节日。

3) 一名妇女正由医院救护车带往教会医院。

她是教会墓地看护人的妻子,墓地位于南京城墙外 1 英里。3 月 11 日,一个日本兵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她不敢快跑,但开始慢慢移动,这时日本兵开枪击中了她。子弹已被取了出来,伤口会很快治愈。

4) 这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的日常一幕。人群中有许多妇女,她们的男家眷被抓走或杀害。这幅画面摄于 3 月 15 日,她们正在向委员会递交请愿书,请求帮助。

5) 朱女士大约 47 岁,她母亲 77 岁,她小女儿 10 岁。多少年来,他们一直住在南京南门不远的一条很偏僻的街上。她当寡妇已经 9 年了,她的丈夫曾在国家造币厂工作,他死时给她留下一大笔钱。这笔遗产已投资到煤矿。

12 月 13 日上午,日本兵闯入她家,这一天,他们光顾她家大约有 20 次,抢走她所有的钱。14 日和 15 日,日本兵每天又去 10~20 次,抢走 13

件金饰品和 12 只箱子、提包中的大部分物品。这三天里朱女士被强奸了 12~13 次,大多以很粗暴的方式。15 日下午,城南开始燃起大火,她领着老母亲和小女儿带着铺盖卷向北城区逃跑。在离她们家不远的地方,这位老母亲走散了,朱女士和女儿悲痛万分,一起跳进了路边的一只井里,幸运的是井很浅。她们在井里从 5 时一直呆到 8 时,这时一位过路的商贩发现了她们,并坚持要救她们。一开始她坚决拒绝,但后来同意了。她和她女儿在这位也很可怜的救命恩人的家里住了一晚上。16 日下午她们到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同时,老母亲也在很艰难地朝北走去,最后在一家小店的前面的长凳上歇脚。一个日本兵从里面走出来,喊她“老姑娘”,让她进去。她想这个日本兵可能觉得她很可怜,让她进去休息;但哪想到根本不是对她友善,而是把她强奸了。他喝醉了酒,吐得老妇人满身都是。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个士兵强奸她。在她离家后的第三天,她终于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并与女儿、孙女团聚。这位老妇人自 32 岁起就开始守寡,她丈夫曾是一名官员。这两晚上她都是在路边睡的,到难民营后她路都走不动了。

12 月 22 日,大量的年轻姑娘拥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不得不劝说老年妇女回家,尽管这意味着很危险,而且要遭受极大痛苦。当时很担心,如果难民营外没有一名妇女,日本兵就会闯入难民营,用武力抢走妇女,这样不论年龄大小,所有妇女都会遭殃。朱女士和她的母亲、女儿就回家了。那晚上三个士兵轮奸了她,其中一个家伙逼她脱下所有的衣服,还有一个逼迫她张开嘴把他的污物吞下。他以刺刀威胁,她不敢抗拒。那晚老妇人免遭伤害。第二天天刚亮,她们不得不返回难民营寻求保护。

画面顺序如下:

- a. 她们站在大院的门口。
- b. 从大街去她家的入口处。当摄影者赶来时,站在左边的第三个妇女正在哭泣。她丈夫姓王,租了朱女士的一间房子。她和她的女儿、儿子在日本人进城前就搬进了安全区,她丈夫还留在家里。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日本兵就闯入他家索要妇女。他说他不能那么做,日本兵就用刺刀刺伤了他的头。第二天,他们再次向他索要一个年轻的姑娘。他说

他实在找不到,日本兵就把他杀了。王夫人的大儿子从在安全区的家中被抓走,从此没有音信。王先生 58 岁,儿子 24 岁。

c. 朱夫人和她的小女儿站在井边。这是她们试图跳进去自杀的那口井。

6) 这幅画面应接在 4 号影片的第 9 个案例,一户有 11 口人的家长被杀死。

a. 在发生这些惨剧的地方,每家院墙上都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画有一名日本军官抱着一个(中国)小孩,把一桶米送给小孩的母亲,糖和其他食品送给小孩的父亲。宣传画右上角写着:“回家吧!我们会让你们有饭吃!请相信皇军!我们会救你们、帮助你们。”这样的宣传画在发生惨剧的房屋或附近随处可见。

b. 这是两个孩子的画面(在 4 号影片第 9 个案例曾提到)。这个小女孩有七八岁,她弟弟有三四岁,正站在通向院子的大门口,院里的房间躺着她们的两个姐姐,一个 15 岁,一个 14 岁,都被强奸后杀死。他们穿过门站在一张桌子的旁边,这是这些惨剧发生的地点之一。血溅在桌子上、地板上和房间其他部分。祖父和祖母被杀死在同一房间,大一点的那个孩子被刺刀刺进背部和一侧而死。画面中出现的那个男人是他们的叔叔,他和妻子在惨剧发生前逃到安全区。

c. 还是上述那些孩子站在他们母亲被强奸、杀死的房间门口,他们在那里呆了 14 天,直到有人救出他们。这是三个月以前这个女孩被刺刀划的伤痕。

d. 这是姓哈的穆斯林在小院被杀的地方,那块石头上仍有他的血迹。

e. 日军进城后,在城东南的新路口街,离这场惨剧发生地点不远,曾杀害了 400~500 人。

8 号影片

1) 这幅画面接着 7 号影片第 6 个案例中的画面 C。

2) 一天之内,有 22 000 份申请递交给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请求帮助。每份申请必须调查核实。

3) 这是一所基督教学校的刘厨师一家。画面左侧的是他大儿子,16岁,1937年12月14日,他正在为一群基督徒难民淘米准备做饭时被抓走了。他和另外一群大约有100人被带到下关沪宁铁路附近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手都被反绑着。据他讲,这群人中包括两名13岁的男孩,两名和他同样年龄,一队南京警察,还有12人是着绿色制服的邮政职员。对这个小男孩幸运的是,他和一位住在鼓楼的42岁的小店主都站在队伍的后面,日本兵在一个个射杀这群人时,他们有时间用牙咬开绳扣。他们在一条沟里躲了两个晚上,直到认为安全时才走出来。他们遇见一个日本兵提着一大桶酒,日本兵就让他俩抬进城,因此,他们得以回到安全区。

4) 65岁的俞夫人(音译),家住南门外5英里远的俞家村(音译,Yu Chia Ts'un)。3月14日夜里,一群中国盗匪闯进她家要钱。她说没有,他们就把煤油泼在她身上然后点火。当时她一人在家,但第二天,她孙子和一个邻居把她抬到教会医院。她上半截背和部分手臂、胸被严重烧伤。此画面摄于她到医院后不久。

5) 这个男孩姓徐,14岁,和他父亲(也在画面上)住在南门外3英里的地方。日本兵在2月27日下午窜到他家索要姑娘,他说没有,一个兵就开枪打中他的腿,造成股骨穿破骨折。医生认为他可以恢复。

6) 王培相(音译,Wang P'ei-hsiang)家住南京九江路。3月9日晚上8时,一个日本兵敲他家门,要王和他一起出去寻找姑娘。王拒绝了,这个士兵至少是个中士,他抽出军刀向王抡去,王用手去挡,被砍掉了一个手指;但这却救了他的性命,要是砍的地方再高出四分之三英寸,他就没命了。他赶紧跑到街上,日本兵在后面追,但很快就不追了。

7) 夏夫人,27岁,家住南门外,她丈夫29岁,受雇当警卫。她母亲63岁,夏夫人两个孩子,分别是3岁和1岁,他们都住在一起。有四五个日本兵去她家并叫她丈夫出来,出来后把他枪杀了。日本兵然后在她家房子四周放火,其中有个日本兵告诉夏夫人和孩子跟着他们走,但不让她母亲跟着。她被带到一间空房,一个日本兵强奸了她。她逃到一户中国人家,然后在稻田的一堆草里藏了20天,这个中国人给她送饭。直到3月下旬,她仍未找到她母亲,她担心母亲已经死了,因为分手时她已经

病了。

8) 这是蔡盼生(音译, Ts'ai p'an-sheng)的遗孀,蔡被杀害时仅 36 岁。他们住在城西南的五福寿街(音译, Wu Fuh-shou)。3 月 10 日,一群日本兵闯入他们家。两个人在外面放哨,三个人窜进屋内要钱。他们全家人跪倒在地乞求饶恕。这群士兵搬了一个木头梯子放在门前,把蔡的双手绑在背后,吊在梯子上,双脚在地板上晃来晃去。然后他们对屋内所有人开始彻底搜查,偷走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钱财,并打开箱子,拿走了所有的衣服和其他物品。临走之前,他们在蔡的大腿上刺了六刀,每个肩上两刀,最后朝他头部开枪击毙。当蔡夫人跪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向她的头和背部刺了数刀。一位姓王的老佣人的腿被刺伤了三处。此幅画面是蔡夫人家及四个孩子——一个 13 岁的女儿和三个儿子,分别是 8 岁、3 岁和 1 岁。注意吊蔡的那个梯子和蔡夫人背部和王的腿部上的刺伤。

9) 摄影者在蔡家时,另外四名妇女进屋来说她们的男人也被杀害(参看 8 号影片,第 7、9 案例;9 号影片,第 1、2 案例)。南京有数千名妇女的丈夫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抓走再也没有回来。这幅画面的主人是俞更时夫人(音译, Yu, Keng-shih), 32 岁。她有四个孩子,分别是 11 岁、7 岁、3 岁和 1 岁,住在城西南的明阳街。她丈夫 39 岁,是一名纺丝工人。日本人进城时,有十多个士兵闯入他家,把俞叫到一个小院子,在那儿把他枪杀了。俞家房子是租了另一家的,这家主人也在同一时间被枪杀。

9 号影片

1) 蔡文江太太(音译, Ts'ai Wen-kiang)的丈夫 49 岁,在南京南门外 25 英里处的陆潭桥镇(音译, Lu Tan Ch'iao)的一家店铺当店员。蔡太太 39 岁,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儿 16 岁,三个儿子分别是 13 岁、10 岁和 8 岁。大约在 12 月中旬的某天清晨,天还未亮,一家人还在睡觉,一伙日本人破门而入,用他们随身带的铁棒抽打蔡氏夫妇,逼迫蔡和他们一起走,蔡太太跟在后面。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时,扒掉了蔡的衣服,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扔进池塘。日本兵站在一边直到他被淹死,而蔡太太无法去

救他。她说那个镇有另外 8 个男人被淹死,还有七八人被枪杀。这个小镇的人们都逃到山里去了,蔡太太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了 50 天。她 3 月 16 日到了南京,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这幅画面是她与她的一个孩子站在城西南的一条街上。

2) 这是李高氏(Li Kao-shih,音译),现在成了寡妇,在日军进城之前就逃到了江北。1938 年 3 月 16 日她返回南京寻找她 71 岁的父亲,以前和她生活在一起。这时她才知道她丈夫被杀害了。他一直住在洪武路虹桥(Hung Ch'iao,音译)的房子里。日本兵到他家要钱,他不愿把他仅有的那点钱给他们,他们朝他头部刺了两刀。在同一处房子里,还有三名男子被杀死,另外三名在街上被杀死。

3) 这是一位姓何的农民,家住在秣陵关(Mo Lin Kuan)附近,离南京南门约 15 英里。2 月 13 日,日本兵去他家要牛、驴和姑娘。他一样也没有,因此他们把他用绳子捆起来,与地面平行放倒,离地面约有 3 英尺高,然后撕开他的衣服,在他身体下面点火,烧他的小腹、生殖器、大腿、胸部和左臂,毛发都烧焦了。其中一个士兵因为他的年龄反对这样做,他扑灭了火,还把正在着火的衣服扯了下来。日本兵离去后,家人为其松了绑,和亲友一起走了 17 英里路,才把他送到了教会医院。

4) 这是一位 18 岁的姑娘,被两个日本兵轮奸。她正在医院治疗脚气病和性病,性病是由这些士兵传染的。全城像她这样的人有几千名。

5) 这些是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拍摄的画面:

从 12 月 1 日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开始为收容妇女和孩子难民做准备。12 月 8 日,第一批难民拥入——主要是城墙周围地区的妇女、孩子,中国军队对这一地区的房屋进行了清理,以便于更好地防卫南京。金陵准备最多能接纳 2 750 名难民,但到 12 月 20 日,有 10 000 多人挤进了校园,难民恳求如果屋内没地方,在室外就行。在拍摄这幅画面时,难民营里只剩下 3 000 人,年纪大一些的妇女都回家了,她们可以找一些没有烧掉的房子住下。

a. 大学教堂。每天下午大约有 300 名妇女和姑娘可进去听听关于基督教的谈话。复活节前数周内她们学习了什么是基督的生活。

b. 她们下午礼拜后走出教堂。注意:她们很愿意被拍摄。

左侧是四个盲人姑娘,来自市盲人学校。工作人员大部分从难民中招聘,在许多新组建的学习班帮助教授课程。

c. 背着铺盖刚来的难民。这些人大多来自现在已解散的难民营,或是来自对女孩子还很危险的乡下。她们说日本兵正在焚烧乡下的房子,以发现姑娘藏在何处。许多姑娘住进仔细遮盖的地下洞穴长达数周,只有在晚上没有危险时才敢出来。

d. 这是买开水的画面。校园里两只烧水锅炉,难民只需花几文钱就可买到开水。锅炉主人很乐意把它们搬进校园,因为这既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又可以得到保护。

e. 难民在洗衣服。每天早晨校园就变成一个洗衣店,每棵树、每棵灌木和每道篱笆都挂满了衣服。因为有几百名婴儿和小孩,妇女们每天都在忙着给他们洗衣服。

f. 难民在寻找丈夫和儿子的请愿书上签名。在数千名失踪的丈夫和儿子中,现在有一线希望,部分人能在模范监狱中找到。为了他们的获释,妇女们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请愿书将送交有关的中日官员。在头两天有 600 名妇女签名。大部分妇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因为她们大多是出身贫寒的农民或菜农。因此,先由识字的中国先生把她们的名字写下来,然后她们在上面按个指印。有些签名的妇女失去了她们惟一的儿子——这是她们年老时惟一的依靠;有些妇女失去了三四个儿子;还有一个妇女家中失去了三位男性。12 月 16 日是失踪人口最多的一天。一个人很难硬起心肠告诉这些痛苦,心碎的妇女,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也许就在城门外的一堆堆尸体之中,或者在红十字会或其他机构及个人掩埋之前,他们的尸体已在偏僻的山谷中呆了好几个月。许多妇女将来除了讨饭,还能做些什么呢!在目前形势下,她们又到哪里去乞讨呢!

g. 体育馆。三个月以来它挤满了数百名难民。她们中许多人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苏州、无锡和其他沿线城市撤出之前就撤到南京。

h. 难民排队等候种痘。金陵大学医院的柏睿德博士为校园中近 2 000 人种了痘。

i. 难民在学习识字。这个班每周用五个下午上课,学习一些汉字。现在一共开了 23 个班,有 1 000 人参加。

10 号影片

1) 这幅画面主人是位于南京湖北路 80 号的一家小店店主,叫陈经河(音译,Ch'en Ching-ho),42 岁,和一个 16 岁的男孩站在一起。1937 年 12 月 14 日,他们俩一起从一个杀人现场中逃出。(关于这个男孩的经历,请看 8 号影片,第 3 个案例。)

12 月 11 日,陈和妻子及 6 个孩子去了安全区,住在宁夏路 7 号。12 月 14 日下午 4 点,他被日本兵抓走,和 103 名中国人一起被带往下关。他注意到沿途有好几群被抓的中国人。他这一群中有三个和尚,七个或八个孩子,还有一些年过 60 岁的老人。他前面的那群人有 30 多名南京市的警察,六名着绿色制服的邮局职员。到了下关的热河路,他又注意到中山桥附近有 300 个中国人双臂被绑到背后。他这一群人走到和记公司时又返回四所村,是苦力阶层的居住地,在沪宁铁路附近。他们被分成两队,面朝不同的方向。被杀死的第一个人离他很近,他(指第一人)双手被绑在腰带上,日本兵把他推倒,抽出大刀朝他头上砍去,这把刀一边是锋利的刀刃,一边是锯齿。陈看见这人被杀死,趁日本兵不注意,溜进另外一队,这队所有人手臂都已捆绑完毕,他因此幸免。他站在姓刘的小男孩后面几排。同时,小男孩在用牙咬手腕上的绳扣,最后终于咬开了。在他们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手枪、步枪射杀时,他们俩成功地溜进铁路路基下面的涵洞里。当时是晚上 9 时,天上有云,因此月光不是很亮;否则,他们是不可能逃脱的。

他们在那儿呆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晚上,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岳父出现在他面前,并说他将明天带他出来。第二天他看见一只蜜蜂飞来,在这个季节这是很奇怪的;他自言自语。蜜蜂向北飞去,然后向西,又转向北。他们跟随着蜜蜂走出了他们的隐藏地,最后到了汉西门外的一个地方。在这儿他们碰见一个日本兵带着一大桶酒,日本兵就让他俩抬进城里,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城门。把酒抬到朝天宫后面的军营后,他们被释放,到了安全区。

2) 日军在城南一带破坏的情景。

a. 在太平路圣保罗教堂的塔顶所看到的房屋被日军焚烧后的断壁

残垣。

b. 这是一座中式大建筑被毁坏的画面,它是美国圣公会的财产,用于传教目的;在12月下旬和1月26日两次被日军焚烧。

c. 这是圣保罗教堂的牧区议事室,在南京陷落前曾遭受炸弹破坏。

d. 从南门附近中华路使徒会教堂顶端所拍摄到的画面。

e. 使徒会的两座建筑已被日本人烧毁。

f. 位于中华路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筑被破坏后的画面。

3)

a. 这是南京众多池塘中的一个。许多人被日本人杀死后又被扔进了池塘。大约在12月26日,这里有四十多人被杀死,他们的双臂都被反绑在背后。红十字会把尸体埋在远处可见的土堆里。在拍摄那天,有一具尸体浮出水面,双臂仍被捆绑着,在这幅画面上可以看得见。

b. 这是上述池塘附近的另一池塘。邻居们站的那个地方,曾有96个男子双手被捆在背后,浇上汽油和煤油,然后放火焚烧。有几名外国人亲眼看见被烧焦的尸体堆得很高。一只汽油桶在拍摄那天被打捞上来,仅这一次焚烧就用了好几桶汽油。在焚烧这些人的那块地方,连草根都烧焦了,没有一点绿色,而池塘其他岸边则绿草茵茵。一些人身上着火时就开始逃跑,但被机枪射杀。有两三名成功地逃到远处的房子,这座房子又被他们燃烧的身体引燃了家用燃料,房屋起火了。

c. 这是上面提到的那座房子的近景。那家人站在残留的墙边。邻居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时都四处逃散,但一些离得近的人听见焚烧的声音,后来又听到机枪声。一个年轻人在远处看到这一切,但他本人没有被发现,因为当时已经是下午5时,天快黑了。可能就在这儿,或是在其相邻地方,那个男子被烧死,他的尸体放进了医院停尸房(见3号影片,第一个案例),一位邻居在路上碰到一个行人,他描述了死者头部被烧的情况,与停尸房的尸体特征一致。

从1月23日红十字会开始掩埋尸体,到3月19日,在南京及近郊区(城墙附近)共掩埋32 104具尸体。他们估计也就刚做了一半的工作。还有许多尸体是由亲属或其他机构掩埋的。日本人在城区燃起许多大火,很可能是为了焚尸灭迹。在城墙以外的地区仍有大量的尸体有待

掩埋。

11 号影片

1) 葛叶氏(Koeh Yieh-shih, 音译), 74 岁, 和一个 16 岁的姑娘住在观音门, 从南京往下游走约 5 英里。12 月日本兵闯入她家中, 抢走了她所有值钱的家当, 大约值 1 000 块钱; 还带走了这个姑娘, 从此再没有人见过她, 也没她的音信。当时她试图保护这位姑娘, 一个士兵把她推倒在地, 致使其肩肘错位。她不得不在三个月后来医院求治。

2) 陈崔氏(Ch'en Chu-shih, 音译), 46 岁, 住在南京东边马群镇附近的乡下, 她丈夫是个农民。12 月日本兵放火烧了她家的房子。她冲到前门想抢救一些物品, 没看见房后有一个日本兵, 他开枪打断了她的腿。

3) 王夫人, 只有 18 岁, 住在南京水西门外。一个日本兵向她索要钱财(她只有一两块钱), 她不给, 这个家伙就开枪打中她腿部, 并把钱抢走。因为她没能马上去医院, 腿上生了坏疽, 膝盖以下必须截肢。

4) 董良益(音译, Tung Liang-yi) 夫妇住在南京水西门外大胜关镇(Ta Sheng Kuan, 音译)附近的一个村庄。日本人来到时说他是士兵, 就在他后背刺了好多刀, 他当时昏了过去。日本人又回来四次看他是否真死了。但每次他都装死, 尽管还活着。

5) 胡经宝(Hu Ching-pao, 音译)住在南京附近一个村庄。2 月 30 日三个日本兵来到村庄时他正和他哥哥站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 日本兵在 200 码以外的远处向这弟兄俩开了枪, 哥哥被子弹穿透了肩膀, 但伤口很快就愈合了。他的臂骨碎成多块, 有大有小, 在他去医院时已严重感染。他拒绝了截肢的建议, 因此, 医生正在全力挽救他的手臂。

6)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1938 年 4 月 18 日。

说明: 从 2 月 27 日至 4 月 9 日, 共有 23 个班集中学习“主的生活”。这个活动在复活节前一周和复活节期间达到了高潮。这个为期六周的学习班的结业仪式于 4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举行, 有各班的 600 名学员出席。每个班都准备了一些节目, 多是她们从这次活动学来的一些内容。最后, 给每个班从来不缺课的学员及成绩最好的学员发了很简单的奖品, 这些画面拍下她们的种种活动, 次序如下:

a. 列队行进。8时20分,所有的学员在广场集合,排成一队前往大学教堂。学员年龄在9~37岁之间,但大部分人15~21岁。文化程度从文盲到高中毕业生都有。各个班级是按她们的文化程度划分,大部分属于3~6级,虽然有近20名高中毕业生。

b. 全体学员齐唱赞美诗《古老的岩石》(Rock of Ages)。大部分学员已记住了这首诗,而且很喜欢唱它。

c. 18~19岁年龄段的认字班在结业典礼上背诵了《八福》,另一个识字班背诵了《十诫》。

d. 3~4级的一个大班在唱“爱之主,和平之王”(God of Love, King of Peace)。

e. 上述同一个班的一位学员上台讲述了耶稣12岁时的故事。

f. 由12~17岁的文盲姑娘组成的一个大班在演示她们在六周课堂学习中认识的汉字。

g. 受过几年私塾或小学教育的已婚妇女班代表表演了《诗篇》第121节和23节。

h. 一位难民在教一组上过二年学的学员背诵《诗篇》121节。

i. 六年级的学员排了一个独幕剧,诠释了“厚生”的生活方式,剧名叫《通向厚生之门》(The Door to the Abundant Life)。^①

j. 六年级的学员在唱新赞美诗集中的“起来,从罪中求解放”(Arise, Be Free, Ye Slaves of Sin)。

12号影片

1) 1938年4月17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举行复活节庆典。

A. 复活节上午。(地点:实习学校南边)

a) 抹大拉的马利亚告诉另一个马利亚和莎乐美,基督正从死亡中苏醒。

b) 她们正在谈话时,约翰和彼得过来告诉她们,他们看见过复活

^① “厚生”, abundant life, 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训, 来自《约翰福音》10章10节: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的主。

c) 众人跟随着他们,都在欢呼主的复活。

B. 从夜晚到黎明。

a) 王菊琪小姐(音译, Wang Jui-chih),是六周学校的教务长,兼任具有初、高中程度的学员班教师。她正在解释庆典的意义。

b) 一些学员在读《新约》选章。

c) 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城的约瑟从耶稣审判厅非常痛苦地返回来,他们恨自己是主的沉默的使徒,主叫他们学会去爱。尼哥底母决定让人们知道,他是真正的使徒,虽然为时已晚。

d) 约瑟给了仆人一些钱,他是主的信徒,约瑟派他去尽其最大努力挽救主。

e) 以斯帖,约瑟的妻子,她的男仆是个信徒,她想知道他们能否把主从十字架上救出。

f) 两个仆人急忙赶来,说主正被带上十字架受刑。最后,约瑟被说服,他必须去挽救主耶稣。

g) 以斯帖对耶稣之死痛苦不已。她来告诉她耶稣复活的消息,她俩一起去寻找复活了的主耶稣。

2) 一个现金救济计划。金陵的贫寒难民为学校草坪拔除杂草挣一点钱。

3)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工作人员。除五人外全部来自难民,但其中大多数是应邀来的。

4) 王太太和她的女儿林珊(音译, Lin-sang)。林在危险时期被挡在城外将近一个月,住在金陵的妈妈非常着急,她想尽种种办法以确定她是否还活着。林打扮成一个小男孩,因而救了自己一命。

5) 一群难民在洗头。

6) 负责发放救济金的程夫人付钱给拔草的妇女。

7) 施粥厂:由南京红十字会管理,每天可以供应两次稀饭,每碗三个铜钱,如果难民付不起就免费。

8) 从青浦和上海战区来的 13 名男孩和三个女孩在南京圣公会驻地避难,他们从 11 月份就住在那里。五个月之后,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努

力,除一个人外,他们都与在上海的亲属取得了联系,双方皆大欢喜。一切安排就绪后,他们将返回原地。这幅画面拍的是在他们离开南京前,(圣公会)向他们赠送《新约》的场面。

(此件背后有手书的“请归还上海 Jespeed 路 990 号福斯特夫人”字样)

[RG8,B263—7。“引言”和 1~4 号影片的解说词曾收在拉贝 1938 年 2 月 11 日的日记中,1997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贝日记》将其翻译发表。收入本书时,编者根据耶鲁所藏原件对译文做了少许订正和补充,其余仍沿用《拉贝日记》的译文,特向原译者表示感谢。5~12 号影片解说词系本书编者译出。]

五、麦卡伦

麦卡伦(James Henry MaCallum)1893年11月19日生于华盛顿州奥林匹亚。1917年完成在俄勒冈大学的本科学业,1921年在耶鲁神学院获神学学士学位;然后在芝加哥神学院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并利用休假在协和神学院攻读博士课程。1921年他与费城的爱娃·安德逊(Eva Anderson)结婚后随即前往中国。此后30年麦卡伦为基督会从事布道与社区中心工作,到过安徽、江西两省城乡各地。1946年至1951年,他作为差会秘书在南京从事重建工作。在中国服务结束时,他掌管差会的财务与撤离。

南京大屠杀期间,麦卡伦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江西牯岭,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南京。他于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1月15日期间给家人的日记、信件,在东京日本战犯审判时曾作为南京大屠杀证词。1995年在上海发现麦卡伦日记的副本,随即以中文翻译出版,但译文未能收入1938年1月15日所记,本书则收录其中。

1. 致家人函

(1937年12月19日—1938年1月15日)

1937年12月19日,星期日

从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溃败到现在已有一个星期了。星期一,日本军队经过医院(鼓楼)到达中山路,到处都是日本国旗。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在中国军队撤退造成的恐慌与骚扰之后,现今秩序将要恢复,当飞机越过头顶时将不再引起惶恐与紧张。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儿已成为人间地狱。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到何时结束。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许多。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我们每天可以记录数百起罪行,老百姓歇斯底里,不管

什么时候,只要见到我们外国人,他们就跪下磕头,恳求援助。那些被怀疑是士兵或其他什么的人,成百上千地被带到城外枪决。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有三次被抢去自来水笔、手表和钱。甚至某些难民营中的贫苦难民也被一再抢劫,直到最后一分钱,乃至剩下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床被褥,也顷刻被抢得一干二净。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有妇女被抓走。整个日本军队似乎可以任凭他们高兴在任何地方自由出入,肆意妄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大和五台山学校的美国国旗经常被撕毁。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大附中的养蚕室、图书馆等几十处其他地方,每夜都发生强奸、抢劫、枪杀和刺刀捅人暴行。如果有外国人在还能防止暴行。但我们只有 15 至 20 人,不能在所有时间守护每所房屋。

12 月 29 日,星期三

这一周七个白天和五个夜晚都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写信。在这儿一个外国人必须在医院值班 24 小时,以便对付日本人的光临。现正下雪而且奇冷,我们为那些难避风寒和挤住在如此狭小房屋中的人们内心感到痛楚。我们医院已住满了,轻一点的病人安排到金大宿舍。有些人我无法送走,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上周有 15 至 20 个婴儿(出生),六个降生在圣诞节。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海因兹小姐,她经常在育儿室照顾所有的小宝贝。

圣诞节我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节日过得愉快。我们推测你们仍在牯岭。传闻牯岭的人可能撤离。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无人能进入南京,出城似乎也很难。我们曾议论派一个人把已经和继续发生的暴行消息带出去,但是获悉一旦出城便不能再返回。

我与米尔士、费吴生、史迈士、宋煦伯、威尔逊、贝德士、林查理合住在卜凯的房子。我们每个人都干双份的活。我们很难坐下来从容进餐,每隔 5 分钟左右总会有人呼叫求援:要么是为阻止卡车被抢,更为经常的是从日本兵那里抢救妇女,我们往往匆忙咽下食物便跑出去,难得一起进餐。天黑以后我们不敢独自外出,总是两三人结伴而行。

每天或隔日我出去巡视教会财产。每次去我们在白下路的房屋都

发现有来访者(指日兵——译者)。每座外国人的房屋都被当作一个景点。但在日本军队到达以前安然无恙,而其后则没有不被闯入者。所有的锁都被毁坏,所有的衣柜都被洗劫。他们搜寻现金和任何值钱的东西,连烟囱和钢琴也不放过搜查。

我们的留声机唱片完全毁坏了;碗碟大量破碎,与每次掳掠后丢在地板上的其他废品混杂在一起。钢琴的前盖被搬开了,所有琴键都被某种重物捶击。我们的房子在安全区外面,这些并非出乎意料,但安全区内的房屋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我们孩子的学校有两幢房屋被纵火,其中一幢完全烧光。南京城一片凄凉。日军刚进城时很少破坏房屋,从那以后商铺被抢劫一空,大部分都被烧毁。太平路、中华路和城内每条主要商业街道都成为一片废墟。城南许多主要街道的背后地区也被烧毁。每天都看见新起的火,不知道这种兽性破坏何时终止。

但一般市民的遭遇更为悲惨。他们陷于恐怖几乎习以为常。许多人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件单衣。他们无依无靠,手无寸铁,任凭日本兵摆布,后者已被允许到他们乐意去的任何地方游荡。纪律荡然无存,许多日本兵醉醺醺的。白天他们进入我们安全区(难民)中心房屋寻找中意的妇女,然后晚上就回来强暴她们。如果她们躲开了,负责的男人便要就被刺刀捅死。十一二岁的女孩和50岁的妇女都难逃此劫。反抗就要丧生。最严重的伤员们来到医院。一个妇女怀孕六个月,她曾经反抗,脸上和身上有16处刀伤,有一刀刺破下腹。她失去婴儿但自己生命得以保全。那些得到许诺可以活命的男人则任由日军摆布而遭到屠杀——他们之中有个别人在很悲惨的情况下侥幸逃回安全区。其中有个人说他们被用以供刺杀训练,他的躯体看来确实如此。另外一群人被抓到古林寺附近,有个人总算回来了,勉强活到能够讲述这群人的命运。他诉说日本人在他们头上浇汽油,然后点火烧他们。这个人别无其他伤痕,只是头和颈部烧得如此可怕,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个人。同一天还有另外一个人,身体被烧伤一大半,也来到医院。他还遭到枪击。所有这些表明,他们这群人大概是被机枪扫射,躯体被堆积在一起,然后加以焚烧。我们未能获悉细节,但他显然是爬出来,设法到医院求助。他们两人都死了。我叙述这样可怕的故事,恐怕会使你好多天吃不下饭。这确

实难以置信,但成千上万的人被残酷屠杀——难以知道究竟有多少——有些人认为将达到 10 000 之多。

我们见过很可亲近的若干日本人,他们对待我们尊敬而有礼。其他的人非常凶狠并且威吓我们,有时还拳打脚踢。林查理就曾遭遇此事。我曾偶尔看见一个日本人帮助中国人,或者举起一个中国婴儿与之嬉戏。不止一个日本士兵告诉我,他不喜欢战争,很想回家。尽管日本使馆官员是真诚的并且试图帮助我们,他们无能为力。士兵中有良心者为数甚少。

现在是医院查房时间。全部在岗职工约有 100 人。如果我们再次有水有电,事情要容易得多。但是现在灯需要照管,水需要泵抽,每天增加了我们大量劳动。

12 月 30 日,星期四

天气多么宜人。出外呼吸新鲜空气感觉真好。现在较为平静但远非良好。今天医院收容一个伤员,肠子被子弹击穿,大约有 4 英尺垂在外面。他不太可能康复。威尔逊花费上午大部分时间努力为他包扎。中饭以前,一个 12 岁小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开着黄色出租车抢走。一些男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马吉的住处还有别的地方,被强迫带走,他们被指控当过兵。这些人在难民群中有朋友可以证明他们是平民,而且他们自己也极力声辩,但因手上有茧,未经进一步审查即被确认为士兵。许多人力车夫、船工和其他劳动者被枪杀,仅仅因为他们手上有诚实辛劳的标记。靠近建安公共汽车站的德国人住宅的年老看守人,据报告昨天被杀死。日本兵在这里抓不到年轻男子服劳役,而他又拒绝前往。今天倒是平安无事。我们连歇下来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你无法想象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一直忙于为医院和住在鼓楼教堂的中国人提供粮食。已搬运 50 大袋,大约 65 吨(疑为 6.5 吨——译者)。

日本人开始加强对警察和中国人控制,并拟议进一步限制外国人。冲(Okie)先生建议,我们美国人应该集中在一个有警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给予多少自由,但我们有点不放心。登记正在进

行,没有登记证明的中国人限制在安全区内自由行动,不准离开安全区。

现在我必须停笔。我得用救护车送几个病人回家。任何人离开医院必须有一个外国人陪同。我甚至是警察的保镖。我们是如此拥挤,所以很高兴有些人能出院。这么多人无处可去,没有钱也没有衣服,这实在是个大问题。我们不能把他们治好以后赶出去饿死,或被杀死,或重遭伤害。自从南京沦陷,他们大多数是带着刺刀或子弹伤口前来的。

……我们仍然与外界隔绝。我听说他们(日本兵)宣布,因为这时四周仍有中国士兵,外国人来此地仍然是危险的。从日本人立场来说,真正的危险倒是他们不愿有更多的外国眼睛看见我们已经看到的可怕事情。情况已有较大好转,强奸与抢劫虽仍在继续,但已减少甚多。最恶劣的师团已从南京调走。但我同情穷苦百姓,他们去的地方将无外国人援助……

12月31日,星期五

这是今年最后一天。为庆祝新年做了大量准备。这必定是我们日本朋友喜欢的一个节日,已经宣布放假3天。我们害怕随着允许更多自由而发生的事情。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好转。今天我看见大群的人们拥往安全区外的中山路。他们稍后带回来日本人在考试院分发的大米。

今天有些快乐的人。我们在医院里有这么多小宝贝,母亲和婴儿总是乐于出院,虽然他们没有适当的地方可去——只有极为拥挤的几百人一间房的收容所。一位祖母和另外3个儿童被护送到他们所谓新的儿童之“家”,我把他们全都扶进救护车,送到金陵大学有着两万难民的“家”里。哥哥坚持抱着襁褓中的小弟弟,他们都甜美地微笑着,虽然是短暂地乘着汽车,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我把小家伙递给他们,他们在这种艰苦的困境中仍表现得非常乐观。另外有一个使馆仆役来作最后检查,从子弹伤处拆线——他一直面带微笑。

金陵女子神学院正在进行登记。上午花费许多时间试图让若干医院职工办理登记,但那里拥挤不堪,我们无法走近。我们的人员急于登记,害怕时限过期,如不顺从就会被处死。我们繁忙的职工不能日复一日站队等待,他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上午剩下的时间用于为我们300人

的大家庭弄点吃的东西。他们每天确实要吃很多,而食品又很难谋求。我们费了很大劲才走到南京西南部靠近城墙的地方,因为几处火灾使街上遍布瓦砾,人们很难前行。

粮食很快就会成为严重问题,除非采取某些措施从城外运来一部分。

另一个妇女带着新生儿坚持出院,虽然她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为婴儿准备的食品。她的丈夫好几天以前被抓走,再没有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她想出去找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寻找。她没有力气,她怎能做到!我把她的名字告诉几处难民营,试图打听她的亲友,但没有任何效果。啊!我们目睹多少悲惨的事!

我们期待新政府明天在南京成立——下午在鼓楼举行庆典。既往的五色旗已经复活,据说已经做了 60 000 面,以便它们随日本旗飘扬。

1938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

这一天和这一年辉煌地开始。鞭炮轰鸣声把我惊醒,我睁开眼惶然不知何事。这是十分晴朗的一天,太阳在天上像一个大火球。稍后紫金山如同喀斯喀特山脉平常那样蓝得可爱。非常明显是一个节日。大量鞭炮免费分发给中国人——他们不愿放肆喧闹来拯救灵魂。我们获悉他们(日本人)昨天赠送了几十万袋大米,每袋 200 磅。相互照常祝贺新年。

前天晚上我们应邀前往拉贝家中,我们看见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并点着许多蜡烛。一切完美,只是没有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极大缺憾。我们为你们担心。我们听到收音机播送的东京简讯,说是所有美国人都从牯岭撤离了。我有时真但愿你们都平安地呆在美国。

我与戴籁三夫人、马吉先生、福斯特先生和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客的程太太一起共进新年晚宴。我们吃了最后一只鹅。约在结束晚宴之时,我们的一天被污损了。两个男人从马吉的住处(他有三个住处挤满难民)跑来,说有两个日本兵进去找女人。我们找来一辆车,由费吴生(开车)带马吉与福斯特前往。随后他送两个妇女到医院。一个已被奸污,另一个惨遭毒打,在其父帮助下逃走,但在跳窗时受伤。她们已精

神失常。然后城东南一个庙里的尼姑被送来。她在12月14日受伤。她们五个人躲在壕沟里,但日本兵从两端进入壕沟,杀死五人中的三人,打伤另外两人。这两个人,尼姑和一个10岁小徒尼藏在她们朋友的尸体下得以幸存。18天没治疗,5天没有食品!邻近一个男人设法把重伤的尼姑送到医院。她恳求我们(援救)那个背部被刺伤的小徒尼,于是我用救护车把她载来。她的伤口已经愈合,她最需要的是食物、洗澡和舒适的环境。住在城东南的人们经常担惊受怕——他们被日本兵包围着。当我们等待小徒尼时,日本兵聚拢在我们周围——这群士兵举止非常适宜。但当我们站在这儿时,一个喝醉酒的日本兵走过来威吓两个中国老人。中国人极为害怕,跑来向我求助。我必须承认自己也害怕武装的醉酒士兵,但是幸好有几个清醒的士兵帮助转移醉鬼的注意力,老人们乘机逃跑——他们跑得多么快!醉酒士兵显然是在骂我,因为一个士兵生气地拿根棍子对着他。当我开始回救护车时,发现我们一位医院工人被另一群士兵抓走了。他是我们的厨子,出于好奇,他恳求与我们一道出来的。他的红十字袖章被抢走了,极为受惊并且担心自己会被枪毙。我把他救了出来,此时又担心救护车会被抢走,但我们迅速回转时发现那群正常的士兵仍在周围,所以我们微笑地离开他们。此后几天我们曾多次前往城市边缘地区,那一带很少有人敢于冒险进入,但我们每次都载运粮食或伤员安然返回。

今天试图估算财产损失程度。从医院到中山路和白下路大约是30%;白下路约50%;中华路到建康路约80%——此外城南边沿也或多或少被焚毁。鼓楼至东城墙约20%~30%,集中在某些地段。

今天下午又有一位妇女住进了医院,她在南京沦陷前受伤。她的家在南京南部的乡下。她与她的五个孩子离家出走——最小的三个月,最大的12岁。日本飞机俯冲用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她的眼睛,从靠近喉咙处穿出。她试图挣扎着去抱婴儿,但终于被迫放弃,昏迷了大半夜,她的孩子聚集在身边。早上她明白已难以继续承受婴儿的重量,便把他放在空房中,挣扎着直到遇见几个乡下人,他们帮助她进入一个难民营。18天以后,她来向我们就医。

今天傍晚估计在城内不同地区有五处较大火灾——焚烧、劫掠和强

奸仍在继续。安全区的情况好得多,虽然日本兵仍然闯入。无论如何,相较于那些日日夜夜我们需要同时在几个地方极力阻拦日本兵,现在是相对地平静。至少我们有时间写信。

1月3日,星期一

今天成功地让医院半数人员注册。

我必须报告若干日本人做了好事。最近有几个很好的日本人访问医院。我们告诉他们医院缺少供应病员的粮食。今天他们带来100斤大豆和一些牛肉。我们医院已有一个月没有肉食,这些礼物极受欢迎。他们问我们还需要什么。

但每天都有一系列坏事的报告。昨天下午有个男人在救济委员会总部附近被杀。今天下午有个日本兵企图强奸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加以阻止并帮助她反抗。但日本兵不久就返回,并开枪打死她丈夫。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处境悲惨的妇女并且有一个可怕的故事。她是5个妇女中的一个,她们被日本兵抓到他们的一个医疗站,白天帮他们洗衣服,晚上则被奸污。其中两人被迫满足15至20个士兵的兽欲,最漂亮的一个每晚要接待40人之多。来找我们的这个妇女,曾被3个日本兵叫到一个偏僻地方,企图砍下她的头。颈部筋肉已被砍开,但日本兵未能切断颈椎,她假装死去,然后吃力地爬到医院——这是众多目击日军暴行之又一人。威尔逊医生尽力为她包扎,认为她有一线生机。日复一日我们这群人把这些恐怖情况报告给(日本)当局。他们加强约束并且颁发命令,但每天仍有暴行发生。

1月4日,星期二

今天一大早就看见12架日本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天气晴朗,但对于这些露宿或住在帐篷里的贫民来说仍是寒冷难熬的。周一我没有记下我们经历了一场来自中国方面的真正空袭。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空袭是怎么回事。日方吃惊不小,对此毫无准备,惶然失措。后来日本飞机立即采取行动,疯狂反击。

我不知道该怎样把信寄给你。你上封信的日期是11月25日,我头

脑中浮现的情景是,你们一群人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在雪中玩耍嬉戏。希望你们一切都好。我们的生活单调得可怕,处处充斥着毫无意义、毫无必要的残暴和遭遇。在医院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挽救被日军机枪和刺刀刺伤的伤员,包扎他们的伤口;他们都是日本人前来帮助的无辜、贫苦的中国人(这是反语——译者注)。当他们(指日军)在新年的第一天发表精彩演说,告诉我们国民党压根不考虑老百姓的需要时,我们不由得想到我们的医院里充满了他们的牺牲品。毫无疑问,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支持和帮助会遭到摒弃。

1月5日,星期三

从卜凯住宅我的阁楼房间可以看到日出的辉煌景象,一个美妙的早晨。在医院X光室用四处拣来的零件装好了一台收音机,昨晚效果不错——于是重新建立起了对外沟通。

开救护车去城南一趟,为我们的大家庭谋求白菜。看见多处熊熊大火。

一个喜庆之日。日本使馆的福井先生通知我们,三位美国使馆人员将于今日到达南京。他们已允诺了10天,但显然很难谋求军方的同意。我们试图通过日本人送一封信要求他们返回,但他们(日本人)拒绝代送。日本人希望我们全部离开南京,但我们现在已停留这么久,而且知道如此之多的事情,他们不许我们离去——我们简直就是囚徒。

我的收音机终究效果不佳。我们得到第二台收音机,但又不能收短波。我们从东京、马尼拉和上海台收到英语广播,还有一些很好听的音乐。

有一项新职业,接送婴儿。啊,是的,特里默和威尔逊迎接他们来到人世,而我是送他们回家,到某些拥挤的难民营。几乎每隔一天,我都要开救护车出去收购白菜、大米和其他食品。为了保障送货,必须有一个外国人伴行。最近我们抢救了3头牛。张太太为我们做了一些黄油。我们一伙单身汉吃光了26听庐州府桃子罐头,上个月我们每天都吃这个。我们吃更多大米,还有大量白菜。我了解到日本人正在卖苹果,有限量,一角钱一个。正运来少量其他食物。

1月6日,星期四

今天刚来的最大新闻。美国领事馆代表告诉我们,麦卡伦、特里默、米尔士和史迈士的家人在30日离开汉口前往香港。他还带来你在11月底写的几封信。

这是我们一个多月以来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或邮件,多么受欢迎!我希望你旅途顺利,虽然我确信你必然会碰到许多不便乃至可能的危险。一旦得知你们在何处以及再次迁移的情况,我就放心了。我原来设想你们获准去上海,并把孩子留在上海的美国学校。我希望这样,因为这意味着不用太久我就可以看到你们,虽然我们尚无信心获准离去。

我很高兴能留下来。虽然我们外国人只有20个,却能在安全区为各个难民营提供大量帮助。如果我们有100人去守卫抵御50 000日本士兵,那就可以取得更多成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纳多至12 000人,金陵大学大约25 000人,神学院和金陵女子神学院各2 000至3 000人,各处空房都挤满了人。有些男人正在从事煤和米的运输,任何一辆卡车或汽车我们都得看住。

仍然有一具尸体在白下路我们的驻地,另一具在我们南门女子宿舍的一楼,还有一具在普洛柏的院子里——大约都是在13日遇难的。在毕范宇的院子里有一个六个月婴儿的尸体,当日本兵强奸他母亲时啼哭,日本兵用手蒙住他的鼻子和嘴把他憋死了,还没有得到允许加以埋葬。我已经在我们医院防弹壕中掩埋了38具以上尸体,是从附近街道上收集的,大多是中国兵。生命的损失惊人。不同年龄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付出可怕的代价。为什么战争必须如此野蛮?

日本人提到让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店铺重新开张并且运来大批日本货物。外交部门希望建立一个市政府,但军方不允许。日本外交官要求市民返家,军队继续恐吓他们,所以他们不敢离开难民营。他们要求商店恢复营业,但军队抢走全部货物并且烧掉店铺;他们要求民众开始购物,但军队抢走了难民的钱财;他们要求民众恢复生产(耕种),但军队杀掉了所有的鸡、猪和牛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1月9日,星期天

有些(日本)报界人士来到一个难民营入口处,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还为这种善行拍了电影。就在同一时间,一伙日本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约12个妇女。这却没有拍成电影带回去。

城建部门希望恢复水电。经由拉贝把工人找回岗位做好最后部署之前的一天晚上,一支由士官率领的一小队军人来到和记洋行,抓走发电厂的43名职工,把他们排成行用机枪扫射。发电厂是一个私营企业,日本兵未经审查便宣称他们受雇于政府。已经一个月了,总的情况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改善的希望。

日本人现在试图破坏我们在安全区的努力。他们恐吓胁迫可怜的中国人否认我们说过的事情。有些中国人甚至准备证明抢劫、强奸和焚烧乃是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所为。有时我感到我们是在同疯子与白痴打交道,我惊讶于我们外国人全都经过这种严酷考验而依然活了下来。

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获准离开南京。我们人数太少,所以不愿离去,除非允许更多(外国)人进来。我们在“单身汉宿舍”生活得相当正常,要与一大群人相处。我们全都经历了许多有趣的境况,也有许多严峻的经历,我们有时也互相取笑。我们渴望不再以庐州府桃子和中国白菜为低热能食物。奶油和鸡蛋的滋味多么好啊!但我们有许多面粉和大米,我们的菜园仍然出产莴苣、胡萝卜和甜菜。如果军方给以方便,应该能为城内20万市民提供足够粮食过冬。但经济情况前景黯淡。没有生产,只有消费。

刚刚听说家人平安到达香港。感谢上帝!

1月11日,星期二

两天前,我们请了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今天又有英国使馆和德国使馆的人来。这可真是令人高兴,我们已有一个多月没见任何来自外界的人了!我们有许多话想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座谈聚餐。我们仔细聆听他们的每一句话,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想问。

医院的事务已度过了最紧急的时期。现在我们有了电,能收到电台广播,这让我们感觉与周围的世界接近多了。如果能保证医院有设备补

给,我们就会觉得已接近正常生活。

强奸与抢劫仍在继续,但这些已老掉牙的故事经过多次重复早已无法增添任何意义。现在又添了恐吓和贿赂——试图破坏现有的救济组织。其他的人则忙于补给燃料与食品。国际委员会每袋按10元出售。他们从日本人那儿以每袋4元的价格买回,但日本人却未花一个子儿——那是他们的战利品!

今天又有人要给我四头牛。如果我有地方喂养它们,我一定会高兴地收下,我们好喝牛奶。但给这些我们救下的奶牛提供饲料却是个问题。今天最值得一提的消息是有关领事馆警官田中(原文如此,似为高玉——译者)。他曾带我们一起去察看遭到抢劫的财产。有好几回有人看见他从这儿或那儿拿走一些小东西。昨天施佩林先生碰见他正从一间精致的德国房屋里出来,带走两车珍奇古玩。他无疑对此已觊觎多日。

1月12日,星期三

我们总算听说了你将于今天抵达上海的消息,这解答了我的许多疑问,我想你会直接去美国学校。我希望现在你能捎些信给我们。英、德、美使馆的官员十分乐于帮助我们,如果你听说他们有谁会来,不妨请他代劳。日本的新闻人士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信件,当然是没有封缄的信。我恐怕你只能随身带很少的东西走,而且我对你不得不留下的物品亦不乐观。我们非常需要柏睿德博士,希望有办法让他来。我们需要帮手。华群尤其需要单身的女助手。但任何人前来都得自备用品,包括食物和被褥。我们的屋子里除了家具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们太忙了,照看不过来这些财产。频繁地去查看医院附近的地方,但也没多大用处。自从日军进城,他们就拆掉了日本及美国使馆的封条,公然置之不顾,反复抢劫各处。除非把他们赶走,否则清理这些混乱的杂物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两个地方能安全地搬移物品。我们无法找工人修理墙、门、锁和窗,也无法在这些地方安置管理人员。他们会非常不安全,因为现在日本士兵无视日本使馆发出的公告。不管是否在外国的领地,任何中国人都有可能被抓、被抢或成为刺刀的目标。我们请过一个日本士兵,但他们要煤炉、食品和家具供其取暖。美国使馆人员

雇用了一些日本卫兵,但第二天就将他们解雇了。

1月13日,星期四

好啊!好啊!收到你从上海写来的信!现在我可以写信给你,确信把它交给咱们大使馆的人你就能收到了。你也可以这样办。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一大早我便去和平门给一些牛喂食——那儿前天被烧了。我们又去了莲花湖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儿弄到了卡车,在另一处我们又弄到了一车棉籽饼。我们的救护车这些天都在执行着双重任务,马上它会来运走另一车。我帮马吉给他们在汤山的一位圣公会传道师弄了一口棺材。我想他是为了反抗目前的处境而自杀的。我还弄了一桶豆油 380 斤。现在我们手头就有够用 3 个月的供给了。我忙得连发愁的时间都没有!昨天我在英美烟草公司从苦力那儿得到了 15 袋大米(每袋 100 斤),大部分是给鼓楼教堂的中国基督徒的。四五个在南门的虔诚教徒被护送到那儿,没遇到什么麻烦。我们差会没有在南京任用传福音或其他事务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两个牧师在这儿。

我决定接受另外四头牛,这样就有八头牛和两头牛犊了。这四头牛被圈在一个环境恶劣的棚里已有一个月了。我把它们牵出来,连同两头小牛、一只山羊和一只小羊,我领着这支队伍回到医院。一路上不停地吆喝,它们有的不愿意走。但我们仍然顺利返回,我把它们圈进了前面的车库。这意味着我们的病人将享用到额外的肉食。我们也需要它,因为我们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豆奶。

我出去从救护车上取了一些白菜,人们无法给我们送来,得有人去取。今天我们又找到了一位护士,是芜湖医院的毕业生。50 位护士中有 10 位是正规的。

今晚我们请了美国使馆的人和特里默过来吃晚饭,特里默还没见过他们呢。使馆的人员在这儿日子不好过,他们没有暖气、电和水,很难操持家务以及获得补给。而且他们当然也没有兴趣参加我们其余人所从事的活动。没有报纸,没有任何户外活动,只有着手处理的问题,生活对他们来说有些乏味。一个人关着时,我得承认空气实在太压抑、太沉闷了。

现在我们都想去上海看望我们的家人。

1月15日,星期六

一位英国使馆人员今晚将去上海,答应为我们携带任何想寄出的信件。我要寄给你已经写好的信,但现在无法寄出——已经有一大堆了。

情况有所好转,但恐怖行为仍在继续。10天以前我到诊所,看见一个15岁男孩躺在台上,部分的胃和一些肠子溢出。伤口已有两天,他住在城外靠近武定门。日本兵把他抓来搬运蔬菜。当他结束工作时,他们在他的衣服里面搜出并抢走6角钱,然后用刺刀捅了他几下。

我们英国使馆的朋友听了我们的故事很难受。这些事对于他们来说是太野蛮了,所以我们有意对此淡化。但是他们自己已经碰到一些非常可怕的事而且得到第一手材料。他们继续巡视英国产业,靠近亚细亚火油公司,在和平门看见一具妇女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插入她的阴道,它的一部分露在外面。现在你就明白何以老百姓仍然留在难民营,何以他们仍然担惊受怕。当我们在场时,我们可以在美国人的房屋中保护他们,但我们所能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

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给我们的牛喂草和棉籽饼。下周我得去弄些大米和燃料。今天我开着一辆救护车出去了,格雷斯·鲍尔开着另一辆去运白菜。她开到通济门装了一车又平安地返回。

我们外国人仍能平安无事地自由活动,实在是件稀罕事。最近到达的一些外交人员惊讶于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竟然没有被排成一行遭到射击!我很高兴你现在呆在上海,孩子们都在学校。你离我近多了,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团聚。请不要太过责怪我把所有的家庭责任都让你独自承担。我也希望在痛苦结束前离开,因为我有负于我的家庭。在我的差会工作结束时,我本来可以溜走,但当时医院非常缺乏人手,急需管理人员,所以他们请我帮助时我无法拒绝。一旦开始,我便被卷入了工作的漩涡无法抽身。我千百次想到你,我都在为你祈祷,思念你。我并不责怪那些离开了的人。我想他们应该这样做,我很欣慰我曾催促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工人们离开。但我很高兴我留了下来,尽管很艰难。在帮助这些可怜的人们时,我与他们分担了一小部分。

下次你在书店若看到一份《体育新闻》，请随那些我渴望已久的家信一起寄来。

[麦卡伦书信曾由 John Labor Christian 编辑出版，选自 RG8, B119, F24, “Account of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of Nanking during the Winter of 1937—38”(《1937 年冬至 1938 年日军在华暴行》)，华盛顿，1942 年 3 月。]

六、米尔士

米尔士(Wilson Plumer Mills)1883年12月1日生于南卡罗来那州的温斯波罗。1903年在戴维生学院获学士学位,1910年在牛津大学获另一学士学位,1912年在哥伦比亚神学院获神学学士。1912年至1931年米尔士在中国青年会工作,1933年至1949年服务于南京长老会海外布道托事部。1937年11月22日,米尔士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后由他接任主席。南京安全区收容25万人,其中7万人依赖安全区提供食物与燃料。到1938年5月底,安全区现金与米、面供应几乎消耗殆尽。

在日本即将占领南京之际,米尔士努力谋求停战,让中国军队撤出南京而日本不必经过战争进城。在得到唐生智将军同意后,米尔士和贝德士在美国炮舰“帕奈”号会见美国领事帕克斯顿以传递停战谈判信息。米尔士1938年1月24日给妻子的信(已收入本书)对此次访问有所叙述。

1. 致日本大使馆函(1937年12月22日)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7年12月22日

致南京日本大使馆官员

先生们:

根据你们昨日提出的要求,在南京的全体美国人员已考虑有关通过你们给上海美国总领馆发送电函事宜。然而我们感到事态的发展已十分紧迫。我们不得不再次恳请你们为我们安排通讯之事。

我们已经向你们报告过,在南京几乎所有美国住宅都被日本士兵闯入并拿走室内物品。更有甚者,竟有人闯入大使住宅,三番五次欲盗走使馆车库或院内的汽车。有次一位使馆警察被日本士兵打伤。就在昨天晚上,使馆车库里的一辆汽车被盗,还有市内的大量美国财产

被日本士兵损坏,其中有些被纵火焚烧。起码有八处美国旗帜被日本士兵扯下或撕毁,他们强迫仆人们降旗,并用武力胁迫那些胆敢升旗的人。

假如此种情形发生在贵国国民、使馆或旗帜上,贵方定会立即提出抗议并要求尽快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调解。因此我们被迫在此提出抗议,为了确保问题得以迅速解决,我们重申关于立即允许美国外交代表返回南京的愿望。有鉴于此,我们会再次要求通过贵方海军通讯设施把随行信件带给上海的美国当局。我们将对您的合作感激不尽。

诚挚的
在南京的美国全体人员
签名:米尔士

[RG8,B103.]

2. 致妻子函(1938年1月24日)

平仓巷3号
南京
1938年1月24日

亲爱的妮娜^①:

当我坐下写信时,所有的记忆涌进脑海。过去三个月的确是多事之秋。11月底和12月初看到安全区的筹划及其行政机构的建立,随即到来的是南京战役的紧张时光,我们劳而无功地谋求停战。最后是自12月13日以来,我们长期持续与日本人斗争,以求建立并维持秩序。接着,特别是在元旦以后,必须经常处理的很大问题是,要解决难民的住宿与食物供应。如有可能,我将在信中按先后顺序

^① Nina, 米尔士的妻子。

叙说这些事情,以便你能更好地了解。

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Father Jacquinot)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我称之为饶神父区,正是由于他的名字辉煌地与它联结在一起。我们在本地的第一项工作,是与中国官员及外国朋友弄清楚设立这样一个地区的构想,然后与中国官员讨论,以确保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最后是取得日本人的认可。我们必须划定一个合适的地区,可以谋求中国方面同意从这里撤出他们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然后从日本方面获得允诺,对这个地区给以尊重。这些事都很难办。事实上后两件事从未完全实现,但我们从双方得到充分许诺,积极把安全区付诸运作。中国当局答应从这个地区撤出军队,但直到(全面)溃败以前从未彻底执行。另一方面,日本当局最初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答复,随后只是由于我们反复敦促,才终于给予一种暧昧的认可,说他们不能担保这一地区不受轰炸或炮击,但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军队,他们就无意于进攻此地。

我们一直未能向双方正式宣告安全区的运作,因为当中国军队已经撤退至足以使我们如实宣告时,外国炮舰已经从江面全部撤出,我们无法发出任何信息,而其他通讯渠道已完全中断。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所有通讯线路中断以前宣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深信(交战)双方注意到已作出的承诺,按计划努力推动安全区的运作,欢迎市民进入,并尽量为他们提供食物、燃料和住房。换句话说,我们南京安全区是靠充分的勇气建立的,或是如你所爱说的,靠信仰,或是靠某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畏精神。很多次,我们成功的机会似乎很小,但是常常发生某种事情,或被动发生某种事情,给我们一个新的开端。安全区开办至今已有10周,它正走向壮大。当然,我们早就思索并期待安全区的创立与运作,但正如我在22日写给你的信上所说,安全区在沦陷后显得比以前更有作用。它在交战时期曾经提供某种庇护,因为它表明为难民的庇护所,特别是对于城内南部和东南部分以及郊区的老百姓,激战曾在那里进行。但沦陷以后安全区的主要功效还是为市民提供保护。我希望你能想象12月初市民拥进安全区的状况,我也希望你能想象上海路与宁海路现在的状况。这两条街是现今南京的主要商业

街道。原来的主干道是太平路、中华路 and 老府东街，但现在这些街道已被烧毁了；原来使用较少的上海路至五台山和美国使馆及新住宅的那段宁海路，现在成了主干道。上海路已是如此拥挤不堪，恐怕一辆车也开不进去。这个变化是近几周发生的。原因很简单，安全区的老百姓就在这里，也是由于现在建立了某些秩序，所以这里不再有如通常出现的劫掠，居民现在比以前增强了信心，开始出外上街。他们在路边开设许多临时店铺，这里生意兴隆——当然规模都很小，而且都在安全区里面。安全区外完全没有商业。

如果起初没有中国官员、外交使团成员、外国新闻记者和外国商人提供的大力帮助，我们就无从开办安全区。他们都关心这个策划并给以力所能及的各种援助。我们的麻烦只是与军方打交道，中国军队与日军。来自中国军方的困难在于他们撤出安全区的拖拉。日本军方给我们带来的难处，在于他们未曾作出任何回答，甚至以后我们得到的也不过是对于安全区间接的认知，不过这对我们的目标已经足够了。委员会坚决执行决议，建立安全区，并且终于取得成功，虽然它的任务繁重。甚至到最后时刻，中国军方还试图让我们更改西南界，宣称他们还没有清晰了解市政官员所已同意的内容，虽然我们先前已经确知全部内容都与他们核定过。如果说这几个月我在南京曾感觉到危险，那是在一个下午，贝德士、拉贝、施佩林和我会同军方最后再次勘察那条界线，决定这条线应该按照原意划出。正当我们走上五台山和神学院背后的小山时，两架日本飞机在头顶出现，靠近我们的高射炮开始轰鸣。我们夹杂在士兵之中，所以我们成为所谓理所当然的靶子。我们卧在地上，看着飞机越过，同时高炮猛击。我是第一次看见若干较小炮弹，或者是曳光弹迅速追随日机的银光。幸好那天日机追逐其他猎物，我们得已逃脱。但如拉贝事后所说，“那天我预期挨炸”。我没有明确预期挨炸，但飞机与大炮太靠近总不会让人舒服。贝德士与施佩林第二天回去树立安全区的旗帜——圆圈内有红十字——终于标明界线，以后他说他们的经历之恶劣更甚于前一天与我在一起。

所有这些只是安全区故事的一部分，而我必须谈别的事情。或许这里是合乎逻辑之处，略为告诉你有关我们如何谋求停战以允许中国

军队从城内撤退,以便日军无须继续作战便可进城。多方面的原因已经充分表明,中国人无法守住这座城市,虽然还不能断言他们无法让日军多少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休战的建议是合适的。这个计划与唐将军全盘讨论过,他是城防司令官,他的一个秘书作为中介人,并且得到他的诚恳赞同。当然,未经蒋委员长的同意,他不能正式接受这个计划,后者那时已离开南京。因此需要向汉口发电报,同时也要致电东京。电文拟定了,贝德士和我携带电报稿前往“帕奈”号,当时它停泊在稍许离开下关的上游。我们与唐将军的秘书同行,凭借特别通行证出城。下关早已付诸一炬,是中国军队放火烧的,其用意是不留任何可供日军攻城利用的掩蔽物。汽车不可思议地在两边大火熊熊的街道上行驶。当我们驶回城门时,(看见)阿奇·曾的房屋严重焚毁。我永远难忘这次夜间行驶的悲伤。破坏似乎徒劳无益且愚不可及。

唐将军已明确告诉我们,他深信蒋委员长将接受停战的建议,所以当第二天接到来自汉口的电报说明他不同意时,我们大为惊讶。自然这就需要进一步沟通,唐的司令部坚持要我们与汉口再次通信。因此贝德士和我于次日夜晚再次前往“帕奈”号。这是12月10日晚上,时间比我们上次旅行更晚。驶过沉寂而荒凉的街道,使人毛骨悚然,有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感觉。还会感到随时可能遇到从某个暗处步枪或机枪的射击。当我们到达舰上,帕克斯顿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到来之前,岸上有射击,这更难以使我们的感觉有所改善。但我们得以发出电报,并在子夜安然返回。这是另一次无人愿意再遇的经验。第二天“帕奈”号开始上行前往它新的停泊处,也是它的终点。所有通讯因此中断,我们无法进一步促成停战。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必须等到下周的信来叙述其余部分。

米尔士

[RG8,B103.]

3. 致美国大使馆函(1938 年 1 月 15 日)

平仓巷 3 号

南京

1938 年 1 月 15 日

阿利森先生

美国大使馆

南京

亲爱的阿利森先生：

1 月 8 日,刘易斯·史迈士博士已向您呈交了一份关于 1 月 6 日下午和 1 月 7 日上午日兵多次闯入双塘美国长老会产业的报告,标题为“双塘的一天”,现在我就上份报告作一补充,以便您了解更多情况。

1 月 8 日早晨 5 时 10 分,两个日本兵前来。

1 月 8 日上午 11 时 25 分,两个日本人前来。

1 月 8 日下午 3 时 25 分,两个日本人前来,带走一名男子去做工。

1 月 8 日下午 3 时 30 分,两个属于中岛部队和征伐队的日本人前来,撕下门上贴的公告。

1 月 9 日下午 2 时,三个日本人前来,在营里找人们要钱,要妇女。一小时后拖走一名姓潘的已婚妇女。从一名姓刘的难民身上抢走两角钱,抢走另一姓匡的人的臂章和徽章。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一个日本人前来。

1 月 10 日下午 2 时,三个日本人前来。

1 月 10 日下午 3 时,一个日本人前来。

1 月 10 日下午 3 时 10 分,两个日本人前来,拖走一名姓陈的已婚妇女。

1 月 10 日下午 3 时 12 分,两个日本人前来,拖走一名姓陈的女孩。

1 月 11 日下午 1 时 30 分,三个日本人前来,拖走姓秦和姓范的两名已婚妇女。

1 月 11 日下午 4 时 30 分,三个日本人前来,拖走了一名姓潘的已婚

妇女。

上述记录向您表明以下事实：尽管都悬有国旗、贴有美国和日本大使馆公告，但我们的财产仍不断遭受侵扰。您可以从记录中看出，日本人前来虽非总是伤害平民，但他们常常如此。无论如何，此种行为总是不合适、令人愤慨的。我诚挚地希望您就日本士兵持续闯入外国领地一事与日本使馆交涉，使之迅速结束此举。

诚恳的
米尔士(签名)

[RG8,B103.]

七、史迈士

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 1928年毕业于芝加哥神学院,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同年被基督会派往金陵大学任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史迈士一家正在去牯岭度假的途中。后来,史迈士夫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牯岭美国学校,史迈士本人则返回南京。当南京即将陷落时,他拒绝撤离并致力于建立安全区保护难民。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他从1937年12月14日到1938年2月19日,给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以抗议日军暴行,有些信由委员会主席拉贝签字,但大多数由史迈士签发。^①

1938年春,根据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布置,史迈士率领大约20个学生,对南京及其邻县战争损害进行调查。其成果是出版了《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一书。1938年7月,史迈士离开南京前往菲律宾接妻子和女儿,然后一起前往四川成都,在西迁的金陵大学重执教鞭。

本书收有史迈士夫妇给美国友人信件的摘录,叙述了南京沦陷直至1938年3月中旬所发生的一切。这里还发表了史迈士的报告:《现状记述:南京,1938年3月21日》。这份报告叙述了11起暴行案件。编号从460到470,其中469号标明日期为3月20日;这11个案件未见于徐淑希或田伯烈的书,所以也重印于此。

1. 致家人函

(1937年12月20日—1938年1月9日)

南京

1937年12月20日

亲爱的玛迪^②、孩子们和亲人们:

近十天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反应,我未能逐日记下,对此我会后悔终生的。这些事件或许不足以震惊全世界,但确已震撼了我们!……而我

^① 这些抗议信及所附暴行案件报告,收录于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上海:另发洋行,1939);田伯烈书的附录D和E,亦收录部分上述文献。《拉贝日记》已将大部分暴行案例翻译,因此本书不再重复。

^② 玛迪(Mardie):史迈士夫人,当时带着孩子滞留在庐山牯岭。

要么是太忙,要么是太累太沮丧,要么是被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连续好几夜我无法思考或写作,于是我的打字机只好被冷落在办公室里……

我还是回到12月11日,从那个星期六早上说起吧。我上次发出书面信函的时间是10日晚上,就头一天发出的电报内容敦促双方停火三天以便城市政权交接。那个星期六一整天几乎枪声不断,中午时分我们都十分担心威尔逊和他医院的病员。一些小炮弹落在福昌饭店前(施佩林的手受了轻伤),有一颗炮弹在该饭店后爆炸,死伤约20人。上午就有九颗炸弹落在宾馆以西至普洛柏家旁的小巷里,下午也非常热闹。当天在安全区南部边界地带我们第一次受到炮火的袭击。我们十分关注日军如何实现他们在电报中的承诺!后来威尔逊进来说:“今天像是7月4日国庆节!从未见过这儿有这么多美国国旗!”林查理附和道:“听起来也像是国庆!”下午没有炮弹落下。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整天都忙于要唐将军手下的人把士兵从安全区中清理出去,尤其是五台山一带。艾贤平(音译)前天许诺肃清安全区的话没有兑现。所以我们在发布会上没什么好说的。但我们与新闻界人士较随意地交谈过,声明我们认为安全区只是个相对较为安全的地带,并未正式宣布生效。唐手下的人那天问我们是否已听说日方停火的事。当晚枪声更加猛烈。炮弹在太平路附近爆炸。宋煦伯计算着枪炮间隙的时间,告诉我们其间隔为六至七秒。我们上床时感觉炮弹好像在距离我们仅1.5英里的地方爆炸。米尔士睡在地下室,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和以往一样睡在原来的床上!炮弹没有进一步靠近我们,我们睡得还不错。

12月12日,星期天

早晨,仍是枪炮声不断,但早上有短暂的间歇。我们去宁海路5号的总部,较晚一点龙上校和周先生从唐将军的办公室过来问我们能否接收受伤的士兵。我们说除非中国士兵全部离开此地,否则我们无法保证任何人的安全。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尽力帮助伤员。他们回去报告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立即组织一个国际红十字会,马吉为此事已筹划了三周。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11时许就回来了,说唐将军希望我们派一个人直接向日军提出停火三日的协议!于是我们

一起商议具体事宜：由施佩林出面，手持白旗和白标语：“请不要射击！我们有口信给你们。”同时我们也给汉口的大使和上海日军发电报。我们详拟了电文并获得他们同意。下午3时一切就绪（他们2时就离开了）。米尔士从屋里拿了几张床单，我们在其中一张床单上写上了标语。我们极其保密地做这些，觉得有可能涉嫌为背信弃义之举。因为传话给唐以后，他们并不急于把话再传给蒋介石。但我们设法把消息带给了约翰逊并坚持他应被告知中日双方当局事情之进展。他们没有回来，我们午饭也没吃成。当天下午火力集中于城南，在位于我们西边的中国军队开火前，我们在总部几乎听不到枪炮声，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内部事务（办公室里的¹问题），所以注意不到外面，因此当12日晚我们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时，我们说那天安静了一些！丹尼尔对此嗤之以鼻。我们得知他和其他一些新闻界人士发现日军在中山东路和国府路（如他们所说）沿线设有路障。但那时我们已知战事临近，因为4时30分时，前线发生突袭。董主教带领的一群信徒进来，说撤退的中国士兵想征用他们的汽车。这群信徒是前天我们派去向士兵做解释的，希望他们离开五台山（以免对安全区产生排外情绪），撤退的散兵游勇正在经过安全区。一片嘈杂。我们一直担心部队撤退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最糟糕的事情。我坚持在5时全体会议开始以前坐下来，匆匆记下我们要做的事之一是，如果部队解除武装就允许其穿过安全区。我们召开了简短的全体会议和新闻发布会，就让大家早点回家。回家途中我们看见整营的中国士兵在上海路、宁海路上行进，于是打趣费吴生刚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让他们解除武装！他们是全副武装！回去以后，贝德士说当夜晚结束之后，我们可能就度过了最糟糕的日子。我很高兴中国军队撤退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把他们留在围城里作战就像把他们关进老鼠夹子一样。晚上仍有炮弹、机关枪轰鸣，我们仍如以往一般安然入睡。半夜3时，枪炮声听起来离我们非常近，我也无奈其何。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不是没有可能阻止日军进攻安全区。大约早上6时，我判断枪炮声是来自上海路，于是决定起来侦察一番。我走到平仓巷看见一个警察在搬东西，他说他从新街口来，那儿目前还没有日军。

（请原谅，我的叙述跳到了13日。12日没有炮弹落入安全区，所以

那天我用于记载被轰炸地点的地图很干净。这就是我们尽管听见枪炮声仍然安然入梦的原因！我们相信日军有意不轰炸安全区。）

12月13日，星期一

早晨我走在路上，看见人们带着被褥离开安全区。我告诉他们，往更北的地方，在最高法院他们能找到地方住。他们惊异地看着我：老百姓怎能住在最高法院！我们还未发布有关公共建筑的最后宣告，因为被报纸宣传所阻止——9日晚，中央社新闻出台，我们必须通过它发布新闻。我们的“安全措施”要求人们星期六早上出门时注意隐蔽，但没有印刷成传单分发。我看见人们沿路寻找食物，于是去五台山看粥厂是否已准备开放。头一天没有开门因为太多中国士兵驻扎在那儿，要在那儿吃饭。军官那时仍把部队集结在建筑物中，因为他们处于设防地带。我看见有几面旗帜放错了地方，便饶有兴味地把它取下来，对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解释哪边是边界；如果他们呆在安全区，日军进来时会被弄糊涂的。我继续走至汉中路和上海路的拐角处，一路上看见几个撤退的散兵游勇，他们在路边的小摊上安然地买东西。夜间安全区没什么明显的骚乱，但撤退的部队随手乱扔一些装备。我回来后又去广州路看还有没有残余士兵。五台山脚下的露营地已被清除，留下一辆挺不错的耐施(Nash)车。我们尽可能贮备所有的东西，又让哈茨去挽救那辆车。我又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那条宁海路，发现旗帜放的位置不对，又告诉他们。路上看见丢弃的几套军装，让警察和群众把它们从安全区清理出去。然后折回陶谷村，回家。我一点儿没意识到已是8时15分了。他们都已用过早餐。我还是要吃早点的。大家都很高兴外面很平静。饭后费吴生又带我去相同的路段查看那辆耐施车，然后又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找华群商议。她问我为什么显得这么疲惫，我告诉她事实上我很高兴！

在办公室，我们得知龙上校给了拉贝先生30 000元钱用于筹备红十字会。我迫不急待地要在10时以前组织委员会。我们拉上马吉和福斯特，我几乎一手指定委员会的成员、其主席及秘书等。马吉首先立即去接伤员，我又建议他作为主席，福斯特作为秘书，去指定的三个地方——

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看那儿的人员是否配合得力。我与米尔士及其他人立即着手印刷传单,告诉人们在“关键时刻”的注意事项。拉贝认为日军会用机关枪扫射街道,所以我们让人们躲进掩体。先是通过住房组织^①传话出去,然后又分发传单。下午1时回家途中我们看见日军已到了广州路,我们开车到那儿,看见约六个日本兵组成的先遣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遭遇,却绝不是最后一次(在上海路和广州路的拐角处,他们在找一辆汽车,倒是没有伤害平民)!

午饭时我们想看看城市哪些地方插上了日本国旗。我们甚至以为鼓楼上的五面旗帜(顶上和四角)都插的是日本旗,后来发现它们仍是我们安全区的旗帜。日本使馆尚未插上日本旗。我们和费吴生一起上车准备返回办公室时,他提出去看看日本人,所以我们又回到上海路。途中我们还碰到一队中国士兵,约20人,向城南方向前进。哈茨急匆匆地跑过去告诉他们日军刚刚翻过小山。于是他们又转而向北行进,由一个勇敢的年轻军官带领。这使我记起,我们在午饭前确是见过他们。两个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保护,是两个中国下级军官。他们给了其中一个人平民服装,另一人离开了。离开的那个就是这个小分队的年轻军官。我们开车看了日本人后,又回头警告他们解除武装并撤离。但他们绝望地说他们没有“便衣”。回到办公室我们决定由拉贝和我立即和日军交涉。我们找到懂日语的克拉,一起动身去向日本人(尽量找高级官员)解释3件事:安全区、新成立的红十字会以及进入安全区的一些缴械士兵。马吉和福斯特在军政部只找到一个人,其余两地的人也都不见踪影,但他们都乐意帮忙。于是他立即组织,决定先在外交部建立,使之运作。战斗在北面继续进行,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我们又往上海路方向去,广州路上没有日本兵。在神学院附近我们看见一些死难的平民,大约20人。后来我们得知日军杀死他们是因为他们逃跑。这是那天极其恐怖的事件,只要有人跑就被枪击,或死或伤。我们的传单都发出去了,但并没有都送到人们手里!但在那条街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士兵,背着枪漠不关心地骑着一辆自行车,我们向他打招呼,他告诉我们在新街口附近

① 即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的住房委员会,由林查理等负责。

的汉中路能找到一个军官。他说得当然不错,我们找到一个约 100 人的分遣队。他们坐在马路南面,对面是一大群中国平民。我们试图向军官解释安全区的概念,并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发现他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他说只要没人向日军射击,医院就会确保无恙,对于缴械士兵,他却没有什么。于是我们带着我们认为是值得高兴的消息来到外交部,发现那儿的其他士兵已被缴械。然后我们又和马吉一起去铁道部和军政部去解除所有士兵的武装。米尔士对此持否定意见,因为城北仍有中国军队在与日军对峙。

中山路遍地都是撤退士兵扔下的杂物。我们来到山西路路口时,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一群衣冠凌乱的人簇拥着一辆小汽车从拐角处驶来。随即我们看见原来是林查理开车领这些缴械士兵去法学院。他们几乎是拥抱着林查理的车!在路口我们遇见一个武装的小分队。我们叫他们解除武装,有些人照办了。丹尼尔在那儿帮助他们以及林查理,这时有个人骑着马往山西路过来并向空中鸣枪,我们立即跳进车,以为他是个日本人,会在那儿开战。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个中国人,哈茨把他的枪夺走了!

大约 4 时,在总部里,米尔士决定这种情况不要再继续下去,但马吉在克拉的帮助下仍去铁道部和军政部缴械。在总部我们还看见一群被施佩林等人缴了械的士兵。那儿几乎成了一个兵工厂!他们行进至我们附近的警察总部,总共有 1 300 人左右,有些仍着军服!(1937 年 12 月 22 日记。)我们向日军力争不要射击缴械人员,缴械士兵的问题是我们头三天最严肃的事情。但这一问题马上得以解决,因为日军向所有人开枪——起码以后层出不穷的事件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他们最终都把中国士兵赶出来,枪决了他们。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言语上的——星期三下午把那 1 300 人救出来。军官许诺说,如果将他们解散,第二天就可释放他们,所以我们就放心地去参加全体会议。半小时后我们被告知他们回来找人,同时带来 200 名士兵,他们被缚在一起。拉贝和我立即跑去找福田,他礼貌地保证绝不对他们开枪,但他的肯定不足以令人相信。林查理和克勒格尔留下来监视,但(日本)士兵们把他俩赶走了。我们回来正看见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被拉出去

枪毙。

尽管我想按时间顺序记叙,有时还不免根据事件发展来写。星期四中午(12月16日)林查理回来说:“他们把所有的士兵都带走枪毙了!”一上午他都在司法部门口(够有讽刺意味的了),不让军官把一些平民连同士兵一起带走,军官则坚持带走所有人以及驻扎在那儿的50名警察。有40名来自另一地方的警察被指控藏匿士兵。至今(12月22日)约有一半警察回来了。

12月13日,星期一

晚上,华群过来报告说(日本)士兵扎营用去了粥厂的米,所以明天粥厂无法开放。我们去拉贝住所,让他手下的人起草了一封日文信函,准备明早交给守卫。回家途中我们在汉口路和平仓巷的拐角处又遇见一队士兵。他们非常粗暴,叫我们“快回去”,我们到那儿看见林查理、齐和顾^①,他们晚饭后从伊立克^②家出来,齐去大学校门查看情况。不久他着急地打电话叫林查理,于是林查理过去了——临走时他把缴械时留下的一只手枪扔进了树篱。看见士兵击毙了一个路过的平民,又在盘问齐,因为他们对齐佩带的大学臂章表示怀疑。反复解释后,他们终于相信齐和顾是林查理的仆人,放他们与林查理一起回家。当晚他们就睡在林查理那儿,直至周四、周五我们开放大学校园保护妇女。

12月14日,星期二

早晨,起床时我们想战斗结束了。头一晚听到不少枪击声,我们认为那不过是日军刚进城第一晚的“躁动不安”,现在既然日军已经在这儿了,他们会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权,形势是令人乐观的。早餐前我打印了一封信,向日军高级指挥官解释安全区的概念,拉贝下属之一将其译成日语。拉贝、福斯特将代表我们红十字会,我看见他俩正和一个来自

① 齐, Gee, 即齐兆昌, 金陵大学校产管理工务室负责人, 建筑师。顾, 可能是金大总务处职员顾俊人。两人都奉命留守校产。

② J. T. Illick, 中文名伊立克, 亦为金大教员。

红卍字会的日语翻译在一起。我们又跑去找新街口的福田,他是日本使馆的参赞,8月16日曾离开这儿。他的第二句话就是“军队可能要对南京施压,但我们会竭力阻止他们这样做”(前天晚上我们发现他们在有计划地烧毁整个城市时——此信写于12月22日——我们总算信了他)。他带我们去重阳饭店见一名军官。我们沿路经过碎玻璃、沙土,进入一间卧室。这位军官见我们时衣冠不整,胡子拉碴,铁青着脸。他简单地说高级将领还未到。为了进入南京城区他们也作出了牺牲,因为中国军队向他们开枪,这就是他们的话!难怪有人事后说:老天,日本人就是相信他们自己的舆论宣传!

福斯特想去查看圣公会的财产,我们便前往太平路。在中山东路,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打碎一家家店铺的门窗,肆意抢走他们想要的东西,主要是酒类。炮弹在圣公会教堂顶上炸了个大窟窿,教堂完好无损。到了白下路我们发现麦卡伦的屋子被炸坏了,我在院子里捡到了三本相册,在另一间屋子看见两个士兵。“起士林”糕饼店的屋子那天早上也被闯入,还有黑姆佩尔住的饭店。今天(12月22日),黑姆佩尔十分肯定地说中国军队撤离前没有抢劫。有几个中国饭店打开大门,让人们随意喝那儿的酒,但士兵不许人们抢劫普通商店。炮弹对城南的损坏相对而言较小一些。

回去时,我们看见汉口路上有50个人被绳子缚在一起。我们和士兵理论,最后福斯特留下和他们一道。我回去叫上拉贝去重阳饭店。到了那儿,军官却推说太忙,没工夫见我们,然后我们又去新街口,那儿的军官更是没兴趣见我们。回到——哦,我忘了说中央饭店^①那个人说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和中国士兵打仗,但我们热爱普通人民。”我们恨不得把这句话扔回他的嘴里!回到中山路,看见那些人从上海银行(S. C. & S. Bank)^②穿过,已到了广州路的拐角处。我们又和他们争论。这时一个军官开着车过来,在我们身边停下。他带我们去新街口见另一位

① 中央饭店,英文名为 Nanking Hotel,按半外交风格管理,知名于中国商界与政府官员。

② S. C. & S. Bank,为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 Bank 的简称,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亦可简称为上海银行。

刚来的军官。但这位军官说：“等明天我们头儿来了再说。”我们把写好的关于解释安全区、缴械士兵和红十字会的日文信给他们看，但他们只注意缴械士兵！那是12月14日的信。和其他的一些信件一起，你以后会看到。15日我们又写了一封短信，进一步要求保障缴械士兵的安全。

12月15日，星期三

早晨，带着那份为缴械士兵说话，要求（双方！）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遵循战争法规的恳求信，我们将去见新到的高级将领。但就在信刚要写完时，福田来到总部问我们安全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给了他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回答了关于人口、食物供给等方面的问题。不一会儿关口^①先生带来“势多”号炮舰舰长和军官的名片，他很乐意合作并帮助建立发电厂。他的一位水手曾中过狙击手的子弹，所以强调一定要仔细清除士兵。他比一般士兵更精悍、更和气。他说他愿意帮我们去上海，并对“帕奈”号事件表示遗憾。这时我们来自红十字会的日语翻译宋，已安排好我们去见特务处的将领。宋已60岁，从前是这儿日本使馆的秘书。那位将领当天中午刚到，所以我们又赶往那儿，福田与我们同去帮着翻译（写于12月24日）。

现在回到15日星期三中午的会见，特务处的首领告诉我们：他们必须搜查整座城市，看还有没有中国士兵；要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老百姓要赶紧回家；要相信日军对缴械中国士兵的人道主义态度；允许持警棍的警察在安全区内巡逻；我们贮存在安全区的一万担大米可以用于救济难民；修理电话、水电系统，他要和拉贝一起去视察；让我们第二天帮助找一至两百名民工（付薪）；要视察食物存放地和保安……事实上做到的事只有枪毙缴械士兵；允许警察进入；每天找我们发电、供水、用电话，同时又枪毙电力工人；至目前尚未干涉我们调用贮存的大米，但日本兵从米店带走一些整袋的大米、还有工人。一个星期内所有的米店只得关闭。昨天米店又在这间屋子内的车库里开门。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米都送进了粥厂，免费施放难民。我们原打算卖掉大部分米，再购进，如

^① 关口，日本海军少尉。

此资金循环,帮助难民过冬。如果我们不能卖出,我们希望以后会有私人商贩购进大米——如果日军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假如不想让老百姓饿死,就应在被围困的区域仍保证正常的经济生活。现在我们所处的征用物资的情况很像苏联革命的早期,而日军是在对共产主义作战!

回去后,我们在警察总部遇见那个带了1300人的军官,我曾对你提过。当晚,我们对于日军枪毙缴械士兵及日益增多的抢劫、强奸罪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曾经担心中国士兵撤退时会抢劫平民、制造混乱,这些压根未曾发生过。没预料到的倒是:日军持续强奸、抢劫和屠杀。星期日以后事态更为严重。

12月16日,星期四

鉴于目前我们面临的恶劣环境,第二天(周四)一早我就起草了一封信,早餐时大家一块儿品评补充。除了罗列15件暴行之外(这是我们对日军暴行记录的开头,现已增至147件),我们要求由一名负责军官领导进行清查工作,安全区在夜间要设岗哨防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汽车、卡车的防风玻璃上要贴上通行证——我们的卡车已陷于停顿。当天早上外国人开始搬运,齐阿尔干了几天,却在—辆小汽车里被日本人抓住,他吓坏了,几乎上不了路。周四那天中午,林查理哭着回来,他被一个军官打了两下。当晚华群让外籍人员过来。我们想应该值夜,贝德士、林查理和我三人轮流。我就在陈先生门边的小屋里睡,他们俩在新教工楼休息,那屋子是空的。晚上除了一个士兵带来半担大米外,什么事也没有!

12月17日,星期五

我们拿到17日的信,使馆有一份,我们又在那儿让打字员多打了几份。下午3时,信送到福井^①先生手里。因为他们不能按要求派巡逻士兵,福井便同意我们的口头建议,让哨兵夜间驻守在妇女集中的八个地方。下午5时30分,我们吃惊地发现他带着一个宪兵头目及一车宪兵

^① 福井,日本大使馆二等秘书。

来到总部,让我们把八个地方指给他们看。城市里只有 17 个宪兵! 我们把他带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地,——我们以为已开始采取行动。晚饭后,我们仍决定去金陵^①看看。贝德士去了金大,因为他说“我只有看见宪兵进入才会相信”。于是费吴生开车送贝德士去金大,再送林查理回家,送另一人去大学医院,然后回头找我们。我决定与米尔士一同去,看看情况如何,再和费吴生一起回来。夜间我们俩结伴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小汽车回家。我们开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高兴地叫“开门”。门开了,手持刺刀的日本兵把米尔士和我推进大门内的路上,另一人用刺刀逼着费吴生从车里出来,拿走车钥匙。他们让我们在路的东面站成一排;华群、程太太和戴籁三夫人,以及一群低垂着头的仆人站在路的西面、门卫的小屋前,幸亏华群立即暗示我们当心这些兵很粗暴。那个中尉粗野地让我们脱下帽子,搜查我们是否带有手枪。他竟然说法语,他手下的一名士兵能说一点英语和汉语。费吴生使劲想记起一些法语,但他的吞吞吐吐更易引起怀疑。我们在那儿耽搁了一个多钟头。我们出示护照,费吴生没有护照,只有名片。他们让我们走,却又两次把我们叫回,先要求妇女和我们一起离开。最后又决定 9 时 15 分让我们走。我们不愿意离开她们,但似乎我们在场会引起麻烦,他们宣称当夜要搜查士兵,我们试图让他们推迟到明天早上。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把华群等扣在门口直到 10 时,那时巡逻士兵已经离开,妇女们又不敢走。日本兵带走了商业经理陈先生。她们看见后门有人影晃动,知道有可能是日本兵在抢走妇女。在宿舍楼,她们找到布兰奇·吴,她说他们抓走了妇女。她们又去了华群所在的实验学校,发现陈先生已回来并正在喝茶,日本兵在广州路把他放了。在门口搜查时,日本兵抓走了 12 个女孩,所以这自始至终是在演戏,意图浑水摸鱼,我们的突然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步骤! 这也打消了我去追日本兵的积极性(17 日下午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来办公室——或许是 16 日? ——见 17 日和 18 日的信——他说虽然日本人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如同被他们承认了一般)。

① 这些外籍人士通常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为“金陵”(Ginling),而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则有时被简称为“大学”(University),两者不能混淆。

12月18日,星期六

我们起草了最详尽的一封信,要求用一切可能的军事手段恢复秩序,使之相信不再有大量的士兵,更加小心地搜查,包括用正常警察系统接管。释放90名警察和45名志愿警察,我们强调不需要政治力量。当天下午我们把事情对田中说清楚,他平静地说,他将对军队提出此事。然而那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日军到处抢劫、强奸。拉贝和我决定作为德方和美方代表要求采取行动,那时是下午5时30分,只看见冈崎一个人在屋里,所以只得对他讲。拉贝开门见山地说,他是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德国最高荣誉的膺获者,德国领导的代表。我强调我们只是对保障人民的人道主义权益感兴趣。冈崎说他下午已让福田去和军队商议。出来我们遇见刚从军部回来的田中,说他们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设岗。我们问其他的地方怎么办——哦,我想有8个地方,但我们已增至18个难民集中地。他说他们只能做到这些。幸好田中下午来到我们办公室带走一些案例,福田也带走一些。一个特务处的军官来见拉贝,谈有关电厂开工的事,他被叫去把士兵从拉贝的住所赶走,据说是在抢劫他的副主管韩先生。附近还有一起强奸案,这个军官当场捉住了日本兵并把他铐起来,然后告诉拉贝,他这才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是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才让使馆人员相信。那晚我们和米尔士惶恐不安地去金陵,到了那儿正好见到宪兵在派驻一个卫兵和一个警察,有一个警察也去了金大,他很好。从那以后至昨晚为止(写于12月26日),华群说她不再需要任何人来金陵,昨天他们却撤销了警卫,不过他们昨晚又派了个警察。

因担心宪兵不来,我们送米尔士去那儿睡觉,前晚过去后,米尔士觉得不安全,我决定再去作护卫。但我们又发现军方和使馆警察派驻了一个警卫。于是大家都很高兴,米尔士还是留在那儿。

12月19日,星期日

早晨。头一晚非常糟糕。吃完早饭,贝德士、威尔逊、费吴生和我就去了日本大使馆,威尔逊、贝德士汇报了夜间护士宿舍和金大的强奸案

件,费吴生陈述了我们进行工作的难度。从那儿我们又去了大学附中,那儿前一夜也不平静,三名妇女被强奸。出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吴珍珠小姐进门,身后有士兵跟随,我们不顾士兵反对,让她坐上车,回到日本大使馆,问在这个城市哪儿对于她是安全的?想带她去金陵,但在大门口看见了许多日本兵,只有把她带回来。她在这儿帮我抄写案例直到中午两点(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高才生干这个真太委屈她了),然后在我们这儿吃了饭,再去大学医院去帮助海因兹小姐,没什么忙要帮,但至少安全一点。她一直在五台山独居,除了一天被无恶不作的日军逼进一个瓷器店外,过得还可以。

12月20日,星期一

8时15分,现在很显然我不能和你们共度圣诞,这儿没有一个人会回去过圣诞节。而且我想这将是我在这座城市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度过的最忧郁的圣诞。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如此众多的人民。在这些天以来我们面临的如此巨大的人类难题面前,我们不应再奢望有自己的愿望。尽管如此,我仍但愿能和你们一起在牯岭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10天前的晚上我曾写信给你们说,我希望中国军队撤离前不要在城南开火。今晚5时以后,费吴生和我驱车经过城南时,发现日军正在有计划地焚烧!我们到保泰街看见一个士兵进入费吴生家的后门,尽管上面贴有日本使馆的公告(自从日军进城以来,几乎所有的外国房屋都被洗劫过,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在中国军队撤退时都检查过,当时还完好无损)。最近两天日本使馆的田中先生还急忙在外国财产上贴上日文公告。但看了今晚的焚烧情况,我们却再没有心情接受其作者对齐兆昌下属的人所说的话,当时他在大学发表声明:他们将在军队焚烧整座城市时制止他们焚烧外国财产!昨天使馆的一个人对齐说“再等一天就太迟了”。

我们在使馆没找到田中,费吴生便建议开车四处看看。当时刚过5时,天开始变黑。我们把写有第71至96条案例的信放在使馆,然后去保泰街,再往南去太平路。我们穿过后面路上的一条小溪,看见一些中

国店铺里的火焰。太平路的大部分已被烧毁,可能毁于昨晚我们见到的大火。再往南我们到了白下路,路两边大火正熊熊燃烧。15至20个一组的士兵们正在清除抢劫者们剩下的物品,并在店铺中间点火。我们必须倒车返回,因为往南的道路被堵住了,日本卡车和小汽车在卸货。再往南没有火光。我们经由白下路去中华路,看见基督教青年会正在燃烧,北面的半边楼里一片火光。楼两边都没有火,火一定是从内部点燃的。在我们以南,路的两边都是烈焰,于是我们只有回来。昨晚国府路几乎被烧成一片废墟,往北就我们视力所及,中华路或中山路以西没有火焰。在太平路我们看见几个老百姓抱着铺盖跑出来,看到这些被毁坏的情景实在是一件悲惨的事,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留在此地过冬将意味着什么,但我仍很高兴我去了。一周前的次日,12月14日上午,我和拉贝、福斯特又去了这一带,一切几乎保持原样,炮火又增添了损毁。我可以向全世界起誓,这些焚烧不是中国军队干的,而是日军所为!

我们可能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但我们明天还是要写一份抗议书。我们听到第一条来自外界的新闻就是那个时候,或者说,从12月12日星期日晚上起,因为从那以后我们总部就断电了,从13日早上起电话也断了……这是今天的新闻。在栖霞山监察江南水泥厂的小伙子辛德贝格先生今天来到办公室,他走了20英里路。然后登上一辆日本卡车进城。现在已不允许任何外籍人士进入或重新进入南京城,他那儿有Delco收音机可以收到新闻。他说“帕奈”号事件完全不是我们听说的那么回事。我们的消息来自日本海军,他们是12月15日(上周三)早上抵达下关的。美国方面反应强烈,要求天皇亲自道歉。香港也闹得沸沸扬扬,英国军舰也卷入其中——他甚至说“蟋蟀”号也被炮弹击中了。“帕奈”号还遭到机关枪扫射、登船搜查等等。知道一点发生在南京城外的事情,让人感到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与活力。

12月21日,星期二

晚上8时30分。今天拉贝给“蜜蜂”号上的罗森博士回了话,并给了他这儿的22名外籍人员的名单,说我们都好。我们是多么幸运!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健康地活多久!好在我们尚有足够的食物以及人

们从家里带出来的“劫余品”，老百姓为防备日本抢劫而杀掉自家喂的猪，他们知道我们花钱买肉，一周以前日军进城以后街上就再也找不到厨师了……

拉贝回罗森的信是那一天的焦点。我们一起到大使馆，以全体外籍团体的名义向日本当局递交了一份恳请信，上有22个人的签名，要求停止焚烧整座城市，立即停止已持续一周的混乱状态，恢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允许运进食品，确保住房安全等。我们到了那儿，他们递给拉贝一张罗森写的便条问我们是否都好，问德国财产是否完好无损！拉贝是发言人，等田中读完信并回复说他们过几天将尽力而为后，拉贝告诉他罗森的来信，并说他不得不回信说除了两座房子以外，其他所有的德国房屋都被日军损坏了。我们的请愿计划已在脑子里酝酿了几天，但一直持保留态度，当前两夜日军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焚烧整个城市时，我们觉得是提出来的时候了。起码我在头一晚就决定第二天早餐前起草信件——我们的就餐时间几乎就是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会议，现在我们有八个人和林查理一起吃饭：威尔逊、贝德士、林查理、麦卡伦、米尔士、宋煦伯、费吴生和我，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我们聚集在一起当然感到安全得多。当我们感到极度沮丧之时，我们中总有人会苦中作乐，开玩笑使大家振作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困难的时光，上周至周日我们都快坚持不下去了。但现在除了焚烧之外，情况有了些许好转，秩序稍稍好一点。也许是因为军队秩序好转，也许是因为妇女和儿童集中在难民营：在公共建筑和学校有25个难民营，共有68 000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天多达8 000人！到处是妇女和她们的铺盖！今天从外面进来的人已基本停止，昨天金陵增加了2 000人！但这个聚集地妇女被强暴的人明显少于其他地方，有些地方设了警卫，对此有所帮助。如果情况很快好转，通过各种途径向安全区运进供给品，以及我们贮存的大米，就能帮我们渡过难关。经过日军的烧杀抢劫，还有这么些幸存之物，真让人有点吃惊。

我还没说完拉贝的信！他用华丽的德语告诉罗森，他很高兴城里还有两座德国房屋未被损坏；罗森的小车以及其他德国汽车，为日本军队提供着优良的服务；说他希望在此过圣诞节，因为那时候估计会有水、

电,并通电话!然后又附了外籍人员的名单,说我们都还好。这简直是个杰作!为礼貌起见,这张回签经过日本大使馆时不能封缄。他们拒绝发这封电报,于是我们几个美国人决定在昨天要求我们的使馆人员尽快派一名外交代表,拉贝知道他必须很小心才能使事情进展顺利。他比我们老练多了!昨天早上我们起床时眼睛布满了血丝,但还是在餐桌上反复把电报修改了六遍,直至我们认为用语比较含蓄、能够发得出去为止。他们再一次拒绝,因为我们说“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他们说“情况是一天天好转”。日本兵已经在威胁我们,而且他们对我们尤其是美国人的反感日益增长,因为我们当日本人要在门房、地下室、卧室等地强暴妇女时把他们赶走。四个地方的国旗都被他们扯碎,除了特劳特曼和此地的房屋之外,其余财产都被洗劫一空(林查理说,我们在25号的房子幸免于劫是因为墙太难翻,而且里面的人太多)。不过大部分美国房屋只被拿走一些小东西,没有被抢得太厉害。对于我们,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在牯岭:铺盖、衣物、食品和钱。现在我只有支付两周伙食费的现金!但威尔逊并不急于要钱,他想保持现金分散的状态。如果我需要钱,可以从贝德士那儿支取一些差会的费用。

今天早上贝德士与福田交谈时,说情况有所好转,我们想让他们了解一些今天的案例。于是我在办公室一直呆到6时,把至下午4时30分发生的案件复制了好几份。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难过的工作!打完了第113例案件,主要是复合案例,而且这不过是无数桩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周六、周日混乱至极点时,我们估计每晚和那两个白天有一千多名妇女遭到强暴,也许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蒙难,而且是发生在安全区!年轻姑娘和一些老年妇女被抓去后无一能逃脱厄运。牧师的妻子们、大学导师的妻子们,都与常人无异,那些漂亮一点的更受“青睐”。最高记录是一位姑娘在神学院遭到17名士兵的轮奸!在美国,人们提起“强奸”二字都要压低声音,而在这儿它的出现成了家常便饭!罪行发生得如此之快,我的记录几乎跟不上进度,我便开始进行速记。我若是等别人把它写下来交给使馆,它已过时了,因为使馆只要求对当日情况进行汇报,所以我现在是随时速记。

整个情况实在叫我们吃惊。我们不知道这个奇迹还能持续多久:我

们这群手无寸铁的外国人在此把日本兵从学校建筑、外国房屋、中国居民的家里赶走,目前我们还没人受到伤害。日本兵一般是跑开了。我们通常是用我们的身份吓唬他们。如果我们眨一下眼,我们就完蛋了。施佩林是总部的总稽查,他整天不时地被叫出去,几乎走遍这一地区的每家每户,现在日本兵一看见他就跑走了。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这简直太离奇:他们只要看见胆敢说话或求助的中国人就用刀刺,用枪击。周六和周日我希望符咒被解除(此处语意不明——译者),但来自军部的压力似乎削弱了士兵的胆量,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厉害。我们四个人(我被派去做这件工作,幸好我在路上遇见费吴生、威尔逊和麦卡伦)把他们赶出门房,他们在平仓巷路口拐角处剥两个姑娘的衣裳。他们当时非常恼火,我们意识到他们随时可能拿枪毙了我们!但是我们站在一边什么也没说,后来他们就走开了。我遇到这种事比其他人少得多。星期天,贝德士在金陵大学遇到类似的事,他简直气疯了。林查理也有好几次这样的遭遇,昨天他去运送大米和燃煤,感觉好多了,因为到了夜间他看得见自己的劳动成果。要及时供应难民营的大米和燃煤,运送任务还真不少。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开着卡车上街。米尔士周五、周六也帮助搬运米和煤,林查理则忙于遣散胡作非为的士兵。他们不但要驾驶卡车,还要去鼓楼红卍字会苦力们住的屋子,把他们护送到大学,装载时得看着他们和卡车,然后再驾车往返发送以免日军抢东西;再把苦力送回家!不让日兵抢走苦力和卡车几乎就是一场战斗。

今天林查理给了日本军官一个机会,他来到大学要 15 个工人。林查理说他可以照办,但他要发臂章给他们,保障其安全并保证发给工资和食物。他说他可以办到。林查理说可以给他 1 000 人,这个军官只是想征用他们! 12 月 15 日我们建议设一个就业局,我们可以掌管就业情况并提供保护;但他们不愿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们会再次提议……

日本人召集商业人员准备明天开会,这表示他们试图恢复秩序,但他们仍在焚烧城市,这显然很矛盾。今天下午贝德士在他的信中又列举了案例,他那天和我想得一样,说“告诉我们,你们究竟是要恢复正常秩序,还是毁掉整个城市,我们可以据此行动,请不要愚弄我们”!

如果我们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我们会把日本人累倒的。我们已顺

利通告他们,(事件)比我们一周前想的多得多,使馆人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军部熟视无睹,或者效率低下。

12月22日,星期三

圣诞节快到了,我却无法和你们联系。贝德士和米尔士今天下午带来一封信,请日本使馆让军队转发我们的电报,但在“情况日益紧急”一句中划掉了“日益”二字。这是米尔士早餐前想到的。他起草这封信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权要一位外交代表。但我恐怕我们的办法不如拉贝那封信言语幽默、让人愉快。当然,他的开场白比我们写得好。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但会让我们知道军队的意见。这阻止了我们请他们为我们发私人信件的事。宋煦伯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在莫干山的家人请求上海的某人把他们带走。这封信还未发,我们想如果我们能与海军直接联系,他们一定会帮我们传递私人信件,可惜他们在下关。

米尔士搬走是我们今天惟一的战略转移,宪兵队的特务今天上午来见拉贝,说他们要进行人口登记。他想也包括安全区的委员会。我们希望这将意味着开始行使管理城市的职责。但目前只登记“良民”,只有持有登记卡才能住在南京!这老掉牙的日本规定!

事情进展不好的一面是中国人中出现了日军的同伙。昨晚一个中国人再次来到大学为一队日兵要姑娘。“拉皮条的”,贝德士如此说这种事。警卫要勒死他,贝德士阻止了,只把他扣住。今天下午我们看见一个人领着一些士兵去总部对面找姑娘。中国人恨不得把他撕碎,费吴生则让他藏身于地下室过夜,又能怎样呢?在大学里警察不敢放他走,担心他会把士兵带回来抓姑娘。这些无赖只会带来无尽的麻烦!

另外一件事就是有计划的焚烧城市在今天仍昼夜持续进行。中山路以东至黄泥岗的大部分已被烧毁。马克斯后面的房子今天下午着了火。事态表明他们焚烧街道两旁的主要大小商店之后,开始烧民房。目前据我们所知,中山路的这一边尚未烧毁,所以我们希望他们会保全安全区。但安全区以外,除去外国财产,一切都是毁坏的目标。

可怜的拉贝急于电厂开工,作了愿意合作的表示。但他们今天去找工人时,发现54个人只剩下11人。几天前日本兵就把其余的43个人枪

毙了！他们是在和记洋行，日本人要人时，问是否所有这些混杂的人都是和记洋行工人。负责人说有 54 个电厂工人。他们说：“那是政府部门，所以得枪毙他们。”负责人说那 11 个人曾帮助修理和记洋行电器设备，所以就放过了他们。其他的人则被带到河边，机枪扫射而死。多么残忍野蛮！尸体开始浮上水面。30 至 100 人一组排成一行射死，有的人奇迹般地逃走。

今天抢劫与强奸仍在继续。昨天几个主要大集中营没有什么案情报告，但昨晚和今天袭击又开始了。昨晚（日军）竟开着车光临金大！还挺高级的！但在门房值夜的警察总算好说歹说制止了他们带走姑娘。今天克勒格尔和哈茨在总部附近一所房子制止一个酗酒士兵抢劫和强奸，他竟然转向克勒格尔，要把他绑起来再向他开枪！一个中国男孩跑到总部找费吴生，费与拉贝跟着这孩子跑去抢救。凑巧田中和一个将军巡视安全区经过此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将军问这个士兵，他竟说克勒格尔袭击他！然后又问克勒格尔，克勒格尔说只是礼貌地请他离开！所幸哈茨没有给那人一巴掌！将军把那人铐起来又狠狠踢了他几脚，但又把他放了！一副手铐、加个敬礼就是他们用来制止强奸、抢劫和枪击的办法！没有一个士兵有任何身份标志，你无法记下是谁干的，这个人就是曾用刺刀指着克勒格尔的那人。我们很高兴克勒格尔是个德国人！但我同意拉贝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试图把他们从中国人居住的房屋中赶出来。他们只允许我们保护外国财产。就像米尔士昨天说的：他们十分确信可以对中国人所欲为！但还未至于此。昨天下午贝德士驱车带福田看一拐角处的焚烧情况。福田表示他知道这是有目的的。福田说他希望远离这个乱糟糟的地方回东京去。我们认为使馆的人不喜欢目前的情况，但军队喜欢。

米尔士今晚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已竭尽所能。大使馆的人说他们没法再去军部提什么抗议了。所以我想我们得听从拉贝的策略放手一两天。从 14 日以来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在金大由贝德士整理细节，拟出抗议书，以及日军所犯罪行的记录，前面还附上一封指责信。除此而外，华群每天都要去使馆抗议。我们也去过两三回。够多了，但看来没多大用处。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我们的工作：往难民营运送大米和燃煤，把案情记录在案等。如果明天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罪行需要我们抗议，我们将一如往常礼貌地要求他们答复我们昨日的请求。

另一个奇迹——今天辛德贝格又开着拉贝借他的车从栖霞山来了。路上有个士兵坐进他的车，并让守城人放他进来！给我们带来了两头猪、三袋红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天送了我们两只鹅，圣诞节看来会好过一点了……

12月23日，星期四

今天情况有所好转，也许因为许多地方增设了岗哨，也许因为今天下起了小雨，我不知道，起码街上少了一些士兵，也没那么多求助的呼号。但宋煦伯开卡车时又碰到麻烦，一些日本兵把斯坦利·史密斯房子上的美国国旗扯了下来，这是第9桩类似的情况，是安全区特别调查小分队（日本人）干的！他们贴上些小旗，并把他拉到街上，让他签字把房子借给他们两个星期，但他们又插上旗帜把小旗挂在门上。贝德士说这事一早就得向大使馆报告……

日本人从 RLTS^① 的难民营带走了 200 人并枪毙了他们，其中可能有军人，但据说一半以上是平民百姓。我们希望日军的愤怒已得到发泄，不再有射击。有一个人跑回来告诉我们他的经历，他受了伤，部分是烧伤。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否和另一桩案情是同一件事。今天另有一人跑回来，他的脸部全烧坏了，很可能眼睛被烧瞎了。他报告说他们 140 个人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太恐怖了！他和前面那个人是否是同一组，我们不得而知。被枪毙的那组据说是先浇上汽油再点燃尸体。死里逃生的那个人被压在下面，最后得以跑走……

我们邀请了拉贝、施佩林和克勒格尔明晚过来过平安夜，这儿还有华群、戴籁三夫人、布兰奇·吴和吴珍珠，布卢姆里圣诞节会来吃晚餐。

福田明天乘飞机去上海，说他可以帮我们带信。但既然信件也是他

① RLTS 为 Rural Leaders Training School 的简称，意即农业专修学校，这里的难民营当时收容有 3 000 人左右。

监视(!)的对象,我们只给你发封简短的电报:“圣诞快乐,我们一切都好,希望你们也一样。”希望上海的美国领事馆顺利地把信送出,麦卡伦、米尔士、特里默和我也将签上我们的名字。

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他带话给“蜜蜂”号,如果情况更为紧急,就停在下关。

那两个烧伤的人都在威尔逊医院里,但他不知他们能否活下来。那个失去双眼的人即使能活下去又有什么用处呢。但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挣扎着来到我们总部的。是一个好心人领他来的。贝德士得到消息,说那次从农业专修科学学校带走的只有 70 人,这也足够了。在总部高平善(音译)第一个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有一个纺织工人的亲戚被带走了,于是他们都要我们的臂章,在这儿,臂章比复活节的帽子还俏!很快臂章被分发到各处,仍享有相当的声望,但那些带太阳旗的想替代我们。今天,日本使馆向我们所有的外国人发了臂章,给我们在城内的自由!林查理计划把纺织工人安置在金大的红十字会的粥厂,因为他们的臂章似乎对日本人更有效。

有了一线希望,一两天以后会有一批新兵来替代那些给我们带来诸多麻烦的老兵。他们被告诫说任何人做坏事都会被抓住枪毙。我们说等他们都被枪毙了我们才会相信。难民们都对明天即将开始的所谓人口登记十分忧虑。要给所有的人发登记卡,如果你把自己的卡弄丢了,你就得滚蛋。这是士兵的新杀手锏。昨天到今晨,又可以看见街道两边有小店开张了。情况有了好转。正如贝德士所说,可能会一点一点地慢慢好起来。

今天早上拉贝来说,领事馆警察要一份至今天 2 时止被抢劫的外国房屋清单。所以这就是我们马上着手做的事。当然我们给的仅是一份大概的情况报告,有关抢劫的程度,晚些时候由美国使馆确定的文件中声称(间接地)保留的权力。47 幢德国房屋中据说有 38 幢遭到洗劫,174 幢美国房屋中有 158 幢被劫,但现在德国人称的“洗劫一空”并不像 1927 年那样。那时连门都给下掉。现在他们的意思是房屋被洗劫,所有上了锁的门、柜都被撬开,东西倒在地上。士兵要的是些值钱的小东西,不是家具。他们更多的是毁坏而非带走。现在整个城市一片废墟,我今晚没

有再去看那些被毁的部分——在中山路的这一边干河沿,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如果下一个星期的大雨,他们可能会停!商店得开张,这还是颇费周折的工作。但若下雨,难民们可就难过了,今天下午,米尔士和林查理想把一些睡在门外的人从蚕厂转移到汇文女子中学,但未成功。我们想转移至汇文、中华和明德,以减轻人满为患的压力,然后再转移到安全区外的地方。

12月24日,星期五

威尔逊昨晚来我们的房子帮了会儿忙。两周来他第一次回家较早——5时。他去金大花园买了六盆圣诞红,分放在客厅周围。然后他又弄了些红色的图案贴在客厅、餐厅,看起来总算像是圣诞节了。但我们没有树,没人有工夫或机会买什么圣诞礼物。屋子里既然没有孩子,估计也没有圣诞老人光临。但今天拉贝先生给我们每人一个笔记本,西门子公司印的德文,很漂亮,也很实用,附有支票夹和地址簿以及一些有用的内容。今晚他将来我们房间共进晚餐庆祝平安夜!真有趣!德国人比我们还看重平安夜,所以我们请了他们三个。华群阿姨明天要来吃圣诞晚餐,格雷斯阿姨也可能来,你瞧我们要吃两次圣诞晚餐……上帝赐给了南京一个好天气,空袭时有雨有云,这段时间安全区一直晴朗、温暖,昨天白天和晚上才下了一点小雨。今天有更多的士兵进来,威尔逊说已没有过去那么多了。周围的士兵减少了。贝德士在金大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白天麻烦也少多了。但士兵仍溜进来并带着警察逃走,今天我在金大看到其他12人,这对于刚建立起的士气民心可不大妙,我今晚要主动去替换贝德士,让他歇一歇。

昨晚的一件麻烦事与美国有关,我给你讲过宋煦伯的遭遇,这事到现在还未了结。今天早上同一队伍又占领了五台山,但米尔士前去解释时,士兵们又突然溜走了。最糟糕的事是抢劫美国使馆,东区西区都未幸免,几辆小汽车和卡车也被开走了。田中对此事极为关注,他将派驻一名警卫。米尔士将这些事件记录在案,所以我今天只记了一页纸。关于枪击的案件我们未能汇报,因为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证据尚有歧异之处,而且揭露逃跑的士兵也没有什么用处。那个把眼睛烧坏了的人今天

早晨死在医院里。但又住进一个被机枪射伤右肩的病人,他说他们有约4 000人,16日在长江边被扫射,有约30人幸存。不祥的是今天下午我们到使馆与田中讨论问题,他告诉费吴生有一个原中国军官报告说,他知道安全区还有一些中国士兵,他们中许多人仍备有手枪。我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完全是这个中国军官为了苟全性命而干的混帐事,以这么多老百姓的生死安危为代价!如果他们在这儿找到一个带手枪的人,他们很可能会杀死200人!一直到昨天,我们还在希望他们不再滥杀缴械士兵。如果还有一些士兵的话,他们已被分散不会生事。从13日以来,安全区就再也没有狙击手了。田中却说:“过几天你们的难民人数将减少。”不知他的意思是士兵将会被杀死,还是年轻人会被拉去做苦力,还是他们会将人们遣散回家,现在有许多房屋都被烧坏了!

今天登记仍在继续。我们看见在山西路的一个登记点,(日本)士兵正在用刺刀胁迫人们从家里、从难民营前去登记!什么都要用刺刀!下午我在日本使馆外等费吴生时,一个使馆警察驾着马车进来,还有三四个仆人拉着煤(他们带着和我们一样的臂章,只是我们的数字小些)!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商业性的,他们运煤就用不着麻烦一个使馆警察监工了。但一切都是征用性的。结果,没有商人现在会对囤积感兴趣,每个人都在努力销毁自己的东西。所以会发生饥荒,肉类很快就没有了。正如我们外籍团体在请愿书中所说,目前的情况很快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饥荒。威尔逊说今明两天我们还能招待客人,以后就不行了!我们的罐装食品持续不了多久。如果我们这儿也像别的地方那样遭到抢劫,连两天都应付不下去!现在我们已是奇迹般地逃脱厄运,克劳特曼的房子也是!对于登记,一些中国人说他们把20岁至35岁的人装进卡车带走,我指男人。但我们没看到。我们只注意到少数几个地方。

昨晚转移汇文不是很顺利,因为使馆和士兵彼此产生了误会。使馆说没有多少女人,士兵说没有男人!林查理和米尔士花了两个小时才讲清楚,最后他们让100个人搬进来了。但同时士兵把守门人的木材都烧光了,又开始烧他的家具,米尔士制止了。那次转移一直耽搁到第二天,还得安排伙食等等。

今天早上汉口路那个卖煤的人来告诉我们,日本兵已征用了他的

煤,本来我们已买了他所有的煤用于开粥厂。田中在这儿时,我们向他提出请求,他表示无能为力。但中午我和费吴生回家时,发现林查理在26号旁边的院子里卸煤!他从日本兵那儿弄来的,他们只需要木炭!燃煤是我们最主要的紧缺物。

今天早上福田要乘飞机去上海,主动提出帮我们带信。我们给了他一份我们全体人员写的电报,我草草写了一页纸的信给你……贝德士代里兹给他的家人发了一封电报。林查理给格蕾丝寄了一张圣诞卡,其他人都给家人写了信,米尔士把他的信写了两遍,你会有更多的了解……

辛德贝格今天中午又来了,他可能还没回家。他说他可以带信给“蜜蜂”号,如果我们保证他仍能领到在水泥厂工作的工资,以防他被“蜜蜂”号或日军阻止。贝德士觉得这太危险,也许根本到不了那儿。最好是等到他能带话给经过栖霞山的外国船只。

今天在日本使馆,克拉告诉我们,修使馆汽车的齐阿尔可能会被派去上海弄些零件。他们把其中一部漂亮小汽车的轴承给烧了——士兵们往往在得到汽车的两三天内就把它毁掉。街上到处是被毁的汽车、卡车,还有尸体,没人去清理它们。如果齐阿尔去的话,克拉觉得我们可以让他带些信,这样我就可以让你更多地知道我的情况。

住房委员会委员许先生刚刚进来。红卍字会正着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满足日本士兵和军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上周六贝德士就暗示过此事,当时林查理吃惊不浅。许先生说他们准备建两个分部:一个在鼓楼火车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个在新街口以南供军官使用,全是营业性的。他又进一步说,我们聘为经理的王先生,以前是保泰街的拍卖人,与南京的下流社会过从甚密。他是我们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特别组织有着怎样的一群人啊!我们这儿的德国人都是些可靠的人。自从日本人进城以后,拉贝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救星。他能把他的黑色卍字翻出要求对方注意,我抓住机会向许先生解释我们对大米的政策。前天他告诉费吴生,福田有次暗地说:“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卖大米而不是把它送给穷人?”我解释说大米要送进粥厂。我想对于大多数南京人,他们只是象征性地给几个铜板,因为他们没有钱。我们卖是因为我们需要钱再去买东西,买将来还需要的大米。这样我们可以资

源循环以便度过冬天最艰难的日子。如果现在我们一下子全送出去,那还吃不到两星期。他说他明白,他对日本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还说,我们得让正常的经营活动开展起来,因为日军的征用制度效率太低下,他们即使不是有意的,也迟早会把人们都饿死。任何经营都会有益处,尤其是米和燃料。他还在试着让上海和芜湖的铁路恢复运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芜湖得到大米。他还说有几个很能干的商人现在都躲起来了,不过只要有一点安全感他们就会出现!男孩子们都笑了:贝德士宣扬妓院,我宣传资本主义!

12月26日,星期日

上午10时在办公室。圣诞节来去匆匆,我却不能在家和你们一起,说到这儿我很难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困于此,几星期来我们看不到任何能够离开希望。我们得看护着难民过冬。

星期五晚上,平安夜。克勒格尔、施佩林和特里默一起来吃晚餐,拉贝觉得他应呆在家里守护房子和他院子里的600名难民。晚饭后米尔士去守拉贝的房子,拉贝先生就过来一会儿。拉贝先生给我们每人一本1938年的西门子公司日历记事簿。威尔逊为他的德国客人打开了一瓶德国使馆送给他的酒!晚上威尔逊回医院前奏了几首圣诞歌曲,我们围坐着在一起忧郁地歌唱。克勒格尔对音乐挺感兴趣,贝德士又坚持我们再去大学看一看。

昨天早上,我们留下的四个纺织工人(三个老工人和一个新学徒)来看我并祝圣诞快乐,又要求做特殊工作。林查理安排他们在大学的红卍字会粥厂,他们对此很满意。我应该提前准备好钱,或当场就交给他们。由于要守护他的房子,拉贝没来办公室,约11时我去那儿谈苦力雇佣铺和交易铺的事(从克勒格尔那儿发现粥厂堆着一些零钞,我们要尽快把它拿过来以便流通),鼓励个体商人带来大米,因为很明显日本人不会给国际委员会任何大米。拉贝觉得苦力雇佣铺应建在自治会旁边,自治会与日方接洽已近一周,(自治管理组织),由几名小商人组成,领头的是红卍字会总部的一位老人许博士。我们的住房委员会委员,一位博士也在其中,还有与下流社会有干系的王先生(那些在12月22日第一次见面

的商人们果然于1月1日正式组织起来)。回家的路上我两周来第一次停在25号,这是自难民搬人的第一次,我给了朱嫂子1元钱,给每个孩子1枚10分硬币,这些共计5元的硬币是我从克勒格尔那儿弄来的。三周以来我除了自己有两枚硬币之外,第一次有了这么多零钱!我看见那些纺织工人,也会给他们每人1元钱。想从我的书房拿点东西出来,但林查理打不开,于是他卸掉把手!(我的书房)还没有被闯入,尽管日本兵已来这所房子光顾过好几次。朱嫂子和孩子们都好,日本兵对待我们还不算太坏。我们的大米还够下个月吃,或许只够这个月。她还不要更多的钱。

中午华群、布兰奇·吴、格雷斯和吴珍珠来我们这儿共进午餐,吃布兰奇·吴给我们的鹅,摆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罐头食品,看来还颇丰盛呢。我们的厨师不能上街,所以罐头食品消耗得很快。但每天都面临着被抢劫的危险,很难让威尔逊留住厨师,以后我们可能只剩下大米了!我们的女客人们建议我们邀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医院的其他一部分人一起过新年,他们是戴籁三夫人、程太太,还有海因兹小姐。我们会的。和以往一样,聚餐又被打断,我们去把日本兵从蚕厂赶走,制止他们从大学开走卡车等等。饭后我出门准备去办公室,遇见一个怀抱孩子的男人,他说他是老司的亲戚,我没认出来。他要我“想法子”帮助他通过登记,因为他在这儿没有亲戚。我一时想不出法子,但告诉他晚上再来,我想林查理会有办法。他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边的一个草棚里。在办公室,我准备了一封信给他,说他是我的园丁的儿子。但他昨晚没来,今天早上仍然没来。多少机会在这个令人困惑的奔波中溜走了啊!昨天下午齐兆昌列出了金大所有仆人以及难民的名单,有一万多人!贝德士说如果今天早上让他(指园丁之子)来,我们可以把他安置在25号。但他如果不能按时来,他就只能在他的棚屋中碰运气了。我告诉他,让他作为这个孩子的家庭成员通过登记。今天早上我把这封信连同一封给齐的信留给厨师,怕他也许上午会来。但今天是登记金陵大学职工和难民的日子,他可能太晚了,或者说,我的办法也想晚了。开始我没认出他,他原来是以前和老司一起住在我们这儿的那个孩子。我希望一切都顺利,我可能晚点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儿,看看他是否会来。

下午办公室没什么事。运输被打断,因为苦力也得登记,我想今天一天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但人们完成这令人讨厌的登记之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有报告说有大量人员被作为士兵带走,中学有20人被带走。费吴生昨天听说,如果有家庭担保他们,即使是士兵也能被赦免,那些没有家庭的则被带去做工,不会被枪毙。但带走那20人的军官说他们会被枪毙,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可能性极小。下午,费吴生和我与首都饭店^①的刘先生谈恢复商业经营的事。他觉得我们已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但对于商人是否能展开工作没有把握。我们急切地想尽快运送大米。负责食品的人估计,私人储藏和我们手头还有的食品能支持一个月。但我们的燃料已维持不到10天了。

费吴生和我约5时离开,驱车前往英国使馆,看望那儿的人们。中山路以北的几个地段,12日晚中国军队撤退时留下的杂物已被清除,但仍有许多路障,烧毁的交通部前有许多小汽车和卡车。铁道部还完好无损,明显被日本军官占用着。英使馆被抢走11辆汽车——这伙人因此公平举动而欢呼!^②没有进到建筑内部。我们沿着一条老路返回,路上仍是一片狼藉。小群的士兵被安置在沿路的房屋里,用那里的家具当柴火烧。许多小店铺都被烧毁了,我们发现好几处纵火,其中一处英使馆的正对面。但总的说来纵火已停止。看来他们是先抢劫再纵火!但只有几个没有和店铺相连的私人住宅被烧毁。

刘先生昨天谈到,他的一位日本军官朋友说,在这儿给我们带来诸多麻烦的第九师团今天早晨要离开,最后的3000人上午9时将去常熟。取代他们的第十六师团装备更好——我们希望如此,因为第九师团把到手的汽车、卡车全毁了。我希望十六师团不要对所剩无几的车辆再下黑手——如果不是更好的士兵就是更好的人,我们希望如此。宪兵摆出一副采取果断行动的姿态,准备严惩那个23日下午在汉口路小学强暴一个办公室女秘书的士兵。他们把她带到交通银行,让她一直待在那儿

① 首都饭店, Metropolitan Hotel, 是中国旅行社开设的西式豪华旅馆。

② 不为美使馆遭劫而忧伤,反而为英使馆与美使馆受同样“待遇”而欢呼,美国人之幽默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等他们抓到凶手进行辨认”。但他们又说他去了芜湖！米尔士已在着手办一份人身保护令，保她出来。但昨天没办成，他们说今天“10时或2时”，他们一抓到他（指凶手）就立即枪毙他。但在同天下午同一地点又发生了三起强奸案！所以我想，看来那七人一伙的士兵，每天晚上都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强暴妇女。我们要向宪兵再次呈上一份特别请求，力求在这两个地方抓住这伙人。从整体上来说，情况好多了，我们希望这种改善将继续下去。昨天宁海路5号的米店很有收获。今天早上又有更多的米，而且昨天和今天早晨，街上的人几乎和11日、12日两天一样多，如果我们能尽快运进大米和燃煤，我们就能熬过最困难的时光。

贝德士昨晚回到金大，米尔士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过夜，两人都说夜晚较平静。今天早上我与贝德士计划今晚由我去金大。他说他要和我一起去，领我转一转。他在会计室搭了一个床铺，有警卫整夜值勤，齐在同一楼的地下室过夜，是警卫主管。前两夜军警都没来。我也应该去跟贝德士学日语！从此以后我打算和贝德士轮流过夜，应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的，不过他更善于与那儿的人交往并使机构运行，他们非常信任他。

我不该忘了告诉你，昨天上午林查理护送一位妇女回家时，在马克斯原来的住处被一个巡视军官打了。这个妇女是他从日兵手里救出来的，对此我们已呈送一份正式抗议书。还有23日晚美国使馆也遭到抢劫，希望那些使馆人员能回来正常展开工作！

12月27日，星期一

下午3时50分宁海路。日军占领南京已经两周，令人忧虑的混乱状态仍在持续。哪怕是最乐观的人对此也不免心灰意冷。我们又开始希望更好的一天会来临，但又有三个妇女在金大被强奸，昨晚被带走一个；在金陵女子神学院有27人被强奸；大学医院一个值勤的人被带走，去帮一个军官搬东西，农业专修科学校的旗帜被取下，今天他们又要占领我们的铁屋顶制毛房。拉贝今天中午去新街口，正好看见他们在纵火焚烧日中公司，这是路口东边一家很好的商店，而且看见新开的市场也是一片废墟，国立剧院也被烧毁了。现在他们还在新街口以北的道路西

边抢劫店铺并准备焚烧。昨天金陵大学登记的过程中,有二百多人志愿承认他们过去当过兵或当过部队的夫役(这两个名称对于被征用的平民劳力来说区别并不明显),因为日军许诺,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就会获准工作;而若不承认就会被枪毙。今天早上有个人身上带着五处刀伤来到大学,他说他们一群人被驱至古林寺,在那儿被 130 名日本士兵用作刺刀靶子。他当时被刺昏了过去,醒来时日本人已离开,于是他挣扎着回来。威尔逊说他有一处伤口太严重,不可能保全性命。我们听了这些,午饭就吃不下去了。我们中有些人因为这些事连早餐也没咽下去。

一面说恢复秩序,一面毁坏一切,威胁老百姓,叫他们无可奈何。拉贝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守护他的家产和 600 个难民;克勒格尔守护他的家产;马吉、福斯特也是如此,守护着满屋子的难民。华群和戴籁三夫人不敢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得有一个外国人整日整夜在大学医院值勤。金陵大学也是如此,只要贝德士有事离开,他们就四处寻他。所以他整日忙于东奔西跑地赶走日本兵。这些天林查理和宋煦伯是仅有的稍有成就感的两人,他们在运货,护送苦力,小心翼翼地看守着他们的卡车。他们运来大米和燃煤好让人们填饱肚子,但他们很难接济每人每日所需之用度,卡车、汽车渐渐地都不见了。日本使馆居然还有胆量找我们借汽车,找我们要机械工人去修理他们的汽车!

昨晚我没按计划去金大过夜。晚饭时贝德士说,最好仍是他呆在那儿,直至登记结束。昨天男人登记完了:先是如前所述的登记程序,然后把他们聚在一起,一个个地问是否有人担保,除了一人之外,其余全部通过了。于是贝德士和宋煦伯保了他。今天登记女人,明天是私人住宅。没看见老司的儿子,我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没看见他。

我那天的想法是这样的:明确向日本使馆请求给予大米、面粉和燃煤。昨晚我们呈上暴行记录时,我和福井约好今天 11 时与拉贝先生会见。今天早上我去拉贝家谈此事,然后拉贝来我这儿,我起草了一封信,他签过字,我们便一起去见福井。福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复,但我们不知道他对军队能起多大作用。我们这帮人决定我们有权力留下市政府给我们的 30 000 担大米和 10 000 袋面粉。就是说要得到 20 000 担大米和 9 000 袋面粉,现在韩先生说我们已有的 1 000 袋面粉根本不是来

自这个指令。没给我们燃煤,但我们找机会向日本人要,因为短缺,我们的燃煤只够粥厂用一个星期。我们可能得买,但也能去要。如我所说,福井先生会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开端,我们希望通过一周的协商,能想出办法在困境到来前得到补给。下午林查理出去找没被军队封锁的煤场,福井说找得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就能有煤。为保险起见我们只报告了其中一半,想自己行动,去我们听说的六个煤场里的另一半买煤!

早上还好好的有太阳,白天却又阴沉下来了,恐怕要下雪,希望别下!去年秋天我们祈愿下雨,而现在我们都希望天气晴朗温和,登记后人们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但秩序若不恢复,我们恐怕情况会很不妙。但我们还是鼓励他们不妨一试,但要小心。然而看见烧毁的店铺,有的还在燃烧,女孩子走在路上被抓走,这些都令他们沮丧。我们希望他们中有些人能够在那些没有被烧毁的地方谋求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女孩子的人数近三天急剧下降,从10 000降至8 000人,安全区又重现了一点秩序。她们回到各自的家里,住在安全区内的其他地方。我们希望能在这拆毁营地之前把这儿的情景摄下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跑道已被清扫干净,几天前那儿到处都是妇女的床铺。

昨晚,我们要在金陵女子神学院设岗哨的请求,没有得到迅速的行动反应。今天福井说,他们正在金大和这些地方设岗。我希望今晚我去时,他们已有了哨兵,我不必一个人面对那些士兵!现在,他们在所有的使馆前都设了岗哨——在马被偷之后,贝德士说,“那简直是幼儿园干的事,那些哨兵应该在13日下午就安置了!”今天下午使馆警察在这儿,要去调查德国财产,还要视察所有外国财产并安置岗哨!我们只能使他们对外国财产感兴趣,而非妇女们的性命和尊严!拉贝说他们总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12月29日,星期三

宁海路5号,下午4时30分。局势渐渐有了些许好转。我们刚刚和福井先生谈了几件事,主要是燃煤和大米,他告诉我们现在秩序已在恢复中,不允许士兵进入安全区,主要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

这正是我们在12月14日的信中暗示希望如此,以及17日在信中更

具体的谈到的事。我要去查看一下我们要求的事他们究竟做到了哪些？17日或18日他们就应该结束所有的混乱无序，但很明显，那一师的士兵被允许肆意妄为，直到新兵换岗并开始清理城市时，军事当局才开始作出控制士兵行为的样子。

昨天我什么也没写。回家很早，但实在太累了——和一个日本军人谈了两个小时——回来就躺下了。五分钟后林查理进来，随后贝德士又来了，我们便闲聊了一会儿。贝德士问林查理的病情等。晚饭前后我什么也没干——太累了！一旦你松懈下来就再打不起精神做事！贝德士回到金大。前天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昨晚贝德士在那儿，今天又该我。在艾尔西^①的办公室更衣不免有点滑稽！

那个军人是冲上校，刚刚从上海来，而且认定他此行来南京要保护外国人，所以他要所有的德国人集中在一地，而所有的美国人集中在另一地，然后他再设岗哨。我很高兴当时拉贝也在，我们否定了这个建议。当我正在驳斥他说安全区没有士兵时，拉贝也帮我应付——冲说我们的危险就在开火，防止中国士兵向日本士兵开火！拉贝说：“我就任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时，就宣誓要尽力保护这些中国人，我决不离开他们或搬到什么保护地。”后来冲要他签字表示同意免除他们对他的保护。随后拉贝又说：“你们保护中国人，我感到安全之后再签字。”很明显，上海的德国当局一定为保护德国人及其财产给他们施加了压力，也许美国也一样。另一个好消息是福井告诉我们，不久将来一位美国代表。

前天，27日。我们呈交了一封信，要求得到剩余的分配给我们的大米和面粉。我们重申现在亟需燃煤，如果日本军方允许，我们愿意向中国煤院购买。昨天下午我们回去看是否有回音。福井没从军方得到回话，事实上他没见到他们。冲跑来，今天我们又回去了，他说高级指挥官Sarati将军在这儿，他在视察我们列出的可用煤院——27日下午林查理挖煤出来，因为福井问我们是否知道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他们不占为己有，我们就有希望得到这些煤！他们建议大米通过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

① 艾尔西，Elsie 即 Miss E. M. Priest，中文称毕律斯小姐，会计室是她办公的地方，所以史迈士有此自嘲。

买卖。但我们已决定以商业形式运作,以后卖给中国商人,现在只保存用于救济的大米。

12月31日,星期五

新年的前夜!下午6时50分,平仓巷3号。这个星期拉贝想了个好主意,他一直在考虑新年我们该向日本人表示什么,他让他的一些闲着的工人们做了一些新年贺卡,正面是安全区徽章,反面是在南京的22个外国人的签名。他做了一些给福井先生、日使馆的成员、负责南京的卫戍部队司令官佐佐木少将,每人还有一盆花。他不愿明天再送,担心会被认为我们在采取什么外交手段,所以他今天分别亲自送到每个人手上。在这儿我们总在谴责日军的暴行,但这些使馆人员非常友好。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少管闲事,而且他们也对军方产生了影响。军队现在似乎真的在努力肃清局势,当然也在试图掩饰这一切!我们祝福那些被卷入其中的(好)人。

前天下午,拉贝和我回去看福井那儿有没有燃煤和大米的消息。他对我们很友好,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他说军方倾向于由自治委员会买卖大米,我们同意了。这回够快了。他还主动提出燃煤的事,那天早上使馆警察在视察,要等最高指挥官的回答。我们请求新年士兵在放假期间解除武装以免生事,他说昨天他们已发令士兵不准进入安全区,入口处设哨兵把守。现在这一地区有几个宪兵站岗或巡逻,今天下午只有少数几个闲散士兵在安全区内。拉贝说,今天中午他们在他那儿树了一个栅栏横在广州路上,并且不让他去中山路。看来他们真的不让士兵进入安全区。同时我们报告了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岗哨之间的麻烦,昨晚他们被撤换了。在金大有八个岗哨,贝德士说一个就够了,这就是今天下午的情况。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撤掉了八个岗哨,现在有一个使馆警察每晚在校门附近守夜。

现在主要得购买大米和燃煤并运进。粥厂尤其需要燃煤,那儿只能应付几天了。林查理下午准备去几个安全区以外、未得到军方允许的煤院买些煤。现在还未有结果,希望他成功。大米还不是很急需,但私人贮存的快吃完了,人们急着购买。所以我们在宁海路5号的店铺,早上、

下午都有人排着长长的队,生意繁忙,那是人们惟一感到安全的地方。除此以外,有几个大难民营也把米卖给那些有购买能力的人,我们也私下送一些货上门。后者近几天快速增长。今天早上我们决定送一袋(1.25担)米收1元,一担仍卖9元,这样每担的价格就低于10元。每送一袋面粉上门收0.5元,每袋卖5元。这样我们希望控制定购,以免有人借此囤积粮食。我们只允许一次在普通店里限买一斗。如果我们能让日本军方允许中国米商购买他们从中国军队弄来的100 000担大米,那么我们就会度过大米危机了,为此我们让他们留了20 000袋,10 000袋用于以后的救济工作以防我们需要。同样,还有10 000袋(大米?)和5 000袋面粉。一旦我们能运进商业性大米,我们将停止出售,并贮备救济所需的供给品。红十字会很幸运地通过日本僧侣得到了分配的3 000袋,贮存在汉中路以南,现在他们正在往粥厂运送。这样我们的大米贮备就和刚开始时差不多了!真不错。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我们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的问题,是这个200 000人口的社区没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如果他们去日军那儿购买大米,那么社区的钱会很快用光,有去无回。惟一的补偿是为日本军人服务的苦力有饭吃,还不一定吃得饱。极少有人拿得到工钱,现在还有几个人受雇于水厂和电厂。其他收入则来自农民耕种的田地。或许还有人们能从城市其他地方找到、抢到的东西!正如林查理所说:用不了几个月,我们会看到很多以掘土挖草为食的人!但宋煦伯说中国人有极强的生命力,即使没人管,他们也能想法保全性命。从16日起,我们就一再坚持,秩序是任何正常生活的第一需要。我过去老是笑英国人动辄讲“法律和秩序”,现在才体会到对于正常的生活,它确是基本的东西。在无序的状态下一切都死气沉沉。如果他们允许城内外的农民自由耕种,那么起码他们仍保留了生存的手段。但现在农民杀死了自家的牲畜,用来食用或卖钱。所以我们这个征用时期与俄国革命早期和5年计划时很相似。任何我们开办的商业机构,只要开始运营就会改变这种状况,要经营而不要征用。如果你能看看,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如此简单的机构如兑换店、米店运营是多么困难,那你就会对组织有序的生活肃然起敬的!然而,那些街边的小商贩生意倒做得不错,危险不大,收获颇

丰,所以他们照常经营,物品还挺丰富,我们简直怀疑是否有些东西是从安全区外被焚烧的地方打劫来的,但现在只要能到手的東西都是宝贝。正如米尔士说的:“我看中山路不再是主干道,上海路与宁海路才是主干道!”现在那儿由于秩序的恢复而挤满了人,路两边都排列着小商小贩,汉口路是个蔬菜市场,每天早上十分拥挤,就像过去的北门桥。而城市的其他部分几乎被市民们遗弃了,除了(安全区?)以南……

由于我刚理发,晚饭时成了大家的中心人物,他们都想知道我在哪儿理的。米尔士安排那个人、我们的“胖墩”明早8时来,我们这群人要等他,他把理发用具留在这儿,很高兴有事可做,因为他几乎没有生意!

今天下午贝德士去美国使馆,看见高玉(他是即将调查外国财产的使馆警察)、福田和董在艾奇逊的办公室。福田告诉贝德士,军方要求他们立即践诺!后来贝德士回来,发现他们已与中国人民解决了所有问题,除了要换一些新自行车之外,还有他们对他朋友的一辆小汽车有疑问。其次,麦卡伦调查了今天涌往北门桥带回大米的人流,发现日本人开放了一家米店,要大家自己去拿米。这可帮了老百姓一个大忙,但极有可能这只是一时的非常手段,不会持续下去。再次,我们主要的“一号抢劫犯”(指林查理)今天下午去了中央大学农学院,拖走了3吨燃煤。一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粥厂的红十字会苦力在那儿弄些水壶,看到了这堆煤便告诉林查理。这一趟,苦力掉了几件衣服在那里,当他们卸煤时,进来了几个日本兵,林查理想,这下可完了,结果他们不过是为过年来找常青树!这次新年前夜听到的故事可比圣诞前夜的好多了!

拉贝今晚不出门,所以我们可以出去一会儿。威尔逊和我最好9时前回到我们睡觉的地方。但楼下开始打桥牌,我想我们不会按时回到拉贝那儿去。其他人可以走晚点。今天戴籁三夫人从布兰奇·吴那儿给我们带来两只鹅,圣诞节我们就吃过她的鹅,这个星期又吃了两只,现在又有了两只明天吃。前两只是礼物,其他的我们买下。今晚是第一次吃全素的晚餐,我想这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生效的经济规划的一部分。以前我们中饭、晚饭都能吃到肉,一天吃3次水果罐头。威尔逊的厨师坚持倾其所有!威尔逊说我们有足够的水果渡过难关。但我们还是减少到

一天吃一次罐头水果,喝一次罐头果汁,然后吃点心,就像今晚这样。威尔逊晚上又带来了坏消息,董事会经费 12 月份每天是 3.10 元。因燃煤的缘故,所有的仆人只有 5 元小费。我的是 96.10 元,从中用 9 元在去年 10 月买了 18 个水果罐头放进粥厂。我从麦卡伦那儿取了 100 元应付款,手上只剩约 40 元。

最奢侈的是宋煦伯拿来一锅米,他煮了一天的份额,双层蒸锅底部 2/3 是满的,尽管水不够。我们的定量是 250 人一担……(此处语意不明——译者)。

1938 年 1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 时 45 分,新年)

今天是我见过的最嘈杂、最令人不悦的新年,一大早就开始放鞭炮。但理发师比约定的 8 时晚了一小时,他抱歉地说他得为日本人放鞭炮!不管怎样,孩子们能放日本人发给他们的鞭炮一定很开心!1 时,在鼓楼举行“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这已是第三次更换新名称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正要升旗,他是有名的“吉米”,所以林查理说“这对一个二手政府来说倒是挺合适的”。下午 2 时,我们往那边看,一点没错,鼓楼上飘扬着“五色旗”。齐说日本人与他们商谈合作时,市内又有两起纵火。一处是苏联使馆。后来我们去金大的塔(指北大楼顶层)上,看到了苏联使馆烧后的残迹。13 日时贝德士曾见过这个使馆完好无损的情形,当时还飘扬着旗帜,今天旗帜从大旗杆上被降下扔在院内,整座建筑弥漫着衰颓的气息。下午晚些时候从这儿往东的几处又起了火,并卷起浓烟升腾在空中。这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白天浓烟漫漫、夜晚大火熊熊!不过,麦卡伦今天去南城看了一遍,与我们从塔上观望的估计相同,城市内只有 10% 的房屋被焚烧,幸运!但主干道的商店门面全被烧了。就像 1932 年上海的情景,似乎主要是一场对中国商业的战争。我们在汉森家的旧棉衣要么是一周前被烧为灰烬,要么是被日军用卡车抢走了。

昨晚 8 时 30 分我和同伴们开费吴生的车去看拉贝,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他为我们点亮了圣诞树,这是南京惟一的一棵圣诞树(除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楼上的那株小树,但我们谁也没见过)。告诉孩子们他

们在外面的马厩以及牧羊人的模型^①，院子里还有羊和牛围绕在圣诞树边，我们闲聊到10时，然后他们带我到大学门口，等我，一直到我让宪兵在门房准备好床铺，我说“行了”。睡得很好，5时30分醒来，一夜无事。今天齐兆昌给我的新年礼物是一张真正的床，而非军营内的一个铺位。

下午我去办公室，没有其他的事，除了继续那些一式三份的文件（我的老把戏），宋煦伯和林查理弄到了够用一天的大米和燃煤，所以今天不用去拖运。下午我们都放了半天假，这是我们开始工作以来我第一次休假。我们的办公室从12月1日下午开始办公，所以我可以说“在宁海路度过的31天”，因为从那时起我没歇过一天，包括节假日，直到今天下午。林查理下午帮助核查了一起我前一天漏掉的暴行记录：

30日，星期四。午饭后，有人说在蚕厂有日兵骚扰。贝德士和林查理急忙赶去。后来他们回到办公室说军警带走了一个户主，此人承认他原来是中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他们又带走了四个人，两个大学仆役，两个难民，因为他们参与了在厕所后掩埋枪支。于是贝德士和林查理起草了一份调查概要，指出涉及此事的那个户主并不受雇于金大，但他们能担保那两个仆役，其他人能担保那两个难民，其中一个还是林查理的一个承包商的侄子。我们把这份文件带到使馆，他们认为我们在阻挠搜查，我们说我们没有。昨天早上我让住房委员会委员许博士去调查此事，昨天下午和贝德士在会上才得知那人不过是个警察巡官！但我们没有确切证据。因为许还是自治委员会的顾问，我们就让他直接去日本使馆询问此事。今天早上他和林查理带出了那四个人的口供书。其中一个因他的担保人前去担保而获释。明天早上他们要去带其他人的担保人。看见他们在调查案件时仍让这些人都活了下来，我们很受鼓舞。

我们通过塔上的巡视，看到难民们晒着暖和的阳光，孩子们在金大校园里翻着筋斗……贝德士又和我走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那儿是否还堆放着本周被害的死者尸体。我们绕至古林寺，穿过南边的山谷，仔细察看每一个池塘，除了几天前数起纵火事件之后贝德士在金陵女子文

① 圣经故事，基督生于马厩，所以圣诞节在室外布置马厩及牧羊人等模型，这是儿童们极为喜爱的节日装饰。

理学院背后看见的烧焦的尸体之外,没看见什么别的尸体。那边花园的几块地只用了不到一半,但每间农舍都荒弃了,只有几个农民在后面装白菜准备运出去卖。安全区外没有一间房子住人,连西康路以西都没有,然后我们往南顺清凉山至汉西门新门,从清凉山到新门我们沿路只见到3个平民!而那一地区过去总是熙熙攘攘。有几个日本兵在附近闲逛,也为数不多。我们途经的每一间房屋、农舍都遭过洗劫,有几家还被烧了。广州路的一家店铺被洗劫之后一片荒凉,而一些线香^①却未被带走!可能是因为附近的寺院也被遗弃了,就像古林寺。在大门口,我们遇见一个刚从城外进来的男孩子,他很高兴能在顺利通过岗哨之后加入我们(我们注意到那几只缸有几个被打破了!)。他去过水西门外他原来的家。他父母想呆在那儿,但日本兵太凶残了:殴打男人、枪击其他人、强暴女人、抢劫百姓,于是他把他们带进难民区——他告诉我们这些事,口气就好像我们从未听到过这些!他说,那儿是人们惟一敢住的地方!在上海路,我们救下了六个红卍字会的苦力,他们刚从莫愁路带白菜过来,被拐角处的岗哨拦住。他们设法让这些中国人懂“护照”的日语,苦力们发出这个音,他们就放他们过去了。去上海路的途中,我们看见有3所房屋可能是一处纵火事件的现场,但下午没有去调查。我们巡视总的结论是整个尸体的情况已没有以前那么严重,所以这是个较为乐观的结论,但人们是否能回到安全区外他们的家,前景仍然十分黯淡(汉西门外一半房屋都被焚毁)。我们爬上城墙俯看废墟,那些是日军进城前中国士兵干的。

一点点好消息,更多的是坏消息,但我很困,得上床睡觉了。一个月来第一次走了这么长的路,也许是因为下午洗了个澡!早晨施佩林没找到那个卖米的人,但他告诉我们,今天城市的供水恢复了。然而,在他们检修破漏的管道前,水压还不够,所以这儿仍是没有水。林查理却又说日本人要在汉中路发放550吨燃煤给自治委员会,他们能给我们50吨,给粥厂500吨,这意味着都用于我们所从事的救济工作。军方仍在搬运,我们可能只得到300吨,但这也能使我们度过元月份。明天早上林

① 线香(incense stick)为礼佛用品,因寺院荒废,所以线香也没有人要了。

查理会去运两至三卡车,许博士和他的朋友,红十字会主席和自治委员会主席陶先生安排此事。但日本人说他们更愿把此事交给国际委员会,我们应该减少,他们应该增加,但只要事情一展开,我们就得担心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这都是没收来的燃煤!我们可以暗地安排给交易人付钱,但燃煤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林查理在今天早上被调查团发现后透露,他知道在德国俱乐部一直存有150吨煤,他一直私下隐瞒此事,因为这是德国财产!所以我们只有在万分紧急时才会动用!

昨晚我还不知道在金大和原交通部,许多人都有腹泻症状。但今天特里默没有发现明显病例,所以我们不知到底是不是痢疾。我们估计不会是。但这是长期吃稀饭的负面效果。许多人实在太穷了,只有以稀饭为食。没有城市供水,他们就用井水。有的人又太懒,不愿抽水,就在附近一个肮脏的池塘取水,那是用于洗马桶的。是寒冷的天气使我们免于更多的疾病。他们没处洗澡,都挤在一起,可以躺在任何一个房间睡觉,可能是缺少流动,使我们免于斑疹伤寒。只有两个医生,一旦发生传染病我们就全完了!我们希望城市供水,逐渐解散难民营,缓和这种局面。

中午我们和戴籁三夫人、程太太、马吉和福斯特共进新年午餐。我们再三催促总算让费吴生把马吉也叫来。我们刚刚吃完,两个中国人跑来说,有两三个日本兵刚刚前来找女人。费吴生驱车和他们匆忙前往,有一名妇女在他们赶到前已被强暴,另一个因反抗被打成重伤。马吉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因为他们从16日起就从没让下关基督徒和其他人在那两三间房屋里单独呆过一分钟!就是说,总得有一个外国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个受伤的妇女被送往大学医院,一个日本“检查官”来拜年。海因兹小姐就让他看这个妇女,告诉他们这起强暴事件。他非常生气,说要报告日军总部枪毙这个人!但日本兵没有身份标志(像中国军队那样的标志),所以没法抓到这个人,除非宪兵恰巧遇见。今天下午在王博士屋子里又有两名妇女被强奸;在Tzing Teh有一个,看来我们这些天还会有更多的麻烦事。

1月2日,星期日(下午3时40分)

星期天下午呆在家里,多么奢侈啊!但我得记下一些案件,写两封

信,再送到日本使馆。刚刚回来。四点半有礼拜,天黑前我要再写点。蜡烛和煤油都不是很好。今晚我还得去金大。

我想这将是12月5日以来的第一次礼拜。上回我参加的礼拜是在11月20日。麦卡伦已准备了3周,但没有人来参加集会,所以我们许诺今天有半数的人会来!林查理正和日军争抢时间从汉中路运回燃煤,没回来吃中饭,可能下午也不能来教堂。我希望他别出什么事。费吴生下午回了一会儿办公室。

空战又开始了!今天早上5时和下午2时,中国飞机前来进行轰炸。中午他们遭到几个高射炮的反击,但和以前中国军队在此作战时相比并不算多。

昨晚的记录中我忘了两件事。昨天城市的新政府从我们的25个难民营里选了一些代表去庆祝其成立,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以这种方式庆祝成立政府!上周日我忘了告诉你,那天上午米尔士、费吴生和我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运了价值282元的铜板!米尔士从他以往汉口洪水救灾的经历中知道它们重达2吨,值1000元钱^①!这个星期我们的兑换店开始营业,现在已把这些铜板摆出来了,克勒格尔把它们每100个打成包,干得十分起劲。

今天我们证实苏联使馆在鼓楼举行庆祝活动的同时被焚烧。我们猜测这意味着什么:这将会使苏联导致混乱呢?还是苏联已决定对日宣战?刚才我们去日本使馆报告昨天下午发生的4起强奸暴行,并敦促他们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让日本士兵远离安全区。福田在大厅接待了我们,因为新政府机构在那儿——现在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在那儿,但他们说他们听日本人的——告诉我们佐佐木将军正在视察安全区,看秩序是否被维持,宪兵队是否被加强。所以我们希望情况不会更糟。但城市的剩余部分充满士兵,而今天他们许多人都会离去。

这个星期,贝德士令人吃惊地让齐叫金陵大学查经班开始上课。今天上午9时,陈勇开始上了一课。贝德士约我和高玉上午8时30分去视察大学财产,但当贝德士到那儿,他却又要延期,这已是第三次了!齐昨

① 原文如此。估计铜为军用物资,其战时价格高于铜板面值。

天还告诉贝德士,在集会前,与会者全被搜查了一遍,并强令解散 120 名难民来自大学,50 名来自拉贝的住所。

1 月 5 日,星期三(晚 9 时 20 分)

昨天让田中先生带信给你,信将通过香港的航空邮件到达汉口,这可挺有趣。我知道航空信能到达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仍值得一试。我们所有通过日本使馆的信都得“公开”——贝德士问这儿的一伙人他们能否拿走斯坦利·琼斯的公开信——我想我有一封信不会被查禁。我昨天中午带回一札信后,米尔士又去拿了一封他的信;他发现福田、田中和福井都在忙着读我们的信!他们读罢,对我的信得出结论说,得制止我发送,米尔士就建议他们撕掉,他把碎片带了回来,信上只不过随口提到一次并不严重的空袭,但这是“军事情报”!总之,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查禁是哪一类事。

因为确实给你发出了一封信,我很激动,在 1 日以后便忽略了继续写这些日记体的信件。不过我想我能很快告诉你这四天的事情,威尔逊在他的一封信上标明“第 50 页”,表示他并未寄出全部信件。

星期天,1 月 2 日。中午之前,我们仍像以前那样紧张工作,但我们认为应该去教堂,给已准备了 4 周的麦卡伦一个机会布道。那天下午我在家里整理一些文件记录,一直到礼拜的时间。有人报告说,在教堂前有军警绕着 6 号办公室至阴阳营 55 号划了一道警戒线,贝德士说我们最好别干预此事。林查理午饭也没露面,他想从汉中路南部运煤回来,我们担心会出问题。米尔士说他知道煤场的地点,便和费吴生一道动身,在门口遇到林查理。他在红十字会吃了午饭。于是戴籁三夫人弹钢琴,麦卡伦带头,格雷斯、贝德士、米尔士、费吴生、宋煦伯、特里默和我(合唱?),他宣讲“希望”,他说四周前是“希望”推动安全区走了过来。我觉得应是一无所知——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但回想起来,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后悔。正当礼拜结束时,许传音博士和国际委员会办公室的陈先生走了进来。日本兵闯入我们总部的房屋,杀死一个男人,其他人都移至我们这儿后面的房子。这样,院子里的妇女就有被越墙士兵强暴的危险。那个人已死了,我们觉得帮不了什么忙,就让一个外国人

当晚住在总部,最好是个德国人。我们就去拉贝那儿找施佩林,拉贝答应了,于是我回头和费吴生一起告诉施佩林,在门口又遇到林查理。马吉前来告诉我们这一杀戮事件的细节。马吉和拉贝一起前往日本使馆呈交这起暴行记录,但由于被杀害的那个人曾动手打了日本兵,所以这事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费吴生和我驱车前去找施佩林,让他当晚去照看宁海路5号。我发现他在楼上吃晚饭,周围全是中國女子——后来听说她们中不少人是演员——他说他10分钟后就去。我看见宁海路还比较安静,便回去吃晚饭。在金大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很高兴,费吴生开车带我们以及贝德士去看土地规划。

刚才米尔士穿着睡衣进来告诉我,老华去报告的那个来访者不是别人,是福井!威尔逊说只要听见狗吠,就有可能是来了日本兵。最好的消息是,福井来告诉我们,美国领事阿利森预期明天上午10时到。他原来在济南,当时米尔士与他很熟。他在东京呆过,懂日语,是个很好的人。他们不知道其他人是谁。德国使馆的罗森10日要来,那时候英使馆的秘书和他们的军事观察员、洛维特·弗雷泽也都要来。我们希望今天会有美国人来。但我中午去问福井,他说还有几天。我想他们是在敷衍,所以我们决定,既然已在最困难的时候靠自己挺了过来,我们现在仍能这样。但3个国家的代表来这儿,将会打开一个新局面。正如米尔士所说,日本人不得不规矩一点,扩大外国社区,尤其是可能有助于其他传教士和商人回来,增加“中立观察员”,也能使我们不必总是递交抗议书。我对米尔士说,我们可以与自治委员会合作。我很高兴一些领事和外交代表12月10日前曾呆在南京,他们会记得当时城市的良好秩序,而今只要开车沿着城区转一圈看看表面情况,就知道现在是多么不一样。这样我们12月21日那天起草的报告以及全体签名就很有战略性。拉贝说,今天我们最好在大学医院给罗森留一张床,他一定会惊呆了!而且这些代表的到来将沟通我们与外面的世界,我就能和你有书信往来了,尽管我们写的内容必须十分审慎,不然我们就得滚蛋!尽管现在的压力主要是被困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能在城内自由行动的囚犯。

现在,经过了四周以来,不,六周以来最安静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走进了星期一。星期天,拉贝非常担心日本人要自治委员会接管国际委员

会和所有物资。星期一清早,我对贝德士说,我最好起草一份关于我们的地位与自治委员会相比较的说明,即,我们是私人救济组织,并希望保持这一性质。当天拉贝回来时兴致很好,也表示同意。星期一林查理一整晚都不断从汉中路运燃煤回来。但星期二有了更多麻烦事。周一领事馆警察坐卡车巡视,哨兵问五台山红十字会粥厂的负责人谁给他们送煤,那人回答道“国际委员会”。警察给了他一耳光,说:“不对,是自治委员会!”星期二同样的事又发生在金大粥厂的人身上。既然对于燃煤运往国际委员会有疑问,我们决定让自治委员会的人监管搬运,林查理只调度卡车。这样一个外国人(的作用)就不会太显眼。我们又让自治委员会主席给司机一份书面指令,把煤运到这些地方。昨天把这件事讲给许博士听,他是个好人。我也向他提及大米的事,说:“我对你说的话也能对所有的人说,那就是要大米。”他说日本人已要求自治委员会成立一个机构着手此事。

昨晚林查理告诉我们,自治委员会按我们的组织模式,指定了一个食品委员会委员。他已向日本人要求一天2000担大米,提供给200000人,他把营业与免费分发相结合,保证我们仓库储有粮食。但他想要我们的食品委员会委员及助手韩和宋煦伯同他一起帮助运送。他算老几?又是吉米!他们都对此嗤之以鼻,贝德士说:“大米是当务之急。”而我说:“他是我们在3月以前能运进一些大米的人。”所以我们都同意尽力与之合作。

既然日军供应商给施佩林提供大米和面粉,我建议他再试着去见他。克勒格尔也认识此人,他自愿前往。今天早上他俩去找他,但他很忙,让他俩明早8时同一时间再来中央饭店。我希望我们能作为王的介绍人,或者安排直接购进大米,取代我们以出售(大米)积攒的钱。现在我们手头要的是大米而不是钱。除了这些进展以外,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把文件一式三份整理分类,其中一份是准备给即将到来的美国代表的。他们会对我们如此直接、如此强硬地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表示震惊的,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感受的比笔下所写的更为强烈。这些记录现在都已成为历史,但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国际委员会在整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场。对了,周一下午我们在对付这样一件事:六个女孩被带到表面

上是日本军事医院的地方,白天让她们洗衣服,晚上让士兵发泄兽欲,按容貌的美丑 10 至 40 次不等。最后有一个女孩被带出来,她的头几乎被刺刀砍断了。她去了大学医院,威尔逊为她缝了针,她能活下来,但脖子会僵硬。拉贝和我向他们呈交了一封短信,要求他们释放另外五个女孩子。他们看了案情后,福田和田中无话可说,只有福田说了这句话:“军队如此疯狂,是因为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征服一地时有中立的观察员在场。”多么荒谬的观点,但我们没有反驳,我们没有时间。但我们更感到幸亏有我们在这儿,否则真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

约好的六件事中,领事馆警官高玉兑现了其中一件:与贝德士一起在过去的六天中视察金大的财产。今天贝德士在中学又遇到了一桩麻烦事:他得知一个员工苏和一个能说日语的难民,被领事馆警官胁迫参与他们的工作。那个难民的第一个工作是指出苏联使馆的女佣。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高玉昨晚搜查了苏的房子——难怪他今天说“失眠”呢。更有甚者,贝德士与那个照看 12 000 至 15 000 名难民的负责人谈此事时,高玉竟出现在中学!他以责怪苏来掩盖自己的惊讶,说他不应该喝那么多酒,并接受贝德士的口头保证,说苏和我们有联系。不是一个警察。情况变复杂了!但这只是组成封建社会的这个拼图游戏中的一片:人民在军事征服下寻求保护。

我应加上 3 日星期一中午我们收到电台广播这件事,但与以往一样没什么新闻。昨晚威尔逊在医院又收到了。昨天与今天宁海路 5 时停了电——昨晚又来了,6 时收到伦敦台,克勒格尔稍晚还收到了别的台。今天我让威尔逊把我们的收音机拿到医院去,还是收不到短波。但外部世界的一点消息在经过四周与世隔绝之后,也会让我们了解到新的动向。

今天中午米尔士有一个新想法。我们一直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我们被迫通过自治委员会解决,而不是直接经过日本使馆。日本人迫切希望国际委员会削弱,将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所以米尔士建议我们要明确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把事情上交自治委员会,极力鼓励他们直接向日本人提要求。以两件事为起点:使城市的其他地方恢复秩序,让人们回家和停止焚烧城市(每天在市内都有几处地方着火,尽管比 19 日

刚开始的几天少多了)。我回到办公室便开始起草有关这两点的短文。然后让拉贝、克勒格尔、米尔士与贝德士提意见,使其成为一篇观点较公允的陈述。我想到可以分阶段进行。这样我们能在人们回到有疑问的地区之前更好地恢复秩序,而且更便于我们观察事态进展。这也是一个间接的途径,让士兵撤出城市的各个部分,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可不是一步就能完成的!这是把在安全区取得部分成功的做法,一步步推行到城市的其他区域,可能从角落开始,西南角,那儿被毁坏得最少,还有人住。

1月9日,星期天(晚8时15分)

6日,美国代表们到了南京,我们感到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并非他们自己能做什么或直接作用于安全区等等,但我们感到他们的存在对日军就具有威慑力,有明显的效果。他们努力整顿城市秩序——有一个负责人被召回东京。今天英国和德国代表上了岸,我们感到了增援的力量——就好像被围困的人们迎来了救援。的确我们决心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代表们这么久才来,而日本人又一再说“还有几天”,我们过得也还不错。但此刻我们意识到,很多事现在有他们可以完成,而以前是不能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我们手上接去了抗议侵犯美国财产的重担。我们得到有关下关经济财产损失情况的报告,我们得采取行动,却不能随意去下关调查此事。我们原来没有打算尽力保护美国财产,但当日本使馆的人来到这儿,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是对保护外国财产有兴趣——可悲的是连这个兴趣也微乎其微——但为中国人办事则毫不感兴趣。我们尽量利用这点优势,因为在美国产业的难民营我们有绝大多数人口。尤其是日军开始大规模施暴时——我们敞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校门,让那些一早在街上惊恐逃窜的妇女都找到一个比她们前夜所在的较为安全的地方。正是这些举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2 000人,中学15 000人,金大10 000多人(近12 000人),减少了妇女被强暴的人数。我们也感到,正是这样一个有勇气的西方人的魔力,才能使我们勇敢地对抗每一个日本士兵,我们得适度地使用这种魔力,以免日本人向我们反扑。所以我们感到需要通过日本使馆尽最大努力维护我们

作为美国人应受的尊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奇迹正继续发挥作用。我们 22 个西方人制约着占领这座城市的日本军队,他们只有 17 名军事警察,从一开始就很不得力。整个局面一直未得到控制,直到 12 月 29 日他们颁布法令,要求士兵不得进入安全区,并在门口设置岗哨,派军警在安全区巡逻。这些并未能禁止所有的日本兵入内,但 18 日、19 日时,到处可见他们翻墙、砸门、闯进地下室,让人联想到冲锋队员布满全城^①的情景。连日连夜的抢劫、强奸、掠夺。老天! 15 日,高级指挥官到来后,一个日本将军和我们一起巡视了安全区。

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恶梦。下午我们拜访英国代表时,他们说:“你们这段日子一定很难过。”我们回答说:“我们的日子并不难过,反而相当舒适,但看到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使我们心里很难过。”普里多·布龙和洛维特·弗雷泽上校给我们讲述了与 12 日英国船被炮轰有关的事,和“帕奈”号沉没是同一天。

好了,其他的信会告诉你整个故事始末。收场白也可以后再写。今天下午做礼拜时,马吉朗读《诗篇》第 124、125、126 章以总结这段精神经历:

若不是主在帮助我们,
仇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他们活活吞灭了,
我们早已被这些愤怒和狂傲的浪潮淹没了,
那没有让敌人吞没我们的主当受称颂。

还有作为结语的赞美诗“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城堡”。他的讲道是关于基督和彼拉多的对比(彼拉多身后的整个罗马帝国)。就像有一天贝德士回答一个伙伴的玩笑:“你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吗,贝德士?”他很快说:“是啊,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定。”在我的生命中从未如此展示正义和价值,能做的事仅仅是站在正确的一方,维护文明与正义,不用任何武力。只

① 原文为“browies all over the town”,纳粹冲锋队员着褐衫,亦称“褐衫党”。

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走日本兵。一旦我们动用武器或强力,我们就会完蛋,我们的事业也无法继续。

好,现在接着记叙我们的经历,当制约(军队)的任务减轻一点,我决定着手为平民们往安全区运进食品,我们以持续增长的速度往难民营、米厂运进大米,私人储备已趋告罄,而需求仍会增长。情况已经如此,所以27号一早,我开始了向日本人要米的行动。那时我们米店每天卖出10袋米,现在每天卖出150袋,每天有700~800人排成“米队”,我们只让每人买一斗。除此而外,我们每天要用100袋米用于免费发放和粥厂所需,红十字会的仓库从日本人那儿得到40至50袋米,通过一个日本牧师得到3000袋。我们向日本使馆请求,他们说军方希望通过自治委员会解决,但自治委员会只给我们最需要的燃煤。自治委员会许诺给我们500吨煤,后来减少到100吨,军队帮我们运输,不过今天已经给我们运来了。因为是自治委员会,所以林查理能让大使馆警官护送卡车,让苦力顺利通过。在我们向日本使馆催促大米时,施佩林正在和军需品负责人谈话,此人说他能卖给我们任何数量的大米和面粉。我让施佩林赶紧行动,但直到这个星期才在克勒格尔帮助下与他联系。现在我们订购了3000袋大米,每袋(1.25担)13元,和5000袋面粉,一袋3元。但有关军队帮我们运进金大“仓库”的事还未得到准确答复(“仓库”即小教堂)。

吉米·王被指派为自治委员会下属的食品委员会委员,因为我们再三敦促日方解决大米问题。他要求免费送100000担,再花钱买100000担,军方不同意。星期五,他告诉我们这事没希望了,于是我们以比我们原付的高一点的价格成交,不过和市场价格相比较还不算太高。但我们团体完全是纯粹的消费,我们想节用物资,无论是必需品还是现金。昨天,他说在安全区外他们将免费发给他5000袋,以此贿赂老百姓,让他们回到被损的家园。并廉价出售给他100000袋。今天免费发放了1250袋,另有10000袋以4至5元的价格卖给他,他将以低于国际委员会的价格卖出去。这可真叫我们好笑。他将用5元一袋的价格买进而用8元一担的价格卖出。而我们还得帮他们运输!但他们给我们支付用于出售大米的运输费用,而免费发送的大米则不计运费。林查理今天

一整天都在组织运输。今天早上,日本人拒绝苦力佩戴国际委员会的臂章。所以林查理得为那些愿佩自治委员会臂章的苦力们签约,他们得经拉贝同意,因为都是西门子的苦力。还有那些受雇开私车的司机,他们只被允许开自己老板的车。所以今天下午林查理又得重复这一步骤,让老板们同意请苦力来帮忙,我们付老板每趟两元。由自治委员会付所有运费,并付给我们运输商业性大米的汽油费。林查理因此由卡车护送人升格为5辆卡车的派遣官员。事前的一步是自治委员会派他们的一名警察和日本领事馆警官一起护送卡车。两名警察,5辆卡车!明天早上克勒格尔要去见供应商,如果他同意转让我们大米,我们就会购买,尽管以高价保证,以免计划失败。

上午吉米来告诉我有关安排。我们和费吴生、拉贝和克勒格尔一起作全盘讨论。他说日本人想强行关闭我们的米店。我便告诉他我们正想关门。昨天早上我突然想到应在星期一早晨强行关闭米店,以便促使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让商业性大米开始经营。现在我们的4000袋大米,以每天250袋的速度消耗,维持不了两周。免费发送的大米是一天100袋,够用40天,所以我告诉吉米,今天我们只有一家米店营业,大米在今天下午或明天会被运走,所以明天一早我们就关门,他可以回去告诉日本人他已命令国际委员会关闭米店!所以明天我们的大米生意告一段落,抽少量佣金的商人不愿在自治委员会领导下经营,就停业了。在更多的仓库开放前,小规模의买卖仍会在难民营继续,以后我们会制止,让他们出去买米。起初由于局势太糟糕,人们不敢出去买米,实际上也没有米店开门营业。我们总部惟一的米店——其他地方没有足够的保护——位于安全区的北端。经过两周的折腾,我们总算让大米的商业化经营起步。因为只需从国府路运来,每天可运进500至600袋。但燃煤供应暂时停止,谈判的两条线平行展开:自治委员会与供应商。

昨天早上,意识到如果我们要花50000元钱买大米和面粉,我们就应该更新这些物资,以免以后再添麻烦。冯秘书打电报给费吴生问需要什么,我回电报要50000元,并让他安排从上海船运大豆、花生或油以及蔬菜等其他代用品。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整个冬天靠水过活。现在我们每天给50000人免费分发大米,他们中有些人能吃到白菜之类,但很快

就会吃完。直到明年春天才会再有。(我们自己的食物固定为吃大米,有时有番茄酱、白菜和庐州府桃子),不过我们还有面包,大学医院用煮沸牛奶的薄膜制成黄油,还有果酱。偶尔也会有萝卜。但今天礼拜过后艾斯比告诉我们,在上海原来卖20元一担的大米现降到17元。其他的物品也很难弄到。我们可能得不到很多,不过我希望能得到本地的大米,中国军队有很大的仓库,日本人现在也开始进口大米。

阿利森和艾斯皮正在帮助我们 from 上海驶来的船只上获得供给。我们得到通知,今晚去船上取火腿(我们一直没有肉——包括今天请英国朋友吃午餐,他们准备明天再接受邀请,因为直到两点才上岸)还有干果、咖啡、糖等,将和他们联合成立鼓楼合作供应社,还要船运一些奶粉。

两周来,食品一直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还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给冯秘书的电报中,我们还要求来两名外国医生和两名外国护士。我们想更多地开展医疗工作,在难民营建立流动医疗站。华群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孤儿寡母们建一个福利院。

我们组织恢复委员会帮助人们重返家园。一旦条件允许,我们就会推动救济工作的展开。

天哪,今晚这座房子在放鞭炮(指劈劈啪啪的打字声)。我下去取赞美诗读《诗篇》,客厅很黑暗,每个人都在屋子里敲打字机。可怜的贝德士和麦卡伦今晚分别到金大和大学医院值夜。礼拜后艾斯皮告诉我们,原拟12日出发的这艘拖船可能明天就驶向下游。

如果你见到特纳一家,告诉他们,贝德士和我今天早上看过他们的房子、衣服等等。与他们离开时一样,仍放在衣柜里,一点没动。他们比艾尔梅幸运多了,艾尔梅家几度被翻得底朝天。我想我说过日本人的抢劫,完全不能和老百姓的行为同日而语,老百姓只是小偷小摸,而他们则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他们拿走了丹尼尔家的地毯和几张床。我相信他们是想让一些军官在这个被他们毁坏了的城市里过得舒服一点。我告诉过你没有,有天供应商依夏德请克勒格尔吃中饭时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他们怎么没有一些舒适的场所让人们参观、吃饭呢!”克勒格尔吃了一惊,只得答道:“在你们毁灭和焚烧这座城市之前,有好多这样的地方。”今天下午米尔士和我去双塘教堂送米——有1500人在那个收

容所避难——一个从上海逃来的木材商人负责这个收容所，他很会管理。在我们到达之前，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被三个日本兵强奸了。所有的商店都被烧毁，江塘街教堂只剩下一片废墟。在南门，靠近西边的两座老一点的学校建筑也被烧了，其他的建筑只遭到抢劫。

马上要停下来收听 10 时 10 分上海的广播。但应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又有了电的。我想上周次日是第一次有电。但日本人切断了除他们军官住处和医院之外的电源。拉贝那儿有电，他是让一个装配工爬上去接通的；克勒格尔则让当地一个日本军官派人接通了，并付了装配工 5 元小费。费吴生和我们提供的一个中国工程师谈了一会儿——晚上我们就有电了。全都是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就在我们周围发生。今天我们花了好半天时间从四散的油罐里弄出一点煤油，好点亮我们的灯（有的已被抢走）。

今天普里多·布龙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我们都笑了。正如阿利森早些时候曾说过，那些 12 月 10 日前呆在这儿的人们，在经历了那段紧张疲惫之后都到不同的地方休假去了。所以看来我们也应去度假，但需要等到人们脱离困境才行，起码得有常规的食品供给。

但你不必担心我，现在最坏的时候已过去，能够直接、迅速地通过收音机了解外界情况帮了大忙，我指的是海军的无线电。通过船运我们也能及时得到补给。天气保持晴好，这样的话，供水、补充的食品还有医生都有望于 3 月 1 日到达，但也很难说。12 月 14 日早晨，我们就以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但那时才刚刚开始呢。

对于亲友们，我要加上在前一封信里说过的话，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建筑仍完好无损。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及的焚烧之外，差会的财产没有被破坏。有一发炮弹炸毁了圣公会教区建筑，一发炸毁了鼓楼教堂，一发炸毁了金大的一幢宿舍楼，一发落在史德蔚的地下室但未爆炸，最后三枚炸弹爆炸时间是 13 日下午，当时我们以为战争结束了。除了第一发炮弹外，其余几发损害不是很严重。没有人员伤亡。有一个中国女孩躲在太平路圣公会教堂的塔楼里，炮弹落下距塔楼几英寸的地方。在我们的难民营，有一个图书馆的工人在图书馆新大楼被刀刺伤颈部，因为他不肯帮日本人找女人。他的伤势不重，没有其他的人受伤。但这

儿一些工作人员的妻子和他们的内眷遭到强暴。

毛料衣服上哪儿去了？被烧了。我们的衣服也未幸免，和金大 400 箱一起。放在制毛厂有七卷未染过的制服布，现在还未被抢走。许多难民在那里，女人对于日本人比羊毛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但他们把贝德士所有的毛衣和被褥都拿走了。

[RG8,B103.]

2. 致朋友函(1938 年 3 月 8 日)

金陵大学

中国 南京

1938 年 3 月 8 日

生活在上帝之国的亲爱的朋友们：

12 月 4 日我给你们发出圣诞节的问候信，你们的回信多亏上海的中国邮政局，现已陆续收到。他们为我们分拣信件，把它们送上英、美两国的炮艇。我说过，他们总会想办法把信送到的！最近的一封信是 1 月 18 日发出的，收到时是 3 月 4 日。希望会来更多的信，这让我感到我又与大海的另一边有了联系！这个冬天我们几乎是被埋在这里，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得知直接消息，我们觉得几乎与世隔绝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成为那些通过各种途径传回我们耳中的有关南京新闻报道的反证或补充。其中最大的失实之处，是我 12 月份在写给你们们的信中说除使馆人员之外，所有的美国人都登上了“帕奈”号。其实更正确的说法是，只有使馆人员登上了这只船。玛迪从牯岭发出的那封标明 12 月 15 日的信（我于元月最后一天收到），说他们不相信我们都已沉入长江葬身鱼腹。我在应于 12 月 4 日收到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们刚刚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名，表示“无论什么情况发生”，我们都将呆在南京。玛迪说：“为此感谢上帝！”虽然这个冬天我们在南京没有一刻快乐的时光，我们仍为我们留下来而感到欣慰。我们并不想为自己大唱颂歌，我

们只是尽了我们的责任。但我们确信,我们使困在城内的 250 000 名中国平民免遭厄运。至今我们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有许多中国人被杀死,尽管我们在努力,仍有许多人受难。但在我们的强烈抗议下,松井将军终于亲自来到南京,叫他的士兵们放规矩一点——但这已是六周后的事,太晚了! 如果 12 月 17 日那天,趁他还在这儿时出此言而且使之生效,那么一切会大不一样。

大部分人们为我们感到担忧的是空袭和战争。最后几天空袭时我们仍在工作,那时一大早就响起了警报,而且一整天都没有响起“消除警报”的信号。战斗期间我们也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相信如果炮火到达比城南更近的地方我们会醒来——也愚蠢地相信日军会下令让大炮尊重安全区。而当我们 12 月 13 日下午在城市中心与(日军)先遣卫队接触,发现他们的地图上压根未标出安全区时,我们紧张得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尽管我们已通知他们,我们将平民转移到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证明是安全的(除了 10 日在南端落下 11 枚炮弹和 13 日下午在金大落下四至五枚炮弹),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听从了这儿外国军事观察员的建议,选择了城里最没有军事价值的一处地方。我们 12 月 13 日下午解除了所有进入安全区的(困在城内的)中国士兵的武装,安全区内没有狙击。但这也未能阻止日军的最高指挥官要求找出安全区的每个缴械士兵,许多平民也和他们绑在一起,拉出去枪毙了。我们请求、抗议,可都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又请教外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只要日军决定肆意妄为,我们就无法解救他们,如果我们把他们分散到平民中,只会使更多的平民丧生。但最使我们恼火的是 12 月 26 号,当他们开始对难民营进行人口登记时,有二百多人被带走,一些被击毙,一些被用作刺刀练习的靶子,还有半死的就被浇上汽油焚烧。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有几个人天黑后摸着路逃了回来。有一个人眼和脸部都被烧焦了,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来到大学医院。这些人在金大校园被反复告诫 20 分钟,如果他们主动承认自己曾是士兵或军队夫役,他们就能被分派工作,但若不承认,抓住了就要被枪毙。由于对这一地区的平民缺乏足够的组织、补偿和保护,南京失守时一些中国士兵从前线被派遣回来作劳工,这可是没有先见之明的举动。

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还具有讽刺意味。在日本大使馆、海军和陆军部队来到“未得到认可的安全区”总部找能启动电厂的工人的当天，其他日本军正忙于击毙电厂 43 名最好的工人！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所说：“我知道日本人无意炸毁‘帕奈’号，那只是他们全无组织、缺乏协调的表现之一！”德国人在这儿说，他们意识到他们在日本的盟军是多么脆弱，如果他们的军队和任何装备精良的部队遭遇，他们都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阿利森事件是南京发生的一系列挨揍事件的最后一桩，起源是一个陆军少校掴了一个在强奸时被抓住的日本兵一记耳光，然后把他放走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周，事实很快十分明显，要么是军队根本没打算制止，或者是制止不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日本报纸上最近的一条新闻，是他们发现了 11 名武装的中国抢劫犯，这些人应对所有的坏事负责！——好，如果在日军已在城内优先取得这些权力之后，他们每人仍能持续两周每昼夜强暴 100 至 200 名妇女，并如报载抢走 50 000 元，那他们可真是些非常有本事的中国人啊！普通中国人的抢劫是在三星期的破坏之后才发生的，他们从被烧毁和洗劫的店铺和废墟中拣走一些小东西。武装的中国人抢劫事件几星期前才出现——在日军进城让枪弹以及尸体几星期堆放在街上之后。甚至在 12 月 17 日，松井将军行经的那条主干道也未被清理，直到几天后得知美国使馆人员要如期返回，街道才被清理干净。两星期前红十字报告会报告说仍有 30 000 具尸体等待埋葬，这已是日军占领南京近三个月之后的事，军队却不愿着手办此事！

现在我们感到宽慰的是，恶梦总算过去了。日军转移他们的部队和卡车，去袭击更往北往西的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可悲的是扬子江流域一带所有被占领的地方情形都大同小异。宣称“对外国人太危险”，是因为他们可能受到惊骇。中国士兵并未对我们造成威胁！我们面临的惟一危险来自日本兵。当我们几乎是“无礼地”管制着日本军队时，我们是怎样逃脱的啊——他们声称城内有 17 名不胜任的宪兵（的确如此），但 22 名外国人却在成功地尝试着行使警察的职权——我们谁也解释不清。一天晚上，那是最糟糕的时候——在松井得意扬扬巡视全城两天之后——晚饭时我们住所的几个伙伴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接着说：“我愿要么做那

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每天晚上，医生充当全家人的“妈妈”，一面看护我们八个人，一面寻思第二天晚上会少哪一个。他说：“我们不可能全都活过这段日子。”但，我们都活过来了。最坏的一次是麦卡伦在阿利森事件的第二天脖子被刺刀划伤。最荒谬的一件事是两个和平主义者传教士，在他们住所附近抓住一个在床上强暴中国女孩的日本兵，并把他们从墙洞里扔出去，然后他们大笑不止，因为那个士兵被扔出去时来不及系皮带，他跑到街上不得不用手拎着裤子！一位德国同志的有关新年的故事比这更胜一筹，但只能印在德国使馆的官方报道里，不能在这儿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关注这些事，但我们仍然要笑，所幸我们尚未被这些事弄得神经错乱！日本人的言行实在是荒谬得让人忍俊不禁！所有那些在12月10日离开这儿的人都度假去了，因为得放松一下他们一度绷紧的神经。我们呢？我们不得不在这儿度假。

在所有一切骚动之中，我们得向69 000名挤在公共慈善机构的人们提供食物，给那些在安全区内没有住所的人们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开始我们估计只容得下35 000人！可第一周下来，每天早晨在一些私人住所惊恐万状的妇女们使人数又增加了20 000人，因为她们呆在拥挤的难民营会相对安全一些，尤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大。置身于这片混乱无序中，只要没有外国人坐在车内，任何一辆卡车或汽车都会被游荡的日本兵抢走，在这种情况下为难民谋求食物简直是孤注一掷。开始两个晚上，我们把大米放在私人汽车里送至难民收容所，保护他们不至于在两天或更长时间内饿肚子。后来我们每日都面临着威胁：我们的大米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在南京失守的这段时间，全体老百姓都依赖我们拚命冒险运进的大米，而这些大米只够250 000人维持一周。但很快我们发现我们有两个主要法宝：中国老百姓的创造力和好天气的延续。中国人比我们更习惯于灾难，他们每个家庭在我们开始运进大米之前都把自家贮存的所有大米拿出来了——那时所有的米店都已关门，个人的先见之明解救了些百姓。因为日本人在来到这里的三个月中，售出的大米还不足以消费两周。而他们征用了中国军队、私人仓库以及我们贮存的大米，这些大米可供百姓吃三个多月！

在“大寒”那几天，日本人下令所有人必须在七天内返家，人们便陆

续迁出,现在我们收容所的人口已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23 000 人。我们通过种种办法筹得的大米还能延续三个星期。2 月 1 日难民开始返家时,我们尽量兑换救济现金,因为他们要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买米,既有困难,且不规则。现在我们相对发放大米而言,发放了更多的救济金——一天 1 000 元,每家 3.85 元,按中国汇率(即 1.14 美元)。到现在,我们已帮助了 6 000 个家庭。

3 月 9 日。如果你们读到 12 月发生的这些事,就像我昨晚写信一样感到不安的话,那么读了这些你们会失眠的。两周前我心窝的那种痛楚的抽搐感现在又出现了,痛苦就在于我们可以预见将来等待这些老百姓的是怎样的命运。12 月 20 日,费吴生和我傍晚开车前往城南地区,看见日军正在有组织地从店铺拿走剩余物品,装进军用卡车,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房屋。我们意识到这是蓄意毁掉这座城市,决非偶然所为。我们到基督教青年会时,那儿刚刚起火。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对城市的蓄意毁坏意味着消灭所有当地的经济资源以及人口,使之不能卷土重来。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们烧毁了城里四分之三的店铺(主要是大商店,只剩下一些小店,全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拖走所有的劫掠品和被毁的汽车等,拖上火车运回日本,这令我想起了布匿战争^①!

当我们谈及日军对南京的暴行时,他们中有的人跑来说,所有的军队都一样,并以比利时为例。我们的德国同志可不爱听这个!其中有一人曾在比利时军中服役,但他承认就单个士兵的所做所为而言,这比比利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士兵施暴时被抓住是要枪毙的。我们中有一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与英军呆过,他说惟一的一例,强奸一名库尔德妇女的案件被发现后,那个士兵当着全旅 5 000 人的面被枪决了。在我们管辖工作的间隙,我们读了有关比利时的资料,得出结论是日本人在南京这一座城市,比德国人在整个比利时杀了更多的平民,烧了更多的房屋!当他们反对一个德国代表称这儿的状态为混乱无序时,他马上说:“难道你想告诉我,这就是日本军官的秩序吗?”

① Punic War,布匿战争,指公元前 264—146 年期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三次战役,终于导致迦太基覆灭。

我知道,我有些和平主义的、中立主义的朋友在想,我们对于美国的权益持何种立场。在安全区建立之初,我们一致决定它不应涉及外国财产和权益。我们为自己负责,不指望任何援助。但日军来到这儿,他们压根不听什么人道的恳求,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关心外国人及外国财产的狭隘而自私的利益。最初让他们明白我们关注难民的安全问题,是我们后来告诉他们日本兵在虐待美国产业中的难民。他们骚动起来,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不过后来逐渐在这些地方设了岗哨(难民营收容了近2/3的难民)。于是我们经历了一段“岗哨期”(但不是在我们的私宅设哨,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制止他们)!我们的德国主席告诉他们,如果中国是安全的,我们也会平安无事。美国代表们到来之后,他们比我们原来更强烈地反对非法进入美国产业,尽管他们此举是基于中国以往有此先例。这仅仅是应日本人的要求,他们要获准进来搜查美国财产,从而导致了阿利森事件。从日本人来这儿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就没有反对他们进行任何合法搜查。但麻烦的是那些三至七个的散兵游勇来到这儿,被抓住时便声称他们在寻找中国士兵!为避免我误传事实,我应插句话,12月27日之后,日本人总算履行了我们早在12月14日提出的要求——在安全区门口设岗哨,不许士兵进入。这使情况有所改善,但由于措施不力,未能完全杜绝。

有人会以为如上所述是为了煽动美国对日宣战。远非如此。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有一个人曾问一位和平主义者:“你现在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吗?”他立即答道:“当然,而且一天比一天坚定。”^①不应为日本人辩解,他们看来是在创建现代战争的世界记录。一点不错,这一切的背景是战争。它引发了人类的罪恶(的确,甚至日本人自己也在一进入南京时就告诉我们:“这是战争。”尽管他们的宣传报道对内对外都称之为“事件”。看来他们称之为“战争”,只是想从中捞到好处,而不愿对这种行为负责任)!甚至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因此而变得不高雅了——我们在圣诞节那天,当着几位女士的面在餐桌上谈论强奸罪行。不,如果美国卷入与日本作战,那么这种混乱会遍及全球。保住自己性命的孤立政策

^① 这个和平主义者是指贝德士。

也不能解决问题。渴望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的 10 年时间已过去,在这个公式下随着英国的绥靖,关于军备竞赛的观点已被定型,每个国家都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军备,落后者就有可能被毁灭。在目前情况下,要么是某种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军备,要么是竞争性的、代价昂贵的个别军备,我们选择了后者,现在我们得承担一切后果。去年秋天我就想指出(但《基督教世纪》不愿发表)!彻底否定中立法的方式会不尽人意,而且很可能被好战的浪潮所席卷。如果我们不想在集体军备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就应对侵略行为进行国际经济制裁,以保证世界安全。但我们担心那也会导致战争,而我们由于担心而踟蹰,亦会导致战争!我们被刚刚意识到的我们过去的帝国主义所摧毁,无力制止别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因为我们也参与了这场“讨逆战争”,现在意识到这样做是因为对世界安全来说非最佳选择。我们袖起手说“我们不能反对,因为我们也犯着同样的罪”,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唤起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让他们起来揭示道义的公正。斯坦利·琼斯对于道德比我阐述得更清晰!要么世界上的国家应为更好的国际秩序而携手合作;要么大家都将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无政府主义世界。

我们必须放慢我们赈济工作的进度,因为据说美国的红十字会募捐运动进行得不很顺利。所有的迹象表明,我们在中国的救济问题才刚刚开始。中国战线一方的主要问题是照料战争地区的受伤士兵和难民;日本战线一方的主要问题是照料战争地区的平民。我们觉得后者比 1931 年长江泛滥时的赈灾工作更为困难。对于“上帝的行为”,例如发生洪水,赈灾工作可以立即全力展开;而对于“人类的行为”,恶作剧似乎才刚刚开始,赈济工作在各方面受到人为的阻碍。1931 年,一船船的小麦马上被运走;我们现在呢?作为一个国际赈灾委员会,却被禁止使用外国船只或日本船只给我们运送任何物品(比较一下比利时,那儿德国占领后很长时间,美国救济委员会还在船运食品物资)!1931 年,人们在洪水退去之后可以迅速返回家园;现在停战三四个月后,农民都不敢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如果冬季种的小麦能在 6 月份收割,那么最困难的日子就可以结束;如果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继续毁坏、劫掠农民的财产,那么到了夏秋之交,在肥沃的长江流域,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饥荒。所以上海领

导赈济工作的人员,要我们量入为出,使之能起码支持一年。这还包括希望从美国红十字会募捐运动得到的物品。如果募捐失败,这儿的情况将更为恶劣。我们的工作有种种障碍,但若有实际的现金资源,我们就有办法。没有资源,我们就束手无策(有关中国的盗匪,我应说明现在的情况比过去的10年还严重。日本人毁坏了这一地区的政府职能,且无意承担责任建立新机构,加上破坏了经济生活的基础,导致农村的盗匪出现)。

我们承受着安全区的“日本时期”的压制,我们几乎忘记了它的“中国阶段”。亏得南京的中国市长有先见之明,给了我们委员会2400多吨大米和500吨面粉,以及80000元现金,使我们在这个冬天得以解救老百姓,现在上海也筹到一些其他基金。如果日本人没有征用我们的14000吨大米和500吨面粉,我们就不必担心以后几个月的赈济工作。中国方面已同意撤出安全区的所有军事机构,但对于时间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我们催促他们加快速度,他们说日本人两周后才会来。所以我们未能及时清除中国军事机构。后来我们通过那艘倒霉的“帕奈”号给日军发出最后通告已为时过晚。但12月13日早晨,我亲自视察过安全区南端,那儿没有中国士兵。中午我们再回去时发现20具平民尸体倒在路边——他们在日本人强行进入边界时想跑走!

我在研究社会学时经常听说“空位期”的恐怖状况^①。我们经历了南京沦陷,经历了12月12日晚中国军队的撤退,经历了从星期天下午中国将军离开至星期三日本最高指挥官到达的一段无政府时期,我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由平民造成的混乱!所有的混乱都是日本人制造的,从13日晚上开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与我们所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也许是我们对安全区组织有序,也许是英勇的中国工人保持供电、供水及电话线路畅通,在12月12日晚之前我们在混乱的汪洋里保持了一片绝对的秩序。但只有一个原市政府的职员留下,连警察局长都跑走了!新闻报道中提到焚烧只在城外,不在城内。换句话说,我们为日本人把一切都

^① 空位期(interregnum),亦称中空期或政治中空,意即旧政府统治已结束而新政府尚未及替代,社会易流于无序。

安排好了,让他们和平地接管市民,在一两天内让基本设施正常运行。可他们公然熟视无睹,放弃机会!

自从被太阳旗的军队占领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价值。在城里发生的一连贯蓄意破坏之后,没有一家店铺敢开门营业——我们特别办理的米店也关了门,因为工人们被抓走了,大米也被士兵偷去了。没有一辆人力车或自行车敢在街上露面,更不用说小汽车了,除了早上短暂的黑市外,街道一片荒芜。让一个米店开门营业十分艰难,由大学毕业生们经营一家简单的兑换店,由南京一位传教士领导发放大米,后来有六周是由一位教《旧约》的美国教授履行此事。我们的一位农艺工程教授,在“警卫工作”中脱身后负责运煤,然后他组织安排全城的食物物资运输,现在还在经管此事^①。他得把那些被日本人毁坏了的卡车组装好,而日军的几百辆军用卡车却无所事事地横列在城市街道上!这就是所谓的“合作”!所有这一切设施都被认为理所当然该由中国人管,电话线不通,没有邮局,没有银行,没有电影院,没有……“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召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而且许多人为此事感到高兴!从那时起,我们就明白我们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校园,从那儿的10 000名难民中,眨眼工夫就叫出了28个妓女!所以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进行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但在那些关键的时候,我们心中激荡的都是普遍的仁爱之情。新市政府的五色彩旗于1月1日在鼓楼升起,升旗的是原来的一个二道贩子——为一个二手政府!——现在是食品委员会委员和市劳动商业部的部长。他告诉我们“自治政府”的含义:“只要日本人说‘是’,我们就马上去做!”

现在我们比过去更了解日本人。在他们进城的前一周,我劝说那些要撤退的金陵大学的人们,还含蓄地责怪他们不该离开,要他们相信日

^① 这里说的是金大农艺系教授林查理,他为全城难民运输食品,不辞辛劳,不畏艰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中国政府曾为此授予他荣誉勋章。

本人的善良仁慈。现在留下的中国人仍在笑我们的幼稚！不久我们就知道，日本人从普通士兵到高层领导都绝对相信，除需要对外国人表示一点尊重之外，他们可以对中国人所欲为！我们和他们交锋而取胜的原因，部分是我们敢于直视他们的眼睛，而且表现出了凛然的正义感。我们意识到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的国籍使我们幸免于难。但参与救济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有些人在工作时遇难。金大附中有个年轻的难民，多次制止日本士兵骚扰妇女，因为他懂一点日语。但因拒绝做领事馆警察的随从而被捕——有一次他逃出机关枪的扫射，躲在一个传教士的宅寓，最后还是被击毙了。快到新年时，日本使馆请我们几个人吃中饭，这个传教士说：“我得去与杀害刘文斌的凶手同桌吃饭吗？”然而，我们仍认为我们应当以个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礼貌友好，为了便于安排工作，为了依赖我们提供食物、保障生命、捍卫尊严的 250 000 名平民百姓。

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 1 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 20 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而在为美国制作的宣传中，日本则把自己描绘成在中国保护外国权力和遏制共产主义的模样。日军在中国则用中文印刷声明，讲述他们要努力把白种人驱除出亚洲。事实上它正在快速推行本来意义上的“赤化中国”，制造经济衰退，导致盗匪猖獗，迫使中国越来越转向苏维埃俄国。我们看到这里的一切，再看下面的话总让人好笑：“过去忽必烈汗的大军曾席卷欧洲大陆。我们东方民族，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为什么要屈从于西方人的贪婪与傲慢呢（见日军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发布的新闻。南京，1938 年 3 月 10 日）？”

一些美国朋友的房屋都遭到日本士兵的洗劫——不错，我们在阁楼里抓住他们正在翻箱倒柜，在藏有妇女的地下室将他们撵走——但我们的房屋挤满了难民，他们掩盖了我们的大部分物品！我的房子直到阁楼都挤住着中国家庭，因此奇迹般地躲过了抢劫，而我的难民朋友们既遭洗劫又遭强暴。有两个（外国）人呆在家里保护他们宅寓里的难民，但我们其他人都觉得，在这片苦海中营造一两个小岛仍无济

于事。所以我们力图从整体上改善局面。一个月来我们每天向日本使馆呈递两份抗议书,两周后总算将日本士兵从安全区中清除出去。但这也仅仅是部分有效,我们八个人住在这所房子里,白天我们却没有一个人能留下保护逃难者,当有人在家时或晚上,日本士兵才会偶尔前来,我们几个人轮换睡在两个收容所和大学医院里保护那儿的妇女,一直到2月份。

金陵大学复学的希望何在?至少在一年内没有希望。当初我批评学生和教工离去,现在我为他们的撤离而感到庆幸,因为大部分学生极有可能被刚进城时气焰嚣张的日军杀死。甚至有一两名从农村回来的神学院的中国教授,都成了反复搜寻盘查的对象。如果我们结束这儿的难民工作,我们很可能最后都会去四川,在那儿云集着中国的知识界人士。日本人只占领了南京的物质架构和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首都”。

另一方面,传播福音的工作开始展开。在难民救济过程中,我们几乎是矫枉过正地确保,不要因对方是否是基督徒而区别对待,不要在福利工作中在资金上偏袒基督徒(不过,我们帮助基督徒用的是特殊基金)。当我们周日也如往常一般忙于给难民提供食物和保护时,留在城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牧师,发现人们被基督教信念所打动,如一位睿智的牧师所说:“现在他们都有了信仰!”我们竭力使更多的差会工作人员前来,以便于他们继续帮助救济寡妇们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

我于去年9月来到这儿,当时没有听从美国使馆“只停留三天”的指示,一直呆到现在,此时美国政府又声明美国人有权在中国居住和迁移。整个世界都在迁移!经过去年秋天让传教士离开的一切努力,以及说过的一些欠缺考虑的言辞,我只能说,我们这儿的美国代表已经用最好的态度对待我们,当他们离开时,有些人说他们希望能留下帮助我们。1月份他们回来时,的确帮助了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以我们政府代表的身份,而且没有为外国的炮舰政策提供背书(包括日本炮艇),我们由衷地感激英美海军的炮艇帮我们运送救济物资,帮我们传递紧急电文。

我们的个人计划还是未知数。玛迪和孩子们一直在牯岭,直至 12 月 26 日美国学校被炸,她和学校一起转移到香港,不过她一直呆在长洲岛^①,而别人都去了上海。孩子们都很欢喜在南方过个暖冬,不过老大玛格丽特·安刚到那儿时患了痢疾——很快就痊愈了。琼安长得很健壮。他们原本希望我能加入,但我们在这儿几乎成了囚犯,现在如果离开就有可能不许再回来——而事实上工作还需要我们——这些都让我不敢奢望今年春天能去香港。玛迪还未决定夏天(5 月 1 日)去哪儿,菲律宾的碧瑶对她来说最方便,我当然绝对不想去日本!希望能到一个看不见日本人的地方呆三个月(唉,对了,我还是愿意看到很多善良的日本人的)!仍有其他人说,进入这个国家之后,他们变得亲日了。我们在这儿有点像在后门(意为尚未进入)。如果我去成都,玛迪说她也想去。可能部分取决于日本在南方战场的力量!我们也可能绕道缅甸(在我没说明之前,你们最好仍用我现在南京的地址——但记住信件要经上海检查。这封信我委托别人捎到从上海驶出的外国轮船上)!

我恨日本人吗!不。我不喜欢他们的政策,我很不喜欢他们对待普通中国人的方式,我相信真理终究会为世人所知。我不想做一个挡路的人!如果我重新面临一次这样的时刻,对日本人做我们曾为 250 000 中国人、妇女和儿童做过的一切,我会同样地再做一遍。这种经历也使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的爱,我们别无选择。

希望得到你们的消息,这样你们能拯救我们的灵魂!

你们的朋友于中国

刘易斯·史迈士

玛格丽特·史迈士

[RG8, B103.]

^① Cheung Chau Island, 长洲岛, 香港较大的离岛之一, 有外国差会兴建的神学院, 为古色古香、幽美安静的休闲地。

3. 现状记述(南京 1938 年 3 月 21 日)

1. 秩序 秩序再次成为问题。抢劫与强奸重现,至少在我们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如此。其中包括 19 日下午在设于一处美国产业的难民营对一个少女的强奸。一个日本兵在那里被一个美国人发现,后者尽管受到刺刀威胁,仍能将这个家伙赶走。但他要求一个美国妇女!实际伤害业已形成。

2. 食物 粮食情况现在已有所缓解,商业性大米允许更为自由地进城,自治委员会接受从芜湖船运的 3 000 袋大米。但很难判明究竟有多少实际可用,自由输入可以维持多久。价格确定为每担 9 元或每袋 11.25 元。由于大米在芜湖售价为每担 4.50 元至 6.00 元,此地粮价有望略跌。但自治委员会(经特务机关同意)征收每担 0.60 元税金,将在某种程度上防止粮价跌落。国际委员会希望能在开放的市场上买米以从事救济工作。

3. 经济状况 未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城内 10 000 名菜农只有少数人敢于回家开始春季的种植。我们试图组织他们返回,以便给他们以较多安全。他们大多不仅失去了家用器物,而且失去了农具与种子。同样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人们正从乡村前来,在这里寻求较多的安全。有天下午来了 300 多人,要求一个难民营收容。聪明的观察员从江北回来说,若干地区冬麦由于战争延误种植将只有不到平常收成的 30%,而且有 80%的农民没有存粮。句容县的冬季作物稍好,可能有平常收成的 70%,但 90%农民没有存粮,开始春季耕作的还不到 10%。江北的农民也逃到城镇寻求庇护。如果农村依靠城市,城市又能依靠什么?如果农民是这个地区仅有的基本生产方式,农业的持续便极为重要。

4. 救济情况 由于乡下人进城,也由于我们的“半固定”难民营塞了 15 000 人,我们只有延缓关闭其他难民营。但设于政府建筑的 8 个难民营已全部关闭,除了一所留下以收容从其他城镇前来者。我们通常试图把所有男人迁出,只允许 13 至 40 岁女性留下,儿童亦可随同母亲留下。对城市南部的视察表明,一个月以前还很荒凉的许多街道,现在已有人居住,而且向城市东南部延伸。但很少有妇女回去——有了 2 月份

第一个星期的可怕经验,人们已懂得把年轻妇女留在难民营或安全区其他房屋。莫愁路甚至还有一家米店开张。

汇集热心掩埋团体和其他观察方面的信息,据估计南京城内有10 000人被杀死,城外约30 000人(受害)——后面的数据只是统计的护城河附近的区域,据估计死亡总数中的30%为平民。

5. 案例

460 2月27日下午大约4时,蔡基兰(音译)及其父停留在名叫Sa Chou Wei Kao Chiao地方的一座房屋边,离南京水西门外大约8至10英里,屋子里有一些妇女。看见日本兵走近,妇女便跑走。日本兵来了,问女人在哪里,并且要孩子及其父带他们去找。父子拒绝了,于是一个日本兵开枪击中孩子的腿,伤得很厉害。目前他正在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461 3月4日。秣陵关一个54岁农民在2月13日被日本兵索要几条牛、驴和女人,邻居们都跑了,日本兵把这个农民捆起来,离地面3尺将他吊起,然后在下面燃火烧他。他的下腹、生殖器和胸部严重烧伤,头部和脸部的毛发也烤焦了。有个士兵提出抗议,因为他年纪大了,并且把火拿开,还扯掉农民烧着的衣服。日本兵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其家人回来把他解下。

462 3月9日晚8时,日本兵来到珠江路黄先生家,要他带着找女人。他不同意,于是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他,刺穿左腹股沟,刺入皮肉1.5英寸。他跳转身,用右手推开刺刀,手亦因此被刺伤。他逃跑,日本兵追赶,但他毕竟奋力跑掉了。刺刀幸好没有触及动脉。(因为害怕日本兵回来,与他相关的两家合共12个人迁移到金大附中)。

463 3月10日约在晚上8时,五个身着蓝色和黄色制服的日本兵来到门市(音译)蔡先生的家。两个兵在外警戒,其他三人进屋要钱。全家跪下乞求宽免。这三个士兵在房门前面放一个木梯。用绳子把丈夫拴在梯上,把他吊在那里。他们继续搜索这个家庭,拿走一张5元钞票,一个10仙日本铜币,3枚中国两角银币,一张纸币和一个铜板。在翻遍衣柜和箱子以后,他们拿走一件皮袍、一件妇女冬衣和一台留声机。离开时,他们猛刺蔡的大腿六次、肩膀两次,最后枪击头部,他立即死去。他们还把跪在地下的蔡李氏的头部刺了几下,并刺王姓大腿两次,然后他们走了。

464 3月11日,一个妇女在邻舍小屋里被两个日本兵强奸。

465 3月15日,一个姓张的人,47岁,住汉西门,早上7时走近朱寿巷(音译)时,被流弹击中头部。他被送往医院治疗,但到达后不久就死了。

466 3月17日晚10时,六个日本兵闯入一个姓高的40岁农民的家,他住在后宰门。他们要高找女人。高回答说他没有女人,也找不到女人。于是他们就用刺刀多次猛戳他的身躯和颈部,并且砍他的头。他逃跑,但刚到门口就倒下了,血流如注。他从此再没站起来。看见他已被杀死,这些日本兵迅速离去。

467 3月19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之间,一个日本兵在金大华言学校难民营强奸一个19岁少女。贝德士博士于4时05分到达,但他走近这个日本兵时,后者挥动刺刀粗野地说,“要姑娘”。但贝德士把他赶走。这个日本兵毫无酒醉迹象。

468 3月19日夜晩,一男一女爬过(金大)附中难民营院墙时被抓住。告诉他们不能进来,他们说这个女人晚上已被强奸过两次,他们不能回家。

469 3月20日晚9时30分,我们邻近五个贫穷家庭被日本兵抢走283.30元。

470 3月19日,我们一个职员叔父被日本兵押走,因为他穿卡叽布裤子。施佩林救了他。

[RG10,B102.]

4. 致 贝 克 函

1. 1938年5月28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你向汤姆生^①大夫询问我会工作情况。下面我们对你提出的问题答

^① C. Thomson, 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会计师。

复如下：

1. 机构名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①

2. 办公地点：目前在南京宁海路5号，自6月1日起，改在天津路3号。

3. 受照顾难民人数：

12月份战争一爆发，25万市民拥入南京安全区。其中7万人被安置在25个收容所。（今年）2月份起，收容所人数逐渐减少。5月31日前所有收容所将关闭。到那时，救济工作将有意识地从强调难民大集中转向为因迁移或被转移而散居各地的个别难民和难民家庭提供服务上来。

经过一番调查，在2月7日到5月27日这段时间内，本会善后委员会^②共向82787人提供过帮助。由于资源所限，这些难民得到的援助一直很少。本应该让受援的范围再大一些，数额再多一些，不过这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在经红十字会^③的合作参与下，国际委员会计划从6月到8月这段时间内，陆续向1万名左右的难民免费发放食物。另外，在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正计划收容800名女孩。这些女孩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现在也不能回家，因为这对她们来说并不安全。这期间还打算再建一所难民中心，收容几百名携有孩童的妇女。不过，我们希望该中心不用花国际委员会的钱就可以运转起来。

为今后着想，国际委员会准备留下一些救济物资以备即将到来的秋冬两季之需。委员会担心，到那时救济工作上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会比去年更加尖锐。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仅限于南京城城墙以内地区的救济工作。城墙以外地区，尤其是六个近邻县，能够得到的救济至今仍旧很少。国际委员会希望，如有可能，宜将救济范围扩大到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身上。

4. 每月救济开支：

从（去年）12月1日到5月31日这六个月中，我们用于救济上的开

①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其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②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

③ Red Swastika Society.

支如下：

现金开支	191 754. 29
日用赠品	93 090. 46
总计	284 844. 75(美元)
月均	47 474. 12(美元)

5. 急需物资：

照目前计划,要实现我们所期望的夏季三个月免费发放的目标,每月约需米 1 000 袋、小麦 500 袋。这还不包括用于以工代赈的小麦需求量,也不包括对其他团体的援助。今年夏天燃料就会非常紧缺,加上本地燃料供应枯竭,今后的燃料供应将成为一大问题。去年冬天,我们一个月就耗掉 200 吨左右的燃料。此外,我们还得替 500 名左右难民的穿衣问题作好准备。

医疗服务：见第 3 页信件说明。

6. 目前手中还剩多少物资？

大 米	732 袋
小 麦	4 466 袋
面 粉	212 袋
大 豆	57 袋
盐	85 袋
汽 油	2 496 加仑
润滑油	1 108 加仑

7. 目前手中还剩多少钱？

财务报表上现金结余

27 491. 99(美元)

南京国际救济协会^①许诺援助

14 750. 00(美元)

南京国际救济协会向与本市红十字会合作项目之捐助

15 000. 00(美元)

①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Association, 简称 N. I. R. A. 1938 年成立于上海, 宗旨是联络上海各国际救济团体向南京地区战争难民提供救济。

刚收到的一笔捐款

100 000.00(美元)

截止 5 月 31 日总计现有现金

157 241.99(美元)

上接第 5 个问题 医疗服务

大多数市民只能在大学医院^①享受到足够的医疗服务。这家医院在整个非常时期的医疗工作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除了常规门诊及紧急增添的 160 张病床外,这家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又开设了 3 个户外诊所。医院职工还发起一场预防运动。给 16 265 名市民注射天花疫苗,还给 12 000 多名市民接种伤寒、霍乱疫苗。

但是这家医院的经费问题却十分突出。眼下只有 3%的病人有能力支付一、二类医疗费用。只有 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类医疗费用,对另外无支付能力的 70%病人必须实行免费就医。几家诊所也同样亏损严重。近几个月,花在免费就诊病人身上的第三类医疗费用平均每月达5 000 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红十字会从一份基金中拨付。不过,该项基金即将告罄。红十字会对该院第三类医疗费用的支付也随之将越来越少。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手术费用。因为现金收入很少(每月约 4 000 美元,只占平时的一小部分),如果所有手术都做,医院每月要亏损 5 000 多美元。有时甚至连红十字会的特别收入也要拿来贴补手术费。

医院所需经费,除了各种传教士团体提供的经常性费用外,每月必须要有 5 000 美元用于穷人看病,另外还必须有 4 000 到 5 000 美元用于职工开支及手术费。外界资助必须达到这个数才能保障医院工作的开展。

8. 每月管理费是多少? (详见财务收支表)

六个月	职员费用	16 650.49
	日常管理费	5 297.45
	总计	21 947.94(美元)
	月均	3 657.99(美元)

^① University Hospital,即鼓楼医院。

9. 分发给养计划：

去年冬天,我们是按每 300 人一袋米(215 磅)或每人每天 0.716 磅米这个标准实施定量供应。

今年夏天发放免费粮,我们准备按下面的标准进行:

每人 0.52 磅米(合 0.4 升)

每人 0.25 磅麦

共计每人(每天)0.77 磅粮

(此项定量标准与上海方面发放 0.75 磅米、麦粮食津贴的标准大致相当。)

10. 贵方就业计划如何? (见第 5 页)[下页]

11. 贵方有何善后良策? (见第 5 页)[下页]

12. 贵方总体意见或建议如何? (见第 6 页)很抱歉,信本来可以写得更流畅些。但是今天上午收到汤姆生博士的信以后,再给你写信,还要把它赶紧寄出,确实是件苦差事。

对您提供的一切帮助谨致谢意!

你的忠诚的

L. S. C 史迈士

上接第 10、11 个问题 就业及善后工作之展望

一切有关南京及其邻近地区救济、就业和善后方面的计划必须把该地区遭受过经济破坏这一背景考虑进去。国际委员会对此作过精心的调查,结果即将公布出版。^① 南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国民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拨款,一切事业均与这一点有关;其次,南京也依赖于以前曾在此活动的许多教育机关。战争使这些基础破坏殆尽。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悲剧的开始而已。

在南京,31%的建筑物遭到破坏,46%的房屋遭到严重洗劫,只有23%的房屋所遭受的抢劫较轻。平均每个家庭损失 902.35 美元,这还只是从那些留在南京的较为贫穷的人群中调查得出的数字。如果把目前不在南京居住的那部分人的房屋及财产损失包括在内,那么总体上的

^① 指史迈士编著的《南京战祸写真》。

损失将会远远大于上面的数字。相对而言,主要商业街上残留下来的那点产业能够使用的很少,即便如此,这点产业也很少掌握在当地人手中。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示,目前只有 9.2% 的人有工作,而在正常情况下,同等的被调查家庭中 26.2% 的人有工作。目前,每个家庭日均收入 0.14 美元,而战前为 1.23 美元。除了脚夫和小贩外,其他行当的人大部分都挣不到什么钱。并且,现在还看不到交通恢复自由的迹象,也看不到商业和制造业大规模复苏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便明显地依赖于邻近乡村地区。但是,这些地方也遭受了类似的大灾难。我们的调查表明,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几个近邻县及半个六合县,每户平均损失 284.57 美元,这还只是房舍、牲畜、存粮和农具这四个方面的损失统计。4% 以上的农舍遭到彻底破坏。正常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冬季储粮足够四个月左右之需;现在的调查表明,冬季粮食储备只够一个月之需。情况最糟的是,靠近公路的农田里,水稻种植严重不足,即便是这样,还不敢保证 6 月份前能否有所收获。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给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幸免于难的家畜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前几个月恶劣的外部条件再加上手头经费有限,使得国际委员会代大企业招工并帮助它们复员的努力受阻。不过很多成功的救济项目已经拟出,其中一些项目每个都有几千个工作日。下面一些工作可以由难民来做:食品生产、路面平整、堤坝修理、污水处理、环境卫生维护、为难民制作寝具及集中埋尸等。

近期内国际委员会还准备开办一所妇女职业学校。国际委员会确信,如果未来 12 个月内能够得到足够的物力财力支持,以上这些工作就可以扩大好几倍。同时,国际委员会有能力对如何使用两至三美元就业救济费进行监督。

国际委员会从上海搞到一批价值 15 000 美元的蔬菜种子,现已分到菜农手上。5 000 美元的专门基金即将贷给合作社(其中几家以前有很好的信用)和江宁县的农民协会。现在找到了两个中国人,他们都受到农业科学方面的教育,是一流的乡村合作及乡村组织方面的专家。国际委员会在农具推广(此举得到了特别的技术援助)、大豆育种等方面进行过一番开拓性的工作。不过,对需求如此大的乡村救济工作而言,这点

努力显得微不足道。1 万美元除了可以满足乡村地区现今救济需要外,还可以借此增加这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提高其整体经济水平。

上接第 12 个问题 总体看法及建议

对于我们来说,能够靠着本地前 2 年秋收积存下来的大量粮食应付到现在已是再幸运不过的了。最近由于购买力低下,谁也无力也不愿意保留存粮,因此粮价不高。工业产品几乎为零,农业前景一片暗淡。银行没有了,唯有商用运输还在勉强支撑着。这几个月虽然受到贫困的折磨,但总算还能凑合着熬日子,而即将到来的秋冬两季,情况将可能变得严重多了。我们建议,在尽量满足一时急需的同时,所有救济计划都应该考虑到冬天的需要。

2. 1938 年 5 月 29 日

尊敬的贝克博士:

函内夹附致汤姆生的一封信。我昨天寄给你的信回答了你提出的 12 个问题,其中一组数据需要更正,致汤姆生的信与之相关。希望对此加以留意,将致汤姆生的信与昨天给你的信二者合并参阅。

再次表示感谢。

你的忠诚的
L. 史迈士

3. 致汤姆生函(1938 年 5 月 29 日)

亲爱的克劳德:

我们昨天给你的报告写得仓促,送到邮局时 5 时刚过,邮局要关门。不过总算没有拒收。我这么说是想解释一下报告上的某些内容为何意犹未尽,同时也想对昨天晚上发现的报告上的一、二处错误加以说明。

我们目前正在登录分类账,在作出详尽分析之前,我们不准备公布报告。不过,为了给你们送上那份报告,我们昨天尽了最大的努力。

出现问题最严重的是“管理费开支”。我们以前从未将该项目加以分门别类。我记账时一直将所有人事费用列入“职员开支”的最后一项“苦力开支”中。也就是说,你所见到的“管理费开支”是有点特别的。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救济费用。有鉴于此,今天上午我给你发去一封电报,内容

如下：

“报告已于星期六寄出。转告贝克，职员开支项下三分之二的经费实际上是用于提供收容住处或搞环境卫生的苦力身上。因此，管理费用开支项下的百分数为4%。”

翻开第7页^①财务收支表，你会看到职员开支为16 650.49美元。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列出，不过，约一半的职员开支实际上用在各收容所工人身上，还有约六分之一开支用在打扫马路的环卫苦力身上。因此，该项开支的三分之二是用在苦力和收容所工作身上。

这样算来，管理费用开支下降11 000美元，而“直接用于救济开支”总数增加到180 800美元：

直接用于救济开支	180 000.00(美元)
管理费用开支	10 900.00(美元)
总计	191 700.00(美元)

再加上日用品的费用，管理费用开支占总开支的3.8%。

即便从“职员开支”中划出了三分之二不属此项的部分，但仍旧包括我们雇佣的负责善后工作的30名工人的开支，总数超过3 000美元。

我注意到上面的数字中未将本应列入的日用品开支包括在内。以下就是有关管理费用开支的完整数字：

直接用于救济的现金支出：	180 906.68(美元)
用于救济的捐赠物：	92 689.96(美元)
管理费用开支：	
职员开支(含30名善后工作)	5 550.16(美元)
办公费及车力开支：	5 297.45(美元)
	1 084.61(美元)
六个月总计：	2 84 444.25

管理费用开支占3.8%。

其次，在提到管理费用开支时应该说明的是：该项开支不包括国际委员会中的外籍人士的开支，他们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当地的一位白俄汽

① 指5月28日史迈士致贝克函，该函共8页。

车修理工和一位奥地利汽车修理工除外,在这危险时期离了他们汽车没法正常运转)。此外,国际委员会的4名中国负责人也没拿过一分钱的报酬或津贴。他们的工作全系自愿奉献。事实上,我们编制这份职员录只不过为了便于辨认工作人员。我们发现,1200名工作人员中,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志愿者。工作人员中津贴最高的每月30美元。而这笔钱在3月1日之前一直没有兑现过。虽然当时大数工作人员已经穷得没钱用了。

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的本会工作人员全是“难民”,没有其他独立的(经济)来源,这与你们在上海的情况一样。例如,我手下的一位负责制表的助手,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有三四年的工作经验,每月仅拿30美元,靠它养活一个13口之家的。他家战前生活殷实。但是他们的房屋和所有家当在战争中被焚毁。

第2点 我在一组数据中发现了一处错误。你也许注意到上面讲到的捐赠物开支为92689.96美元,这个数字是对的。昨天给你寄去的信中第2页将该项开支误写成93090.46美元。由于信写得很匆忙而出现错误。原信第2页上的数字应为:

4. 每月救济开支:

现金支出	191 754.29(美元)
日用赠品	92 689.96(美元)
总计	284 444.25(美元)
月均	47 407.37(美元)

第3点 你可能注意到,我把南京国际救济协会答应援助但尚未到账的14750美元也列在原信第2页第7个问题之中。这笔钱到底捐给我们没有呢?我要查一下5月31日的账才能知道。

你的忠实的
L. 史迈士

[原文载《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

(文俊雄 译)

[J. E. Baker,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负责人。]

八、史德蔚

史德蔚(Albert Newton Steward)1897年生于加利福尼亚,1918年与肯塔基的西丽亚小姐(Celia Belle Speak)结婚。1921年史德蔚毕业于俄勒冈农学院,同年被美以美会作为教育传教士派往中国,在金陵大学教授植物学,直到1937年8月全家撤离中国。1938年9月,史德蔚回到南京。1939年7月,妻子与3个孩子也一同返回中国。1943年2月,史德蔚在上海闸北被日军拘留,直到1945年9月被释放,后仍留在金陵大学工作。1950年12月返回美国,任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1959年1月去世。

史德蔚虽然是在大屠杀以后才回到金大,但所见所闻日军暴行甚多。他在1938年11月至1941年4月间写下大量日记,曾编辑成册,取名为《从加利福尼亚到四川》(California to Szechuan),本书选译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部分。

1. 日记选译

(1938年12月10日—1940年3月23日)

1938年12月10日,星期六

.....

旅程的前面几英里经过了一片衰败荒芜的地区。间或可见一位老翁或老妪在废墟间走动,不时有日本旗帜在风中招展,似在炫耀其军队的手艺。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一块块耕地,有几个人在田里劳作或在村子里走动。但直到我们接近整个耕作区的尽头才看见了牲畜。后来我们见到几头水牛和别的牲口,但鸡、鸭和猪似乎在这儿消失了。我很遗憾地看到人们砍了这么多树。这样做原因有二:其一是由于缺少外来的燃料和木材,木材价格出奇的昂贵,而且正在进行大量的重建工作;其二是出于军事需要,日军下令砍掉所有铁路两旁一英里范围内的树。

火车很准时,六个半小时后到达南京^①。我很高兴福勒太太已为我准备好了午餐,一路上几乎都没什么吃的。我好奇地注意到一个日本人的午餐包在四英寸宽的薄木片里,像中国人用竹套那样。南门外连接芜湖线的那段铁路,铁轨和枕木都被下掉了。一到下关,我们就像士兵似的被排成一行等待检查通行证。车站外,小汽车非常稀少而且要价很高,于是我们乘马车进城,就像1921年时那样,只是不时有一辆辆军用卡车和汽车呼啸而过。下关大部分已被夷为平地,那儿没什么生气。圣公会仍和过去一样美观,就像一片干涸土地上的一泓清泉。我们只在城门停下来接受检查。我带着桑莫弗洛德和盖尔先生下来,然后回大学医院,在那儿我们得知特里默博士刚去上海,去和他的家人度圣诞节。我在林查理的房子与林查理先生、威尔逊博士停留了会儿。

12月11日,星期日

今天星期天,我步行去江塘街(3英里)。城市的这一部分无甚变化,但人烟稀少。王牧师在那儿,主持了非常成功的祈祷仪式,仪式是在地下室举行的,参加人数是战前的一倍。他们这次唱的赞美诗是我所听到的唱得最好的一次,整个仪式无一人开小差,没有任何表示痛苦与沮丧的言论。宋煦伯一家、布莱斯特小姐、王太太和叶子牧以及袁先生问候西丽亚和全家。

日军进城一周年的日子临近了,我已听说了一年前有关这次事件的许多情况。大学医院的一位治疗中的伤员(他是一位中国高级军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消息。据说湖北某师未能到达指定地点,汤山和铁路之间的某地,于是留下了一大块空隙,日军大举拥入,直逼城墙,提前攻入。然后此地的军事将领(他曾在蒋委员长开始下令撤退时请求守城)乘飞机跑掉了,在灾难来临的前一天丢下了无统一组织的军队。军官们于是解散了队伍,各自为战,当夜所有人都拥向街头。第二天一早,街上随处可见军服、枪支和其他武器装备,绵延几英里,他们都逃往长江上游的中国内陆。

日军从三面围攻城市,显然故意留下下关通向长江的那一面。当中

^① 史德蔚从加利福尼亚乘船经檀香山、日本,于1938年11月29日到达上海,12月10日到南京。

国士兵拥出城门到江岸时,有约 40 000 人进了圈套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城市被占后,费吴生先生第一次出城时得越过堆积起来高达 6 英尺的尸体。不久日本兵开始搜城,包括中立区,找伪装起来的士兵,抓走有士兵嫌疑的人。多数情况是这些人被带往江边,100 人一起,用机枪扫射,尸体就倒入江中。起码有两三次是成群的人被绑在一起,浇上汽油再点火燃烧。城市陷入日本人之手时,有约 6 万至 7 万人丧生。

下午 4 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工楼举行了英文礼拜。米尔士先生行牧师之职,许多朋友都在那儿,还有几副新面孔。

12 月 12 日,星期一

我们的家和斯洛坎家的房内物品和家具看上去都还好,但和清单一核对,就发现我们屋子里丢了好几件东西。贮存室未被侵入。我估计损失约为 150 元(当地汇率)。一发炮弹落在火炉边东面的窗上,但损坏很少。今天我从车站拿到了我的大衣箱,在城门时得打开其中的一只接受检查,这是我从温哥华到这儿以来第一次被要求打开箱子。

华群小姐带我参观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们从事的一些有趣的实际工作,例如纺织和缝纫。她说很难为纺织筹到纱线,建议我们在大学里用当地的生棉加工成纱线。林查理先生在研究一个纺织的困难问题,他碰到“密合曲线”这个词,对其意不甚明了。现在我们等合适的时机告诉华群小姐,她给我们出了一个多大的难题。

今天有约 50 人乘日本船从牯岭前来。盖尔博士停在这儿与她丈夫会合,他们分开已有一年多了。

陈勇先生告诉我金陵大学开设了四门指导课。在农业专修科学校办了一所小学,在蚕厂大楼办了一所农民学校,在 Severance Hall 办了汉语、英语、日语和数学课程班,还在鼓楼教堂为老年人办了识字学校。今天收到了成都来的航空信,这些信在途中走了三周的时间。

我们不断地听到有关一年前的那段恐怖岁月的故事。除集体屠杀之外,市内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到大规模的强暴。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有一两例我闻所未闻:发现了两具妇女尸体,其中一具体内插有高尔夫球球杆,另一具下腹插有啤酒瓶。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

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她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尽管对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医生们持有不同意见。我明白在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此处原文空缺)大夫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

12月13日,星期二

我安排了卢嫂子(艾斯德的仆人)收拾我们宅寓靠南的套间,过一会儿,我就可以住进去了。谈和敦博士中午和我们一起吃了中餐。

一年前的今天林查理先生在街上捡了几把手枪,晚上他打算把它们给顾先生,他是我们商业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从未拥有过这类东西又一直很想要。齐先生试图劝说他别接受。我想他没有这样做。一小时内,他们三人中的两位险遭厄运。齐和林查理刚刚在街上分开返回各自住所,这时几个日本兵截住齐,他又叫来林查理。在林查理过来看发生什么事之前,齐听见他把手枪扔到了墙那边的响声。他俩都被日兵扣留了,直到迈克·丹尼尔带来印刷的通行证才被释放。

12月14日,星期三

维新政府已下令要求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人员离开城市,六个为委员会工作的中方人员已被逮捕。事情很复杂,包括中国人内部的彼此嫉妒,日本人对贝德士近日关于南京毒品的文章的仇恨,以及委员会的所谓政治野心,还有有人筹划谋杀维新政府新任命的市长一事。

在一位来自日本的基督教青年会牧师的帮助下,通过联络使救济委员会的问题得以解决。委员会同意增加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无政治色彩市民将更有助于澄清问题,现在的成员都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

今天林查理说在南京城内及附近被击落的日军飞机的价值相当于空袭损坏财产数目的三倍。

12月15日,星期四

陈勇先生今天告诉我金陵大学农场里价值约1万元的棉花全被毁

掉了。

新的傀儡政府叫维新政府，林查理先生把在其中工作的中国人分为四类：（1）反对国民党或被国民党开除的人士，他们对日本政权很宽容；（2）大量的中产阶级流氓，他们会抓住任何机会为自己谋利益；（3）并无多大能力的人，他们曾就职于国民党政府，在日军到来之前未撤离，他们被要求选择“要么服务，要么死”，他们不敢不在维新政府任职；（4）少数几个诚实的人，他们感到可以为中国做点事，通过控制维新政府，使之不落人流氓之手。他们也暗暗希望将来有机会重返国民党政府。

12月21日，星期三

下午我骑车去接近南门的地方，沿太平路返回，一路上景象令人黯然。损毁的财产数不胜数。仍是人烟稀少，大部分地方厂房凌乱不堪。假若双方合作给平民生命财产以保障，使之不受军事行动的干扰，估计损坏情况可能只有实际的百分之一或二（详见史迈士《南京战祸写真》，1938年6月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出版）。

我听说去年冬天在南京被残害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尸体并不是被那些杀害他们的部队搬走的。一个佛教组织红卍字会的工人们花了五六个月的时间才清理完。他们的行为在当地受到高度赞扬，我应该说他们比中国红十字会强多了。据说他们在1938年上半年从南京的街道上清理了四万具尸体并将其掩埋。当时许多尸体都已腐烂无法直接抬走，只有卷入草席内推进卡车。刺鼻的臭气几乎使人无法在卡车上干活。据说那几个月随处可见人们在街上把狗从吃了一部分的尸体上撵开。

1939年1月15日，星期日

今天早上我和盖尔一家以及辛普顿小姐吃的早餐是煎饼而非鸡蛋饼，因为断了电，他们不能用烘鸡蛋饼用的铁模。辛普顿小姐告诉我们，她刚从返回的中国人那儿听来四件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可真是叫人吃惊：（1）新政府（经日本同意）仍用五色旗，这是孙逸仙博士让他的国民使用的中华民国原来的旗帜；（2）保存历史文物，使之免于被毁；（3）继续邮政局之业务；（4）国家名称未变。

盖尔先生告诉我一件最近发生在王先生住宅的事情,王先生是汉德·李博士的秘书。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一天下午王太太跑来告诉盖尔先生,日本士兵正在拆他们的房子。这房子不是美国财产,所以盖尔先生抗议也无济于事,他对此无能为力。他们拆了房子,把木材及其他材料如愿装上卡车后,那伙人中的14个日本士兵抓住了一个路过的妇女,把她拖进屋并强暴了她,然后登上卡车扬长而去。这件事就在不久前发生在金陵神学院附近。

1月27日,星期五

我们的农场管理人邵铁兴(音译)发现日本军队马匹的粪便可以用作我们棉地的肥料,还包括过去几年积下的中国军队马匹的粪便。而且今年比平时的价格便宜得多,只花了20元钱(当地汇率),他就得到了够用今后一两个月的肥料。

在太平门,两个日本士兵的职责是检查出入者的通行证,但他们却坐在警察局走廊舒服的椅子上,背靠着枪支,让一个中国警察检查。他没有查看我的证件,却给我行个礼。麦卡伦说,他一定是日军进城前组织维持安全区秩序的原警察局的一员。他们原来有300人,日军取消了他们,在一天之内就枪毙了100人。我告诉我的中国朋友说,如果这种漠然和懈怠已在日军中极为普遍的话,那他们对这支军队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在太平门外,我们去看了邵先生的一位农民朋友的家,他刚刚回来建了新房,因为旧房已被烧毁。他们从事多种耕种,有一项是缫丝。他们种了桑树,桑叶用来喂蚕。妇女们则熟练地把蚕吐的丝纺成线织成薄纱,做夏天穿的衣裳。她们的织机都被烧坏了,现在还没有修好,但妇女们仍在纺线,看上去她们都期望着很快恢复纺织工作。

看到市内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种的树都被砍了,真是一件伤心事。在城门口可以看到军用卡车运进一车车用作燃料的小树,成百上千的农民们也往城里搬运各种燃料。路两边的许多树都被砍了。我们自己的管理人员也像当地的农民那样砍下我们房产边缘的树木,以免夜间四处游荡的盗匪先下手砍它们。盗匪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除非是集体行动,

否则不敢晚上外出,燃煤十分有限且价格极高。

我们期待着组织一个南京职业委员会以便与各方力量合作,帮助人民恢复正常生活。华群小姐认为,我们若有一个可行的计划,便更能获得外部支援以促进该工作的展开。

神策门外周明义(音译)先生家的房子被洗劫一空,连窗子都掉下了,不过房子外壳还在。邵先生的一家住在里面,帮助看管房子。有一段时间一家日本人曾住在这儿,不过后来他们搬走了。邵先生的日本朋友写了一张告示贴在那儿,请日本人对他的财产手下留情。

华群小姐对米兰姆主教(Dean Milam)对中国的兴趣做出了反应:她希望安排她为中国妇女上为期数周或数月的培训课程,通过与她们一起劳作并做必要的调查,以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建一所“模范中国农家”。

2月18日,星期六

今天下午我从米尔士先生那儿听说了有关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工作的一些情况。他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份申请表,并对每份申请作调查,平均有四分之一的申请会被驳回。这一切要费相当多的人力。圣贤堂里堆了一袋袋大米和黄豆。他们主要是分发食物和衣物,很少发钱。在过去一年里他们经手的救济物品金额达到50万元。在我12月到达南京之前,有六名为救委会工作的中国人被警察抓走了,现在还未被释放,尽管没有任何逮捕他们的罪名。据说他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中国人内部的嫉妒看来在这事上起了重要作用。

3月18日,星期六

今天早晨我7时就出来了,没吃什么早点,因为对于和我一起吃早点的那家人来说,这个时间太早了。我和郭一起去查看太平门外的果园。我们看见有两组人员在大学农场里除草,一组17人,另一组16人,大部分是妇女。杏树和樱桃都开满了花。这项除草工作大约是10个人要在一天之内除6亩地。5亩相当于1公顷。

今天我又从米尔士先生那儿听到一个故事,这事发生在日军进城后不久,他说那时金大校园内有10 000名难民。有传闻说中国军队即将返回;

实际传言说他们已在城内,我们 10 000 名难民中有很多人都相信。我们后面的院墙与日本领事馆毗邻,我们的一部分妇女很容易看见一些人从日军领事馆后门拿着大包的东西走出来,她们断定那一定是掠夺物。很快又传闻日本领事馆遭到中国人抢劫,我们 10 000 名难民中的一部分也打算进去分得一份物品。事实上在齐先生和警察来维持秩序、阻止她们时,已有一些妇女翻过院墙。费了好大工夫才劝阻她们,并告知她们见到的那些人员是住在领事馆内的妇女拿着日本人的衣服出去洗。我很想知道假如那些妇女真的拥进日本领事馆掠夺物品,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

我附上一份关于园艺的记录,以便你能了解我们的工作。

4 月 21 日,星期五

今天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大意是,在城门口,连棺材也要求打开接受检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可是极大的侮辱。更何况那些家庭已经费尽周折在检查之后获得必要证件才把棺材从家里拖出来。第二件事据说两周前发生在水西门,一个年轻中国妇女经过日军守卫的城门时嘴里含着一支香烟。他们认为这是在侮辱他们,便剥掉她的衣服,并用皮带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就这样让她走完那条街。回家后她便自杀了。

我们听说他们保证将释放潘先生。指控他的罪名有三:(1)1936 年他还是金陵神学院的学生时写过一篇论文,文中说日本是个军事国家,这是不对的;(2)去年 2 月,他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演讲时,鼓励与中国为友的人们不要担忧,中国会逐步赢得这场战争,这也是不对的;(3)在大学医院,他在谈话中赞扬上海的恐怖组织,因其多次行刺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说我们在南京也应有那样的组织,这样我们就能在美国旗帜的保护下轻易行事。我们想第一点可能是事实,尽管我们不知道如果潘先生说日本军事力量薄弱,他们会怎样处置他。第二点我们表示怀疑,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纯粹是无中生有。

6 月 14 日,星期三

神学院南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宋煦伯先生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

行政主任,他极少谈及几年前在南京发生的事情,但今天他略带地方色彩地讲述了一个有关一个特殊家庭的故事。大约是这样的:这家人住在城南的三叉河。日军来了,父亲双手被绑,悬在树上,脖子被砍伤。日本人要强暴其已婚的女儿,母亲去保护她,却被当场刺死。女儿不从,其躯体被剑刺开。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逃到市内,在金陵女子神学院大院内避难。曾有一群女孩从那儿被(日军)拖出去强暴,后来有的人回来了,但那家的女孩子没有回来。这个家庭其他人的生活都依赖一个16岁的男孩。而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帮日本人在卡车上干活。他从车上摔下来伤了一只眼,于是这份工作也丢了。现在这个家庭已无法维持生计。

6月22日,星期四

今晚我和柏睿德博士谈了一会儿话,我们都应邀参加了大使馆为米尔士夫妇即将离开去度假而举行的告别晚宴。就他们在医院的经历,他们说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到80%。军队要大量妓女,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御力,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充。

6月23日,星期五

今晚贝德士讲了一件战争中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中国(军队)在五台山的美国学校附近有一架很好的高射炮。他有一回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和苦力们一起划定安全区边界,这时来了日本飞机,他们便躲进五台山脚下的一个棚屋边的壕沟里。炮火声真是震耳欲聋。飞机离去后,一队士兵匆匆下山走进棚屋,原来那是他们的军火库。

今天我们收到一些信件,了解到有关成都轰炸的详细情况: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张易正(音译)先生(他是植物病理学专业的一员)在轰炸中丧生。一颗炮弹落在距陈校长家40英尺的地方,房子被炸毁,他们家好几个人都受了伤,幸未危及生命。炮弹的杀伤力可以从下列事实中体现出来:一颗炮弹落在距斯洛坎宅寓150码的地方,炸坏了两扇门和40多扇窗户。校长的妹妹玛丽·陈小姐受重伤,但会痊愈。我们的人还比较幸运,没受什

么伤。市内约有 500 人丧生。随炸弹落下的传单说,这次还不算是真正地轰炸成都,但如果政府迁到那里,他们会再来光顾,动真格的。

我们的学校又开始上课了,他们试图把家属都搬出城,城里太危险。但我尚未听说他们会搬到什么别的地方。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位女学生也丧生了。如果所有的炸弹都爆炸,伤亡会更惨重。幸好落在校园里的约有一半是哑弹。

7 月 5 日,星期三

今天威尔逊大夫说,有一个人在最近一两天被送进医院。他受雇于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刚刚干了一天。当天晚上他就被抓了起来,带到太平路,在那儿他被指控偷窃了店里丢失的物品。他们毒打了他,并用一种极残酷的电刑工具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第二天,他们告诉他弄错了,物品又找到了。于是将他送进医院等死,他的神经中枢已被电刑导致永久性的损坏。

7 月 24 日,星期一

今天宋煦伯先生给我讲了发生在文华村的一件事,文华村在南京东南方,距青龙山约 3 英里。在离城区约 5 英里的一个小村,一些农民聚在一起为其中的一位祝贺生日。据说这个聚会被一个卖珠宝的间谍报告给城里的日兵。天黑之前大部分客人都回家了,少数几个留下来一起吃晚饭。这时日兵包围了这个地方,当场杀死了好几个人。其余的人则一个个被提审,问他们是否为游击队。若他们否认,他们就会遭到严刑拷打,直至他们承认。然后所有人(约 30 人)被带到文华村,在那儿(日军)要求新(傀儡)政府的地方官员准备好一个大土坑,那些人就被处决并埋在那儿。有些人被刺刀和剑斩断了躯体,还有的被掩埋时仍是活的。然而,最近在城里散发的传单中,有一页翻译出来是:“日本士兵来这儿是为了让你们能和平地耕种土地。”

8 月 6 日,星期日

艾斯德·斯洛坎给我捎来了我的同事,成都的焦启源(C. Y. Chiao)

博士的短信,他谢谢我托斯洛坎家的人带给他的微缩幻灯片。他特别提到他们非常高兴看到我用包装纸把木箱里的小盒子都包起来了,因为在成都很难找到包装纸。

双塘街教堂王牧师的女儿王恩泽(音译)刚刚从美国回来,她在那儿读了两年的护理硕士课程。她乘坐的加拿大轮船刚刚抵达日本港口时,传闻日本人会搜查乘客的私人所有物,于是她把她两年间在美国写的日记全扔进了水里。后来却并没有被搜索,但这说明了当时情况下人们的心理。

8月9日,星期三

今天威尔逊说他在做外科手术时遇见一桩有趣的事。有一个人患了丝虫病,他为他取走了15磅囊肿。这位病人反应很好,并准备回他在漯河的家带一位患同样病的朋友来接受手术治疗。

我刚刚读完田伯烈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哥朗兹,1938),书中提供了大量材料,有很多内容,人们从日军占领期间仍留在南京的我们朋友的信件读到过,也有更多的内容我们从未读过。贝德士认为这是对于已发生的一切的最佳阐述,我很看重他的意见。288页书中有近一半是权威文件。

1940年3月23日,星期六

今天我去紫金山和灵谷寺,看到山脉南坡那么多风景优美僻静的地方都被毁坏了,心情十分沉重。这是1937年城市被占领之前一场激烈战斗的产物。连花费一百多万元新造的式样美观的宝塔^①外表也被毁坏了,屋顶许多装饰性的肖像也被折断了。我真想去问问心理学家为什么西方人,还有东方人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或写在一些华丽建筑的墙壁和匾额上,又为什么毫无道理地损毁、破坏这些精致的艺术品和建筑物。

[RG20,B8,F179.]

① 灵谷寺。

九、华 群

华群(Minnie Vautrin)1886年9月27日生于伊利诺州司考尔。她在伊利诺大学攻读教育专业,1912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基督会任命她为传教士并派她前往中国,最初几年在安徽庐州一所中学任校长,1916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教育系,由她出任主任。在德本康夫人(Matilda Thurston)校长回国筹款期间,她担任代理校长。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华群再次受命照管校产,并开放校园作为妇女和孩子们的难民营,在高峰时金女大曾收容近一万人,使许多妇女免遭日军强暴。国民政府为表彰她保护难民的业绩,于1938年7月30日授予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一枚。

华群详细记述了日军占领期间的南京实际情况。除若干较长复印的报告和文章外,她还保存526页1937—1941年期间的日记,约占其全部日记的1/4,记载了1937年12月—1938年3月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本书选译了华群写给金女大当局的两个报告。1940年4月14日,华群在日记的末尾写道:“我几乎精疲力竭,不再能够推进与筹划此项工作,因为这里到处存在着某种障碍。我希望马上休假,但是谁能为实验课程考虑?”两周以后,她由于神经衰弱而回到美国。离开南京一年以后,华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 第一个月的评述

(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13日)

说明 多少天来我一直期望能很仔细地做一个书面报告,但这个愿望随每天而来的许多打扰而被迫放弃。每当我抽出一个上午专心写作时,却最终做了其他事情,那些事在当时看起来更重要。但我决心为你们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是一个很不正式的、可能也是一个不连贯的报告。请原谅它缺乏整体性。

华 群

背 景

1937 年 12 月 1 日至 1937 年 12 月 13 日

我们的校长^①虽早在 12 月 1 日就离开了学校,但我认为校长乘坐的轮船直到 12 月 3 日才会驶离下关码头。对她来说,离开学校是很困难的,对我们来说,眼看着她离去是更困难的一件事。但以后形势的发展证明,这是一项明智的抉择。在她离去的 12 天里,我们以最大负荷开展工作,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校长离开之前曾任命了一个有程瑞芳夫人、弗兰西斯·陈和我组成的紧急委员会,这个小小的委员会承担起责任,度过了这些艰难的日子。幸运的是这个委员会很小,因此我们可以迅速决策,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这样做。进餐时间——我们在一张饭桌上吃饭——经常用来开会,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下面,我将向你们讲述在这 12 天里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那段时间南京的形势。

悬挂美国国旗 张贴布告

12 月 1 日这一天我们都忙于选择可悬挂美国国旗的战略要地,裁缝高沃(Gwoh)已为我们做好了許多面国旗,决定在何处张贴南京卫戍司令部和美国大使馆供给的布告。最后,我们在学校四周竖起了 8 根旗杆,在学校大门和远离校中心的建筑物如南山宿舍、洗衣房、中国教员宿舍甚至在西山的小房子都贴上了布告。长达 30 英尺的美国国旗仍用于广场,好让飞机知道这是美国的财产。我和陈先生终于找到了金陵^②过去用的一些指示牌,把他们重新油漆一遍——这些牌子上面写着:“大美金陵学院(Great American Ginling College)。”我们把其中一块放在门

① 指吴贻芳博士,吴是金陵女子大学 1919 年第一届毕业生,1928 年至 1951 年一直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1951 年起历任公立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南京师范学院副院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1985 年病逝。

② 金陵在这里是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英文为 Ginling College,简称 Ginling。以下同。

口,一块放在中大楼的前面。直到日军进城我们才启用这些牌子。

整理楼房 准备难民入住

很多天以来,我们一帮忠诚的工友一直在勤奋工作,把所有家具搬到阁楼或贮藏在一楼的一个或两个房间。这是一桩苦差,但事后证明这个准备是明智的。连同实习学校和宿舍共清理了8座建筑物。实习学校和宿舍从未占用,因为第一次启用的6座建筑物中容纳了大约10 000名难民后,我们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更多的难民。一开始我们的理想很高,因为我们在张贴的布告中写明仔细计划好的一套条例,这将有助于难民的起居健康,我们训练了一些年轻人担任侦察员和招待员,对建筑物做了计划。根据条例,我们在8座建筑物中可容纳2 700名难民。12月8日,我们迎来了第一批难民——他们是从无锡、上海和战争前线的一些地方逃出的人们,还有一些就是居住在南京城里和城外的人,中国军队因为军事目的而强迫他们离开,后来这些人的很多住宅被大火焚烧,我们应再用几天时间来整理这些房子,因为难民大量拥入后,就没有时间搬动家具了,也无法制定一些生活方面的规章。

珍贵物品的掩藏

大学地下室让我们多次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南京被围困时间很长,一定会发生彻底的抢劫,任何士兵都知道,一个像金陵这样的机构一定会有一个地下室。因此,我们决定把地下室清理干净,让地下室和里面保险柜的门都开着。我们藏在里面的许多东西——我将不告诉你们,因为我们想可能还会用这个地方。我们把钱分开,小部分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物品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后来知道,美国使馆官员将要撤离时,这些东西会被送到美舰“帕奈”号(Pannay)。我们的紧急委员会决定将德本康夫人的结婚银戒放进同一只箱子。你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后来得知“帕奈”号沉入江底时,我们是何等的惊讶。俄国潜水员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笑对此事,而当时却笑不出来。关于新泰瑞丝楼(Terrace House Building)的文件,我复制了两份,藏在不同地点。

在做清理准备的日子里,学校焚化炉忙个不停。程夫人花费了两天

时间把可能会引起误解的文件清理出来,还花了几个小时焚烧吴博士做司库时的一些收据,以免引起误解。南京新生活运动组织在今年秋天租借我们隔壁的房子已有几个月,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待做的工作,因为他们撤离得十分匆忙,所有留下的教学材料都需要销毁。住在这座楼的裁缝高沃也在今年秋租给他们一个房间,当他们离开时,他们把一大批盒子放在他的小店。这些东西当时看起来也没什么罪过,但当日军日益逼近城市,裁缝越来越担心会有什么灾难降到他头上,因为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的来源。就在日军进城的前两天,他过来问我是否能去小店检查一下。我答应了,然后叫着费吴生一起去。他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执行干事。我们俩决定全部销毁是比较妥善的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裁缝和他妻子在12月13日的情景。他们俩及所有的亲戚一整天都在把一捆一捆的书籍和小册子搬运到我们的焚化炉。直到深夜,他们才搬完,但他总算逃脱了可能的误解以及怒气冲冲的刺刀。在12月15日晚上,我们把以前考虑到应当销毁的东西——南京妇女为伤兵缝制的衣服放进焚化炉,一直烧到很晚。我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为城市居民在冬天会需要它们——但在那个晚上,这个需要看上去没有比销毁他们的需要更为急迫。

这一时期的南京形势

数周以来,人们一直在撤离南京。先是富有的人家开始撤离,所有的卡车、小汽车都派上了用场,成千上万的人沿江驶向汉口或更远的西部。接着是中产阶级开始撤离,最后是穷苦人。多少天以来,你可以看见人力车满载着箱子、铺盖卷和乘客经过。所有能这么做的人都逃出了南京,穷苦人往往是带着儿女躲到乡下,把老年人留下看家。我们听到的报告说,乡下被破坏得比城里更厉害,如果这是真的话,我经常想逃到乡下的那些人会遭遇怎样的不幸。

这12天一直有连续不断的飞机轰炸,而且当日军飞近南京时没有了警报——飞机来了接着抛下炸弹——有时炸成一片。在城破前的最后几天里,日军对南京的轰炸也是怵目惊心的,城南尤其如此。透过我在实习学校的房间,可以看出在城门处曾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太激烈

了,以至于古老的城墙似乎抵挡不住现代武器的猛攻。也正是在这些天大火开始燃烧——先是城外如军队撤出的村庄由于军事目的而被焚烧,接着便是城墙内外的房屋——又是用于军事目的。我经常怀疑这种整天整夜焚烧村庄房屋来阻止日军进城的方法,与它让人们遭受的痛苦相比是否值得,更不用提人们蒙受的损失了,尤其是对于穷苦百姓。每天晚上,当那些沿城墙一带的房子被焚烧时,天空总映着红色的火光,也正是在这时,我们的第一批难民来了。在城内——12月12日,是个星期天,我确信交通部大楼起火了——他们不想让日军占领这座漂亮的大楼。一些中国士兵进行抢劫,主要是从商铺里抢钱。所有这些灾难都还没有殃及我们平静的小山谷^①,我们继续做着迎接难民的准备工作。

11月23日,吴博士带我出席一个招待会,使我了解每日新闻发布会的组织构成情况,发布会一直持续到12月12日。在北京路中英文化协会(Chinese—British Cultural Association)总部举行的这些会议,自然会有西方的各种新闻机构或报社代表以及警察部门、国防委员会和市长办公室的代表。市长本人也多次出席发布会。我从11月28日晚上开始出席这些有趣的会议,自那以后程夫人和我每次都出席会议。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还可以与我们想见的人会谈。我应提一句,在南京的相当一批传教士都来参加,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来自商业机构和各国使馆。现在让我回顾一下这些发布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在发布声明,不是由军方人员发布,就是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主任和秘书发布。国际委员会各成员不断促使中国军队尽可能快地从安全区撤出所有军事设施,这样,安全区国旗才能升起,宣布安全区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的电报才能发给日本和全世界。

你们会从其他渠道知道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所有计划得以实施,并在以后负责维持南京安全区。安全区的大部分中国人,对委员会成员不论是商人还是传教士都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在令他们倍感紧张、恐怖的几周里,他们得到了安全和保护。而且我发现这些有头脑的中国人对巨大恩惠并非不铭记在心,而是为此深深感激。拉贝先生,一位德国商人,

① 这里是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该校座落在南京陶谷。

任国际委员会主席,他无所畏惧,不知疲倦;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史迈士先生,是金陵大学的一名教授,任委员会秘书。我不能一一介绍委员会的其他所有成员及其杰出的工作,他们自12月早些时候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日军进城的第一个10天(12月13日—23日)

当日军先头部队入城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当时的情景。早在12月10日我们就听说一支小部队行进到老东直门,现在叫光华门。那一带连续几天都有激烈的战斗,有人告诉我们,日军试图入城,但多次被击退,双方损失都很大。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告诉我,军队实际上是在13日早上4时进城的。12日整个晚上,正在撤退的中国士兵经过我们学校门口,一些人乞求要一些平民衣服,另一些人脱下军装丢下武器躲进校园。从这不祥的安静中我们得知已经不妙了。大约在13日下午2时,负责南山教员宿舍的工友跑下山来告诉我,从我们的西山——在我们主体校园外边,可以看见日军。几乎在同时,另一位工友也跑过来说一名士兵发现了家禽实验场,要拿两只鸡。通过手势,我解释这些鸡是非卖品,那个家伙离开了。从校园后面我可以看见相当多的日本士兵来到这里。他们要求住在小茅屋的人为他们杀鸡做菜。那晚,校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睡觉。在我的印象中,我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火炮和机枪屠杀撤退中的中国士兵的声音。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惨死在日军枪口和刺刀下。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身上被浇上汽油焚烧——碳化的尸骨会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些悲剧。这10天里发生的事件正变得日渐模糊,但其中一些在我这一生中都不会从记忆中消失,也不会从那些留在南京度过这一时期的人士的记忆中抹去。我将竭力为你们重现其中一些最为生动的场景。

在这整整10天里,如果不是更多,也至少有10至20股日军每天进入校园;有一些从前面进来,但更多的是打破边门或从后门进来,或是跳墙进来。我们忠诚的工友一见有士兵进来就跑来找我。我的白天都花费在从大门跑到南山,或到后山、家禽实验场,或某一个宿舍。虽然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并不能阻止日军进入,但一个外国人在场还是

能起很大的作用,我把许多士兵从住满难民的宿舍或从南山宿舍请了出去。

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最终决定,我应该用我的力量来救人,而不是抢救财产。这些天日本兵经常抓住我们的工友,说他们是士兵,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能把他们从日军手中解救出来,但苗先生(Miao, 译音)家的管家除外,他是生物系蒋师傅(Djang Szi-fu 音译)的儿子。当他被抓住时我不在那儿,因为那些天我不能离开校园。

我们中任何人都不会忘记12月17日这一天,因为痛苦灼伤了我们的记忆。4时到6时之间,戴籁三夫人(Mary Twinem)过来看望我们,这使我能够护送两组妇女和孩子去金陵大学校园,他们将在那里住下。我们这儿太拥挤,又缺乏人手,以至于当时无法容纳更多的人进来。在我离开的空档,两名士兵骑着自行车闯进校园,怒气冲冲地撕下挂在广场那面大的美国国旗,并想把它拖走。他们发现它很重就扔在科学馆前面的空地上。有人通知了戴籁三夫人,两名士兵一看见她就跑进发电室藏起来,她既兴奋又尴尬地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校园。当我们刚吃完晚饭——我们劝说戴籁三夫人留下过夜,因为天太晚了——中大楼一位工友跑到餐厅,说两位士兵在前门想进来,要我们交出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告诉他们这儿没有士兵,只有妇女和儿童,他们不相信,坚持要进来搜查。我当时还不知道,但后来得知,在这同一时间,其他几队士兵正在其他楼房搜查。他们最终成功地实施了一个很聪明的花招,把负责难民的我们和几乎所有工友都骗到前门,然后他们进到其他地方搜查,我们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他们让我们误认为他们正在搜查中国士兵,但实际上却是在寻找年轻妇女和姑娘。费吴生、史迈士和米尔士出人意料地出现了,米尔士想在校园里度过这晚上,他们出色地结束了日军的鬼把戏,但没有挫败他们。一小会儿之后,他们送走了这3个人,继续去搜查中国士兵。在9时与10时之间,他们从边门带走了12名妇女和姑娘,那位和我们在一起呆在大门的军官带走了陈先生。直到他们走远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们的诡计就是想抓走女孩子。我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陈先生,我确信他一定会被枪毙或刺死。最后的情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不会。戴籁三夫人、程夫人和我站在大门附近,工友们

跪在我们身后,那位军官和几名士兵领着陈先生走去,落叶沙沙作响,在远处,影子经过边门——我们并不知道是谁——那些经过的人低声哭喊着。陈先生在上海路与广州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被释放。第二天早上5时有6个姑娘回来了,没有受到伤害——这两件事我们认为都是祈祷的结果。我认为现在我可以保全这些女孩子,但同时看起来又不太可能。我们一群人一直默默地站着,直到11点钟,因为我们不知道外面的卫兵是否准备向任何走动的人开枪。随后,我们离开到了校园后面。日本士兵几乎窜进了每一幢建筑物,除带走12个人外还进行了抢劫。那天晚上,我守在前门门房,你们可想而知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入睡。当我去门房之前先赶到实习学校时,我发现陈先生和罗小姐在那儿。很快,其他助手也赶来了,他们和程夫人和儿媳及孙子们藏在难民中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实习学校那个房间我们举行的小小祈祷会。从那以后戴籁三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帮助我们承担起责任——尤其是送走士兵。除了那晚上被抓走的12名姑娘外,又有3名妇女在校园被强奸,9名妇女由于外国人的适时出现而免于遭难。我想,相比其他难民营和私人住宅的命运,我们有可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这真是了不起的成绩。

另一件难忘的记忆是12月15日一名军官和大约100名士兵进行的军事检查。他们十分迫切地想找到中国士兵,把校园彻底地搜了遍。一挺机枪架在通向广场的主干道上,要求交出所有藏匿的士兵,他们还想偷偷行动,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校园里的妇女、孩子会发生什么。我们后来被告知,在校园四周的马路上,布满了相当多的机枪和士兵。我们加倍小心,不让任何男人出现在校园,除非我们认识的住在东院的几家,因此,毫不困难通过了这次检查。他们想带走几名头发剪得像士兵的工友倒是真的,但最终,在确认身份之后他们被释放了。负责这次检查的军官留给我们一封信,用他自己的印章封口。这封信作用很大,直到17日晚间被闯进的另一位下级军官撕碎扔到地上,他制造了我上面描述的那场惨剧。这封被毁的信件很快被日本使馆军事参赞的信件代替,这封信对送走建筑物和校园里的士兵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我离开校园,就把这信留给戴籁三夫人,如果她离开,我就拿着。

这10天和接下去的日子里的另一件事是许多民事、军事官员的访

问。前者总是竭其所能帮助我们,有时他们给我们派遣使馆警察,晚上帮助保护我们和成千上万的难民;在这两个不同时期,日本军官也给我们派来护卫队,虽然有时能帮点忙,但他们并不总是安全的护卫队。我们的第一支护卫队由 25 名士兵组成,住在学校助理注册员陈先生的一排房子——他找到了更安全的地方,这儿早就空着了。使馆警察撤走后,我们每天有一组 4 人的护卫队。每天当新的一支护卫队换防时,我和王先生都要前去认识他们,问问负责军官的名字,并竭力向他们交待清楚:他们应站在大马路,负责守卫校园外面,我们负责校园里面。这个办法很有效,只有一个晚上我们有点麻烦。这段时期,日本使馆送给我们 30 张日文布告,我们把它贴在了所有的建筑物和大门。这些布告帮了大忙,但并不能完全阻止士兵进入贴有布告的楼房内。事实上,许多曾去过南山教员宿舍的士兵,都必须经过挂着两面美国国旗、贴着两张美国使馆和三张日本使馆布告的地方才能进到里面去。我们派了一名守夜人和两位以前的警察,换上平民衣服,每晚值班,万一有什么麻烦就报告给我们。

难民登记时期

金陵大学难民登记从 12 月 26 日开始,持续到 27 日。金大校园内所有男女难民在这两天都已登记。我们这里是从 28 日开始的,我们认为只登记住在校园里的女难民,但毕竟不是我们说了算。登记持续了漫长的 9 天,安全区各难民营甚至乡下的所有男女都必须赶来。上万的人四人排成一队,先听日军关于做一个好公民的演讲,然后每人拿一张小纸条,才可以去陈钟芳先生(Chen Chung-fang)的其中一处住所完成最后一步,在那里他们拿到一张盖有印章的登记表,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登记号码。头几天的登记仅限于男人。他们从凌晨 2 时就在汉口路和宁海路排成长队。一整天他们慢慢向校园挪动。由于刚下过雪,你们可以想象这么多脚会带进(校园)多少泥巴。登记一开始是在军官监督下进行的。每次都来两队士兵,每队都要给他们的军官生一个火炉,我们提供两个煤球。最初,我认为对在校园登记男人表示抗议可能会好一些,因为登记男人使我们的前门大开,而出于保护这些妇女的目的,我们

必须特别小心,防止无家可归的男人进来。但登记的第一天表明,我们最好忍受这个过程,因为每当男人从队伍中被指控为士兵而揪出来时,他们的女家眷往往会出来求情,这样许多无辜因此得救。布告中虽然清楚地说明,如果这些男人承认自己曾当过士兵,他们将会被原谅,并可有一份报酬高的工作,但我们怀疑日方是否真能遵守诺言,尤其怀疑中华门外大量未被掩埋的尸骨中就有这些人,那时我们去那里,知道一点情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妇女在注视登记过程中心情是那么急迫,他们在为丈夫和儿子求情时又是那么勇敢。虽然妇女登记自(1月3日)星期一开始,但直到星期三才真正开始,星期五结束。面对士兵粗暴的行为,她们是多么胆战心惊;而当通过甄别拿到登记表时,她们又是多么愤恨。一些妇女被怀疑是妓女——当时,日方正试图在南京为士兵开办一些有执照的妓院^①,但每次当这些妇女被确认身份后就被释放了。妇女登记的最后两天是在中国官员的监督下,既体面又有秩序地进行。所有书写工作都是由中国人担当,所有程序都在我们的广场进行。他们允许我带领我们的工人,包括工作人员和工友参与登记工作,登记很快完成了——令他们恐惧的考验终于过去了。令妇女痛苦的是,她们发现登记表并不能保护她们,男人们也发现登记表并不能使她们免于被抓走。金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登记数目。

金陵成为妇女、儿童的难民营

前面已提过,我们12月8日接纳了第一批难民,他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前线日军战斗的城市无锡、苏州跑到南京的;另一类是中国军队下令必须撤退的家庭。到12月11日(星期六),我们已有850人入住中大楼和一幢宿舍,我们原来估计会有2700人,这个数字太大了。到那时,人们都随身带着食品,我们准备的粥厂还没启用。到12月16日(星期四),这里已住了4000多人,我们感到已拥挤到最大限度了;我们也缺乏人手照看更多的难民,最好是金大能开放宿舍楼接纳我们这里多出来的人。第二天,我带着大约1000人去了金大校园。但我们并没有局限

^① 即以后建立的所谓“慰安所”。

于4 000人,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妇女留在家里将是很危险的,士兵搜寻姑娘时非常野蛮。因此,当她们蜂拥而入时,我们敞开了大门。接下去的几天,形势变得对妇女越来越糟糕,她们从白天就接连不断地拥进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年轻姑娘跑进来时的面孔——她们大部分在门口与父亲或丈夫分别。她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伪装自己——许多人剪掉头发,大部分人把脸弄黑,许多人穿着男人或老妇人的服装。王先生、夏先生、戴籁三夫人和我很多天一直呆在门口,把浪荡汉赶跑,让妇女进来。在高峰期,我们校园容纳了10 000人,科学馆和文科楼的大阁楼,我们已清扫干净,是接纳年轻姑娘最好的地方。楼梯和大厅太拥挤了,以至于不可能穿过去,所有的走廊也挤满了人。人们不要求住在楼里,在外面找个地方能睡就很满足了,如果我们能让她们进来。我们认识到12岁的小姑娘和50、60岁的老妇女同样不能免于被强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父亲或丈夫注视着他们的亲属进入校园时的面孔。很多情况下,他们流着热泪,向我们乞求“只要给她们一个地方,睡在外边就行”。妇女在那些日子里,面临着非常痛苦的两难选择——这意味着她们虽被挽救免于日军强暴,但她们的丈夫儿子却有着被抓走或杀死的危险。即使在这危险时期,我们也竭力劝说老年妇女留在家里,和丈夫儿子住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会遭受强暴,而是让年轻妇女到我们这里来寻求保护。这种可怕的、野兽般的强暴妇女的行为仍在继续着,甚至在安全区也避免不了。两天以前,正当我要出大门时,一位年轻姑娘跑过来找我,请求我去她家看看,她跑过来时有三个士兵在那里,正搜寻女孩子。幸运的是,这些女孩都是跑步健将,而且知道通向校园的捷径。我赶到她家时,士兵已离去,一个姑娘也没找到。

你们也许想知道我们是如何供应这么多人吃饭的。南京沦陷那天,红十字会在我们校园北部开了一个粥厂,每天向我们这个大家庭供应两顿米饭。数周以来,他们把蒸好的米饭送到校园广场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已定好了供餐标准,并竭力教育妇女不要拥挤,按顺序轮流,但这对她们来说是很难学会的一课。最近,供餐改在粥厂,比原来好多了,因为粥厂给妇女和姑娘每日两餐,并能随时让她们吃到热的米饭。如果她们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她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

给她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许多难民营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有一个管理完善而且近在身边的粥厂。关于开水,我们很早就让两个男人把大开水炉搬进校园——他们很乐意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了人身保护——因此,这儿的妇女整天都有开水喝。花费很低,他们都能付得起。对于那些没有铺盖的难民,幸亏我们手头上有一些被子,已分发至最需要它们的人。卫生一直是我们的最大问题,尤其是难民拥入高峰期。我们一度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似乎难以克服,但我们慢慢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因此,校园看起来不像最初几天那样糟糕——尤其是在早晨。即使仅仅有些石灰也会起很大作用。瑞伍博士(Dr. Reeve)如果听说中大楼后边池塘里的鱼有一段时间很难生存,一定会很伤心,因为池塘成了妇女洗马桶的场所。至于洗衣房,每天上午和大部分白天,女人们都在那里洗衣服,尤其是给孩子洗。在白天,每处灌木丛、每棵树和每道篱笆都晒满了衣物,很多人来到这里认不出这曾是校园。

妇女和儿童的聚会

在这些恐怖与破坏的日子里,宗教已成为许多人的现实需要。当你走向前面对一群穷凶极恶之徒,他们闪亮的刺刀沾满了鲜血,这时耶稣就成了伴你左右的朋友。从8月到现在,每个周三和周日晚上,我们为校园和楼房里的工友举行聚会。他们特别喜欢唱《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和《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在难民拥入高峰及难民和男人最危险的时期,我们没能聚会,但很快又开始了。她们现在在南研究室聚会,因为科学馆演讲厅被妇女孩子占用了好多周。也是在8月,我们开始了为教职员而举行的聚会。这些聚会除星期日上午现在已成为每日例行活动。言语难以表达这些聚会对于我们群策群力面对每日艰难问题所发挥的作用。祈祷者多么真诚和富有活力!现在大约有12人参加我们教职员聚会。我们例行的周日下午和周四下午专为妇女的聚会继续进行,由娄小姐主持。这周在中华美国圣公会(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牧师的帮助下,我们已开始了例行的专为妇女的下午聚会。每天下午2时,大约有170名妇女,大部分都很年轻——在南研究室聚会。年龄超过15岁才允许参加,而且不准抱孩子进来。我们按难民所在的建

筑物轮流进行,在前一天晚上分发入场券。我从来没参加过比这更郑重的聚会。在同一个钟点里,我们在科学馆也有一个孩子聚会,现在难民已经搬到其他楼房。主日学校一位老师主持这些聚会。

在圣诞节,虽然我们处于危险时期,不知道每天将会发生什么,但还是举行了一些特别的聚会祈祷——一次是为程夫人和孙子,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会爱,他们使我们保持正常;一次是为帮助我们分担工作的成年人及其亲属;一次是为学校工友;一次是为邻近的妇女,还有一次是为在那些天担任侦察的年轻人。戴籁三夫人把实习学校二楼朝北的一个房间装饰得非常漂亮,一张带十字架的祭坛,一棵闪着彩灯的小圣诞树,一大束挂满了亮晶晶的红浆果的天竹,几大盆圣诞红,红色圣诞卷纸图案。幸运的是我有一块深绿色的窗帘,再在门楣上挂一块厚布,无论是在楼里楼外,谁都不会发现我们。让我们压低声音唱我们喜爱的赞美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从未被打扰过。后来,我们很不情愿地将各种装饰拿走。负责以上各组的教职员精心准备了这些聚会,因此并非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我们还为孩子和年轻人准备了一些点心,尽管这类东西现在根本买不到,全城没开一家商店,我们所有的贮存也已被洗劫,其中很多被烧掉了。

如果没有这一大帮忠诚的助手,我们要做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的。程夫人不仅负责膳食和宿舍管理,她还是这一大群难民的保姆,她给最贫困者分发了被褥,也是应付复杂和困难局势的好顾问;陈先生因为他的小孩子而遭遇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是个妨碍——但他总是愿意尽最大努力来帮助我们;李先生,他是陈先生的助手,也尽其所能来帮忙——从监督米票出售到总管校园卫生。在那些最危险的日子里,年轻人被抓到城外,他也不得不隐身于幕后。王先生,我的汉语家庭教师,几乎成了我的秘书,他和我多次去日本使馆进行艰难的拜访,不时地和派给我们的卫队对话,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些高级官员前来检查或拜访时,他也协助我们。现在,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他忙于整理妇女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其丈夫儿子失踪情况的资料。到今天,我们已整理了这些纸条中的 592 张。你们会很有趣地看到,有 432 个男人在 12 月 16 日这天被抓走。我们不知道递交这些请求能否管用,但我们只能为这些痛

苦妇女做我们所能做的事。王小姐，神学院惟一留在南京的女学生，在许多方面帮了我们大忙。她负责调查那些申请米饭免费的难民的情况。薛小姐，家庭手工学校的教师，在日本人人城前几天刚刚关闭这所小学校，自那以后，她也帮我们做调查、组织聚会。娄小姐，一位福音工作者，过去住在校园西部，现在住在这里，全部身心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她对街坊妇女很了解，这对我们很有帮助。戴籁三夫人，我上面曾提到过，她从12月17日过来后一直忙着。我们中总有一人留在校园里拿着封福田先生的信件。在晚上如果我们必须去前门，她总是跟我在一起。她和刚才提到的三位女士和我一起住在实习学校，小起居室里有一个火炉可以取暖，是一个放松自己、很安静的地方。布兰奇·吴住在科学馆，直到难民喧闹声很大时才搬下来和我们一起住。她除了忙她的家禽项目外，如果可能也帮助我们做一些难民工作。住在前门的夏先生很善于和士兵讲话，经常护送周围的一些人。刁先生，埃瓦·斯巴色的汉语老师，他与一大家人住在东院，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帮忙，他都很乐意去做。陈先生住在东院，当需要时就帮助我们写东西，但有一名士兵对他多加注意。这些是职员或是工人。还有一些佣人，在危险时期工作都很努力——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还能干什么。他们愿意承担额外的工作——并且，不住在校内的人很难体会他们工作的繁重和艰辛。我们想多付他们一个月的薪水，当这场悲剧结束时——如果它能结束。另外，我们不得不多用一些佣人，每个宿舍都有两名——他们中许多人都愿意为难民服务，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很安全，但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些小费。也许我应提到董老板，他是名木匠，也是住在这里的难民，无论何时我们需要他，他都很爽快地跑来帮忙。

教职员在能容400人的餐厅一起就餐，这也是坚强信心的源泉——我的意思是指那些在这儿没有家的。我们的食品供应陷入困境。在城陷之前，我们没能多储存一些食品，因为担心抢劫，现在真希望当时多存一点。很多天以前，一天至少两顿饭中含有两种豆子和一种蔬菜。我们一直没挨饿，我很高兴我们还能对所有工作人员在饮食上添加一些营养食品。家禽实验场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鹅和鸡，这使我们的菜谱更丰盛一些。我们把袁博士的山羊杀了，林查理先生给了我们另外三只山

羊。实习学校的一个池塘为我们提供了鱼,全体教职员吃了一次鱼,这真是一件愉快的事。

学校和私人财产所受损失

在中国士兵撤离之前,他们没有打劫,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老百姓抢劫。日本士兵窜至南山宿舍有 10 至 20 次之多,藏在大餐厅的 4 箱女人内衣让他们找到了很大乐趣。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们在抢劫,然后再把他们请出去。生物系的吴博士、陈博士,心理学系的张博士,图书管理员爱丽丝·莫瑞丝(Alice Morris),他们的住宅不幸被抢劫,但我认为损失并不大,因为他们已把最好的东西打包随身带走了。虽然他们多次到这幢楼的三楼,但他们并没有发现阁楼的门,这里用衣橱遮住了。我们希望他们别去碰藏在那里的东西。苗先生和陈尔昌先生的房子被抢劫,我还没有办法知道损失有多大。这些房子现在都被难民占着。程夫人丢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她心爱的一支钢笔,其他人也丢了一些钢笔和手套。李先生在去校园的路上被劫去了 55 元钱,陈先生和董夫人的皮箱被搜查,拿走了一些东西。这基本是所有个人损失的情况——比起南京城许多人的损失可说是微不足道的。大学财产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日本士兵的劫掠,包括毁坏的门窗。我们最大的损失是难民占用房舍而导致的。一万人挤在六幢楼上不可能不损坏房子。墙要重新粉刷,门窗要重新上漆,纱窗、纱门要更换,锁和插销也要更换或修理。树、灌木丛和草坪全都被破坏,主要是因为每天在上面晾晒衣服。我们的外国朋友进到校园,和从前整洁的校园一比较,他们总是大笑。但是,带小孩子的妈妈不得不常洗衣服。我们也不想禁止他们。幸运的是,在中国这块地方,大自然很快就会治愈创伤,几年之后,我们不会想念那些被践踏折坏的灌木,虽然我仍会感到伤心,因为精心培养这些树木花费了十多年。在校园进行的九天登记时期内,我们也有一些损失。一些椅子开裂,桌子受损,灌木被踩平。

魏子夫,我们学校的小信使,12 月 14 日被抓走后,直到 28 日才回来。他是在去金大医院给一位医生送信的路上被抓的,他的自行车也同时被抢。当时,他胳膊上戴着美国大使馆送给我们工人的袖章。我们很

高兴他能安全归来。生物系佣人总管蒋先生的儿子是12月16日被抓走的,但他再也没回来,虽然我们多次向军方请求放人。他当时也带着袖章,而且他的房间外面还张贴着美国使馆布告,插着美国国旗,标志很明显。这位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和其他四个孩子在无锡近郊的下落,再加上这件事,他心都碎了。我担心这个年轻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那时许多男人都被杀死,尤其是年轻人。

当然,回首过去一个月的工作,我们有很多要表示感激的。我们没有在南京开学真是一件幸事。在这些日子里,我曾多次说过,我真高兴学校里没有学生,吴博士也被劝说离开这里。我也很高兴,在这个大城市处于危险和恐怖的日子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能为妇女儿童提供一块安身之地。未来会怎样,我们无从知道,但我很有信心,如果我们寻求上帝对学院的意愿,它就一定会引导我们在通向天国途中开辟广阔的用武之地。

[这是华群女士写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立者董事会(设在纽约)、吴贻芳校长、德本康夫人(Mrs. Thurston)和学校同事的报告。报告上注明“秘密,不得出版”。此件到纽约时间为1938年3月9日。RG11,B145,F2876。]

2. 作为难民营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8年1月14日—3月31日)

一、城市及乡村形势

南京自治委员会于1938年1月1日在鼓楼正式成立,五色旗在日本国旗的旁边再次升起,又一个政府成立了。新政府计划在3月15日组成,但到28日才最终完成。据报道,唐绍仪是新政府首脑,但他未出席就职典礼。新政府与北平已建立的政府之间有何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一些人说它是超越北平政府的,将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其他人则说这两家是各自独立的。麦可琳博士(Dr. Macklin)和包文博士(Dr. Bowen)

也许认识的新政府成员比我们多,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属于上一辈的人,而且是一些在新中国不太活跃的男人。

国际安全区的名称前一段时间正式废除^①,原来的委员会改成国际救济委员会,各成员工作异常繁忙。委员会雇佣了大批中国职员,把救济物品分发到最需要的家庭中。一些成员鼓励农民和菜农回家收割庄稼,这样可以避免以后的饥荒。即使最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农妇对此也很理解,如果委员会能资助一点,她们就会满怀信心立刻返乡。3月17日,星期四,在学校总部一些人发表热情讲演之后举行了一个很简单的招待会,挂了一些横幅欢迎委员会成员光临。宋煦伯牧师接任拉贝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②。拉贝先生大约在2月24日离开南京^③。所有人都不愿意他离去,因为在自11月份以来的艰难时期里,他犹如菩萨再世,深受他的中西方同事所热爱。25个难民营逐渐减少到4个,在这些难民营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感到仍没有可能回家,还有一些是无家可归者。牛奶和鱼肝油定期发放到这些难民营,我们正努力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难民提供铺盖。

我们不再感到被蒙在鼓里。你们记得,在三位美国使馆人员返回以后我们才与外界取得首次联系。他们的到来使我们有可能给家人、组织拍发电报,还可以通过炮舰收发信件。不久,英国和德国使馆人员也返回了。在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与上海的联系可以通过火车、汽车和商船,据说现在这儿约有600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但除了柏睿德博士获准来南京居住并从事商业和传教工作外,没有其他美国人,原因是这里还不是很安全。我们已做了很大努力来争取军方准许医

①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1938年2月18日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以符合其民间救济工作的性质。

② 这是华群记错了,应是米尔士接替拉贝任委员会主席。宋煦伯任委员会行政主任(总干事)。

③ 拉贝先生因要与上海西门子洋行经理商谈该行在南京下属办事处详尽事宜,于1938年2月6日向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往返上海的申请。后得到日本大使馆的批准,于2月23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南京。详见《拉贝日记》1938年2月6日、10日和23、24日。

护人员返回,但到目前为止,效果不大。在最近几天里,盖尔先生获准从芜湖返回。这儿急需原来的教牧人员和各差会领导人,通过反复要求,他们有希望能获准返回。邮局原定于3月25日正式开业,但过了好几天才开始运营。现在南京有七家分局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第一封信是在3月26日,发信日期是2月28日。报纸开始通过火车运送——如果我记忆不错,我们从11月12日就再没有定期收到报纸。2月21日,我第一次乘坐黄包车,这是自12月12日以来我在街上看到的第四辆黄包车。城里还有几辆马车,但都被拆坏了。卡车和小汽车难得一见,除军方外,大使馆和国际救济委员会是仅有的拥有者。两天后我看见以前的一辆公共汽车。我们不知道其他那些车都到哪里去了。戴籁三夫人对她能找回她那辆小奥斯汀车(Austin)仍抱有希望,但我认为希望太渺小了。最近,一些人看见一辆喷成米黄颜色的奥斯汀车,怀疑这就是她的那辆车。

警察治安工作逐渐加强,但仍不足以阻止这个城市的违法案件发生。军队劫掠仍在持续,但形式多少不同于以前。贫苦百姓仍旧被剥夺了铺盖和钱财,甚至连几个铜板也不能逃过,从前小康人家的房子在安全区内是很安全的,现在,地毯、收音机和家具都被劫走。从12月17日至1月17日,我们看不见房屋成片燃烧的情景——1月17日我看见了最后一次大火。现在最令人苦恼的是老百姓的持续抢劫。因为南京还没有恢复法律和秩序,穷苦人和非法歹徒很自由地窜至任何人的家中,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在安全区以外,许多房子已被抢得干干净净,甚至连门窗地板也不剩。在最近几天里,我曾看见有很好的门窗在出售,这意味着破坏仍在进行。很自然,我们的中国朋友对此很伤心,但也毫无办法。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上海路起了一些变化。它很快成为一个繁忙的市场,路两侧建了数十家小商店。不光有卖各种劫掠品的商店,还有茶馆和餐馆。我记得曾经过一家叫“怡人”(The Happy People)的茶馆。这条街变得如此繁华和拥挤,以至于人们在经过时很难穿过。后来军方下了命令,这些店铺必须立即关闭,否则就强行拆掉。很快,这条繁华一时的街道又恢复了原貌。这一变化也延伸到我们的邻居。我多么希望能把这些快速发展的变化拍成照片送给你们。在这些

自由抢劫的日子里,我们很希望能去朋友家里为他们抢救部分财产,但即使我们有时间、有力气,也没有卡车和汽车来运送。

在南京法纪无存的这个时期,我们的校园却相当平静。无论何时都未曾有人来抢或偷。士兵警卫1月14日离去后再没回来。很多天我们一直担心会出现什么事,但幸亏没有发生无法制止的事情。有三次士兵恶作剧地窜进来,但被劝说后离开。我的日程表显示,日军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共有17伙人来过学校。他们中大多数是来察看校园和难民营的。我们通常先带他们去看一座难民占用的楼房,然后带到行政图书大楼结束他们的访问,这座楼现在看起来很正常,已开放用来接待视察者。他们看到这座楼总是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能向他们展示一座很整洁的楼房。

2月4日是当局规定的所有难民都必须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的日子。这则告示由自治政府发布并在全城广泛张贴。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年轻妇女对此大为吃惊,在2月4日前一周,我无法离开校园,一大群人围着问我,我们是否会在这天送他们回家。我们的答复不变,这不是我们的命令,我们的难民营一直开放到她们感到在家里很安全为止。一天,米尔士先生来访,他的汽车被跪在地上哭泣的年轻妇女围住,最后他不得不下车步行回家,他的司机开着车子,米尔士让他在后面跟着。几周之后,这些年轻妇女仍未摆脱恐惧与焦虑,我们在实习学校为拉贝先生举行告别茶会的时候,她们中一些人听说他要来,并得知他要回家的打算,便请求程夫人为她们安排在拉贝先生坐进汽车之前与他会面。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底会发生什么。成百上千的妇女在科学馆前围住拉贝先生,请求他不要离开南京,留下来负责国际委员会。只有不多的人听到他的保证,人越聚越多。戴籁三夫人将他从后路带出,我也奋力挣脱这群哭喊的妇女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样我们还可以把罗森博士和瑞彻先生(Mr. Ritchie)救出来,他们也是这次茶会的客人。一个多小时后,局势恢复正常,这三个人不得不步行回家,他们的汽车跟在后面——很后面。2月4日这天,(军方)没有使用暴力驱赶安全区和难民营的人们,充满紧张和恐怖的一天平静地过去了。

1月31日,星期一,是中国旧历新年。即使长达数周的恐怖和悲伤

也不能阻止人们搞一些庆祝和宴会。一些人大着胆子燃放鞭炮，鞭炮的巨响开始使我们有些担心，“又有一位平民被杀死了”，从那时到现在不过数周。那天下午，我和花匠老邵出去寻一些腊梅。我们想去古林（Guling）寺西边的小农舍，去年在那里曾买到很可爱的腊梅，但当我们到了寺东边的街道时，发现那边的山丘和山谷是真正的“无人区”，不敢再去那儿。我们已经碰到了5具未掩埋的尸体，知道在寺那边会有更多。我还知道在小山谷到两个池塘边的寺南，有143具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尸体——他们在这儿被烧死、枪毙已有月余。我们匆忙赶回家，没有了欣赏腊梅的快乐。

我们都还不习惯庆祝新年的老式祝辞，不知为什么，今年我们没听到那些令人愉快的问候。第二天晚上，程夫人准备了满满一篮子饭菜，这只精美的篮子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从上海送给我们的。又一次吃上猪肉和其他可口的菜，真香啊！我很高兴，可以不吃每顿都是豆子做的菜了，即使只有一顿。

2月4日，我第一次去城南看看。麦卡伦先生和福斯特先生带我去看教会财产，然后去圣公会驻地看看。这座城市仍毫无生气，因为我们看见在许多大街上仍有成群结队的士兵。这样的破坏在我们这座城市处处可见！我说不出准确数字，但在我看，那些好的商店几乎有80%都被劫掠和焚烧。多数小商店还在，但所有的货物都被洗劫一空。在我们的财产中，有两座学校建筑被焚烧，在圣公会驻地，牧师住宅被毁。我们碰上几辆装载掠夺品的卡车，很显然是从城北过来的，因为在我们刚才经过的这片地方已没东西可供掠夺。就在两天以前我再次经过这里时，情景有些不同。这里恢复了生机，年纪大一些的居民已经返回，其中一些人正在大商店的废墟旁重建一些小店铺。上海路在1月和2月所发生的变化已转移到莫愁路（Street of No Sorrows），但没有建造那么多的临时商店——东西都摆在桌子上和马路边。人们耐心地开始了重建。掠夺品仍在买卖——这是人们谋生的唯一手段，因为我知道至目前为止，这座城市没有任何生产。

乡下的局势不像城里这么平静。1月份后期，乡下妇女乔装打扮，开始偷偷跑进城里。要经过城门站岗的士兵是一场生死考验。年纪大一些

的妇女先进城,她们听说有难民营,就先进来看看是不是真有。她们乞求我们接受她们的女儿、儿媳,如果她们能进城的话,说她们数周以来一直小心翼翼地藏在密封的地洞里,或是家中的双层墙壁中间,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也并不总是安全。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已从乡下接受了五百多人进入难民营,金陵大学也接受了同样数目。不仅士兵,盗匪也祸害难民,尤其是在他们进城时,他们往往被劫走了所有的东西——先是钱,然后是铺盖,甚至是身上的部分衣物。去年秋天撤到乡下的我们的中国朋友现在都回来了。男人先进城以确认他们能进来,并在当地政府登记,然后回去带他们全家来。在最近两周里,李汉德先生(Handel Lee,音译)和邵德星先生(Shao Deh-hsing,音译)及其他人已经回来。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充满了紧张和焦虑,我们知道其中大部分是为他们的女家眷而担心。

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形势

我们的难民营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IRC)选中的可继续存在的四个难民营之一。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我们成立了四个组即:商务、监督、教育和卫生。由于委员会给我们一笔少的津贴,可用于为每1000名难民雇佣两名助手、四名佣人,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增加工作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我们“邀请”的一些难民,如王小姐(Miss Rachel Wang)、王先生和邓先生,以及正式职员的私人教师、助理注册员陈先生和住在东院的一位邻居闻先生。文科楼从前的会客室现在成了我们的新办公室,从早到晚一直很忙碌。程夫人也邀请三位女性难民帮她分发牛奶和鱼肝油。统计最新的难民异动情况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在2月的第一周,我们对所有难民进行了正式统计,给每家主人发了一块白布做的标签,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家庭人数。这些标签是我们的工人用特殊颜色的线缝制的,因此,当他们想离开时不会把这些标签送给别人。据那次统计,我们有3200名难民。到3月中旬,我们的新职员认为有必要再做一次全面的统计。他们准备了淡紫色的布标签,发给除了还抱在怀里的孩子以外的所有难民。根据这次统计,我们有3310名难民。商务组长陈先生正和他的职员一起着手解决免费大米发放的难题。很自然,许多有支付能力的难民也想得到免费大米,因此,区分这部分人和那些

确实分文没有的难民就成了最困难的一项任务。享受免费的那群人一开始发个红标签；一个月后重新审核，发给黄标签，现正在制定第三套系统，下周将启用。如果人们总是很诚实，我们的工作将大为减轻，顺便说一句，脾气也许会好一些。

与难民一起生活三个月后，我们决定必须想出一套办法，能让她们洗浴。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想法，但弄不到煤。我们制定了计划并报给国际救济委员会，他们答应供给煤炭和雇佣一名司炉和照料每间浴室的两名妇女的资金。在这两周，在程夫人的督促下，已有两间浴室投入使用，每天可供 168 位妇女孩子洗浴。费用为成年人四个铜板，婴儿和孩子两个铜板，穷得连这点钱也拿不出的难民只好免费。这点优待除了给妇女以快乐外，还使这五个人有了生计。

我们难民营还得到了一笔资金用于现金救济，另一笔用于个人贷款。那些很贫穷的妇女，有的房屋已被烧毁，丈夫被抓走，这样的人准备回家时可得到一笔现金。这样做可帮助她们重新开始生活，并得到了所有接受资助的难民的赞赏。贷款主要给那些丈夫在国内其他地方并能挣钱的妇女。许多这样的妇女被留在南京，进退两难，而且没有办法从丈夫那里得到钱款。

程夫人是难民营卫生组组长，给婴儿孩子发牛奶、鱼肝油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营养不良的孩子每天都可得到这种额外的食品，小组的 3 名助手除分发牛奶外，还负责调配牛奶，这两种食品是由国际救济委员会供给的。戴籁三夫人和程夫人也负责其他难民营的发放，许多上午，她们去视察其他难民营，组织发放工作。在卫生组，我们还有 3 个注射疫苗的诊所，教会医院（即鼓楼医院）的柏睿德博士为将近 2 000 人注射了疫苗。在这漫长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在我们校园有 30 人死亡，又有 40 人出生。粪便的处理仍是我们最大的难题之一。但我们正逐步解决。所幸的是我们有一个大校园，有很多空地可挖壕沟用于处理粪便。戴先生一直在学校敲钟，每天上午 8 时、下午 5 时准时敲钟，这是妇女清洗马桶的时间。

三、宗教教育计划

从 1 月 17 日至 2 月 26 日的六周里，我们的宗教工作限于每天两次

聚会,一次是为成年人,一次是为孩子。我在前一封信中已报告过,圣公会的五位牧师每周除周六外每天下午都来布道,非常热情、真诚。妇女还由此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歌曲。2月27日我们开始了另一项计划,这次是“主的生活”(The Life of Christ),将在复活节早晨的礼拜、下午或晚上的游行以及复活节前一周的特别礼拜中达到高潮。王小姐是教育组的组长,她根据所有人接受教育的能力,组织了23个班,以一种或其他方式来学习“主的生活”。你们可能会对此很感兴趣,因此我在下面讲一些细节:

两个具有初中、高中能力的班级。

两个具有小学六年级能力的班级。

两个具有小学五年组能力的班级。

四个具有小学三年级能力的班级。

六个曾在私立小学念过几年书的班级。再按年龄分班,一些是孩子,一些是成人。

三个从来没上学的班级。他们正在上福音启蒙书。

两个18至19岁的文盲班。

两个12至17岁的文盲班。

最后两个班每周上五次课,由王先生和刁先生授课。我们的注册人数超过1000人,每周参加者约在700至800之间。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力求正常上课,但如果孩子病了就不得不缺课,一天中她们还经常回家或为其他事耽搁。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两个班,所有班级都每周上3次课。除了“主的生活”课程外,她们还学习《诗篇》、赞美诗和圣经其他章节。王小姐已选了《诗篇》第23节、121节、《八福》、主祷文。她们很爱唱《耶稣是怎样一个朋友》和《我灵魂中的耶稣》。刚才她们正在学唱复活节赞美诗,一首是在这周“复活日”唱的。教员们想和学生们一起分享赞美诗和经文,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这是最好的安慰。所有这些教员,除了薛小姐和我,薛小姐是主日学校的老师,其余都是难民,其中一些是邀请过来的,她们知道当一名难民意味着什么。我们下午的祈祷礼拜仍在继续,但现在改在大礼拜堂进行。参加者从150人到400人不等,礼拜天人数最多。这些聚会的主题是由圣公会的五位牧师精心挑选的,而且

都是以“主的生活”为中心。你们真该听听 300 名妇女难民唱《耶稣是怎样一个朋友》。她们喜欢这首歌,喜欢唱它。我们轮流领唱并参加聚会,以免负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缺乏教室,你们知道,文科楼的每间教室都被难民占用着。我们已将北工作室改为一间很好的教室。去年秋天,中央大学西迁时存放在这里的希腊塑像用窗帘很得体地遮掩住。大礼堂的舞台也改成了教室,而且是一间非常好的教室,能放上 40 把椅子。另一个班在化学实验室,这儿从没住过难民,很多课都是在科学馆报告厅上的。复活节后我们会有一周的假期,然后再开始工作。那时,我们希望能增加不同类型的班级,如家禽饲养;个人、家庭、社区卫生;育儿,也许还有日语班。我们还希望教授工艺课程,但这需要更多的职员,而现在没这么多人。昨天,我们几个人冒险去了城南,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织布机和袜子编织机。令人失望的是,所有这些都被劫掠一空。但我们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四、另一项计划

在 1 月份早些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许多妇女难民——尤其是做妻子和母亲的——特别悲伤,因为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在 12 月 13 日日本人进城后不久就被抓走,再也没回来。她们中许多人带着小孩,以及一位或两位老人,她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除了乞求无事可做,即使这样,现在也无济于事,大家都跟难民一样穷。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来问我们:她们能做点什么才能争取这些男人回来——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确认的这些男人全是平民。最后,我们去了日本大使馆,和其中一位比较关心此事的官员交谈,他建议我们给他一份事实报告,看看能否给军方做一些工作。从 1 月 24 日至 2 月 8 日,我们得到 738 个案例报告。这些报告不仅送给了那天第一次会见我们的官员,还送给了从上海赶来的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据我们所知,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们没听说有什么人回来了。同时,我们听到一些传闻,说一大群男性公民被关押在中央大学附近的模范监狱中。(有人)去了那儿一趟,证实了传闻不假。我们不能确定准确人数,但我们知道这些男人确实在那里,而且条件相当恶劣。很快,有些年纪大的妇女到我们校园,说她们到过监狱跟前,看见每

天早晨这些男人被带上卡车去劳动。很多妇女告诉我们,她们看见过丈夫或儿子,一些人还被允许同她们说话。她们再次请求我们帮忙,释放这些男人。当地政府行政部门的中国人建议我们不仅要把请求书送给当地政府首脑,还要送给日本军方。从3月18日至22日,1 245名妇女在这份请求书上签名——她们中大部分人非常贫穷,没上过学,只能在她们名字下面按个手印。我从没见过这样一群可怜的人。她们大都很穷——农民、菜农、苦力、小商人;大部分人都失去了惟一的生活来源。一位妇女失去了四个儿子;另一位家中被抓走了五口人;还有一位失去了三个儿子。有相当多的年轻妇女带着三四个小孩,她们没办法喂饱这些孩子。看来这份请求书起了些作用,现在这些妇女被要求提供更多的细节,如被抓走的时间、职业等。今晚,王先生正在宿舍里起草一个通知,明天将有六人着手此项工作。这需要三到五天时间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些妇女要从很远的乡下过来。这类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得很快,穷苦的妇女不顾路途遥远,也要赶来,即使是仅有一线希望。这一地区的人们要恢复正常生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妇女失去了生活来源,丈夫再也不会回来。我希望金陵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许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损失

自送给你们上一次报告后,我们开始有时间收集关于学院与教工损失的事实。由中国士兵劫掠造成的财产损失为零;由日本士兵劫掠造成的损失不超过300元。大约有14位教员和2位佣人由于日本士兵抢劫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估计在1 200元左右。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损失是由教学楼用作为难民营造成的,10 000名妇女孩子挤在这里,即使时间很短,也会对门窗和地板造成磨损。根据我们的观察,最乐观的估计,损失也在7 000~8 000元之间。但如果难民还将继续在这儿住下去,损失可能要比这高出很多。我觉得我们能募集到修缮所需要的资金,但即使募集不到,用这破损的土墙面对未来,也比不为这些奔向我们的妇女孩子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要好。对于她们,我们不会关上我们的大门。

让这封信带去我们对你们的亲切问候。你们不必为我们缺少食物

或社交生活而难过。我们能得到食物,需要保持身体健康。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中一些人甚至参加过两次宴会,一次在日本大使馆,一次在汇文女中(Hwei Wen Girl's School)。明天,程夫人、戴籁三夫人、布兰奇·吴和我将请一帮中国朋友到南山宿舍,吃一顿简单的中餐。今天下午我们收拾叠好了散落在起居室内的衣服——自从抢劫开始就再没时间来收拾。我们将不去动用大餐厅,让它继续为我们的朋友取笑娱乐。南京现在的形势是这样: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离开校园,而不觉得在我们离开时,这3300位难民就会很危险。这周我把自行车从阁楼上取下来,上了油,我有事去南门时就骑着它。我和戴籁三夫人正打算骑车去国家公园,那儿的花引诱着我们,难以抗拒。一些职员曾病过,但现在全好了。吴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在医院住了三周。她回来那天,戴籁三夫人又不得不住进去,患的是同一种病,她也住了三周。程夫人患了几次重感冒,医生让她在卧房休息一段时间。我有几天不太舒服,除此之外都很好。

我们的园林工浦师傅(Puh)忙着做他的工作,校园看起来整洁多了。实习学校校园现在是它最可爱的时候,对我们住在那里的一些人来说有着享不尽的乐趣。住在东院的小孩和程夫人的外孙正在实习学校的学生花圃里照料花木,他们满脸的快乐。每天,他们花费很多时间给花木浇水。如果这场可怕的战争和破坏停下来,如果破碎的家庭重新团聚,如果国家按照已经勇于开始的重建计划继续前进,那么生活将多么美好!每天上午,数十架轰炸机经过我们头顶飞向西北,这使我们意识到战争还远没有结束,破坏、恐怖和痛苦仍在继续。

朋友的来信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视已收到的信件。如果你们写信,请寄到我们在上海的办事处:圆明园路133号,512A房间,我会按时收到。我担心这篇报告会被当成私人信件的替代品。

[原件标有“非正式报告,秘密,不得出版或广播”。此件到
纽约时间为1938年5月2日。RG11,B145,F2876。]

十、威尔逊

威尔逊(Robert O. Wilson)1906年10月5日生于南京,是美以美会传教士威廉·威尔逊(William F. Wilson)和玛丽·萝内(Mary Rowley)的儿子。威尔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9年在哈佛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35年获准在金陵大学医院工作,1936年到职。南京沦陷前大多数中国医生都离开南京,威尔逊则在整个日本占领时期坚持在该院工作。威尔逊的日记体家信已收入本书,家信叙述了威尔逊在同事特里默(C. S. Trimmer)和少数护士(其中一位是67岁的美国人爱娃·海因兹)协助下所从事的难以置信的繁重医务工作。直到1938年4月,无锡圣安德烈医院的李医生和另外一位医生及两位护士来到(金陵)大学医院,才使威尔逊和他的部属稍得轻松。1938年6月初,威尔逊得以离开南京到上海休假。

1. 书信(日记)选译

(1937年12月15日—1938年1月9日)

1937年12月15日,星期三

亲爱的家人:

请你们原谅我上封信件末尾的草草结束。今天中午我回家时,知道史密斯(Smith)和斯蒂尔(Steele)将搭乘一艘日本驱逐舰到上海。我赶紧跑上楼,把这些日记塞进信封,趁他们发动车子的工夫我写好了地址。第35页是副本,因为我找不到原件。我甚至都来不及署名。

看见你们报纸的头条新闻将很有趣。今天我们得到确凿消息,美舰“帕奈”号被日军炸沉,我们原本会在这艘舰上。毫无疑问,你会知道比我们更多的消息。我们听到的消息说,一位意大利报社记者和一位“索可尼”号(Socony)船长被炸死,许多人受伤,包括帕克斯顿。美舰“瓦胡”号(Oahu)把他们直接送往上海,因此我们谁也没见到。

医院日渐忙碌。到目前为止,医院将达到其正常容量。今天约有30人入院而没人出院。我们不能送走任何病人,因为他们已无处可去。

150 例病人中只有 10 例属于内科和产科,其余都是外科。我们的中国医生没有一个能护理病人^①,除非在我们的仔细指导下,因此,我只好拼命干。昨天我写道我已做了 11 例手术。今天我做了 10 例,并查看了病房。我起得很早,在回家早餐前先查看了一个病房。早餐后,整个上午我都在查看其他病房,午餐后开始做手术。

第一例病人是个警察,炸弹炸伤了他的上臂,桡骨粉碎并撕开了四分之三的肌肉。他已被止血七个小时,但任何止血的努力都将完全中止手的血液循环,因此除了截肢别无他法。第二例病人是一个穷苦人,一大块弹片穿入颈部,并挣裂了一部分下颚。我把几颗嵌进开裂下颚的牙齿连同弹片一起取了出来。后来又来了几例病人,特里默帮助做了 X 光检查。有一个人在腮腺处中了一块弹片,严重伤害面部神经。另一个肋部留有一颗子弹,它穿过腹上部直接穿入胃。他吐了很多血,后来感觉好些。他的情况还相当不错,我认为根本没必要剖腹。我毫不费劲就把子弹取了出来。另一人在四天前被炸掉一只脚,他已严重感染,我把他小腿截去了。还有一位理发师被日本士兵用军刀砍伤,军刀砍在颈后,切断了所有肌肉直至棘间韧带。他已休克,可能会死。他是店内八个人中惟一的幸存者,其余的人都被杀死了。

对平民的大屠杀是惊人的,我所能继续记下来的病人告诉我的强奸和屠杀案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两个被刺伤的病人是七位街道清洁工的幸存者,日本兵来到时,他们正坐在总站里,没有警告也没有理由就杀死了五人,两人受伤来到医院,我不知道此类情况何时才能终止,而我们能得以喘息。

12 月 18 日,星期六

两个夜晚之前,我就在这个地方写了一页信,当我打算把它与其余的信件放在一起时,却找不着了。但愿日本人没发现它。今天是当代但丁炼狱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秽的大字写成的。大批人被屠杀,成千上万妇女被强奸。看来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些野兽们的残暴、淫欲和

^① 因为这些中国医生都是内科医生。

野蛮。开始我对日本兵笑脸相迎,免得惹起他们的愤怒,但微笑渐渐就不起作用了,我的目光也像他们一样变得冷漠和怀疑。

晚饭后我返回住所时发现三个士兵已经仔细搜查过这个地方。海因兹小姐陪着他们去后门。有两个家伙到了那儿,另一个却不见了。他一定是藏在附近哪个地方。我给外面的其他人打手势,明确告诉他们这是美国医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那两个家伙允许把他们领出去。他们抢走海因兹小姐和其他人的手表,还抢走了一些钢笔。

让我讲述在前两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昨夜,大学(指金陵大学)的一位中国教员的住宅被捣毁,他的两位亲属被强奸。一所难民营里的两位大约16岁的女孩被强奸致死。在金大附中有8000难民,昨晚日本兵翻墙进去10次,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足。他们用刺刀捅死了一个小男孩。上午,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为另一个八岁男孩做了缝补手术,他被刺了五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腹膜流了出来。我想他能存活。

我快步走出去,因为发现了第三个日本兵。他正在护士宿舍的四楼,那里住着15位护士。她们一生中的这一刻给她们留下了永远的创伤。我不知道在我赶去之前他已侮辱了多少姑娘,但在我来到之后,他就没有再做什么事。他拿了一只或两只手表,还想带走姑娘们的照相机。我让他把照相机还给姑娘,让我惊奇的是他居然还了。然后我陪他去前门,并和他“深情地”告别。不幸的是他对我的注视并不领情。先前来的一名士兵耍弄着他那只令人恐惧的手枪,我很感激他没开火。

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3处子弹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惟一的幸存者,80人中包括一个11岁的男孩。他们被从所谓“安全区”的二幢房屋带到西藏路西边的山坡上,在那里被屠杀了。日本兵离开后他苏醒过来,发现周围79人全死了。他的3处子弹伤得不太严重。说句公道话,在这80人中只有几个是前军人。

这儿有个女孩子,我认为是个因出生而致伤的弱智人。她除了用手去抓抢她仅有的被子的日本兵以外,没有任何理智,但得到的是被军刀砍掉了颈部一边一半的肌肉。

另一个17岁的姑娘,颈部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长的伤口,她是她家

中惟一的幸存者,其他人都被杀死了。她是南京和记有限公司的雇员。

我查看完我所照料的 150 名病人后,离开医院回去吃晚饭,一轮圆月从紫金山上徐徐升起,夜色非常美丽,简直无法形容。但这时月光下的南京城却是太平天国以来最荒凉的时期。城市的十分之九被中国人抛弃,街上游荡的日本士兵四处抢劫。剩下的十分之一地区将近有 20 万惊恐的市民。

昨晚米尔士、史迈士和费吴生一起坐收费汽车送米尔士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华群在那里守护着几千名妇女。当他们到达前门时,一位好斗且蛮横无理的中尉命令他的巡逻队拦住他们。他让男人们站在一排,让华群、程夫人和戴籁三夫人站在另一排。他抢走男人们的帽子,命令每一个人包括妇女离开这里。费吴生告诉他车里容不下,但中尉坚持每个人都必须离开。他们刚挤进汽车,中尉又命令他们回来,又训了他们几分钟,最后是要他们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才得知,就在这段时间,一些士兵已翻墙侮辱了 16 名妇女。

难民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饥饿,冬天的燃料也没有着落。这不是我们期望的令人愉快的冬天。可惜的是新闻记者在那天都走了,如果他们能晚走一两天,那他们将会对南京的恐怖统治有更详细的报道。

有两名日本兵过来欺负招待员,我把他们赶了出去。

今晚我想多睡一会儿,但我最好开着灯和衣而眠。

12 月 19 日,(我猜是)星期天

昨晚做完这些记录后,这一夜总算平安度过。早晨我回家时又听到十几起抢劫及强奸的暴行。写完昨晚我在医院查看的情况后,我与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前往日本大使馆(日本人仍这么称呼),与使馆的一位秘书田中先生交谈,他以前就在南京。他仔细读了我们的报告,还听我们讲述了其他许多事情。他本人对我们很同情,但他无法控制军方,能做到的仅仅是像我们一样提交一些报告。似乎有一线微光,但它太微弱了,今天是最糟糕的日子之一。

事实上,城里每一幢外国人住宅都被日本兵破门而入。我回家时顺便去了谈和敦家。我到他家时正巧有三个日本兵在那里。在我说话时,

我的微笑停住了,我命令他们立即出去。他们已闯进了我们上了锁的阁楼,大衣箱的每一件东西都被扔在地上。有一个家伙打开了我显微镜上的封套,还想看个究竟。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居然下楼逃跑了。我离开后他们也许还会再来,但我不能整天在那儿。二楼被劫得干干净净。我非常感激玛兆瑞(Marjorie)^①,她把没用的东西都丢掉了,留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我穿得着的衣服。

我回家吃晚饭时,柏睿德的厨师和朱先生想请一个人去他们那里住(去年夏天,我们曾在那里住过),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的妻子免于被强暴。贝德士、史迈士和费吴生过去了,在地下室发现了三个士兵,贝德士赶紧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切平静之后他们可能还会再来。日本人成群结队闯进这块地方,我完全相信,(鼓楼)医院是城内惟一没有日本人的建筑物,还没有人被强奸,但我不敢确定在我到达护士宿舍四楼逮住那个家伙之前,在医院里有没有发生这种事。后来的一份报告说那个家伙一丝不挂,爬上了三个护士的床,每次当护士大声叫喊时,他就匆忙穿上衣服,出去看看是否有人进来。我到那里时是在他第三次试图(作恶)之后,因此我想我到得还算及时。

今天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大火。昨天已有多处大火,今天太平路附近的几条大街在晚饭时燃起了大火,离我们200码远的一幢房子也着火了。从医院看去,这幢房子好像正窜出火焰,直到我结束查房回家时,发现房子仍然很完整,我颇感欣慰。

我去了一趟日本使馆,所以很晚才开始查问这两个病房。下午我做了近期的第三例眼球摘除手术,还做了其他五个小手术,为我的博物馆增加了两枚弹片。今天没做截肢手术。最近至少有四面美国国旗被撕扯下来。在山顶的美国国旗被取下来,一名妇女被强奸,然后被用刺刀刺进下身。晚上米尔士带着一名使馆警察察看时,地板上还留着一大摊血。这位妇女看样子还活着,已被送进医院,特里默今晚来看护她,我明早再为她治疗。

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何时是

^① 玛兆瑞是威尔逊的妻子。

尽头?!

12月21日,星期二

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这座人间地狱的24个小时。昨天我们听到日本新闻社的消息,据同盟社(Domei)报道说,南京居民已回到家中,商业正常进行,人们欢迎日本人的到来,还有诸如此类的话。如果这些新闻传出南京,而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后,必定会造成极大震撼。

现在已有大半个南京城被烧毁,每个商业区都烈火熊熊。我们一些人确实亲眼看到他们在几处放火。昨天在回家吃晚饭之前,我数了一下共有12处大火。今天在同一时间,我数了数共有8处。其中几处是整个街区建筑被烧毁。我们附近的大部分商店已被烧毁。平民拥进难民营,有些人家即使在安全区也搬进了难民营,虽然哪里都不敢保证安全,但难民营还是比其他地方安全些。如果不是国际委员会预先存贮了一些大米,并尽其所能保护平民,那么现在就会发生严重的饥荒,日军对平民的屠杀也将大大超过现在的数量。

若干新的屠杀事件陆续传来。今天有一个人来到马吉处讲了他的遭遇,有1000人被日军从安全区一个被认为较安全的地方带走。这支队伍中包括100名缴了武器且换上平民衣服的士兵。这1000人排成两列长队行进到长江岸边,然后遭机枪扫射。他在后排,和其他人一样倒地装死,直到几小时后日本人离去,他才溜回城里。

我们曾在安全区看见许多相类似的集合,但他们再也没回来。我们猜想他们也都遭遇了同样不幸的命运。

昨天早晨,一位17岁的女孩带着她腹中的婴儿来到医院。她在前天晚上7时30分被两个日本兵强奸,9时开始剧烈腹痛,12时,她的头胎婴儿降生了。她显然晚上不敢外出到医院,到早晨才敢过来,那孩子看起来竟奇迹般地平安和健康。

下午我给一位13岁的可爱的小姑娘打了石膏。当日本人13日进城时,她和她的父母亲正站在防空洞入口处看着他们走过来。一个士兵走过来用刺刀捅死她父亲,又开枪杀了她母亲,并砍开了小姑娘的肘部,

导致穿破骨折。她没有亲属,整整一周没人送她到医院。她在想当她不得不离开(医院)时,她能做些什么,她的双亲都被杀害了。

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 19 岁姑娘,企图反抗两个日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 18 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有很深的一个刀口。今晨在医院里我未能听到胎音,她很有可能会流产(第二天早晨得知,她于昨晚做了人工流产)。

昨天午饭时,离我们只有几门之隔的几个中国修理工来问,他们那里有两名年轻妇女有危险,该如何处理。我们建议把她们送到金大,那里晚上已有宪兵值班,或者我们可用车接他们去那里。我和费吴生吃完午饭后发动了车子,还没开出大门,修理工又跑进来说日本人已经来了。我们直奔那个地方,史迈士和麦卡伦也一同前往。到达时,惊恐的中国人指着房子紧闭的大门。我们高喊着推开大门,发现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但当时只穿了一点衣服,两名妇女虽然衣衫凌乱,但幸免于玷污。其中一名士兵极为恼怒,有些威胁之意,但没敢动真。我们把两名妇女带到金大。我们离开时,修理工再也不敢住在那里,所以昨晚睡在我们的车库里。

昨天,士兵再次闯进汉口路 5 号家中,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小时,尽管他们军方的日语布告贴在大门上,禁止他们入内。当人们力言此处没有妇女时(在地下室有几名妇女),他们走出门,看到一个女孩,就把她抓到楼上蹂躏了三个小时。他们有三个士兵,他们离开时,姑娘穿着一件病人的冬天外套,其他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抢走。我的显微镜昨天也被拿走了。

中午我去了厨师那里,他的东西被掠夺得干干净净。我们捡了一些零星残余,如我的小杯子,两三件剩下的银器。医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倪先生(Mr. Nyi)送给我们的杯子有一半不见了,幸亏我们在 9 月份把每件 kori(?)都装满物品运走了。

昨天美国人起草了一封电报,要求美国外交代表立即返回南京。日本军方在此之前曾答应他们发出这封电报,但现在却拒绝了。今天,所有美国人和几位德国人一起去日本使馆表示抗议。我太忙没去。

所有病床都住满了。在 20 名职员中只有 4 名护士曾受过若干训练,目前我只能召集到这么多人。我的一个病房有 3 名男护士,我确信他们之所以做护士是因为这是目前最安全的职业,他们是这样想也是这

样说的。我有一个重病号，胸腔被穿透，病历表上写着体温是 99 度（华氏），脉搏 80 次，呼吸 24 次。我意识到这完全不准确，就亲自做检查，结果发现心跳 120 次，体温 102.6 度，呼吸是 48 次。这个“小小”的误差是这层楼护理水平的象征。

中午我差一点被枪杀了，我曾经希望如此。在我回家的路上，金大女生宿舍门前的警察告诉我，有一个日本兵在里边，他央求我去看看。像过去一样，我闯了进去，毫不含糊地命令他出去。他让这群人给一辆自行车充气，他想骑车走，但我阻止了他，我让他赶紧出去。他又想乘黄包车，并要把气筒带走，我坚决反对，但这次我是冒了不该冒的险，因为黄包车和苦力是他先前带来的。我们不再是朋友，他很镇静地举起手枪，有点想开枪。有个中国人告诉我，黄包车和气筒是他先前带来的，因此我告诉他，可以把它们一起拿走。然后他出去了，当我经过时他往步枪里压进几颗子弹。在我回家路上超越他时，我满以为他会从背后枪杀了我。那时他一定是气馁了。

圣诞夜，星期五

这哪里是圣诞夜！我们坐在很小的 X 光室内，躲避日本士兵的抢劫，这着实有点危险。几周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医院，而现在家庭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我的孩子再有四天就满半岁了，但我们在一起只呆了七周。

大火几乎结束了。但今天在主干道两侧又燃起六处大火，焚烧店铺里的东西。抢劫仍在持续。他们今天抢走了谈和敦家的地毯，其中一块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走。住在他家里的那些可怜的人只好干瞪眼，毫无办法，只能事后讲给我们听。卜凯怎么也想不出他多么幸运！他家里住着八个美国人，因而免遭浩劫。隔壁的唐美森(Thomson)^①家也丝毫未损。这儿其余的房子都徒有空壳。

上午我和特里默从盖尔家抢救出一些食品。那里还有一些极受欢迎

① 卜凯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金陵大学教授。唐美森(J. C. Thomson)亦在金大化学系任教，其夫人在外语系任教，是章开沅的英语老师。

的蜜饯和罐头水果。我们的贮藏室渐渐见底,也没希望得到充实。我们还去了主教家里。两座房子都被抢光了。我顺便去了共济会礼拜堂,取回我的中式晚礼服和其他六套衣服。他们破门而入,拿走了许多东西。

今晚,我们邀请特里默和城里五位德国人中的三位共进圣诞夜晚餐。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未能参加,他不能把他家院里的 600 名难民扔下不管。他每次离开时难民们总是被抢劫。拉贝的确是个纳粹,但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和他进行了密切接触后,发现他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拥有一副菩萨心肠,这使我们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希特勒的忠诚协调起来。他为安全区的成千上万难民日夜辛劳。另外两位德国人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也全身心地投入到委员会的工作,并尽全力拯救这些穷苦人。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残酷地杀害了。

今天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一名担架员,曾和 4 000 名中国人被押到长江边,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他的肩部中了一枪。他在仔细窥视是否会被旁听后,只敢用耳语交谈。有两个不幸而可怜的烧伤病人上午死了一个,另一个仍在坚持着。贝德士下午去了他们描述的焚烧的地方,发现了烧成炭状的尸骨。现在,日本人告诉我们仍有 2 万士兵在安全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得出这个数字的)。他们正在到处搜索,并把搜到的士兵全部杀害。这就意味着每位 18 至 50 岁的强壮男性都将受到检查。他们怎能再次仅凭相貌来检查每个人呢!

辛德贝格今天回到城里,带来了更多可怕的消息。他说,中国人为阻止日本坦克而挖掘的大壕沟里填满了尸体,还有一些是伤兵,尸体不够多,日本兵为了使坦克能通过,居然屠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用他们的身体来填平壕沟。辛德贝格借了架相机,拍了一些照片以证实所言非虚。

晚安,圣诞快乐!

12 月 26 日,星期日

从圣诞节前夕写信以来,我变成了主要的产科医生。写完这行后我上床睡觉了,刚到 11 时和 3 时 30 分就被叫起来,主持两名中国婴儿的出生仪式。这好像又回到了在医学院接生的时候,稍稍不同的是,在这里

不论发生什么,我都是绝对的权威。

昨天,在晚餐前我把所有病房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家与我们刚刚集合起来的大家庭的八位成员和四位客人共进圣诞晚餐。来的人有鲍尔、华群及两名中国姑娘,布兰奇·吴和吴珍珠(并非亲戚)。海因兹小姐婉辞了我们的热情邀请。布兰奇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给我们带来了两只鹅和一打新鲜鸡蛋作为圣诞礼物,这是几周来我们头一遭。

下午,我尽可能推迟所有的手术,抓紧时间睡觉和读一本很有趣的书,是由一个喜欢冒险的叫耐格力·法森(Negley Farson)的人写的自传,名字叫《违纪者之路》(The Way of a Transgressor)。

上午我们发现特里默为 102 度(华氏)的高烧所苦,他很难过。我们把他搬到鲍尔住的地方,在那里他能吃得比医院好一些。今晚他好多了,休息一两天也许就会好了。

我上午的查房被两次生日庆典打断。一次是在 10 时 30 分,另一次是 11 时 30 分。一大清早,海因兹、高小姐还和我打赌哪一个先出生。在一连女孩之后这次该是个男孩。事实上,我们连续接生了五个女孩之后,那一夜生的是一个男孩。

下午我开始了另一个截肢手术,还看了几例小手术。几周以来我试图保住病人那条腿,但最终还是需要截肢。病人身体持续恶化,看来需要在他的腿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结果难以预料,他也许两样都会失去。做完手术,我还需要查看两个病房里的 70 名病号。

刚过 7 时,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我去鲍尔处吃晚饭,并看望特里默。上午有几名日本军官来进行了半官方的访问,并仔细查看了此处。他们以尽可能最无效率的方式对全城居民进行登记,所有居民现在都被逼到了安全区。他们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袖标,作为在市内的通行证,并嘱咐我们一定要戴上。

昨天,一名负责难民登记的军官拦住林查理并打了他好几个耳光。我不知道如果我受了这种非礼会如何反应,但用拳猛击其下颌的诱惑将是难以抑制的。如果这事轮上我,我希望我能和他一样把手揣进口袋。

除了辛德贝格颇似速写的消息外,我们已有两周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们确信在这段时间内没有真实的新闻从南京泄漏出去。一旦真情

透露后,感觉就会降温,以致无可奈何。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光明,但现在却连一线微光也看不见。

12月28日,星期二

伊丽莎白^①今天正满六个月。我多么希望和她及妻子一起来庆贺她的半周岁。我猜想她现在可能长牙了,会做某些我还没见过的动作了,这六个月中我们只在一起呆了七周,但这里还没有形势平静的先兆。

特里默感觉好多了,起来查看病人。昨晚9时30分我接待了一个产妇,今天中午又有一个。这一位约有20岁,她的婴儿大约有10分钟怎么也不哭叫。看见他开始哭叫这才让我稍感安慰。在特里默生病期间,连同婴儿在内,我现在有175名病号。特里默能让我减轻20人的负担。

我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把所有病人查看了一遍。昨天我们有一例病人,如果他讲述的事是真实的话,那么我可以把它写进(黑色)幽默大全了。他是下关电话大楼的一名工人,正在金大避难。他出去到街上找他一个朋友,被一些日本兵抓住,领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几百个人,也都是从金大来的。日本人在登记难民时,先讲了一通漂亮话,说他们只是想找出曾当过兵的人。他们还说,如果有人能走出来承认曾当过兵,那他们就能保全性命,并可以编进军队劳工营。这些话当着每个人的面,包括宋煦伯、贝德士和林查理,重复了很多遍。有200人走出来承认曾当过士兵。

据这位病人所言,这几百人被领到了城西的山丘,用作练习拼刺刀的目标。他不知道有多少人生还。他身上有五处刀伤,其中一刀刺进了腹腔。我在手术时注意到他的肠子被刺穿,但在腹腔里只发现了一些发黑的血。刺刀几乎刺向他腹部正中间,但稍稍偏了一下,刺进了下面的腹腔,伤着了一些血管,但没刺破肠子。如果腹腔伤势不是很严重的话,身体有可能复元。

日本人似乎在真诚地努力阻止违法乱纪的行为。士兵抢劫商店时

^① 伊丽莎白是威尔逊的女儿。

有一些宪兵出来制止,但他们走后,抢劫照旧进行。只是每天的一起或两起大火才提醒我们,城里仍有一些未被烧坏的建筑。街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垃圾,成群的士兵和苦力忙着清扫街道。他们用库存货物作燃料,在大街上放了很多大火。在新街口附近的一家乐器店,所有的乐谱和乐器都被堆放在大街中央,然后一把火烧掉。多么愚蠢的事情!我认为日本人是想毁掉所有东西,然后再把便宜的日本货倾销到中国。现在老百姓被抢得干干净净,因此,即使是很便宜的日本货也不可能买得起。

特里默下午在医院里,我们拍了一些片子。有一个病人被子弹从骶骨穿透到方骨正下方,而且显然其右边的迴肠孔与脉管间长出一个动脉瘤。我害怕他在手术中死去,现在无疑要治愈其表面的感染,但仅仅将它包扎意味着整条腿的坏疽。我们拍完片后,打开他的收音机听听外面的消息。我们得知济南陷落,“帕奈”号事件宣告结束,外交官有望回到南京。我们将很高兴见到他们。

12月30日,星期四

今年即将结束,但愿今年早点结束,明年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我们又十分沮丧,因为看不见一线黎明的曙光。我们惟一的愿望是局势不再恶化下去,日本人不能再杀更多的人,因为已没有那么多人供其杀戮了。我不能离开我的家庭再远些,即使我试图那样做。医院不可能像往日那样自立,因为没有一个人有钱。

宪兵很忙碌。我和林查理从医院回家时,日本兵举着刺刀拦截了两次。前天晚上,日本兵在金陵女子神学院的难民中寻找妇女。没有人敢出来,因此,昨天晚上一个日本兵强奸了一名妇女。今天,一些可怜的人对蚕桑系难民营的负责人很生气,他带来一些日本士兵查看了埋藏六支枪的地点。一阵可怕的争吵后,有四个人被带走,其中一个被认为是重犯,是中国军队的上校。我们想不出他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今天早上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国商人,冒险走出了安全区,想去看看他家和商店里的情况。他和三个伙计经过桂兰(Kuilan)教堂时,一群日本兵无缘无故地向他们开了枪。其中一个伙计被击中,他被抬到医院,腹部有4英寸长的小肠挂在伤口外面。子弹从左腹部射进,穿过了右腹

部。子弹仍留在他的裤子里,这又丰富了我的收藏。

打开他的腹腔,我发现小肠有六处被严重损伤,还有多处被挫伤或刺穿。我把挫伤部分切下放进试管,发现他存活的机会很小,还不到千分之一。我上次提到的那个病人状态很好,正在恢复。今天的另外一个病人是一位胸部已积脓,得把他一根肋骨切除。我们有10位被射中胸部致死的病人。这个病人一周之后脑力渐趋衰竭,死在医院。一个10岁男孩的第三块胫骨和腓骨有严重的穿破骨折,我试图挽救他的腿。我担心只有截肢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特里默又回来开始工作,接替我照看产科病人。我接生的一个小男孩的大拇指多出一小块肉梗。在接生时我没有发现,今天我把它切除了。一个17岁的小姑娘在晚上7时30分被强奸了,9时她就要分娩。她现在已恶化成一个不时喊叫的急性淋病患者。她发着105度(华氏——译者)的高烧,看起来很不妙。她在地下室被军刀刺伤后早产,奶汁很丰富。

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令人厌恶的是那时只有一家电台广播的新闻。我们又打开小收音机,听到了东京广播。他们说所有美国人正从牯岭撤回汉口,但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信(下面原文字迹不清)。

1938年1月1日,星期六

外面的人们一定感到很奇怪,因为两周来没有从南京传出任何第一手的消息。外交代表还未获准返回,也没有新闻记者回来,虽然当他们于12月15日离开时,他们希望在离开的48小时内可以返回。日本同盟社记者和其他记者当然也没有希望做到准确报道。

……(原文字迹不清)

医院虽宣布放假三天,但没有人知道该干些什么。街上没有一家商店是关着的,表面上看市面正在恢复,尽管整天枪炮声不断。日本兵觉得现在是他们白吃白喝的时候了。经历几天相对宁静之后,日本兵又开始了强奸。在金大校牧王先生家,三个士兵破门而入,一个在外面把守,另两个在屋内强奸了一个孤立无助的姑娘。中午,我们和四位客人举行新年午餐会,他们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戴籁三夫人、程夫人、马吉先生

和他的室友福斯特先生。这是马吉和福斯特先生从城陷以来第一次离开他们的住处,他们那里约有 250 个难民。我们刚刚吃完午餐,就有人来叫他们回去,他们到得太晚,没能阻止(日本兵)强奸一个姑娘,另一个姑娘因为她全力抗拒而惨遭毒打。

下午,一个尼姑被抬到医院,她两周前穿破骨折。日本人进城时她和其他三个人躲在防空洞里,日本兵进入防空洞,一个士兵向防空洞深处开了火,其他三个人被打死,她的伤口严重感染,病情很重。

下午还来了另一个悲惨的病人。一位 29 岁的妇女,带着六个孩子,最大的 12 岁,住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中国军队撤退时烧掉了这个村子,她带着五个孩子(一个先死了)来到南京。傍晚前一架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一颗子弹穿过她的右眼并从颈部出去,她昏迷过去,直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才发现她的五个孩子围着她大哭,她感到很冷。最小的孩子才三个月,还需要吃奶。她躲在血泊中非常虚弱,已没有力气带走孩子,只好将婴儿留在后面的空房子里。她带着其余四个孩子来到城里并进入难民区,终于安置好孩子,自己找到了医院。

这类事情如同家常便饭,很难有个好心情向周围的人祝贺新年。这次轮到我在医院值班了,这些文字是在司库办公室的打字机上打的。昨晚,我们全体人员在拉贝家里度过一个小时,他有一些很好的唱片。在离开之前,我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我们没有人守在守夜等待新年的到来。

1 月 3 日,星期日

在你得到很多资料之前,一定会得到一份长达 50 页的材料。我希望这些材料只是暗示没有机会写下更多,而不是代表日本人的全部罪行。

前天,一块 4 磅重的铁家伙砸在我的大脚趾上,所以这两天我都是在一瘸一跛地巡视医院。昨天是晴天,上午查完一遍病人,休息了一下午,现在快要好了。

今天有三件很恐怖的事。一个 17 岁的男孩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 14 日大约有 1 万名年龄在 15 岁~30 岁的中国人被带出南京,到了靠近轮渡码头的长江边。在那里,日本兵用野战炮、手榴弹和机关枪向他们

开火。大部分尸体被抛向江里,有一些被堆起来焚烧,有三个人想方设法逃跑了。这男孩估计这1万人中大约有6000人是被俘的军人,而4000人则是平民。男孩胸部中了一枪,但不严重。

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住进了医院,她讲述了下面的故事。12月31日她被日本人从难民营中带走,名义上是给日本军官洗衣服,共有六名妇女被带走。他们白天为日军洗衣服,晚上则被他们强暴。她们中有五个人每晚要受到10~20次强奸,而另一个由于年轻漂亮,每晚大约要被强奸40次。第三天,两个日本兵将我们的这位病人从住地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想砍掉她的头,其中一个砍了她四刀,但只削掉了她的颈背部到脊背的全部肌肉,她的背部、面部和前臂还有六处刀伤,当她这样躺在地上时,另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她,并将她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她有可能恢复。

第三个病人是一个14岁的年轻女孩,她虽没有被强奸,但不得不做相当大的外科整形。

下午我做了五例手术,其中又拔出两颗子弹,我的收藏又多了。上次我写到的那位有六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子弹穿过眼窝,进入颈部,但没有进出,下午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对股骨上端的穿破骨折感到沮丧,现在根本做不好这种手术。其中一例患者在住院六周后于今天死去。感染慢慢向上发展,几天以前他的伤口处开始流血。止血带不起作用,把伤口切开一看,腹腔里面有大量脓肿,伸进两个拳头可以摸到后面。大腿上半部分股骨完全粉碎,我想立即给他截肢,但为时已晚。我并不认为早点截肢就一定能挽救他的生命,但也许能。

一位在美国住过四年的日本军官对我们非常关心,每天都过来询问我们需要什么。他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袋豆子和一些新鲜肉。我希望像他这样的人多一些。

昨天我们在家里举行了礼拜,特里默、戴籁三夫人和鲍尔还有我们这个大家庭。麦卡伦领祈,四个星期前他就准备好了布道内容,但推迟了一周又一周,现在不得不做些修改。

1月6日,星期四

更忙碌的三天过去了,局势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日本军队渐趋平静,

没什么可讲的。上午有三位美国外交人员返回。阿利森先生以前在济南,从我们住进卜凯家后他曾来做过客,现在是美国驻南京领事。他带了两位年轻人。我们留他们在这儿吃了午饭,今晚他们还要赴日本使馆做客。

他们带来了一些信件,大部分是从牯岭来的家信。想要正常收到美国的来信可能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带来了在牯岭的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在12月30日经汉口撤到香港。看来我们在牯岭做对了,因为这样的旅行不可能带很多行李。

日本人正沿着津浦线向北挺进,准备攻下津浦线与陇海线的交汇处徐州。他们已攻下济南,并从北向徐州挺进。中国主力部队准备西撤,双方毫无停战的迹象。从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很难想象中国用什么来装备军队。

我们偶然得知中国空军并非没用,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城市附近的机场,也应该如此。

医院的门诊部又恢复起来,中国医生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忙活。下周一我们又可以按日程表进行正常的内外科诊治了。昨天下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一例脱肠(疝气)手术,他脱肠已有五天了,生疽很严重,必须把小肠切除八英寸。今天,我又想起了去年12月份的手术,我试图保住病人的两条腿,但最终还是切除了。其中一个男孩,他的腿受伤很厉害,我尽了最大努力想保住它,但他的脚开始生疽,血液循环不畅,感染扩散以至无法控制,因此不得不截肢以保住生命。

日军尚不允许英、德外交人员返回南京,但打算让他们在10时返回。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允许记者回来。

下午,麦卡伦开着林查理刚修好还未上油漆的救护车去城南为我们谋些蔬菜。他一到那儿就有一只轮胎瘪了,又没有必要的工具来修理。司机一路小跑返回医院,生怕被日军抓住。我刚刚完成大部分的重要手术,就开着红十字会赠送的很漂亮的新救护车去帮助他们。这辆车是白色的,有4幅可折叠的担架,只跑了1000英里。……他们把这车送给我们是防止被日本人偷走。我们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盛备用轮胎的盒子固定得很死,用我们自带的工具没法拧松。我们只好把坏胎卸下拿回去

修理。夜间行走尽管不安全,但我们还是决定把车留在那里,第二天一早再来取,如果它还在那儿的话。我们现处在南京最东南处,离城墙只有几百码。附近没有日本兵,因此,我们认为取回汽车的可能性很大。今晚,麦卡伦在医院轮班,我们要在他回去吃早饭之前把车取回来。

1月8日,星期六

中午我回家时发现有一封信,上面盖有使馆的印章:“重要,急件”。原来是玛兆瑞通过海伦姐妹和比蒙特准将发出来的圣诞节和新年问候。前天阿利森来吃午饭时忘了把它带来,只给其他人带来了一些信件。收到这信当然是无比的高兴。她们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何时我们才能相聚,这三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伊丽莎白现在该长出第一颗牙了吧,也许她正在试着用牙咬各种东西。

医院大部分时间都有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接触外面的世界,每天都能收听新闻真是一件快事。当然,这些新闻不会让我们增加和平感。很显然两个国家都准备打一场硬仗。日本人在攻占南京后攻势似乎没以前那么强劲。

城里仍充满了可怕的谣传,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检验真假。今天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中国人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到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堆东西回家了。她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一群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篱笆,试图抢劫。她们还未来得及行动就被使馆建筑后面的中国雇员阻止了。

今天仍有宪兵巡逻,并抓走了一个住在中学的年轻小伙子,他会讲日语。他很不情愿在那里做翻译。贝德士去见宪兵头头看能做些什么,被很粗暴地推出来。很多中国人害怕回家,尽管日本当局希望他们那么做。一旦他们离开安全区,就会遭受各种非人的折磨,男人被抓去做劳工,女人则被强奸。

今天上午中国飞机又来空袭。城东的一座军火库被击中,大火烧了整整一下午,并有持续不断的弹药爆炸声。南京每天都有10起或更多起大火。昨晚我从医院回家吃饭,路上没看见一个人,我可以说,这是三

周来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等我返回医院睡觉时路上仍是如此,有几处大火仍在持续。我回去后在大门口的中国警察都很激动,告诉我刚才一些日本兵敲门想进来,但他们假装听不见,日本兵没有进门。后来知道今天来的是一些军官,他们想告诉我们别开那么多电灯。他们强调要在6时30分关上所有灯,但刚好有两名产妇正在分娩。今晚是特里默值班,由他来照看产妇。昨晚是我值班,没有孕妇待产。

英国与德国外交代表有望在明天(星期天)返回,比以前报道的日期有所提前。我们希望能有三位英国人到这里,但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按时到达。有关南京的消息可以通过美国使馆传递,因此你们将会得到一些新闻。

1月9日,星期日

我们终于有机会能避开日本人的审查而送出一些邮件。这些邮件先被送到在长江上打捞“帕奈”号的一艘美国拖船,然后由长老会牧师沃力恩(Walline)送到另一艘美国船上,到美国后再按正常邮件寄出。玛兆瑞,你可以按你的想法来处理这些资料。我多么希望大部分资料都能有几个副本,因为我希望我的家人能读到这些东西,毕范宇(Frank Price)和贾义德(Garside)建议部分内容可以出版。毫无疑问,许多人对此会很感兴趣。

把我在你离开前写的第一部分与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我希望你们能得到斯蒂尔和史迈士带出城的未经审查的资料。我手头上也留了一份复印件备用。史迈士做了大量的官方记录,并根据人们的所见所闻编写了许多案例,我所讲述的这些我亲身经历的事例也被写进了他的材料。

今天是星期天,吃完早饭比平时略晚了一会。我查看了大部分病人,发现马吉已准备好了摄影机,补拍上次来时未拍的影片。上午我们为一位老人拍,他的颈部有两道长长的伤痕。一些士兵要求他提供姑娘,而他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遭此不幸。接着我们为一位警察拍,他的背、胸和手臂有18处(不,是22处)刀伤。他是无辜的。第三个拍的是我前几天写过的那个妇女,她曾和另外五个妇女被抓去洗衣服,晚

352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上则供日军享乐。她的颈部刀伤已慢慢愈合,我认为她可能患了肺炎,现在也好了。

[RG11,B229,F387。]

十一、宋煦伯

宋煦伯是南美以美会派往金陵神学院的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宋煦伯担任国际委员会下辖的“粮食委员会”的副主任,亲自开车为难民营运送粮食。同时他还是金陵神学院财产委员会主席,担负着神学院的重任,金陵神学院难民所曾收容2500名中国难民。宋煦伯在保护这些难民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安全区第一任总干事费吴生在1938年初离开南京之后,宋煦伯担任了总干事的职务,和安全区主席、秘书一起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委员会的常务事宜。

在保护中国难民的过程中,宋煦伯经常受到日本士兵的威胁,还曾遭到日本兵的殴打。

1. 给上海普莱士博士^①的信

尊敬的普莱士博士:

自你离开南京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的学校(神学院)关闭了,师生们疏散到了安全地方,或者说相对安全的地方,留下来的人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准备。我们都估计会出现一定的混乱,特别是由中国军队造成的混乱,因为中国军队不可避免要进行撤退,我们担心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抢劫。南京建立了安全区,人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安全区。安全区是以汉口路为其南界,中山路是其东界,北界是山西路(实际是山西路以北一点),西界是西康路(这条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西面经过,并径直穿过小山到上海路与汉中路的交界处)。这形成了安全区的西南边界。这条线正好横穿神学院的男生宿舍,但在安全区边界外的房屋被认为同边界内侧的房屋一样的安全。事实上,南京的整个人口都迁到了这个地区。所有的房屋都挤满了人。由

^① 即毕范宇

于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没有负责人,我叫估衣廊的卫理公会教堂的郭(Kwoh)牧师搬到女教工公寓,并负责那里的工作。他住在那里使我们相信这座房子在可靠人的手中。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校园里收容了大约4 000难民,在我们的神学院有3 100多难民。当然,在这两个地方成百上千的难民正住在校园里临时搭起的小芦席棚里。所有公共及私人住房都人满为患。

随着日本士兵的到来,我们以为秩序很快就会恢复,和平也随之到来。人们将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并再次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从一开始,日本士兵就进行抢劫、掠夺、拷打、谋杀、强奸、纵火——一切能够想象到的坏事,没有任何限制。在现代史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超过这些罪行。南京几乎成了一个活地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日本士兵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并毁掉他们所不想要的一切东西;成百地公开强奸妇女和少女,那些阻拦的人当场被刺死,或被射杀。妇女们稍有反抗也被刺死;儿童妨碍了强奸也被刺死。有一名妇女在弗兰克家被强奸(他家住的大约150名难民)当时她4~5个月大的婴儿在她身边哭泣,强奸她的日本士兵将那个婴儿闷死。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一名少女遭到17次的强奸。最后,我们终于让日本当局在比较大的校园门口设置了卫兵,但是这些卫兵常常自己到校园里强奸妇女。每天每夜都不断有案件发生,数量达到数百起。人们几乎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这些恐怖的案例。

但是我们仍然满怀希望地活着——希望情况会很快改善,但现在我们还看不出这何时会到来。许多人的住家都被烧毁,小店和商场正在燃烧着。每天每夜人们都可以看见这座城市里燃烧着的大火。几乎整个太平路和中华路已被烧毁。Chiang Tan Chieh教堂和基督教男青年会已被夷为平地。城外的许多村庄也被烧毁。淳化镇已被烧毁,但我们听说乡村教堂培训中心没有被烧毁。

我们现在面临巨大的难民问题,难民区可能有15万,或更多的难民。我们的各个校园里大约有6万名难民,我们要向其许多人提供食物。我们的食物供给非常短缺,除非能采取某种措施得到更多的食物,这里的人民将面临十分严重的饥荒威胁。我们国际委员会手头的大米

供应仅够三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在那以后我们该如何做。我们正在试图从日本人那里购买大米(他们霸占的中国的大米),他们占有这些大米显然是预计战争会长期持续下去,以便供他们自己使用。我每天忙着向各个难民点分发大米;里格斯(Riggs)负责监督向各个粥厂提供煤及其他燃料;其他人做着别的事情——我们所有人正在同心协力维持,并尽我们所能改善难民的现状。但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相信上帝,并在尽我们所能。上帝会与我们共渡难关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佣人、三校(原文如此)的佣人以及你自己的佣人询问史密斯(Smith)小姐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需要得到他们的工资。我告诉他们我将设法和你联系。但我自己定期给他们发工资,这样他们就不用着担心了——我们以后可以进行财务方面的调整。当然,我在负责神学院的财务,包括所有看管各处房屋留守人员的薪水。资金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我很高兴地说我们所有的佣人都非常可靠和忠诚,在这一考验人的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通过今天去上海的英国使馆的官员寄这一封信。他们很快就会有一艘炮艇返回南京,所以如果你想给我回信的话你可通过那里的英国领事将信寄来。

向你及你的妻子问好

休伯特·L·索恩^①

附笔:不用说我们所有的房屋,无论是中国人居住的还是外国人的都被彻底地洗劫,但这些房屋本身受损不严重。日本人到来之前,我们的已婚学生住房被落在附近 50 英尺处的一颗炸弹严重毁坏。书籍及重家具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小的贵重物品,厚衣服、食物、被褥、自行车、汽车、奶牛、马、猪、鸡几乎被一扫而光,但故事太长在这里无法一一叙述,而且也十分令人伤心。

H. L. S.

^① 即宋煦伯。

356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 Record Group 165 Regional
File 390/32/31/03]

(杨夏鸣 译)

附 录

1. 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节录)

作者原序

去年12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对于中国的无辜平民,枪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我以为身为新闻记者,职责有关,曾将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拟成电稿,拍发《孟却斯德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不料上海日方的电报检查员,向当局请示后,认为内容“过于夸张”,加以扣留,屡经交涉,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我所发电稿的真实性,结果我从最可靠各方面获得许多确凿的凭据,同时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料,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这是我写成本书的原因及其经过。

由上所述,足见本书之成,完全是我本人的意思,有几位朋友为我选择整理材料,给我极大的帮助,但本书的出版则由我完全负责。本书内容所引录的文件,都是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向关系人恳商而得的。

还有一点也须预先声明,就是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非常尊敬他们,假使适宜的话,我很想指出他们的大名。其中有一位是重要的官员,还有一位(半官的),其情操与才智的高超,不易多见。他们都在上海,在人道的事业上,我和他们接触已不止一次,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不能不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我还应该向一位日本某军官表示敬意;去年9月初头,日机轰炸松江附近的难民车,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当时这一位日本军官曾以私人资格,向我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实属难能可贵,倍值敬慕,因为像在目前这样非常的时候,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被人泄露揭发,就有杀身之祸,并为国人所共弃呵。

本书的目标,扼要言之,在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平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后者是好大喜功的军阀们所不能忘情的。

在任何战争中,交战国双方固各有不同的宣传方法,但“暴行录”一类的东西,较为读者所信任。本书搜集了许多纪录、报告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均为绝对可靠的第三者所供给。所有私人信函,除纯属个人事件并仅涉亲友关系者,均照原文抄录,以存其真。为便利及安全起见,所有发信人及其他原作者的姓名,大多略去。附录之四内的正式文件,则引录全文。所有信函及文件的原本或副本,均经亲自审阅,妥为保存,所有照片影片及其他物证,也都可复查。

敬以本书贡献给全世界为集体安全的前途与战争恐怖的消除而奋斗的人士,并且向帮助我完成本书的朋友们表示谢意!

1938年3月23日田伯烈于上海

译者附言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军队,除发挥飞机、大炮、毒气、唐[坦]克车等现代杀人武器的暴力外,并以大规模屠戮、放火、奸淫、掳掠种种残酷野蛮惨无人道的手段,来破坏、来摧毁、来消灭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一切暴行,决非偶然的或例外的现象,而是故意、整个的、有计划的和有组织的举动。只要看本书内各中立国家旅华公正人士的观察和叙述,就可以明白。

本书的作者田伯烈氏(H. J. Timperley),是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他代表《孟却斯德导报》赴西班牙,对于西班牙政府、军队和民众团结一致抗御法西斯侵略势力的英勇斗争,予以忠实的、真切的、同情的报道,而为广大的读者所赞扬。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侵略战争爆发后,《孟却斯德导报》因为他在远东曾有将近20年的长期经验,熟习[悉]远东的情形,所以又派他到中国来观察战局。

田伯烈氏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疯狂的一幕。日本帝

国主义的代理人当然认为非常不利,而在各方面予以牵制、干涉和阻碍;我国军队退出上海附近后,这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变本加厉”。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方面在国外进行虚伪荒谬的宣传,一方面则在暴力控制的范围内,以种种方法遏止公正忠实的报道,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然而,这企图是失败了。《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的问世,实在是最有力的反击。

译者在上海时知道田伯烈氏搜集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写成本书,将返国进行出版事宜,乃在他离沪之前,向他商购该书中文译本的版权,承议定由田君以原稿的副本,留给译者,因此日夜赶译,以期与英文本同时跟读者见面。出版的时候,恰逢我国全面抗战的一周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纪念啊!

插入本书的几十帧照片,是译者向各方面搜集的,与本书的作者无关。还有一点须加声明,就是:因为中文本出版的期间非常急促,不及参阅英文本,倘有出入之处,这责任完全由译者担负。

译者代表受难的同胞,向本书的作者致敬,向国际的友人们致敬。

最后,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要为受难的同胞复仇! 要为被侮辱被蹂躏的父母妻儿兄弟姊妹们复仇!

1938年6月25日

(一) 南京的活地狱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8月、9月、10月间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11月、12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1800万人。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中外人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救济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男女老幼,上海各收容所里的难民,最多时曾达45万人。

在华中战区内,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有30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恐怕也不相上下。四乡人烟绝迹,满目荒凉,日军则长驱直入,欲囊括中国所有的财富,并消灭正在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几个月之内又重行组织起来。中国的财富,最主

要者是能够刻苦耐劳的人民,日军愈前进,就愈把中国的老百姓赶入内地,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少数的工厂,也经过了日军的猛烈轰炸而同归于尽,所以日军可说是一无所获。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11月间,上海饶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25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掩饰的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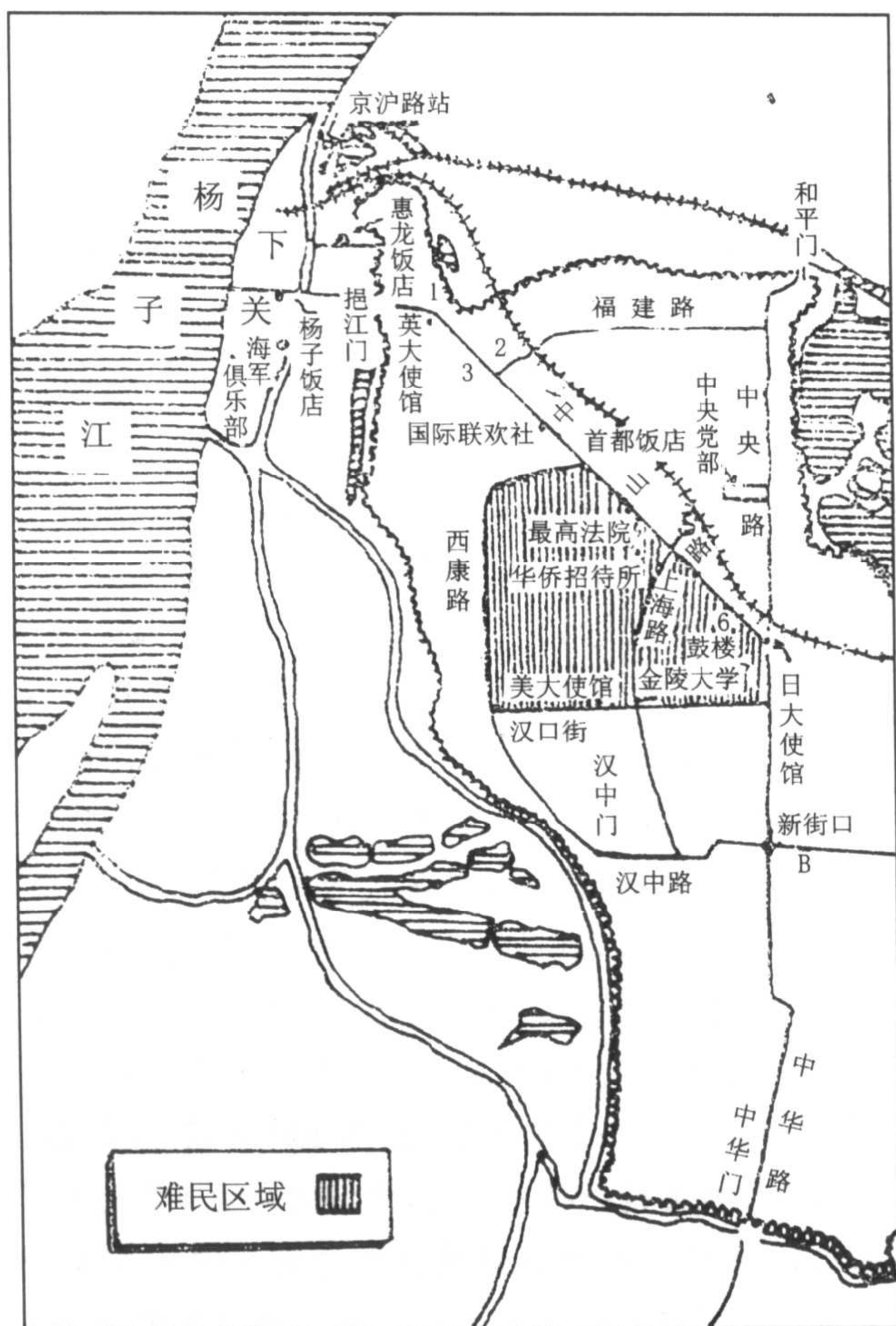
也是在11月间,南京若干热心公益的人士,曾经一度讨论是否可能在南京设立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是否可避免空军的轰炸,也曾经过热烈的辩论,一时未获结果。可是日军愈迫近南京,这一个问题也就愈见其急切,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委员会产生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雷伯(John D. H. Rabe)(委员会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见本书[下册],109至110页),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见本书[下册],110至111页)。

这些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各该国使领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为本书的读者所敬佩。

难民区自南到北计3公里,自东到西计2公里,总面积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区内有日、美、意、荷各国使馆,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鼓楼医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其他教会财产。

南京难民区的面积及其位置,详见附图。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及其他机关的许多信函,择要载入附录之四(见本书[下册],107至143页)。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书面答复,只在口头上偶而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而已。

1937年12月13日,即在日军冲破了上海方面中国防线的一个月以后,日军攻入南京——中国的首都。这不失为近代战史上的一个伟绩。可是,日军在占领区域内的暴行,却把这伟绩打下一个极大的折扣。当



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这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于12月15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把日军占领南京后几天内的情形，加以扼要而明白的叙述：

“南京的日本军队已经失去了声誉。日本军队本有极好的机会获取中国人民和外侨的尊敬,这机会也给他们抛弃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秩序确多紊乱,日本一向夸耀它是有秩序、有组织国家,所以当日军攻入南京时,曾有许多人表示宽慰,并以为战争的紧张和空炸的危险,可暂告结束。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时,实际上大部分的市区,并未受严重的损毁,可是其紊乱情状已造成一种恐怖空气,现在这种恐怖也可解除了。”

“但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是幻灭了,连续不断的屠杀,大规模的、经常的劫掠,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在南京中区,几乎每两条横街间必有一具尸体。其中一大部分是13日午后及晚上日军入城时或被枪杀,或被刺死的。任何人如因恐惧、兴奋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以后如为巡逻日军所执,都有就地枪杀的可能。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在难民区,在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若干外人和有地位的华人曾目睹这些暴行,有些刺刀的伤痕,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未及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有的则已卸去了制服,但日军大事[肆]搜捕,捆绑在一起而加以枪杀。据我们所知,除了行将就戮的散兵和暂充夫役的华人外,日本军队里面没有中国士兵的俘虏。日军曾强迫华警从难民区的一个宅子里,拉出400个难民,每50个人排成一个行列,来复枪和机关枪手押着前进,他们的命运不言而喻。”

“日军进城后,对于重要市区就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工作,大小店铺,无一幸免,且由日本军官从旁指示。日本士兵最需要的是食物,但如有其他好东西,自然也弃之可惜。大批赃物,日本兵自己拿不动,就强拉夫役背负。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下面的几件事情,尤其无耻:第一,日军搜劫收容所及其他避难处中的难民;第二,日军抢掠鼓楼医院职员的钱和表,以及看护妇宿舍中的物件,(这些完全是美国人的财产,挂着美国旗,并贴有美国大使馆的告示);第三,日军夺取汽车及其他财产,并先撕毁其国徽。”

“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已经听得很多,但我们尚无暇调查。不

过,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证明局势严重一斑,我们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见日本兵闯入邻近的人家,抢去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到军官的寓所中有八个年轻的女子,而他住的地方却是无人之境。”

“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呕呵!”

“当然,南京日军种种恐怖残酷的行为,并不足以代表日本帝国的伟大成就,日本有许多负责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他们为日本自身的利益打算,应该毫不犹豫地设法补救在中国已大为堕落的地位。有少数士兵和长官确能严守纪律,顾全日本皇军和帝国的声誉,但日军的整个行动则是一个悲惨的打击。”

南京另一个外侨向上海友人报告下面的事实,他差不多是终身旅居中国的。除略去关于私人事件的部分外,其余均照原函:

“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难于令人相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纪录。”

“现在是圣诞夕了,我的故事就从12月10日讲起罢,在这两星期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是失败了,撤退了,日本军队攻入南京。12月10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有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足足有10天,宛如人间地狱。我的生命并未遭遇真正的危险,但假使看到了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假使日本兵以刺刀或手枪相威胁,要你让他横行,你也会感到不知所措。日军曾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最讨厌留

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可是，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现在正是严冬），连黄包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戳的东西，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面前，惊惶万状，悲伤哭泣，恳求我们援助，使之脱离虎口；我们看到日军侮辱我们的国旗，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看到自己所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关，为日军有计划地纵火焚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活地狱。”

“我们自问：这现象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日本官方每天向我们确切表示，事态立刻就将好转，他们决尽力设法，但结果适得其反，事态一天坏似一天。据说又有两万日军要开到南京来了。他们是不是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可供掳掠的东西已经很少，整个城市已经是空无所有了。在上星期中，日军先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我们知道把我们所有的存粮来供给 20 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三星期，存煤仅足供给 10 天，不得不深切焦虑。而且即使有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之后吃什么呢？房屋是毁坏了，住到那里去呢？在目前恶劣万分的环境下，疾病与疠疫一定不久就会发生，难民决不能长此生存下去。”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确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像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 10 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到兴趣，并且借此可以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为我预

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巴奈’号炮舰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等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要两星期才有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中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20万居民,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唐[坦]克车的优越火力,加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12月1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们,同时交给我们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10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收到了8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直到12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而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10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城外,车夫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夫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12月10日,难民潮涌而至,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个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40人。我们的

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史波林君(Eduar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巴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27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18人、德侨5人、英侨1人、奥侨1人和俄侨2人。‘巴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12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墙塌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4000人。”

“中国军队在12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于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是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是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英)里的三汊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南京愉快的、和平的、有秩序的,以及进步的局面,是这样暂告结束

了。日军已经控制南京,恐怖、毁灭和死亡,随之而来。日军第一次侵入难民区是13日上午11时,我和两个委员去招待他们,他们似乎初无恶意,可是几分钟以后,他们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个难民。凡遇见日军而奔跑者,一概枪杀,这似乎已经成为日军的定律。”

“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是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呵!”

“炮火尚未全息,不过落到难民区的炮弹很少。我们的院子里曾落下若干弹片,鼓楼医院的威尔逊(Roberto, Wilson)医生在手术室里,险为弹片所击,一个炮弹穿过金陵大学的新宿舍,但并无死伤。南京最漂亮的建筑物交通部大厦,连同富丽的礼堂,已经起火了,但是否中弹起火,或为中国军队退却时放火焚烧,则不得而知了。”

“14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惟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日军从我们的收容所拉去许多难民,最初我们以为是充夫役的,但他们一去就无音讯,恐怕永远不会重返的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处整整花了一个钟头,研究‘6 000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日本兵接连4次到我们这里来,想偷我们的汽车,在别处我们的确有3辆给他们偷去了。桑纳牧师(Hubert L. Sone)离开他的房屋不到5分钟,日本兵就把他屋上的美国旗扯去,扔在地上,敲碎窗门,驾车逸去。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也给他们偷去两辆。因此我们以后便派了两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他们对付日本偷儿的经验,可以写成很有趣的故事。日本兵还强抢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 Ti'rman Durdin)那一天动身赴沪,但到了句容就被迫折回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Archibald S.

Steele)从江边回来报告,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一个日本军官告诉他‘巴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起其他船只被击沉的消息。‘巴奈’号上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乘舰同去,临行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巴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秘书史密斯(Lewis S. C. Smythe)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巴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份]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l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给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碍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向司令部给我设法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 1 300 人全

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拉贝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用绳子缚着,每100人缩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像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

“16日,运输难民的食粮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亚纪逊(George Archeson)商借汽车,交给密尔士牧师(W. P. Mills)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3只煮米的大灶,都是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25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200人,最多1.2万人。金陵大学全部收容了约3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3000激增至9000,连甬道都挤满了难民。我们本来打算给每人占16平方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lin)、程夫人、金陵大学的德威南夫人(Paul Dewitt Twinem)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16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100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7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许多妇女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所。中午,金陵大学的李格斯(Charles Riggs)走来报告,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被劫去,还有50名警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李格斯抗议无效,反受日兵侮辱,并为日本军官所击。日军遍体搜查,抢劫难民所有的一切财物。下午4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到扫射难民的枪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我赴布克教授(J. Lossing Buck)处晚餐,乘便回去视察我的住宅。

两面美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也依然存在,可是门户已经洞开,进去一看,凌乱万状,所有箱厨抽屉,均被打开,阁楼上尤其扰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多不翼而飞。王正廷博士赠我的麻栗树屏风架,雕刻精美,也失踪了。”

“美联社记者麦唐纳(C. Yates Mcdaniel)午后乘船赴沪,我又托他带一封信,我希望你们能够收到。”

(二) 劫掠·屠杀·奸淫

关于16日以后的事情,他在日记上记述如下:

“12月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的婴孩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闷死,反抗的惩罚就是刺刀。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我们惟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忙得无暇休息。日军不但要抢珍贵的东西,连黄包车、牛、猪和驴也不甘放弃。日军向我们的厨房和米店捣乱,我们不得不把米店收歇。”

“黄昏后我送裴志博士(M. S. Bates)到金陵大学,麦加伦牧师(James Megallum)到鼓楼医院,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我们要分班轮流值夜的。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就给日军搜索队所阻止。日军以刺刀相向,迫我们下车,满身搜索有无武器,掷去我们的帽子,电炬照耀着我们的眼睛,并查究我们的通行证以及夜行的目标。魏特琳女士、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立在我们的对面,二十多个妇女跪在地上,那下级军官口操蹩脚法语,坚持校内藏着中国兵,我说除了50个仆人和少数职员外,没有其他男人。但他不相信,并谓如查出超过该数,将予以枪决。他教我们一律离去。魏特琳女士反对,便给他硬拖到汽车上,忽然他又改变主张,女的可以留下,男的必须走开。我们要求留下一个男人,但他不加允许。我们先后被扣留一小时余,才恢复自由。第二天,我们知道那一批强盗抢去了12个姑娘。”

“12月18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报告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姊妹。威尔逊报告一个5岁

的女孩子送到医院,她给日本兵刺了5刀,有一刀刺在小腹上,一个男人的身上有18处刺刀的伤痕,一个女人的面部和腿部,也给刺了17刀。午后,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就在露天过夜。”

“12月19日,星期日。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还有几处也要烧。许多地方的美国旗均被撕毁。挂在美国学堂上的国旗,竟给他们扔在地上践踏,并警告看屋的人,若敢再挂上去,就要他的命,连日本大使馆贴在外侨财产上的布告,也受到侮辱。一天以内,日本兵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达五次到十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则被强奸。有些人是很残忍地被杀死了,毫无原因。难民区中的清洁队队员七人,六人被杀,一人负伤逃回。黄昏后,我们派了两个人冲到鼓楼医院代理院长白雷特博士(Richard F. Brady)的家里,驱逐四个又想强奸的暴徒,并将所有的妇女都移到金陵大学,史波林一天到晚忙着驱逐暴徒,我又赶往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金庚斯(Dougl S. Jenkins)的住宅,国旗依然飘扬,但两个仆人都给杀死了,尸体一在汽车间,一在床铺下,都留着残酷的痕迹。室内凌乱不堪。街道上尸体甚多,全是平民。红卍字会想掩埋尸体,苦无卡车和棺材,卡车是给偷去了,棺材被劈成片片,大放焰火,红卍字会的掩埋工人也给赶走。”

“我又偕史密斯君去访问日本大使馆,又提出55种暴行的证据,并告田中参赞和驻京总领(事)福井,今天的情形是愈趋恶劣了。他们确切表示将‘尽力设法’,局势不久可望‘好转’,但事情很明白,他们无法控制军人,军人也无法控制士兵,据说有17个宪兵已经到达南京,将协助恢复秩序。17个宪兵控制5万军队,岂非笑话?平心而论,我们确很欢喜日使馆里的几位先生,他们也许真已尽了他们的力量。可是他们反要我设法商借车子和一个机匠,我倒又觉得好笑。我们有许多辆车子,早给日本兵偷去了,我很想请他们去向日本军人商量。但我终于领导〔着〕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借了三辆车子(其中一辆是大使的),并派去一个俄国机匠。”

“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5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

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候,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观,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我们拟就致上海美国总领事的一个文稿,请求立即派遣代表团来京,刻不容缓,并恳(求)日本大使馆设法由海军无线电发出,不用说,这电报永不会发出的。”

“12月21日,星期二。午后两时半,我们14人访问田中参赞,面呈由22个外侨具名的抗议书(参看附录之四——见本书〔下册〕,107至143页),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态,他又满口允许。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很为忧虑。他的花园里还有难民四百余人,吃的问题,愈趋严重,金陵大学内若干难民,因饥饿而骚动,煤不久也要用完了,李格斯还在向各处搜寻。日军把城内所有的米和煤,一律加以封存,今天日本兵爬墙到我们院子里来,想乘我们出去的时候,偷我们的车辆,另有一次他们几乎真把桑纳的卡车偷去了。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Rosen)乘“蜜蜂”号英舰到下关,但不准上岸,写了一封信托田中参赞转雷伯,询问德侨财产的情形。雷伯这样回答:五十余所德侨住宅,未经抢劫的只有两所,未被‘征发’的,只有大使和罗森博士的汽车。”

“12月22日,星期三。清晨5时,射击队又开始工作,我们听到清晰的枪声,在100响以上。夜间,日本兵又两次闯入院内,以刺刀威胁门警,冲破大门,值班的日本宪兵不加干涉。日本宪兵的代表却来告诉我们,1月1日就可以恢复秩序了。他们还向我们商借汽车和卡车。我偕史波林君走过离办公处很近的一个池塘,看见50个平民的尸体,反缚着手,其中一人被削去半个脑袋,恐怕他们是牺牲于军刀的罢?回来早餐时,路上又遇见一个酒醉的日本兵以刺刀威胁着一个青年会作家的父亲,他的老太太简直恐怖欲狂,我们不得不替他解围。我们到家后还未坐定,又赶往金陵大学建筑师季君(G. T. Gee)和鼓楼医院院长邓尼尔博士(J. W. Daniels)的住宅,日本兵正想强奸那里的女人,那些勇敢的日本兵竟越过铁丝网逃走,我们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裴志和李格斯两君也在早餐未毕前就赶往金陵大学蚕桑系校址去

驱逐日本兵，其中有几个是喝醉了的。我回办公处后，又接到史波林和德商礼和洋行代表克鲁治(Christian Kroeger)两君的紧急报告，一个酒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他们，生命危险。侥幸得很，田中参赞偕一日军高级将官同时到达。那将官打了醉兵几下嘴巴之外，大概不会再有其他惩罚。我们从未听到整饬纪律的事情。长官对不守纪律的士兵，往往是很客气的劝他下次不再如此。黄昏我和李格斯君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54岁的老妇。让妇女给日军蹂躏，固然于心不忍，可是我们也不能整天不离开她们呵。”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该厂共有54个职工，都勇于服务，直到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在江边)和记洋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其实是民营的)，便把其中43人拖出枪决。日方每天派人到我的办公处来缠扰，要找寻那些职工去恢复电力的供给。我听了吴君的消息后，可以这样告诉日方，他们的军人已经把该厂的大多数职工杀死了，我至少会觉得舒服一点。”

“12月23日，星期四。桑纳君今天受到日军的虐待，他到南京神学院斯密斯博士(Stanley Smith)的寓所里去，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兵正在撕去美国旗和日使馆的布告。他们强欲难民迁去，说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登记难民的机关。桑纳君当时的处境，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他终于被迫签具凭据，允许日军借用这房屋两星期。可是桑纳君决不是容易屈服的人，他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终于又把日本兵赶出。”

“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难民，又有70人拖出枪毙。毫无纪律，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手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常被捕去。”

“中午，办公处来了一个人，头部是烧焦了，眼睛和耳朵是割去了，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送他到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个人缚在一起，浇灌汽油，用火烧炙。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缚在外挡，所以汽油仅掠过他的头部，不久，医院里收到同样的病人，被炙的伤势更重。自然，他也死了。日军似乎曾先用机关

枪扫射,但也有人得免于死。第一人没有子弹的创痕,第二人就有。我住在鼓楼的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臂膀受着同样的火伤,睡在马路的转角。他在未死以前显然挣扎了那么远的一段路。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兽行。”

“12月24日,星期五。据美国大使馆华人某君(略去姓名)报告,所有住在使馆内的中国职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昨夜统遭日军搜劫,巴克斯登君办公室的大门给刺刀戳破,日军偷去院子里的三辆汽车,今天早晨又偷去两辆,其中一辆是孟根君的,昨天我曾允许借给田中参赞,因此我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他。”

“今天开始办理登记了。日军当局认为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2万人,他们定欲肃清这些‘恶鬼’。我向他们表示,剩留下来的中国兵,恐不到100人了。但无论如何,许多无辜的难民必须还要受难,他们都觉得恐惧不安。中国人组织的“自治委员会”,经田中参赞的出面邀请,昨天成立了,或者可以帮一点忙,可是奸细也已开始活动。难民区中就捉到了一个,难民群起加以痛殴,我救了他出来,锁在我们办公处的地下室,旋交给中国警察。中国警察怎样处置他呢?据我猜想,也许是绞死他,但我叮嘱他们要特别留神。”

“今天日军不断来骚扰,又有几个清洁队队员失踪,金陵大学看门的警察也给捕去,他们还是想偷我们的卡车。他们封了我们的一个煤栈,但李格斯君努力交涉的结果,煤栈仍得开放。”

“耶稣圣诞夕。克鲁治、史波林和德利谟博士(C. S. Trimmer)3人来偕我们共餐,炸牛排、甜番薯,滋味甚佳。雷伯不敢离开他的住宅,因为日本兵每天有许多次爬墙而入。他们既爬墙而入,他便教他们爬墙而出,不许他们走大门,他们如果违抗,他就向他们挥动他的国社党臂带,并指示他的国社党最高勋章,问他们是否明白那勋章的意义。这方法屡试屡验,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晚上,他走来,送每人一本精致的皮装西门子日记簿。威尔逊按钢琴,大家唱圣诞歌。”

“耶稣圣诞日。天气好极了,环境似乎也略略好转,街上行人渐众,有许多临时的货摊。我们邀请魏特琳女士,鼓楼医院鲍育女士(Grace Bauer)和金陵大学生物学系教员吴女士(Blance Wu)、白路莱夫妇

(Charles Bromley)的养女吴女士(Pearl Bromley Wu)等午餐。我们正围坐共尝烤鹅的鲜味时,却接到了三个紧急报告,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往金陵大学教授方恩博士(Wm. H. Fenn)的住宅、中国教职员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三处去驱逐日本兵。”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旗,昨今两夜,七个日本兵盘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强奸妇女。贴近我们的办公处,三个日本兵强奸一个12岁的女孩,一个13岁的小姑娘也遭强奸,待我们发觉,已嫌太迟。刺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医师报告,南京失陷后,向医院求治的共240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日军暴行的结果。”

“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扬言如果中国兵能够来自首,将罚做夫役,可以保全生命。约240人真来自首了,他们却全给捆载而去。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后佯装已死,乘机脱逃,到医院来求治。据他们说,一群给机关枪扫射,一群则为日军刺刀演习的靶子。常常有人在刽子手行刑后只受了一两处不足致命的创伤,他们睡了一整天,身上覆(盖)着同伴们的尸体,夜间设法潜逃,或赴医院,或往朋友的家中,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多。日本兵做事未免太嫌轻率呵!”

“12月27日,星期一。日军占领南京,今天已入第三个星期了。日清汽船会社从上海开到一艘轮船。该公司代表四人来访,谓长江不久可望正式恢复通航。随该船同来的,有许多日本妇人观光全城。她们向若干儿童散发糖果,似乎很觉得意,并为日本的惊人胜利而欣喜,自然她们对于真正的事实是一无所知。不过,据我猜想,恐怕全世界也是一无所知。”

“士兵仍然毫无纪律,军队和使馆间没有合作。军队方面甚至拒绝承认使馆所发动主持的自治委员会,对自治委员会的委员故意加以蔑视。据军队方面表示,中国人是被征服的人民,不应妄希恩惠。骚扰和暴行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而我们所未听到的或看见的,更不知有多少多少。”

“以下是今天所接到报告中的几件事情:约两星期前日军捉去一个13岁的男孩子,因为他的工作做得不满意,日军用铁棍打他以后,再用刺刀戳他。昨夜一个日本军官和两个小兵乘车闯进金陵大学,当场强奸了

3个妇女,并带去1个。日本兵闯入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许多次,搜劫难民,并强奸了20个妇女。鼓楼医院的夜班管理员给日军捕去,鲍育女士抗议无效,放火的行为仍未终止。今天,南城有两个基督教教会学校焚毁,德商‘起士林’糕饼店(Kiessling and Bader's)也起火燃烧。日使馆的警察长高谷却来向我们表示,今后将保护所有外侨的房屋,并偕史波林君去视察德侨的财产。在我们个人看来,他口头上的支票是很难十足兑现的。南京外侨所有的财产,差不多统遭日本军队的掳掠。日本再要向外侨提出什么要求,似乎是大可不必了。连外侨的汽车也为他们所窃取。我几乎忘记了一件事情,昨天我曾偕史密斯君去访问难民区外的英国大使馆,11辆汽车和两部卡车,均由日本兵不告而取了,所有仆从侥幸倒还平安无事。几乎每一条街口可以看到弃而不用的汽车、电池及其他东西,往往凌乱颠翻,不加爱惜。”

“今天却有一件愉快的事情,日清公司轮船带来邝富灼博士的一封信,由日使馆转交给我,这是过去三四个星期内我们许多人中间所接到的第一封信。邝君访问我们进行救济工作是否需要现款,并主张将各方响应国际扶轮会代我们发出的呼吁而慷慨捐助的现款,划出一部分。这十足是邝君的态度!我们确乎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我每一次想到不久需要钱的时候,就有一个暗影掠过心头,哪里可以弄到钱呢?”

“12月28日,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着的。草棚里可怜的难民,其境遇将感悲惨,因为大多数的草棚不能避雨,有些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竟难插足。不过这许多日来的天气,迄甚良好,总算还是幸事。”

“我今天共观察几处收容所,大多数很拥挤,当然内部也不能怎样干净。收容所的干事和助理员,都是义务性质,工作非常美满,维持难民的秩序,注意难民的膳食,对措置其他事物,也相当整洁。但这些收容所到底要维持多少时候呢?即使有一部分难民的房屋尚未被毁,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呢?秩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

“我今天第一次走到学校去,离开我的住宅不远。内部已颠江倒海,不成样子。物理实验室里的仪器,全部是故意损坏的,运动场上有死牛一头,野狗已吃去了一半。大门上的大使馆布告也不见了。”

“12月29日,星期三。天气较好,登记继续进行,但毫无效率,难民不知道何时登记,何处登记。日军又捕去认为是中国兵的难民。女人和老人向我们跪拜哭泣,恳求我们设法找寻她们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有几次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日本军人非常讨厌我们的任何干涉。关于下关方面的情形,据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告诉我们,江边的难民约尚有两万。我们在日军进城前交给他们的米粮,即将告罄,他们痛苦不堪,要求也到难民区来。可是难民区已经太嫌拥挤了,事实上日军不会允许到难民区来,也不会允许我们去设法援助。他们只好暂时忍受一切。”

“各国使馆门前终于有日本卫兵出现了。为什么不在两星期前出现呢?我们的住宅还是无人保护;有几处收容所的卫兵,与其说帮我们的忙,倒不如说给我们麻烦。他们要暖的火,要吃的东西,要取睡的床,还向难民要别的东西。”

“12月30日,星期四。我召集了某教会机关的18个仆人,付给他们的薪水,到下月15为止,叫他们另想别法。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人已服务多年,很善良忠实,我和W君希望待秩序恢复后,或可利用旧校舍做些小规模的事情。可是,我们中间留在南京的人太少,鉴于目前南京的物质环境,要建立起一个新的集团,并非易事。W君是设计住宅的优秀助理员,C君是收容所的优秀管理员,我们的仆人也都能各尽其能,各称其职。”

“午后我访问日本大使馆,使馆人员忙着向约60个中国人(多数是难民区收容所的干事)训示怎样庆祝新年。不能再用青天白日旗,一律改用五色旗,教他们去做1000面五色旗和1000面日本旗,难民在1000人以上的收容所,应派代表20人,较小的收容所,则派10人,元旦日午后1点钟,鼓楼上应悬五色旗。据预定的节目,有‘恰当’的演说和音乐,自然摇旗欢迎新政府的民众,届时将被摄入镜头。城内的火焰依然未息,十二三岁小姑娘被强奸或强抢的事情,又连续发生了三件。史波林驱逐办公处附近房屋内的日本兵,忙个不停,日本兵又大举捉人,在金大蚕桑系校舍四周布置哨兵线。”

“12月31日,星期五。比较安静的一天。晚间没有暴行的报告,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次,日方忙着准备庆祝新年,放假两天。我们

反而担忧,因为将有更多的日本兵狂醉。我们叮嘱难民不要出门。晚餐后,拉贝请我们全体到他家里,燃起圣诞树,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贺年片,贺年片上刻着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并由我们 22 人全体签字。他讲起在南非洲时若干冒险的故事,以娱来宾,墙上挂着几种庄严伟大的纪念品。”

“大除夕了,不禁想起家庭,想起亲爱的家人,谁都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一封家信。日本使馆人员告诉我们,恢复通航还要几个星期,所以我们显然仍须忍耐若干时。他们并谓至少在一个月以后,留在南京的任何外侨才能赴沪,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都已做了俘虏。”

“再继续叙述这个故事,继续叙述新年以后所发生的恐怖行为,似已无甚意义。今天是 1 月 11 日了。情形虽大见改善,每天却仍有暴行,而且有几件的性质是非常可恶。美国大使馆代表三人,6 日抵达南京,9 日英德两使馆也各有代表三人同来,我们因此觉得情形还更可改善。不过我昨夜驾车出外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内动手放火。从 12 月 19 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 20(英)里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和外界接触了,这是一大快事;上星期日,我就把各人的住宅接好电线,现在 we 是有电火了,我们的办公处在几天之前就有电火。但因为恐怕只许日本人有电火,所以我们并不张扬。我们看到上海日文报纸,还有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说早在 12 月 28 日,商店已纷纷开门,营业已恢复常态,日军协助外侨救济可怜的难民,城内中国匪徒已被肃清,南京已恢复安宁。要是当前的现实不是那样悲惨的话,我们都不禁要捧腹大笑!”

“以上的叙述并非出于仇恨的情绪。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一个民族想征服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据我从这一次战争的经验 and 1932 年淞沪战争的经验看来,缺乏基督教精神的日本军队,如今已成为一种野蛮的破坏的力量,目前不仅威胁着东方,将来也许会威胁到西方,所以全世界应该明了事实的真相。至于如何措置这个局势,我不想多说,还是让贤明的人士去考虑罢。”

“自然,我也不应该忽略光明的一面。中外友人都表现出惊人的服务精神,我们在共同工作中发生很密切的交谊。对于我们已做的或想做的事情,难民每一次都向我们表示感激,我们常常为之振奋。我们所遭遇的损失和困难,跟他们所受的痛苦比较起来,似乎轻微不足道了。三位德侨委员也引起我们的敬佩和感戴。他们确是一座坚强的堡垒,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怎样能够渡过难关呵!”

“将来怎样呢?最近的将来固毫无光明可言,但中国人除其他许多美德外,具有忍受苦难的伟大力量。而且,公理与正义必获最后胜利。总之,我个人永久愿与中国人共患难!”

(三) 甜蜜的欺骗和血腥的行动

去年12月的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50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12月31日所拟草稿,以及1月3日所留记录,于1月25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12月20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走到后面去。你们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己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若干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向我商议,可否借用

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域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怖,我几乎相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那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个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人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记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事情的地位较高。其中一人对于已经进行的事情非常不满,他昨天曾到学校里来,他的举止既粗鲁,又拙笨,因为这一个区域内的宪兵归他指挥,所以我们时常领教他的恶劣行动和鲁莽办法。将近5点钟的时候,两三百个自告奋勇的难民,终于给卫兵分为两队,押解出去。其中一人在事后宣称,他开头就怀疑若干卫兵所表示的非常的礼貌。”

“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受了五处刺刀的伤痕,到鼓楼医院求治。以前,他曾经明白说过两次,他是收容在图书馆内的难民。据他报告,他在街上为日军所捕,加入来自网球场的一队难民。晚上,在城西某处,130个日本兵用刺刀屠杀同样的500个俘虏,多数是给戳死了。苏醒后,日本兵都已走去,他在暗中爬行。他不熟悉城西的情形,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27日早晨,又送来一人,据他报告,昨天给日军拖去屠杀的两三百人,只有三四十人未遭毒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求我援救他,和正在听候登记的几个同伴。因为我的周围全是宪兵,不便表示,所以我对他说,这一天的登记限于妇女,目前不必多讲。后来,我曾去查询三次,但毫无下落。”

“27、28两天内,我听到并查究若干旁人的报告。据称,那两三百个难民中的一部分,被缚成几队,5个10个不等,从某巨厦的第一室内鱼贯送入第二室(也许是一个院子),那里正火光熊熊,每一队走进后,外面人就可以听到呻吟和惨喊,但没有枪声。原来是60人,剩下的20人拼

命冲破墙壁，狂奔逃命，另外一部分人则据说因五台山和尚的恳请而苟延残喘。这里必须明白指出，这些间接的报告，一部分是和尚供给的。李格斯在26日傍晚，听到同样的报告，照时间推测，这应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否则不会如此迅速。这些报告重复混淆，似难完全相信，几次进行查询，也无甚结果，而其他许多事务和许多问题，又每天紧迫而来，使大家无暇兼顾。”

“12月31日，有两个人走到图书馆收容所，向一位可靠的助理员某君讲述这一件事情，并要求援助，某君告诉我的时候，表示可以唤他们来证实。其中一人坦白承认他是当兵的，这显示出他的诚实。据他们说，校内押解出去的两三百个人，给分成许多小队。他们一队先解到五台山，再解到汉西门外的秦淮河旁，一架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他们俩跌倒了，一人受伤，身上溅满了死者的鲜血。”

“1月3日，图书馆收容所中五个相识的难民，终于逃出了12月26日那一次的劫难，走了回来，我和他们中间的两人接谈。一个是第一批押解出去的，他证实了上面所讲五台山附近日军使用火刑的事情。据他估计，被杀的约80人，逃出的有四五十人，一个给刺刀戳伤的，也在图书馆收容所内，他可以报告同样的事实。”

“还有一个人异常聪明。不论叙述经过或答复问话，都很清楚而不会混。他是第二批押去的，押解到五台山上一个庙宇对面的巨宅内，（据相当可靠的推测，这地方是上海路上两所大厦之一，南面离开美国学校很近）。他看见许多中国和尚与一个日本和尚苦苦祷告，并在庙门口铺着长长的纸条，当时心里就很惊骇。（他说南京有一个日本和尚，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怀疑地问他怎样知道那和尚是日本人。他说那和尚的鞋另外劈开了一个大脚趾的地位，旋悉他曾久居天津，故能有此认识。几天后，我亲自在上海路上看到这样的和尚。）他觉得凶多吉少，便向一个态度和善的卫兵，表示忧虑。卫兵静静地用棒子在地上划出几个大字：大人命令。”

“他身旁三十多人（没有讲到其余的人），用铁丝缚着手腕，两人一起，解往汉中门，渡过秦淮河，四五个人因有墙垣可以掩护，便在黑暗中挣扎脱逃，设法藏躲。月色微明，约在午后一时，他听到从北面送（传）过

来的凄惨的叫喊声。天明,他向北走了不多几步路,看见尸体横陈,满身是刺刀的伤痕,恐怖万分。他终于安全经过汉中门,潜回难民区。”

“对于这个人的叙述及其所提供的证据,我还可以附加两点。第一,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人曾要求我们到汉中门外去察看许多尸体。第二,据国际委员会的克鲁治君告诉我,他一早在汉中门外冒险行动时,曾目睹那些尸体,但从城墙上,则一无所见。现在城门是关闭了,不能出去。这一个人所以如此直率向我叙述一切,实在因为他就要去登记,他已预先感到登记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困难。我记得是在1月7日,校内又举行公开的登记,日本宪兵又从他们面前的难民中间挑去了10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在那一个星期内,负责登记的日本军官,似乎获得上峰的命令,每天须这样才能消差,似乎觉得不足此数就不能使上峰满意。当然,自动承认曾服兵役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了,而登记的手续也已与最初大不相同。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密切注视登记的种种情形,在任何时间,只要为日本军官及其性情所许,总想援助受难者。我看见他被日军挑出后,曾替他间接设法,但无效果。我又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一个态度最好的军官恳商,表示我认识那一个人和最有释放希望的另外一人,是否可由我担保(不无勉强之处,请那位军官原谅)。第二个人是释放了,我真认识的人则不准释放,不知何故。再度努力,又碰了壁,我不得不适可而止,以免连累了他人。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死亡是最可能的结果呵。”

“据图书馆收容所内两个难民的间接报告,在三汉河附近沿秦淮河北岸,有几百个人被日军用刺刀戳杀,只有他们逃了出来。”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两星期内所发生的同样事情,不知有多多少少,本文所述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在作风上,这两星期内也有重要的转变,现在是把他们认为曾服兵役的难民,不管是否冤枉,加以集体的屠杀。照国际公法,如无严格的军事上之必要,俘虏的生命须加以尊重,但这里不是讨论国际公法条文的地方,日本军人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他们早把国际公法搁到脑后,他们公开承认是为了复仇,为了要给现在占领南京的军队中已告阵亡的同伴们复仇。其余许多次被屠杀的难民,远过此数。在目前的环境下,我有两种特殊关

切的事情：第一是日军用完全不顾信义的手段，使难民葬送他们的生命；第二是我们的财产、全体人员和难民，与这种滔天罪恶的各阶段，均有苦痛的密切关系。关于那一次屠杀，在方法上、地点上以及时间上，全部证据非常充足，其他几次同样有许多难民一去而不复返，但我们只有简单的报告。据各方面的情形推测，那一天从校内拖出去的难民，大多数是在一个晚上处死的，其中有若干人则并入由它处移来的待决的受难者。”

“因为过去两星期内的种种暴行，我迄今还很难通过网球场。每天有几千难民送到校内，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对付在这一幕悲剧中占据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以笑脸相迎，并谦恭有礼，接连要许多天，这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成为屠杀那二百多人的从犯，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要是那些家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话。”

“那些日本军官和士兵到底是怎样人呢？有几个比较我们所接触的暴徒要仁慈得多，谁无妻儿？他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爱着自己的妻儿呵！”

（四）恶魔重重

提供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材料的某君，又于1月10日，即在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个月后，写信给他的朋友们。报告情形如下：

“各位朋友：因为救护‘巴奈’号的一艘美国海军曳船驶往上海，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次开出的外国船，我趁着这个机会，在奸淫妇女，刺刀戳人和任意开枪的纷乱环境中，又匆促写下了这报告。请上海的朋友们向总领事馆领取，设法直接交外国船带出，免受日本方面的检查。”

“新年以来，难民区内的情形已经和缓不少，但最大的原因还是由于大批的日军已开往它处，所谓‘恢复纪律’，真是无从说起，甚至派来协助‘恢复纪律’的宪兵，也强奸劫掠。忽视所负的责任。只要新的军队开到，或当局依然优柔寡断，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发生新事态的可能。日本方面还是没有确定的政策。本星期内，日本方面终于允许各国使领馆，可以派员重返南京，似足以表现对于安定现状的一种愿望。”

“1 万以上的非武装人民,已牺牲于残酷的屠杀中了。许多可靠的朋友们认为决[绝]不止此数。实则据掩埋的统计,尸体共达 4 万具。在牺牲者中间,一部分是中国兵,他们已经抛弃了枪械,或因不及退出而做了俘虏;许多平民甚至毫无当过兵的嫌疑,也随便加以枪决或刀戳,其中妇孺也不在少数。据几位精明的德国同志估计,强奸的事情,达 2 万次。我则以为至少有 8 000 次,这当然只是最低限度的估计。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 100 次以上强奸案的详细纪录。以及约 300 次强奸案的确实报告,苦痛与恐怖的情形,简直使你难于想像。校内被强奸的,有 11 岁的女孩子,和 53 岁的老太婆。在神学院内,17 个兵白昼宣淫,连续强奸 1 个女人。实则三分之一的强奸是在白天干的。”

“城内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遭日本兵搜劫几次,即美国、英国、德国使馆和大使住宅,以及外侨财产的一大部分,也未能幸免。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银钱、钟表、地毯、字画以及其他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他们搜劫的对象。现在还是如此,尤其在难民区以外。南京的店铺只有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用仓库未蒙日军光顾。大多数的店铺先由日本兵争先恐后地打开大门,略事偷窃,于是在长官的监视指导之下,有计划地用卡车搬运一切,再付之一炬,现在每天还有几次火警。许多住宅给日本兵故意焚毁。日本兵放火用化学的引火物,我们有几种样品,就是他们放火的步骤,我们也一一目睹。”

“大多数难民所有的银钱,都给抢去,他们仅有的若干衣服、被褥和食物,至少遭日本兵夺取了一部分。这真是毫无心肝的行为,使难民在最初一星期到 10 天内,露出沮丧绝望的神情。店铺和工具是损坏了,银行是没有了,交通是断绝了,几条重要的街市是化为焦土了,一切东西都给抢劫净尽了。饥寒交迫的难民就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们不难想像此间工作与生活的实际情形呵! 此间共有难民约 25 万人,几乎都在难民区,其中 10 万人的食住两项,完全要靠国际委员会供给。其余难民或赖以私藏的一些米粮过活,或赖以直接间接抢来的若干东西苟延生命。日军攻陷南京后,虽然焚毁了若干小规模仓库,同时却也没收了大批中国政府所存储的粮食,如今日军为了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开始出

售一小部分。但此后如何呢？我向日本官方问起通邮通电的情形时，他们说：‘毫无计划。’”

“国际委员会确乎是难民的一大帮助，它的本身也等于一个奇妙的故事。三位德侨最为出色，我几乎也想挂起国社党徽章，和他们保持友谊。在筹备难民区的初期，一位荷侨和三位英侨，出力不少，可惜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以前，他们因所服务的公司和他们的政府强欲他们离开而退出了。因此工作大部分落到美国教士的身上。我们这些美国教士，没有一人置身事外，没有一人不参加医院的紧张工作，医院里是常常塞满了受子弹伤或刺刀伤的难民；自然，我们中间几个人另有不同的责任或不同的责任感。最初的时候，我们获得中国人士的许多帮助和合作，而且许多事务也必须假手于中国人士。不过，有几个时期，如无外国人挺身而出，和日本兵抗争，简直什么都不能搬动，甚至装了米的卡车也不许通行。我们确曾冒过很大的危险，有几次看来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却也终于能够完成任务。我们照顾难民的食住两项问题，查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而向日方交涉抗议，并努力保护难民区的安全。除了这些一般的工作外，我们还阻止了许多次的抢劫，劝阻或吓走了许多次强奸或想强奸的日本兵。日使馆人员曾对我们说过，日军长官以为在许多中立国家人士监视之下来完成占领中国首都的任务，实可愤慨。据他们判断，世界历史上关于占领情形的记载，从没有说过老实话，这话自然是不准确的，却也不足为怪呵。”

“有时我们因受挫折而失望，但成功的次数往往超过失败的次数，足以鼓励我们更大的努力。我们不必否认，我们和日军的关系，在若干地方很不圆满，但因为日使馆人员竭力设法避免日军与外侨利益的摩擦，因为日使馆警察相当谦逊（仅指少数而言，并非都是完善的），因为办理这一种事业的主要人物是参加反共公约的德国人和日方觉得在‘巴奈’号惨案后亟须加以安慰的美国人，我们确乎获益不少。鉴于损害财产和侮辱国旗事件的层出不穷，我们曾两次以委婉的措辞，请求美国使馆派员来京，此项请求均遭日方扣留。本星期的情况虽略见好转，实际上我们却仍与外界隔离，甚至不能到郊外和江边，我们仅可从使馆方面偶而收到美国海军无线电所发出的几条消息。”

“12月1日后,没有接到过邮件,迟钝极了。经过特殊的接洽,从昨晚起,我们有电火了(因为美侨7人与电灯厂职员有私人关系)。日军诬称电灯厂的职工是公务人员,54人中有43人已被枪毙。飞机大炮轰炸后,继以纵火焚烧。在这情形下,公用事业难于迅速恢复,自在想像之中。而工人及其家属的没有保障,实为公用事业难于迅速恢复的主要原因。水要靠电力帮助抽取,我们在低区另外找到了一个水源。大家不妄想有电话,或公共汽车,甚至不妄想有黄包车。难民区的面积约2方里,^①还有尚无房屋的空地。难民区内未发生火警,除了日本兵的骚扰外,也未发生罪恶或暴行,直到本星期,才有若干难民向难民区外的空屋搜索,主要是为了燃料。区内没有宪兵。”

“金陵大学各部,共收容难民三万人。即使维持他们的最低限度生活,管理问题也非常棘手。校内的正式职员和校役很少,做的工作都很出色。有许多自告奋勇的人,纷纷投效国际委员会,其动机却相当复杂。告密恐吓以及收买汉奸的事情,时有发生。我最近就经历了三件不易应付的事情,我怀疑他们要使我和学校陷入困境。过去三天内所发生的两件事情,涉及我所提出关于金大附中的损失报告,他们使我的报告自相矛盾,这样我便有欺骗日本人的嫌疑,并且离间我和该收容所负责人的感情。另外一件事情的经过如下:给我们充当舌人的一位青年,活泼善良,他拒绝日军的要求和威胁,不愿离开金大附中收容所,乃为日军所执,绑去枪毙,我赶往一个可怕的宪兵司令部探询,给他们用暴力推入门内。原来,该处有一个宪兵昨晚从金陵大学拖出一个女人想进行奸淫时,恰巧我们的李格斯撞入,那宪兵便以刺刀相向,然后痛快地把女人强奸。所以,我们不怕困难,竭力挣扎,希望对于这些可怜而又最能忍受痛苦爱好和平的人民,能够有所帮助,但你们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恐怕不易真切了解其风味罢。”

“当5万以上的日军在南京横行时,宪兵只有17人,有许多天连一个宪兵的影子都看不见。后来有若干日本兵缚上臂带,标明宪兵,这样他们就获得作恶的特别便利,可以阻止若干普通的干涉。据我们所知,

① 原文如此。

因强奸而被长官捉获的日本兵,除受一顿责骂外,毫无其他惩罚;抢劫东西的士兵,向长官举手致敬就算了事。有一次晚上,用汽车向金陵大学袭击,实际上是由军官领导的,他们缚住了我们的看门人,强奸3个女人,其中一个只有12岁,临去时又带去一个。”

“L女士相信我已经死在‘巴奈’号炮舰或已经受伤了,因为我留居南京的报告,她没有接到,同时东京报纸也预料所有外侨都已乘炮舰和汽艇等离开南京。但痛苦了48小时以后,她终于在某日报上看到两个傻瓜于日军进城不久时,向我访问的记载。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恳商,该报于17日特派几个访员和一个摄影记者来华。(查日军于13日进城,‘巴奈’号于12日炸沈,消息传出已迟)。元旦日,我接到他们从上海带来的一幅画和一封信,后者自然已经使日馆人员仔细研究。因此我们互相解除了忧虑的心思。11月8日以后,她曾用种种方法,写给我许多次信,打过许多次电报,但除了该信以外,我没有接到任何外来的音讯。12月17日,她希望能于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从东京到上海,但后来就迄无消息。最近美国炮舰带来一具无线电,我希望可以收到上海方面的若干消息。”

“不过,日军现在不许我走出南京的城门,即使交通工具不成问题,日军也不会许她从沪西动身。我们不知道这情形究将继续多少时候。中国人恐美侨或所有外侨被迫离开南京,深为忧虑。日本人方面,则既恐我们留居南京,更恐我们离开南京。目前,我竭力设法和日使馆人员,半官地位的若干日本人,以及比较不残暴凶恶的若干日本军警,保持友谊。但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呵。南京沦陷已经四星期了!要是我们懂得其中滋味,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炮弹和炸弹并不如何讨厌。然而,前途又怎样呢?”

“再者,这一封信的杂乱无章,正与外面的情形相同。我应该早就提及,中国军队根据了一种军事计划,曾焚毁城外的许多村庄和街市,并略有抢劫食物的事情;当时大家对于中国军队不可避免的溃退,对于巷战的准备(实则巷战迄未发生),以及可能对于平民的损害,均深深感觉不安,但除了这些不安的感觉以外,确乎并未发生重大的骚扰。……比较地观察,中国士兵十分良好。”

“不用说,这封信并不欲刺激日本人民的恶感。日本军队常用虚伪的宣传掩饰罪恶,如果信内叙述的事实说明了日本军队的不必要的暴行,那也无可奈何。在我看来,最重大的事情还是这一次侵略战争所造成的苦难,这苦难因放纵与愚蠢的结果而倍增,并且将投入悲惨黑暗的未来。”

下面一封信写于一星期之后,虽不及前者那样具体,但能传达出当时的情景和空气,所以也有引用的价值:

“自你离开南京后,情形已大起变化,我们的学校关门了,教员和学生纷纷向安全的地方或比较安全的地方避难去了,留在南京的人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国军队撤退已属无可避免,我们大家预料中国军队撤退时,不免发生若干纷扰,甚至难免抢劫。难民区是成立了,全城的难民纷纷迁入。难民区的四址,南以汉中路为界,东以中山路为界,北以山西路为界(实则还在山西路以北),西以西康路为界(该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西,越山而至上海路和汉中路的交叉点)。这一条直路形成难民区的西南界线,经过神学院的男生宿舍。但据我们想来,靠边的房屋当与界内的房屋同样安全。南京所有的人民,几乎全数迁入界内。每一个房屋均有人满之患。因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没有负责人,我便请估衣廊美以美教堂的牧师移居女教职员宿舍,担负那一方面的责任。这样,我们放心不少。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所收容的难民约4 000人,神学院内的难民也在3 100人以上。自然,有许多人是住在狭窄的芦席棚内的。整个难民区其实已成为芦席棚的世界。所有公共机关和私人住宅,已经不再有余地。”

“日本军队初临南京时,我们都以为秩序不久就可恢复,和平不久就可再见,难民不久就可重返其居,仍过平常的生活。可是,结果却大谬不然,使我们惊奇万分。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像的任何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一一实行。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南京等于是活地狱,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人,都不安全。日本兵看见了任何东西,欢喜的拿了去,不欢喜的就加以破坏,看见了任何妇女就公然加以奸污,反抗者立遭戮杀或枪毙,不愿被强奸的妇女,或在身旁麻烦的孩子,日本兵都饷以

刺刀的滋味。一个日本兵强奸佛兰(Fran)宅内的一个女人时(宅内共有避难者约150人),四五个月的婴孩啼哭不止,那日本兵便把婴孩活活闷死。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一个姑娘,被强奸了17次。后来经我们交涉结果,日方派兵驻守规模较大的收容所门口,可是,那些卫兵也常常进去强奸妇女。每天每夜我们接到日军强奸妇女的报告,强奸的事情层出不穷,造成了令人难于置信的恐怖故事。”

“我们仍然怀着希望,希望较好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究竟什么时候呢?我们却不能预料。许多人的家宅是焚烧了,现在还有许多店铺房屋在火焰中燃烧着。每天每夜我们可以看见城内的火焰。太平路和中华路一带几乎全成焦土了。讲堂街的教堂和青年会也已付之一炬。所以,即使难民可以重返故居,一大部分的人也已无家可归。听说新华村也已遭难,但乡村教会训练所似尚安全存在。”

“难民区内的难民总数恐在15万人以上,我们自己的收容所也有6万人以上的难民,这样一个重大的难民问题,落在我们的肩上。6万个难民中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供食,而我们的存粮又不多,如不能设法增加存粮,这些难民一定不能避免非常严重的饥饿恐慌。国际委员会现在所有的米仅足够维持三星期,三星期之后怎样呢?我们毫无把握。日军曾没收许多中国人所存储的米,我们向他们商买若干,他们不肯,显然预料战争一时不能结束,准备自用。我每天忙着向几个中心分配饭米,李格斯忙着向各厨房分配柴煤,其余诸人也各司其职,大家协力苦干,以期尽可能的改善现状。我们的工作是相当艰难的,但我们信赖上帝,不稍畏缩,我们坚信上帝会保佑我们。”

“圣经师资训练学校的仆人,即三个校役和你的一个仆人,问起斯密士女士究在何处,因为他们都要工钱了。我告诉他们我将向你接洽。他们的工钱我可以按期付给,无须顾虑,这笔账我们以后再算。神学院方面的经费,包括各部分房屋看管人的生活费,也由我负责,经费问题目前倒不是我们的主要困难。在这艰苦期间,我们所有的仆人都十分忠诚相助,殊堪欣慰。”

“英国大使馆某君今天动身赴沪,我托他带上此信。英使馆若干人员不久将乘坐炮舰重返南京,有信乞交英国驻沪领事馆转来。”

“再者，不消说得，我们的住宅——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均遭搜索，不过房屋的本身所受损失尚微。日军入城前，曾有炸弹一枚落在离开成婚学生宿舍 50(英)尺之处，稍有损伤。书籍和笨重家具损失尚少，但较为轻便的东西如衣着、食物、珍饰、被褥、脚踏车、汽车、牛、马、猪、鸡、牲畜等几乎一扫而空。不过，这故事讲起来实在太冗长了，也太痛心了，还是搁笔罢。

敬祝贵夫妇康健。

某某 1938 年 1 月 16 日于南京。”

[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汉口 1938 年版]

(杨 明 译)

2. 外文资料中常见外国人士姓名对照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Miner Searle Bates	M. S. 贝茨	贝德士	裴志、裴滋、贝特斯	美国	金陵大学
H. J. Timperley		田伯烈	丁伯莱、丁伯烈	英国	曼彻斯特卫报
Grace Bauer	格雷斯·鲍尔		格瑞丝·鲍尔	美国	金大医院
John Moore Allison	阿利森		爱利生、亚立逊、阿里逊、爱理逊	美国	美国大使馆
Arthur Menken	门肯		阿瑟·孟肯	美国	派拉蒙公司
C. Yates McDaniel	耶茨·麦克丹尼尔		叶兹·麦克丹尼尔	美国	美联社
Hallett Edward Abend	阿本德		哈立德·埃邦德	美国	纽约时报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George A. Fitch	乔治·菲奇	费吴生	费奇、费区、费尔生、菲思	美国	基督教青年会
Ernest H. Forster	厄恩斯特·H·福斯特		福斯多、厄内斯特·福斯特、欧内斯特·福斯特	美国	圣公会
James Espy	詹姆斯·埃斯皮			美国	美国大使馆
J. M. Hanson	汉森		翰生	丹麦	德士古石油公司
Trautmann	特劳特曼		陶德曼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R. R. Hatz	R. R. 哈茨			奥地利	安全区机械师
R. Hempel	R. 亨普尔		黑姆佩尔	德国	北方饭店
Iva Hynds	伊娃·海因兹			美国	金大医院
Frank Tillman Durdin	德丁		F. 提尔曼·杜丁	美国	纽约时报
G. F. Rosen	罗森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Christian Kroeger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		克罗戈、克鲁格、克鲁治、克罗格	德国	礼和洋行(卡洛维兹公司)
James H. McCallum	詹姆斯·麦卡勒姆		麦卡伦、麦考伦、麦加伦	美国	基督会
John G. Magee	约翰·马吉		梅奇、马约翰、马冀、麦琪	美国	圣公会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Archibald T. Steele	阿奇博尔德·斯蒂尔		阿契包德·斯提尔、A. T. 斯提尔	美国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Ivor Mackay	麦凯		麦寇	英国	太古公司
W. Plumer Mills	W. P. 米尔斯		米尔士、密尔士	美国	长老会
G. Schultze Pantin	舒尔茨·潘廷		舒尔彻·潘丁、舒尔兹·潘亭	德国	兴明贸易公司
J. V. Pickering	皮克林	毕戈林		美国	美孚洋行
Cola Podshiv-oloff	科拉·波德希沃洛夫		普特希伏洛夫、克拉·波德希伏洛夫	白俄	桑格伦电器商行(桑德格林电器商店)
John H. D. Rabe	约翰·H. D. 拉贝	艾拉培	雷伯、拉比、锐比、诺波	德国	西门子洋行
Charles H. Riggs	查尔斯·里格斯	林查理	李格斯	美国	金陵大学
Lewis S. C. Smythe	刘易斯·S. C. 斯迈思		史迈士、史密斯、史迈斯、路易斯·S. C. 史迈士	美国	金陵大学
L. C. Smith	史密斯		莱斯利·史密斯	英国	路透社
Hubert L. Sone	休伯特·L·索恩	宋煦伯	宋尼	美国	金陵神学院
Eduard Sperling	爱德华·施佩林		史波林、斯伯林、斯波林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续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Willey Noebel			奈贝尔	德国	德国驻日使馆
Sauken			绍肯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Fischer	费希尔		菲舍尔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Scharffenberg			沙尔芬贝格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Altenburg			阿尔滕布格	德国	德国驻华领馆
Dirksen			迪克森	德国	德国驻日使馆
Newiger			内维格尔	德国	德国驻华使馆
Albert N. Steward	艾伯特·斯图尔特	史德蔚	司徒华	美国	金陵大学
C. S. Trimmer	C. S. 特里默		德利谟	美国	金大医院
Mrs. P. D. Twinem	特威纳姆	戴 籍 三夫人	特文兰太太、德威南夫人、特威兰、杜南夫人、特维内姆	美国	金陵大学
Minnie Vautrin	明妮·沃特林	华群	魏特琳	美国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Robert O. Wilson	罗伯特·O·威尔逊			美国	金大医院
Reverent Jacquinet	雅坎诺	饶家驹	饶神父	法国	上海法国教会

续 表

姓 名	新华社译名	曾用中文名	其他译名	国 籍	机 构
Aug. Zautig	A. 曹迪希			德国	起士林糕饼店（基士林克和巴达公司）
A. Zial	齐阿尔		塞尔	白俄	安全区机械师
Prideaux-Brune	普里多-布龙			英国	英国大使馆
Jeffery	杰弗里			英国	英国大使馆
Shunroku Hata	畑俊六			日本	日本陆军
Hongo	本乡（忠夫）			日本	日本陆军

说明：上述译名在不同的历史资料和翻译中被采用，此处特作汇集，以便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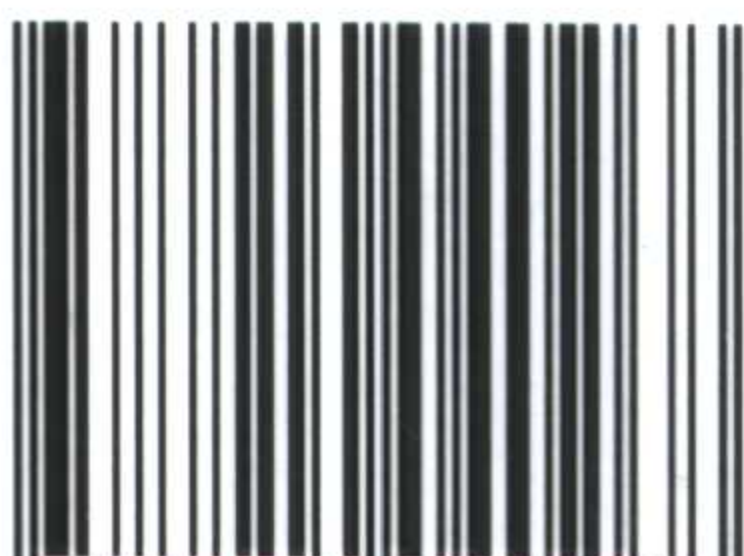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④ 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



ISBN 7-214-04026-3



9 787214 040268 >